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DIAOSHANZHONGHUN

# 雕山忠魂

贺晋年

英烈事迹、遗文（墨）、回忆纪念文章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DIAOSHANZHONGHOU

雕山魂

刘润涛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



英烈事迹、遗文（墨）回忆纪念文集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DIAOSHANZHONGHUN

雕山忠魂

贺晋年

英烈事迹、遗文（墨）、回忆纪念文章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雕山忠魂 / 《雕山忠魂》编委会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ISBN 978-7-224-09710-8

I. ①雕… II. ①雕… III. ①师范学校—优秀教师—生平事迹—绥德县 ②师范学校—模范学生—生平事迹—绥德县 IV. ①K825.46 ②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970 号

## 雕 山 忠 魂

---

编 者 本书编委会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25 印张 10 插页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710-8

定 价 46.00 元

---



SUIISH



歷史不會忘記綏師  
綏師不能忘記歷史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任：冯泽福

副 主 任：武 军（常务） 尚品山 马海树

陈彦荣 马润喜

委 员：张 杰 闫宏谋 刘联春 张治雄

张雁兵 康 宏 赵生筱 冯 毅

曹莉霞 曹道勤 丁许浩 马 瑞

李维宇 张仰峰 张恩军 贺向党

延晓强 周俊兰

主 编：武 军

副 主 编：张 杰 闫宏谋

执行主编：张 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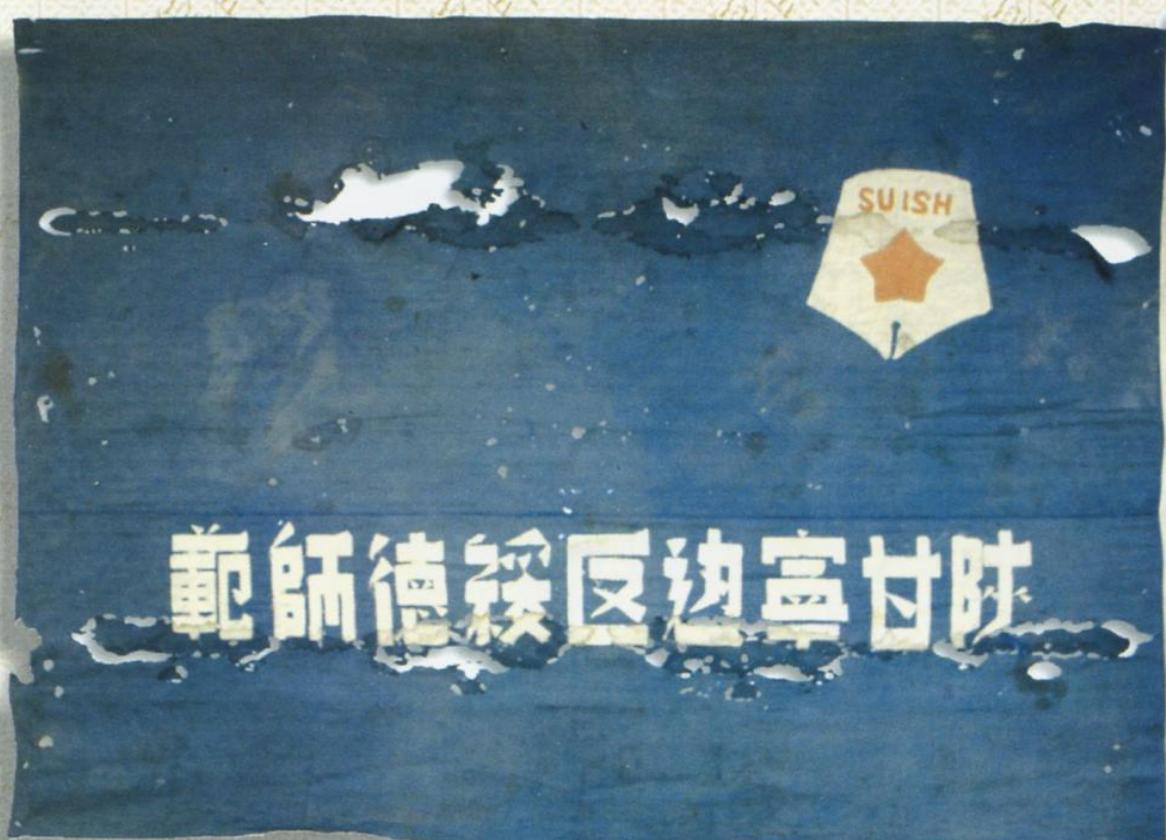
李子洲校长



20世纪30年代校徽



20世纪40年代校徽



20世纪40年代校旗

奮鬥  
無窮  
無窮

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

發奮圖強  
百折不回

1941年8月，毛澤東同志為綏師學生代表題詞

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

革命英才的摇篮

吕仲勋

二〇〇〇年七月五日

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吕仲勋同志为绥师题词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马文瑞校友为绥师题词

陕北革命的策源地

—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马文瑞题

二〇〇〇年六月一日

革命摇篮  
育才基地

庆祝绥师建校七十周年

刘澜涛  
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

何培碧同志商教处处理。  
李鹏总理  
你好!  
四月五日  
(陕西和教字左有字号)  
陕西省榆林地区绥德师范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也是我的母校。该校创建于1923年,是唯一保留的一所陕甘宁边区中专学校。由于诸多方面原因,学校仅占地18亩,办学条件之简陋,让人难以想象。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榆林地区决心另址迁建,年内便可动工。除上级下拨及自筹的款项外,尚有一千万元的资金缺口无法解决。请总理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此事,尽可能地批一些钱给他们。  
请向心和国防教委呈报。  
何培碧

贺晋年  
1997.4.8.

47886

李鹏字, 号  
明, 年, 月, 日

1997年4月16日

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校友为绥师题词

李鹏总理为贺晋年校友就绥师迁建资金的信件批示

賀綏德師範學校創建八十周年

八十載英才輩出  
新世紀再創輝煌

二〇一三年三月廿六日 遲浩田



祝賀陝西省綏德師範學校建校八十周年

發揚革命傳統堅持教育創新  
為西部大開發培養優秀人才

彭珮云二〇一三年三月

自古驚心無定河艱難苦恨英雄  
多春風吹醒花千里舊園育出村  
翁探回首豐碑已算立遠瞻芳跡  
須爬坡陽光正好群情奮廿載來  
吟百歲歌

綏德師範建校八十周年 許嘉璐賀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  
同志為綏師題詞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珮云  
同志為綏師題詞

國務委員、國防部部長遲浩田  
同志為綏師題詞

陝西綏德師範學校建校  
八十周年題

奮進

一九八二年七月廿六日  
黎夫

原中顧委委員、裝甲兵副司令員晉年校友為綏師題詞

參加延安綏德柳友茶話會  
飲水難忘掘井人 秦陽甯師著銘  
雕陽志院柳秀純 古城長安夕陽紅  
桂其光臨六十表 當年師生刺心感  
幸存尤須重晚晴 扶正柳柳常換磨  
李子洲 陽修軒 郭江三三位老師  
辛卯黎夫 五六年二月廿六日

陝西省黨史資料編纂委員會

原中顧委委員、陝西省人大副  
主任常黎夫校友為綏師題詞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南海合影。后排左一为安子文校友，左二为刘澜涛校友



刘澜涛校友(右二)于1985年在绥德县委书记李凤扬(左二)陪同下回母校。右一为冯祖仁校长，左一为王旭亮副校长



马文瑞校友(右二)于1997年偕夫人回母校。图为和张怀泽校长握手话别

教育家，原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委科教部部长，绥师原校长刘宪曾同志（中）于1983年回绥师故地重游



贺晋年校友（左）于1982年回母校。图为在孙秉悦校长的陪同下察看校园

曾经在澳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爱国女杰，原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校友（左三）和江泽民、何厚铨等在一起



2002年，原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校友为绥师题词



1998年，原全国政协常委、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校友（左三）在原陕西省委政法委书记霍世仁校友（右三）陪同下了解母校绥师新址建设情况。图为听取张怀泽校长（右四）、宋永华书记（后中）的汇报



2001年，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安志文校友（左一），原物资部部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柳随年校友（右一）和唐洪澄校友之子贺光辉（左二）回母校了解新址建设情况。由宋永华校长（右二）陪同



# 绥师在京师生校庆联欢会合影留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六日



1986年，绥师在京校友聚会合影。前排左起：马国骥、黄永平（绥德县副县长）、白烈飞（白明善之女）、汪洋、霍世仁（榆林地委书记）、刘燕平、黄翠英（李国璋老师夫人）、刘采石（老师）、张达志、刘宪曾（校长）、刘澜涛、贺晋年、李平（将军）、潘开沛（老师）、周云琛（老师）、柳随年、白介夫、安致远、常紫钟、李冰洁（老师）、任远



2000年6月10日，齐心校友（习仲勋夫人）在陕西省委常委栗战书（右，今贵州省委书记）及榆林地委书记马铁山（后左二，今广西自治区政协主席）陪同下回母校。图为听取宋永华校长（左二）的情况汇报



1986年正月初八，西安绥师校友尊师敬老茶话会合影



2006年，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左二）在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后左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培仓（后左一），绥德县委书记曹世玉（右一）的陪同下视察绥师。图为宋永华校长介绍情况

2008年，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全国政协常委黄静波同志（右）在原榆林市人大主任黄文选同志（左三）、市委副秘书长崔高兴同志（左一）陪同下视察绥师。学校党委书记武军同志（左二）作陪



2006年，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伍绍祖同志视察绥师。图为伍绍祖同志为绥师题词



1993年，姜信真副省长（左）在榆林行署副专员赵兴国同志（中）的陪同下视察绥师。张怀泽校长（右）作陪

1995年，范肖梅副省长（中）在榆林地委常委、教育局局长刘建胜（左）陪同下视察绥师。图为听取张怀泽校长的情况介绍



2000年，陈宗兴副省长（左二）在省教委主任刘炳琦（右一）、榆林地委书记马铁山（左一）、榆林行署专员张智林（左三）、绥德县委书记曹世玉（左四）陪同下视察绥师迁建工程。图为听取宋永华校长（右二）的情况汇报

七八级毕业生为母校捐资修建的反映学校光荣历史的大型浮雕《光辉历程》



## 序 言（一）

绥德师范学校从创办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了。在七十周年校庆前夕，为了回顾学校光荣的革命历史，为了纪念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为了使一些校友能有机会回忆当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学习、战斗和成长的过程，学校编辑出版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热烈地祝贺。

绥德师范学校创建于1923年。她一诞生，就由李子洲、王懋廷等先烈撒下了革命种子，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从此，革命种子就在这所学校生根、发芽和成长。学校七十年间大体经过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反动势力统治下办学，后一阶段在革命政权下办学。

从1923年到1939年这段时期，绥德地区由当地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动当局经常对学校的革命势力进行摧残，曾经两度解散学校，怀有革命热情的学生乘机深入农村，点燃了革命烽火。有的同志在革命中牺牲了，生者在继续战斗，直到革命势力发展壮大，他们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绥德等51县被划为警备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八路军开进驻防，但政权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掌握。当时日本军队打到黄河东岸，绥德师范的学生为抗日战争所激励，抗战热情高涨，组织战地服务团，走出校门，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战。这种革命行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一专员公署的恐惧，他们想方设法对充满革命热情的学生进行欺骗和镇压，并暗中策划撤换进步校长，委任反动校长。消息传出，全校哗然，

进步学生纷纷离校，奔赴延安。反动校长到校后，在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实行法西斯反共教育，迫害留校的进步学生，将学校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反动的国民党专员公署专事摩擦，破坏抗战，当地党委和我八路军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初反动专员逃跑，国民党政权垮台，绥德地区革命政权随即建立。在革命政权领导下，绥德师范更换了领导，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派了大批水平比较高的教师，对学校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反共教育，从此绥德师范获得了新生。学校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用革命的、乐观的、向上的精神，鼓励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因而他们进步较快。从此一批批饱含革命热情的青年学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分布到全国各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切实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绥德师范继续为地方培养了大批教师和干部，成绩依旧显著。

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集中精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地方来说，要大力发展农业，发展乡镇企业，这就需要大批的地方干部，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作为地方学校的绥德师范，其主要任务，就是继承革命传统，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和较好的文科学知识，培养一批批师资，为地方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出不懈的努力！

刘宪曾

1993年3月20日

## 序 言（二）

陕西省绥德师范和她的前身第四师范，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校。第四师范创建于 1923 年 5 月。在 1924 年夏李子洲同志任校长后不久，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这里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大革命失败后，经过这座“革命摇篮”培养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为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争取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数先烈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也激励着后继同学走上革命的道路。当然，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绥德师范也有坎坷的经历，她的发展也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总的来说，学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的，始终坚持了教育和现实斗争相结合，使学习为现实斗争服务，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不仅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条战线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新中国成立以后，绥德师范培养的人才多又为陕北的基础教育和榆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可以这样说，从第四师范的创建到以后绥德师范的全部历史，是和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在纪念绥德师范建校七十周年的时候，编辑出版这套六卷本的丛书，以此来讴歌前辈，启迪后学，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材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按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 90 年代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

奋斗。而在老革命根据地，要抓住机遇，改变社会经济面貌，必须把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放在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使更多的读者了解绥德师范，认识绥德师范，从而深刻体会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促进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使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尤其是师范教育的发展，以发展教育促进老区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我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陕西省绥德师范，能够继承七十年光辉历程中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新的任务，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长江后浪推前浪，喜看后人超前人。

安志文

1993年3月18日

# 服务社会，教书育人（代序）

——绥师光荣传统初探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 武 军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自1923年5月建校，迄今已近90年了。由于她在创办之初就受到李子洲、白超然、呼延震东等陕北旅京津的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以及陕北名士杜斌丞先生等人的影响，特别是自1924年夏李子洲同志出任校长，当年初冬就在学校创建了中共党团组织以来，学校绝大多数时间是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实际控制之下的。特别是她作为“西北革命策源地”、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曾经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组织、军事和群众基础，使得陕北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这一特殊的历史贡献，决定了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绥德地区解放后，学校又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所重要的干部学校。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走上了正规的中等师范教育轨道，为陕北地区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师资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人才。在近90年的办学历程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逐步形成了“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

—

李子洲同志于1923年在北大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指派回陕北开展建党工作的。1924年夏李子洲出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今“绥师”的前身）校长后，学校制定的《学则》明确提出四师的办学宗旨为“（一）发展青年身心；（二）培养积极道德；（三）注重科学教育；（四）造就优良师资。”（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李子洲校长讲得就更具体了“本校的宗旨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并且还提出四师的办学原则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杨明轩》第118页）。他认为，把一所学校办好，本身就是革命。由此可见，在四师创立之初，李子洲校长就把教育和改造社会紧密地合起来了，着眼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并依此进行教学和革命实践。

在教学方面，四师首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为必修课，由李子洲校长亲自讲授（李子洲同志系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国文课以“爱国主义教育和提倡唯物论、科学宇宙观，反帝反封建、反对唯心主义”为中心，学校自行选编教材讲义。还增加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词、顺口溜、谚语等民间文学。同时，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使课堂更贴近于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强调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四师时期，星期天组织学生轮流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已形成了制度。图书馆备有许多进步书刊，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及《新青年》、《向导》、《共进》、国民党一大《宣言》等。特设政治问答栏，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由教师随时笔答。学校还接办了绥德的平民学校，由学生轮流执教，既使学生得到了实习锻炼，又扩大了社会教育，

培养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力量。寒暑假都要求学生回乡办补习学校和夜校，在进行文化普及的同时进行革命宣传。

为使四师能够感受到八面来风，凡来绥德的名人，学校从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师生，使大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来到绥德，就被请来给师生们讲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结交孙中山的过程，以及日本的政治、军事等情况，讲辛亥革命；共进社社员严敬斋留美归来，被邀请来校讲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美国的生活状况等；史可轩从苏联回国，也被请来作关于旅苏观感的报告。杜斌丞、杨虎城、耿炳光、魏野畴、马雅堂等知名人士途经绥德时，四师都组织了演讲会、报告会。

在李子洲校长的领导下，四师更加重视引导学生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从1924年11月起，由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人发起，四师在“共进社”绥德分社的基础上，先后建起了党团组织。从1925年起，党小组逐步扩建为党支部、陕北特支、绥德地委、陕北特委……起初，四师的党团组织分属在北京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和在上海由邓中夏领导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后来统一到北方区委领导，一度还曾划归豫陕区委领导。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又划归陕甘区委领导。四师党、团组织的建立，在陕北，乃至整个陕西省和西北地区，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党团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东至山西汾阳，西到安边、定边、银川，南至延安和驻守在宜川的国民军李象九部，北至榆林、神木、府谷的广大地区。米脂、葭县（今佳县）、清涧、吴堡、安定（今子长县）等地也都在四师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下建起了党团组织，从而使四师成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有力地吸引着陕北各地的有志青年。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师的革命实践活动非常活跃。每逢重大纪念日，学校总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既教育了青年学生，又发动了群众。1924年冬，在李子洲、杜斌丞等人的策动和促成下，杨虎城将军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身份率部由榆林南下讨伐刘镇华途经绥德时，曾住在四师。四师组织全校师生及地方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和欢送会。李子洲和杨虎城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大大地激励了杨部的士气，同时，使四师的师生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

1925年初，四师成立了学生会，后又与榆林中学等陕北较大的中小学校学生会联合组成“陕北学生联合会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运动的作用，争取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革命活动，四师又成立了“青年社”，后与各校联合统一为“陕北青年社”，出刊《塞声》，宣传马列主义，抨击时弊。组织学生针对反动上层发动学潮，发动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和反对基督教等斗争，在实践中锻炼青年学生。

1925年3月15日，李子洲校长组织四师师生积极参加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举行的各分会代表会议。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四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和地方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并立碑铭志。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李子洲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绥德、榆林、葭县（今佳县）等地于1925年春先后成立了国民党K时分部。自此，四师绝大多数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班俯开展群众运动，周时又加入了经过改组的国民党。教务主任杨明轩先生又以国民党陕北特派员的身份，尽量选派四师的共产党员到各地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对推动陕北革命群众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5年5月初，西安爆发了驱逐吴新田的斗争后，四师积极响应，召

开驱吴大会，举行游行示威，震撼了井岳秀的反动统治。“五卅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两周，一方面成立“后援会”，发动和领导绥德城乡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声援活动；另一方面，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在“到民间去”的口号下，分赴葭县（今佳县）、吴堡等地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从而在整个陕北地区形成了以绥德为中心的声援工人大罢工斗争的高潮。斗争不仅唤醒了民众，而且增强了各阶层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文化侵略，四师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了“陕北非基同盟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精神文化侵略的阴谋在陕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四师学生会会同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青年社、陕北非基同盟会等组织，于3月24日在绥德联合召开市民大会，愤怒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通过了给被难者家属的慰问电和警告各国公使的通电，并由教务主任杨明轩和共产党员田伯英老师主演了由王子休老师赶写的三幕话剧《被毁的血书》。剧情悲愤激昂，使校内外观众深受感动和教育。

与此同时，学校党团组织还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和兵运斗争。1926年，四师党组织通过学生会和陕北青年社，领导“脚户”（即脚夫，专门从事赶牲口搞运输的人）和农民，于6月成立了“脚户自保会”。会长白明善，副会长杜嗣尧、高光祖，以及李明轩、罗百福、赵通儒、邓重庆等委员，均为四师的学生和教员。脚户自保会领导脚户和学生、农民联合行动，几次冲击打砸“骡柜”（又称厘民局，是官府设办的一种专门敲诈勒索脚户的帮会组织），迫使官府取消了“骡柜”，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下半年，在5月1日成立的绥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绥德县总工会，使工人运动走向自觉的道路。同时，党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向农民

做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建立村、区农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村庄还发展党团组织。并在1927年农历正月初七成立了绥德县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先后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县衙和地主、高利贷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虽经1927年8月和1928年4月两次封闭，但四师的革命火种并未被扑灭。到1930年底第三次被封闭之前，四师党组织仍然秘密地存在着，组织学生发动农民运动，抬龙王斗县长、砸蛋厂、驱除国民党绥德党务指导委员会等斗争，深深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吉国桢、刘澜涛、苏醒民、常应黎（即常黎夫）等中共陕北特委负责同志以教员的身份来四师任职后，又利用国民党搞军训的条件，组织“学生军”，培养从事武装斗争的人才。

正是因为学校能够从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为现实斗争服务、教书育人的方针，在环境险恶的四师时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高光祖、白明善等数十师学生，先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安子文、马明方、刘澜涛、马文瑞、张达志等同学投身革命，到新中国时期成为我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的就有40多位。正如刘澜涛同志于1986年4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绥师余校友座谈会上所说，“我们的母校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校友，今些成就，很主要的是当时革命的学校里培养了新的人生观，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而成为一名革命事业的战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是“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方针，谱写了四师时期这一绥师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1930年底学校第三次被封闭，长达近三年半之久。1934年秋，学校才被正式恢复，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当时，由于党组织尚未恢复，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整个学校的空气是沉闷的。“西安事变”的爆发，给绥师师生带来了很大震动，绥师沉闷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部分思想活跃的学生渐渐地开始注意国家大事了。一些进步书刊，甚至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也秘密地传开了。大家对“西安事变”，对谁抗日谁不抗日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七七事变”爆发后，曹孟朴老师（东北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和一些进步学生每天晚上用收音机收听、记录关于抗日的消息，经整理后以大字报的形式，一抄数份，张贴于绥德城内的主要街道路口，成为新闻渠道不畅、消息闭塞的古城绥德的重要消息源，为绥德人民及时了解抗战形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11月，我八路军驻防绥德，设立警备区，使绥德成为国共统战区后，绥师的政治空气更加活跃。学生秘密组织起读书会，学习邹韬奋主编的《永生》、《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流》、《译文》、《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俗哲学讲话》等革命书刊。学校邀请八路军的干部来作报告。霎时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响彻了校园斋舍，《睡狮猛醒》、《八百壮士》等救亡戏剧展现在礼堂和操场的舞台上。还办起了抗敌壁报。在警备区民运科和“青救会”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重建的学生会也改建为学生抗敌支会。在学生抗敌支会和民先队的领导下，以班组成工作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从而推动了绥德及周围地区抗日救亡

运动的发展。1938年4月，学校党组织得以恢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更加蓬勃发展，轰轰烈烈。当黄河防线吃紧的情况下，学校曾组织战地服务团，在曹孟朴、刘宪曾、李国璋（当时已均为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带领下，分别挺进葭县（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的河防前线，深入榆林、横山、米脂等县的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支援前线，保卫河防。还有两支宣传队曾东渡黄河到山西农村进行宣传活动。绥师师生的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此惊恐不安，而我方军民则大受鼓舞。

1940年端午节，绥师被反动校长白焕亭分裂后，我党、政、军当局接收了未出走的师生，又从延安调来一些教师，保住了绥师。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暑假期间，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绥师党员学生和部分进步学生赴延安参观，周事实澄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给青年学生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正式决定接办绥师，改校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到下半年，将原来分属不同系统领导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使学校各项工作在党的有效领导下健康地开展起来。当时明确规定绥师的教育方针为：“（一）新民主主义教育。（二）统一战线的学校，在不违抗抗战的原则下，允许各党派的存在及思想自由。（三）提倡新启蒙运动，培养青年勇敢的、乐观的、健康的、有独立人格的良好作风；反对盲从、独断专制、迷信、奴役等思想。（四）正规化的师范学校，有一定管理制度与工作制度，兼干部教育的学校……”训导方针为“（1）克服自由主义与散漫现象，加强集体生活的训练。（2）提倡遵守校规服从团体纪律的精神。（3）克服保守、自私、褊狭等不良现象，发扬为公服务

精神。(4) 养成活泼、紧张、切实、朴素的作风，提高学习情绪，加强学习效能。(5) 在实际活动中培养民主精神。(6) 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7) 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这年暑期，绥师学生代表再次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赴延安参观了医科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女大、陕北公学、鲁艺、抗大、高级法院、中央医院、解放日报社、保育院、光华农场、纺织厂及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部分学生代表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亲笔题词，勉励大家“团结”、“向上”、“奋斗”、“学而时习之”……通过参观，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1942年暑期，又有部分学生参加了由警备区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晋绥解放区参观团，听取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开辟根据地、反扫荡和根据地建设、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民兵抗日等情况的报告，参观战利品展览和日寇烧杀掠抢后的惨状。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得同学们更进一步认识了国共双方对抗日救国的不同态度，增进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赖，并且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对转变学生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见1942年3月2日《解放日报》）此间，边区高干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边区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是“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见1944年2月8日《解放日报》）绥德分区也提出了“学校要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见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据此，1943年起，绥师便转为以干部教育为主。先后增设了地方干部训练

班、青年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及无线电训练班和会计班等专业培训班，以及到 1948 年的文艺班等，学制不定，应急培养。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十分重视为社会现实服务，教书育人。从而适应了战争和边区建设、开辟新区等方面的需要。1946 的年冬防空期间，仍然坚持上课，学习适用于战争需要的政治、军事和救护等一些基本知识。1947 年学校转移于黄河两岸，也每天坚持四小时以上学习时间。教师们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战时教育方案》的要求，自己编写讲授提纲，搜集利用驻地的活教材，在国文和政治课上，注重对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坚决勇敢及拥军尚武精神的培养；并向学生讲解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蒋介石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专政的实质；宣讲发扬民族气节与反抗强暴的历史传统，以及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事迹；同时联系战争形势，介绍各解放区的形势概况，以提高保卫边区的热情；在着重介绍防空防毒、急救护理、熬硝、制造火药和地雷等；体育课进行基础军事训练，学习侦察、通信、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并注重学生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以形成一定的自卫能力；还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调整课程及社会活动时间，如增加时事、军事及社会活动时间，减少一些不急需的课程等。

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联系学生自身的实际和社会实际。例如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初期，为帮助学生提高对劳动的认识，国文课上学习《毛主席这样爱我们》和《建立新的劳动观点》等文章，并配合介绍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引导学生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鄙视劳动人民和生产劳动的封建思想，分析了陕北劳动人民为什么习惯称劳动为“受苦”，从而使大家认识到了参加大生产

运动的意义，提高了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每人平均生产成果以小米计，在一斗三升（约合50斤）以上。1945年收蔬菜16万余斤，高粱14万余斤，豆类2000多斤，棉花3000多斤，还建起校舍窑洞27孔。1946年11个班种洋芋45亩、棉花24亩、花生15亩、高粱6亩，教职员又另种棉花3亩。1948年春，除帮农场种6亩菜蔬、24亩洋芋、6亩南瓜外，另种1300株南瓜，并还拟开井种6亩秋菜……从而维持和保证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负担，支援了人民战争。同时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意志和品质，增进了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感情，提高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与此同时，绥师还积极开展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1942年寒假期间组织回乡工作团，学生们回乡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办冬学、办识字班，宣传文明、卫生。1943年冬，组织了宣传工作团，自己创作了17个秧歌剧，排练了22个节目，利用假期先后到马蹄沟、周家砭等7个区22个村镇进行宣传演出，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和征粮的意义。宣传过程中，还进行农户调查，组织识字组、补习班，办大众黑板报、读报组等。仅1943年到1945年，《解放日报》对绥师学生的下乡活动，就曾有过五六次报道。解放战争中，学校曾多次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进行护理伤员和文艺宣传、文化教育等工作。这些社会活动，直接地培养了同学们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当时的绥师学生，几乎没有学制的限制，只要前线或边区、新区需要，都能随时随地接受调遣。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至1946年暑假，绥师有530余名学生被调出工作，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调往延安工作。1947年7月29日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当时绥师自动报名参军的教职工有15名，其中包括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刘宪曾同志，以及

两位教育处的副主任。学生自动报名参军的有 56 人，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 40%。其中女生 15 人，占当时在校女生总数的 86%。1948 年 4 月 17 日《群众日报》报道，“该校为抽调一批干部至新区工作，除前已派出学员一百余名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方医疗工作外，短期内又有 T。余名干部派往新区”。1948 年 8 月 2 日《群众日报》报道“绥米中学（1948 年 4 月 7 日由遭敌人侵犯破坏的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合并而成）白华祥等 20 名知识青年踊跃参加分区地方武装，到达部队后，都要求分配到连队，参加直接对敌斗争。”1949 年 6 月的一期《大众日报》又曾报道绥师自动去新区的有加名学生，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 70%以上。

正是在“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宗旨下，使 40 年代成为绥师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那时从绥师出去的学生（包括毕业的和未毕业就被调出去的），由于革命的需要，从事教育事业的并不多。他们在实践中所学到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技能，也未必都能用得上。然而，正是在绥师时期所打下的扎实的文化科学知识基础，所养成的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作风和习惯，特别是所培养起来的正确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自立观念，艰苦奋斗的创业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他们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思想基础和始发条件。当年的绥师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成为我党、政、军较高层次的干部，如安志文、汪洋、任远、白介夫、白纪年、安致远、李嘉玉、柳随年、张汉夫等。还如党凤德、马援、刘森民、马倬、王炎等，有的成为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翻译家、经济学专家，以及医务界和其他科研部门的专家和业务骨干，还有企业家等。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绥师作为一所中等师范

学校，为当地基础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师资。虽然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提并论，可她在长期的革命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却依然有着不竭的生命力。今天我们总结绥师的光荣革命传统，再回顾一下我党在建国 60 多年来对教育方针表述的演进过程，从“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7 年 2 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 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后来的“一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是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三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90 年李鹏总理会见参加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代表时的谈话），“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0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 5 纲要的建议》），1999 年 6 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我们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直至 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教育方针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和丰富。乃至我们追溯到前面所述 40 年代我党的教育方针，不难看出绥师所走过的道路同党的教育方针的一致性。从中也可发现作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自身所具有的普遍规律。教育事业的生命力就在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这一普遍规律曾经存在于绥师这个特殊的个别之中。同时，绥师的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绥师辉煌的历史，才有绥师发展的今天和灿烂的明天。也更昭示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不断前进。

## 前 言

“绥德师范学校是有革命的光荣传统的学校。我们党今年是 71 周年，绥德师范是 69 周年。就是我们党的幼年时代就在党的领导之下办起来了。所以，这个学校一开始就和共产党是不能离开的，也是离不开的。这种师范或者中等学校全国是很多的，但像这样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学校，却不是很多的。”1992 年 5 月 7 日，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校友在接受学校派员的采访时如是说。

是的，早在 1924 年冬，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后称北方区委）指导下，李子洲、王懋廷等早期的共产党员就在这所学校建立了直属于北京区委领导的中共党团组织，并迅速向周边地区发展，组织领导陕北的革命活动，逐步创建革命的武装，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终于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初创时称“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存在的价值，绝非仅仅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习近平同志曾经讲过：“陕西是根，延安是魂。”而这“根”与“魂”的源头，则在我们光荣的绥师！

自从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争取建在绥德，至今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了。这一历程，无时无刻不凝结着陕北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努力，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精神的引领下，经过一代代绥师人的不懈努力，甚至抛头颅、洒热

血，写就了学校辉煌的历史。

历史不会忘记绥师，绥师不能忘记历史。为了记述艰苦卓绝的辉煌历史，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学校曾几度着手编写校史：

——早在 1943 年初，就写出过约 6400 字的简略的《续德师范历史》，曾呈送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原件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1959 年 3 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庆祝伟大的祖国建国 10 周年，向学校征稿。学校随即组成“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革命教育史编辑委员会”，着手编写校史。通过翻阅档案材料、访问校友、和老校友举行座谈会、给外地老校友写信请他们回忆在校时的情况并供给材料等办法，经过 3 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编成了近 10 万多字的《绥德师范革命教育史》一稿。人民教育出版社阅稿后，征得学校同意，将书名改为《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师范学校》，并经陕西省教育厅审查，决定出版。1960 年 3 月发稿付排，并已制成纸型。但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纸张供应关系”，未能付印。1961 年 6 月 27 日，陕西省教育厅致函学校，称考虑在陕西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要求学校在 10 月 1 日前，对 1959 年形成的书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后送教育厅。但之后，不知何故，此事被搁浅。

——1982 年，那是学校恢复后的第四年。为了迎接建校 60 周年，学校再次启动了校史的征编工作。征编工作由黄海老师负责，经过大量的走访和信函联系，收集了一些史料。到 1984 年，整理出约 35000 字的新中国成立前校史初稿。

——1987 年，学校委托原任校长孙秉悦同志在 1984 年新中国成立则，史初稿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续写。至 1989 年 5 月，完成了约 85000

字的校史征求意见稿《绥德师范六十五年》，内部印刷。并被绥德县政协编入《文史资料》。

——1991年12月，为迎接1992年李子洲同志诞辰100周年和1993年绥师建校70周年这两个有意义的日子，邢宏校友又发出倡议，提议由各地校友组织编辑出版一套《雕山文集》（分三册《雕山火种》、《雕山火花》、《雕山火星》）作为献礼，并亲自起草了《雕山文集》编辑出版计划，列出组织机构，甚至连人选问题，他都作了具体安排，计划争取于1993年5月前出版。但由于病魔夺去了邢宏同志的生命，他的宏愿未能得到实现。

——1992年3月，在7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为了讴歌前辈，启迪后学，弘扬传统，开创明天，正尊师重教之良风，奠基础教育之厚基，学校决定编印《绥德师范学校》丛书（内含六卷第一卷《光辉历程——校史》、第二卷《峥嵘岁月——回忆录》、第三卷《雕山忠魂——英烈传》、第四卷《群星璀璨——学生传》、第五卷《为人师表——教师传》、第六卷《历届领导人小传》），并指定由闫宏谋同志负责征编。学校还请刘澜涛、马文瑞、贺晋年、刘宪曾等知名校友分别题写了书名，刘宪曾、安志文校友分别作了序。在广大校友和省、地（市）、县各级党史机构、档案部门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10个月的辛勤劳动，收集整理了部分回忆文章和英烈事迹资料，编印了《峥嵘岁月——回忆录》、《雕山忠魂——英烈传》各一册。尽管略显粗糙，并且是内部印刷，但毕竟为学校70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好评。特别是《峥嵘岁月——回忆录》一书，为地方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翔实的史料。

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便停顿下来了。

——2009年，学校再次启动了校史建设工作。这次校史建设工作包括

编纂出版校史丛书和建设校史陈列馆两部分，由校党委书记武军同志亲自负责组织实施。组成了由武军同志任主编，张杰、闫宏谋同志任副主编，武军、张杰、闫宏谋、刘联春同志任编辑的班子，拟定了编纂校史丛书的具体规划（包括《光辉历程——校史》、《峥嵘岁月——回忆录》、《雕山忠魂 英烈事迹、遗文(墨)、回似已念文章》、《群星璀璨——知名校友介绍》、学校建党历史专题研究成果《陕北革命的策源地——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光辉历程——校史画册》等），在以前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征编史料，计划于2010年至2013年5月1日前陆续出齐。目前，经过参编人员的不懈努力，部分图书已经开始相继面世。

在史料征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广大校友及家属子女，有关档案、史志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谨致由衷的谢忱！

由于史料征集难，考证难，且又来源纷杂，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人物事迹介绍的稿件，大致以在校时间为序，但仍可能有排序不准确的现象存在；章法体例亦因材料不足而无法统一并且还有许多应该入编的校友，因没有资料来源而致明显的缺憾等等，遗漏和差误在所难免。回忆文章我们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对相关事件进行考证，对文字进行必要的处理，但仍不能保证事事准确。校史及学校建党历史专题研究成果，尽管我们力求尊重历史、尽量客观地还原历史，但仍可能有失偏颇。凡此种种，敬请读者，特别是广大校友见谅，请及时向我们反馈意见。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校为我们提供资料和信息，以便于我们进一步收集整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适时地再结集出版。

编 者

2010年5月1日

# 目 录

## 英烈事迹

李子洲.....	(3)
常汉三.....	(12)
王懋廷.....	(14)
王复生.....	(21)
钱清泉.....	(25)
徐梦周.....	(28)
苏士杰.....	(30)
吉国桢.....	(34)
白明善.....	(37)
高光祖.....	(40)
刘正平.....	(45)
冯圣昌.....	(47)
杨重远.....	(49)
贺 牛.....	(58)
蒲子华.....	(59)
刘善忠.....	(63)
张庚飏.....	(67)

拓克宽	(68)
丁学浚	(71)
马汝翼	(72)
刘耀西	(73)
乔国桢	(75)
赵  铸	(79)
孟芳洲	(83)
李嘉谟	(87)
张承忠	(90)
刘光显	(93)
马汝骥	(95)
刘汉武	(96)
马承启	(99)
张慕时	(101)
田庆丰	(103)
王兆卿	(105)
李青云	(108)
白雪山	(109)
吴志祥	(112)
高绪祖	(115)
田作勤	(118)
局尚信	(121)
冯崇道	(123)

孙兰馥	(124)
刘成武	(126)
杨凤歧	(128)
崔玉瑚	(133)
高农斧	(136)
胡廷俊	(140)
王 文	(146)
崔曙光	(152)
李成荣	(156)
杨岐山	(158)
惠泽仁	(161)
马子骥	(163)
李景波	(165)
惠金瑞	(171)
许志云	(172)
霍世英	(174)
延振伦	(177)
张继增	(180)
薛世丰	(183)
蒲政仁	(186)
贾仰青	(188)
马克昌	(195)
慕生桂	(200)

王聚德	(202)
薛翰臣	(205)
杜修杰	(207)
马 洛	(208)
强 雄	(209)
白力锋	(210)
赵先锋	(212)
王立功	(213)

### **英烈遗文、遗墨**

陕西师范学校应革新的几点	李子洲 (217)
释教育的意义	李子洲 (224)
陕西的选举应亟谋根本澄清	李子洲 (227)
施、林及“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	李子洲 (232)
纪念“五一”	李子洲 (234)
绥德县教育局问题	常汉三 (237)
在党的“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王懋廷 (258)
在党的“六大”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讨论中的发言	王懋廷 (262)
狱中遗书	王懋廷 (265)
耶稣是什么东西?	王复生 (274)
“三一八”流血的代价	王复生 (276)
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吉国桢 (278)

钱清泉遗嘱·····	(279)
我寒假内的工作·····	王兆卿 (280)
绥德市民大会纪实·····	王兆卿 (282)
白明善一九三一年在狱中写给惠仁闻的信·····	(284)
杨重远家书·····	(285)
许志云家书及联语·····	(286)
高农斧家书·····	(287)
薛世丰在《国文讲义》上的批注·····	(289)
徐梦周手稿·····	(290)

## 回忆、几年文选

纪念李子洲同志·····	杨明轩 赵通儒 常黎夫 (293)
民族的柱石祖国的骄傲·····	屈 武 (296)
亢斋岁月西北风雷	
——忆李子洲同志·····	罗章龙 (310)
回忆李子洲同志·····	白超然 (322)
革命先驱李子洲·····	李明轩 (326)
良师益友·····	李瑞阳 (333)
常汉三先生墓志铭·····	杨明轩 (336)
回忆母校缅怀师长（节选）·····	常黎夫 (338)
高风亮节照千秋	
——纪念革命英烈白明善同志诞辰 100 周年·····	马文瑞 (341)

## 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 忆白明善……………白如冰 (355)
- 怀念白明善，学习白明善……………白寿康 白炳勋 (359)
- ## 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典范
- 回忆白明善同志在狱中……………李赤然 (361)
- 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马文瑞 (364)
- 高光祖在四师……………李明轩 (371)
- 回忆高光祖烈士……………高长直 高长久 (373)
- 怀念刘光显同志……………张达志 (376)
- 悼高农斧同志……………霍维德 (379)
- 我们向高农斧同志学习些什么？……………张毅忱 尤奋涛 (381)
- 悼崔曙光同志……………崔田夫 郭洪涛 (384)
- 延安各界举行李景波同志追悼大会……………《解放日报》(385)
- 怀念强雄、康文林二同志……………马树勋 (387)
- 忆革命烈士王立功同志……………王佩仙 (389)

# 英烈事迹



## 李子洲

李子洲(1892—1929)，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绥德人，出生于一个手工业家庭。

李子洲于 1912 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1915 年任绥德县劝学所视学员。1917 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 年在哲学系上学，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火烧赵家楼等正义斗争。1920 年至 1922 年，参与进步刊物《秦钟》、《共进》半月刊的创办和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创建，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先后发表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纪念五一》等十余篇文章，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指导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李子洲便加入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北大上学期间，李子洲同志十分注意陕西家乡时局的发展，关心三秦父老的疾苦。这期间，陕西当局筹备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地址拟设

陕南或关中。闻讯后，他深感陕北文化落后，从全局考虑应设陕北为宜。便和白超然、呼延震东等一起，与陕北教育界知名人士杜斌丞商议，联名上书陕西当局，终于争得把第四师范设在绥德。他还联合当地的进步士绅和学生，成立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绥德教育会，改革学校教育。

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组织追悼会，悼念被北洋军阀杀害的林祥谦、施洋等京汉铁路大罢工领导人。会



李子洲在校时的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后，他激愤地写下了《施、林“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的挽诗，在《共进》上发表。同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受中共北京区委李大钊的委派回陕开展工作，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

在榆林中学时期，李子洲对保安的刘景桂（即刘志丹），绥德的贾春霖、

霍世杰、张肇勤，清涧的王怀德、白作宾，延川的曹必达，定边的蒙嘉福，安定的营尔斌、杨国栋，横山的高岗，米脂的马济川，榆林的杨尔瑛等积极教导培训，介绍他们加入共进社，组织起榆中学生会。这些人在李子洲的教导下，思想觉悟大为进步，为榆中党团组织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4年5月，李子洲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

李校长聘请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先后聘请的教员有王懋廷、田伯英、韩叔勋、王复生、刘尚达、李致煦、蔡楠轩、关中哲、罗端先、何寓础、雷五斋、王汉屏、赵秉彝、赵少西等。他们有的是“共进社”社员，有的是共产党员，思想很进步，工作又积极，全校教职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一心为办好学校群策群力。根据学校的实际，制订了新的《组织大纲》与《学则》，明确办学宗旨就是“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图书阅览室新购《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图书、杂志2000多本，供学生自由选读。



李子洲等人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共党团组织的地方——四师图书馆

李子洲同志办学有许多独特之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提倡民主管理学校，在召开校务会议时，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共

同改进教务。同时他对办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倡社会教育，迫使当局改组绥德劝学所为教育局，撤换了把持教育专款的劣绅，将经费用于创办单级师范学校、平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

1924年10月间，共进社四师分社组成。李子洲介绍白明善、李嘉谟、高光祖、赵通儒、李明轩、马瑞昌、罗伯福等入人社。在清涧、米脂、神木、府谷、定边、佳县、延安、延长、保安、横山、子长等县同时发展了共进社，作为党团的外围组织。还成立了陕北青年社、四师青年社、学联合会等，党团活动逐渐展开。11月，李子洲和王想廷、田伯英根据中共北京区委指示，按照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为党小组的规定，在四师秘密建立起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四师）小组，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12月在组织领导下，王懋廷在四师成立陕北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Y）绥德（四师）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局领导。1925年初，在中共北京区委特派代表耿炳光同志的指导下，根据中共四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由小组改为支部的规定，在中共绥德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四师）支部，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活动是陕北各地。李子洲被指定为支部书记（开学后为便于开展工作，支部书记之职交由田伯英同志担任）。同时榆林中学、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建立中共和共青团组织。1926年6月，在绥德省立四师建立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统一了陕北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绥德省立四师成为陕北革命的策中心，被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陕北23个县有志青年十分仰慕，争先恐后前来投考。富县的李承文，洛川县孟祖兴，中部县（今黄陵县）的李瑞才、刘榭基，白水县的石介等，不远数百里来投考。山西汾阳铭义中学的任国梁、乔国桢、赵搏、李麟铭等学生也转到四师上学。学校党、团组织

先后向黄埔军校输送贾春霖、刘志丹、杨国栋等学员，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输送霍世杰、李波涛、乔国桢等学员，向上海大学输送张肇勤、李维勤、柳长青等学员，向甘肃军校、耀县三民军官学校输送了丁广智、方明方等学员。

这期间，李子洲同志和绥德党团地方执委会还派出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到绥德、榆林、葭县（今佳县）、清涧等地帮助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工会，建立妇女协会，开展群众运动。派李致煦、冯景翼、马瑞生等党团员到陕北驻军石谦团（不久扩编为旅）做兵运工作，在石部成立了党团组织。到1926年底，石团有李象九、谢子长、李瑞成、李有才、史唯然等百余名官兵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不少连排长都由党团员担任。

1926年12月，冯玉祥、于右任五原誓师后，率部由宁夏、甘肃等地入陕夹击刘镇华，从而使被围困八月之久的西安解围。因工作的需要，党组织调李子洲同志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改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路过延安时，召集呼延震东、刘尚达等党团员开会，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布置安排工作。要求延安党团组织在军事方面要善于运用统战方法壮大自己的队伍，这对我们的军运工作十分重要。要加强宣传三大政策，扩大组织工作。学生方面要循循善诱，注重他们的学业成绩，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深入农村，积极进行农运工作。在工作中选拔优秀分子介绍入党。延安基督教会比其他各县更为猖獗，我们要扩大宣传，发动群众，驱逐牧师，捣毁教堂。要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先从剪发、放足、读书、识字做起，组织妇女识字班、妇女学习会，首先从城市入手，然后再推广到农村。开辟农村工作十分重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是我们党的基本力量，我们的政策是农村包围城市。他指示不了这五点工作以后，第二天凌晨就

离开延安，南下西安。

1927年1月，李子洲同志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出任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和院长刘含初一起确定了“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人才”的办学宗旨。中山学院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李子洲同志任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在他和战友们的努力下，不到半年时间，在陕、甘40多个市、县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党员发展到2400多人。陕西的农民协会会员达70余万人，仅次于湖南、湖北，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

6月下旬，冯玉祥下令在陕西进行“清党”，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活动。此前，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区执委会成立陕西省委。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他受省委派遣，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请求中央选派有能力的干部来陕西工作。8月27日，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接见陕西代表，李详尽报了陕西党组织的状况。不久，携带中共中央发给陕西党组织的“八七”会议文件和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离开武汉。

9月上旬回陕后，李子洲同志向省委常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9月26日，和耿炳光主持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检查和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在陕西的影响及危害。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成员，李子洲同志除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外，还负责省委军事工作。

会后，李子洲同志便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当年10月，就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1月，李又参与渭华起义的准备，和省委秘书长刘继曾共同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五号通告》，此后，具体领导筹划渭华起义。当发动农民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相继派出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军事干部，去洛南县三要镇，到共产党员许权中担任旅长的军队工作，又从地方上抽调了一大批党团员充实许旅的力量，并指示许旅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相机起义。5月，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率部开赴华县高塘镇，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与已经举起义旗的渭华农民武装相结合，在渭华地区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



狱中备受折磨的李子洲

1928年11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李子洲同志代理省委书记。他和战友们认真总结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重新部署全省的革命斗争。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子洲和其他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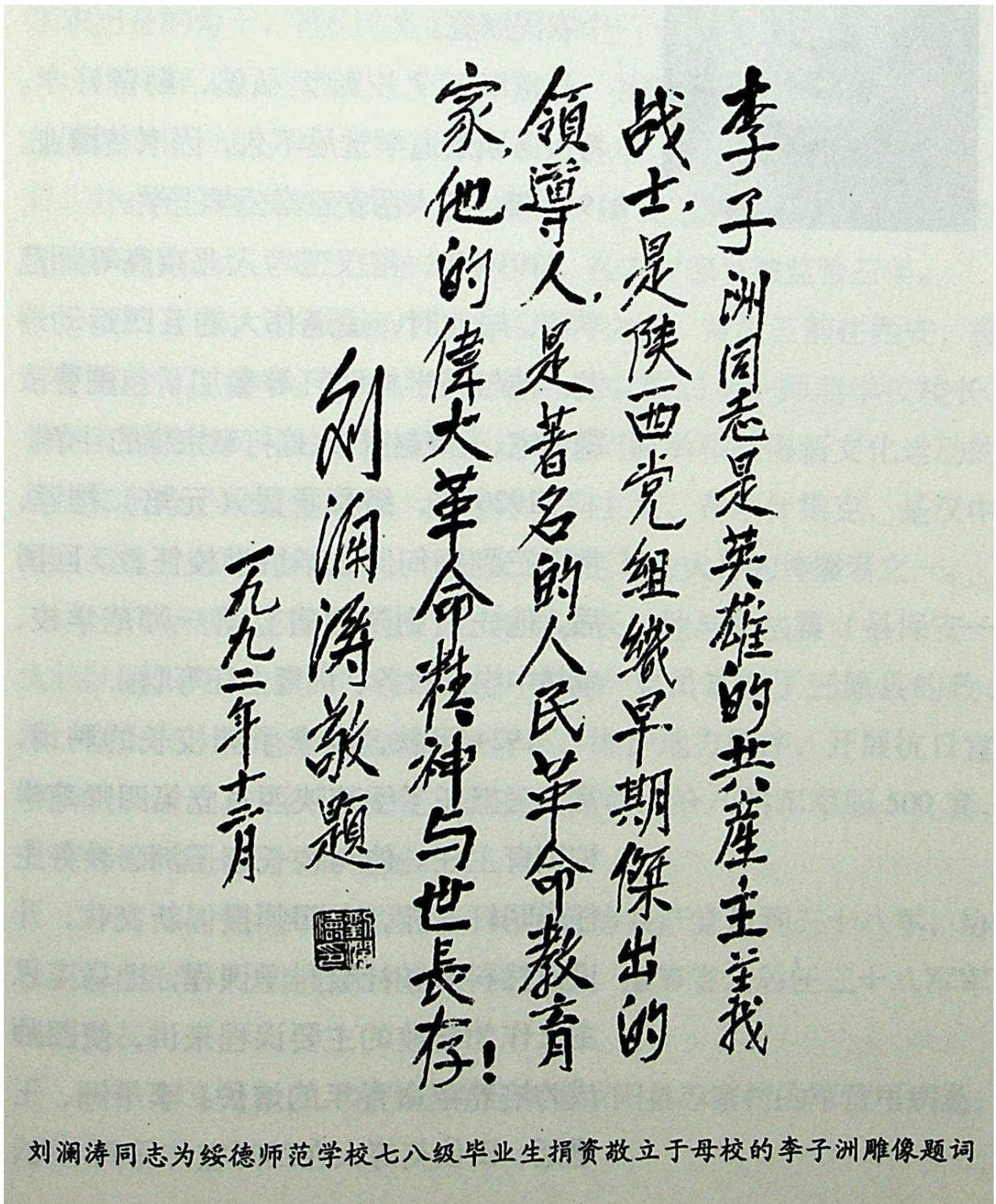
责人先后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使国民党反革命派一无所获。

李子洲同志在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入狱后，国民党新军阀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致使其等病加重，同时他又患伤寒引发肺病，身体十分虚弱。难友们劝他用济难会的经费买些滋补药品，他婉言谢绝。通过看守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李子洲同志给在家乡的妹妹李登岳写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狱中罹难，时年3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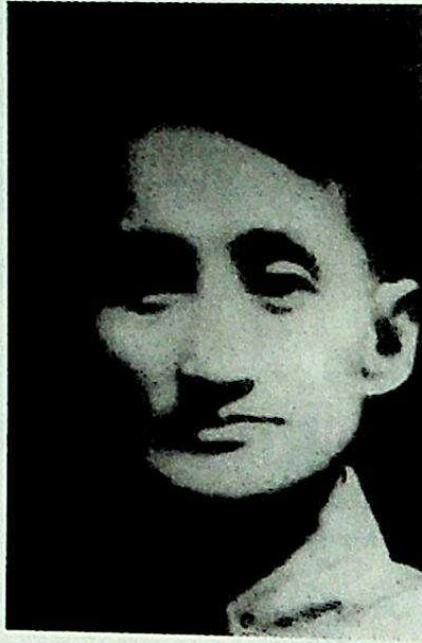


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子洲县，以志纪念。在2005年开始的由新华社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各省市主要媒体共同推出的《永远的丰碑》大型主题宣传活动中，2006年4月14日发了通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题为《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的专题片。2009年由中宣部、中组部等11个中央机构

发起组织的“双百”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子洲同志入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150位候选人之一。



刘澜涛同志为绥德师范学校七八级毕业生捐资敬立于母校的李子洲雕像题词



## 常汉三

常汉三，名士杰，字汉三。1903年3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常家沟村一个农民家庭。

常汉三7岁始读私塾，勤奋好学。考入三原宏道学堂后不久，因家贫肄业。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上学。

1914年，常汉三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时，适逢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他与同学杨明轩等参加了包围曹汝霖宅、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

1920年，经蔡子民（元培）推存，常汉三到缅甸仰光华侨学校任教。回国后，他先后到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咸林中学任教务、训育主任等职。

1924年秋，应李子洲校长的聘请，常汉三担任了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他与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一起，在四师提倡新文化，开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校的主要课程来讲，使成为培养革命青

年的熔炉。李子洲、王戀廷、田伯英等人在四师宣传马列主义、组建党团组织的活动，使常汉三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常汉三兼任绥德县教育局长，四师毕业生马瑞昌为教育视学员。常汉三在任期间，大力整顿教育，撤换了腐朽的各高小校长，兴办了简易师范学校、纺织业学校，增加了平民学校的经费，在平民学校开办了妇女班及成人班。平民学校成人班培养出李邦俊、杨重远、丁锦业、雷忠秀、贺文章、郝进德等工农出身的骨干，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1927年1月，常汉三任四师校长，并担任了学校党支部书记。他坚持李子洲的办学方针，宣传革命斗争，为党培养人才。8月4日，井岳秀部团长刘润民率士兵奉命“清党”，查封四师，四师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常汉三被拘押出校，在农村家乡被监管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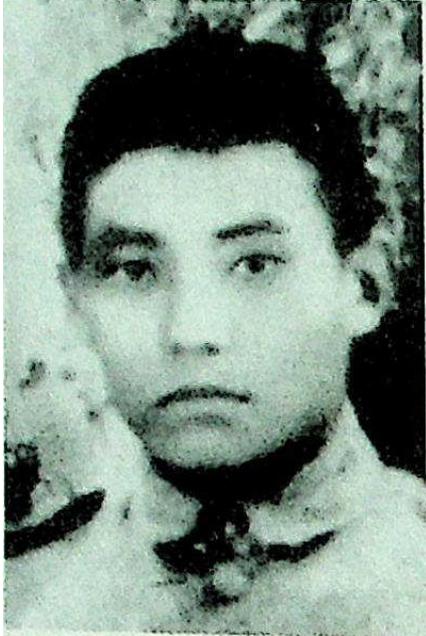
1930年春，应省教育厅厅长杨明轩之请，常汉三前往西安，担任了省教育厅督学。秋季，被任命为汉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常汉三到汉中女师后，聘请了留日学生刘霞举和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梁益堂执教。他宣传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是汉中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也是汉中地区革命火种的传播者之一。

1937年初，常汉三担任了三原县县长。他与杨法震（县保安一大队队副）、冯一航（中学校长）等共产党员掌握了三原县的政、军、学大权，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维护地方秩序，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常汉三代表三原县人民赠送给八路军军服500套，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的赞扬。

1938年，党组织派常汉三、杨明轩等共产党员到三十八军，协助赵寿山治军，开赴抗日前线，转战晋、豫等省。后任三十八军军法处处长。

1943年9月8日，常汉三在河南省荥阳县苏寨村的军营里病逝，时年50岁。



## 王懋廷

王懋廷，又名王德三、王茂廷，字正麟，笔名正零、齐人。1898年7月15日出生于云南省祥云县王家庄村。

王懋廷的父亲在乡村以教私塾为业。故幼时随父在家乡私塾念书，后就读于大理县高等小学和中学、昆明成德中学，爱好数学和文学。

1920年底入北京大学补习班，翌年春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王懋廷经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人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法文翻译。他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走出校园到劳工群众中去。先后与王复生（其兄长）、王有德（也是云南人。当时北大称他们三人为“云南三王”）多次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并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使王懋廷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他在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为中共北大支部书记的罗章龙后来回忆说，

王懋廷“是北大支部很活跃的积极分子”。

王懋廷在北大上学期间，因家庭经济困难，与兄长王复生轮换教书来维持读书。1923年夏，他接替王复生到了陕西，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数学教员。

1924年夏，李子洲接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后，专程去北大与同窗好友王复生请示李大钊，在《北京



大学日刊》刊登了四师聘教启事。北方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派王懋廷到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建党工作，决定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

1924年秋开学前，王懋廷和弟弟王馨廷来到了陕北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王懋廷任国文教员，弟王馨廷随其上学。王懋廷知识渊博，教学认真，为人热诚，口才极好，很受学生欢迎。他在自编的国文教材中，选择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十分重视日常需要的应用文写作和民间文学的讲解。还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挟歌、顺口溜，同时指导群众性艺术活动。教学中特别注意思想性，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的一些名句详细讲解。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课外指导学生阅读《中国青年》、《向导》、《共进》等革命刊物。和校长李子洲一起在学校成立学生会、青年协会、青年读书会，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于

课内课外，结合教学宣讲马克思主义，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辅导学生自习，常与学生谈心，了解家庭状况，吸收“真实努力的分子”入党入团。

1924年11月，王懋廷和李子洲、田伯英根据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为党小组的规定，在四师秘密建立起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四师）小组，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12月在李子洲的组织领导下，王懋廷在四师成立陕北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Y）绥德（四师）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局领导。12月，报请团中央，拟将发展的15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组建为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未获批准，以Y绥德支部组织活动。1925年初改为Y特支，王懋廷任书记。特支成立后，他亲赴榆林建团，成立了榆林中学团支部，介绍刘志丹等17人入团。还派人到瓦窑堡、延安、山西汾阳等地开展建团活动，并组织团员深入工厂、农村和军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在如何开展工人运动问题上，当时在团组织内部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陕北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工人都是从事木石业的手工业工人，而且分散各地，很难组织开展斗争。王懋廷认为应该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工人就组织什么工会，陕北城镇苦力数多，是一支很大的革命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是有充分条件的。他把两种意见写信报告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中夏，请他指示。邓中夏回信支持王懋廷意见。

陕北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毛驴，不少农民养一头或数头毛驴，靠驮脚贩运赚钱为生。绥德城内的军阀官衙看到有油水可榨，便设名为“骡柜”的店栈，横行霸道。农民赶牲口一进城，便被拉去无偿支差（供人骑或驮东西）。脚户住宿也被强拉住他们的店栈，宿费又高，直到把脚户身上的钱刮得差不多了才让离店。农民脚户受此敲诈，敢怒不敢言。王懋廷组织四

师学生以学生会出面，与农民脚户组织起“脚户自保会”，发动脚户罢工，不给城内驮粮、拉盐、运炭，以致威胁到官府衙门的吃饭生活问题。经过斗争，迫使官衙取消了“骡柜”。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懋廷在绥德组织起“各界救国办事处”，组织七八百人游行示威，检查和抵制英货、日货；百余学生组成“募捐团”，向机关、商号、住户沿门募集，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并派学生到各县及各大镇进行宣传。王懋廷代表四师联络北部各县，在榆林组织起陕北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的“雪耻会”，组织各界游行示威。陕北各地共募捐 3200 多块银元汇交上海总工会。根据邓中夏回信精神，绥德工会很快地成立起来，木匠、铁匠、石匠、砖瓦匠、泥水匠、担水工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利用工会团结广大手工业工人和脚户同军阀、厂主及豪绅进行斗争。他还和李子洲、田伯英派学生深入农村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在绥德县城成立了平民学校，吸收一大批中青年参加学习文化和政治。王懋廷带头义务讲课。

为响应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共同倡导召开的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他和李子洲、田伯英、杨明轩等共同发起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在陕北 9 个县成立分会 11 个。利用寒假组织学生回家乡开展宣传活动，散发传单 8000 多张。1925 年 3 月中旬，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绥德，王懋廷与李子洲共同主持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在城南砭上立碑纪念。1925 年“五一”、“五四”、“五九”，他和李子洲一起主持召开纪念会，向团员和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王懋廷认为，共产党有高深的理论，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他自己就是为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而献身的。他在 1925 年 5 月 23 日的一个报告中说：革命要闹成功，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作为我们的中军”，“第一步先把各地进步的师范学

生及贫苦的中学生组织起来，将来他们毕业后到各地去当小学教师”；“第二步的工作，每个小学教师都于课外成立一个成年补习学校，使劳苦同胞于作业外受相当的教育，了解我们的主义。因补习学校的关系，我们并可以组织他们，使他们有坚固的组织”。他特别提道：“苏俄革命的功劳，我们不能不提及到民间去的志士。”每次假期或节日，王懋廷便给学生党、团员布置回村做社会调查，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宣传演讲，宣传建立农民协会等工作任务。还亲自去榆林成立起榆林工会，向工农群众宣传“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和“背上头颅干革命”的献身精神。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是当前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求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以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这年春，四师成立党支部，夏季又成立起党的特别支部，王懋廷担任支部和特支最为重要的宣传工作。在驻瓦窑堡的石谦团（石谦团部1925年由绥德换驻瓦窑堡）中，第三连连长李象九（王懋廷介绍入团旋即转党）组织成立了党和团的支部，王懋廷还到榆林帮助榆中学生张肇勤和李登霄（由他介绍入党的）成立起党和团的支部。党员也迅速增加，四师发展有20多名，榆中和李象九连发展了10多名。陕北1925年有明多名党员，其中有7人是王懋廷介绍入党，许多人则是王懋廷介绍入团后转为党员的。这一批党员，有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革命烈士白明善、乔国桢、刘志丹、王兆卿、高光祖等；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马明方、郭洪涛、霍维德、阎红彦、武开章、雷恩钧等。同时，共青团员发展到70多名。陕北党、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形成了陕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1925年夏，王懋廷从陕北回到北京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初任

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是年春调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政治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官，主编《黄埔日刊》。1927年2月，调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的部署。1927年冬至1928年春，深入到开运、蒙自、文山等地检查指导党的工作，与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一起恢复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夏，王懋廷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为大会宣传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在会上提出党内要切实制止盲动主义倾向的建议被采纳。

1928年秋，王懋廷返回云南，主持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当选为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他还是我党早期的少数民族工作者，主持制定了我党在云南少数民族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少数民族问题大纲》。

1930年11月中旬，因叛徒出卖，王懋廷在昆明附近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抱定了为党的事业、为求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的决心，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万言《遗书》。1930年12月31日在昆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了三個牙。這兒自修不有的。什麼對不起  
情。免。特。滴。死。短。命。是。被。人。壓。迫。去。成。仁。  
父親活生生的兒子。媳。最。親。愛的。丈。夫。  
人。奪。去。最。可。悲。慘。的。事。情。可。是。公。親。是。  
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甚。麼。事。來。  
有。什。麼。臉。在。人。世。上。天。下。人。所。見。雲。南。就。要。  
的。人。雲。南。人。撰。着。王。字。就。要。指。着。祥。雲。  
免。現。時。只。有。解。定。主。張。把。身。子。獻。給。人。類。

王懋廷《獄中遺書》(局部)



## 王复生

王复生，字涵万，乳名正，化名王甄海（振海）、郭其瑛、郭毅，笔名止庵。生于1896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云南省祥云县王家庄人，幼年随父读私塾。1911年，考入云南省立大理中学上学。

191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后转入西语系读书。此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正主持北大图书馆工作，为了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李大钊召集王复生、罗章龙、李梅羹等学生参与翻译。在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复生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我党最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1919年5月，北京青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王复生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一青年运动。1920年，在李大钊指导下，王复生等发起成立了我国早期比较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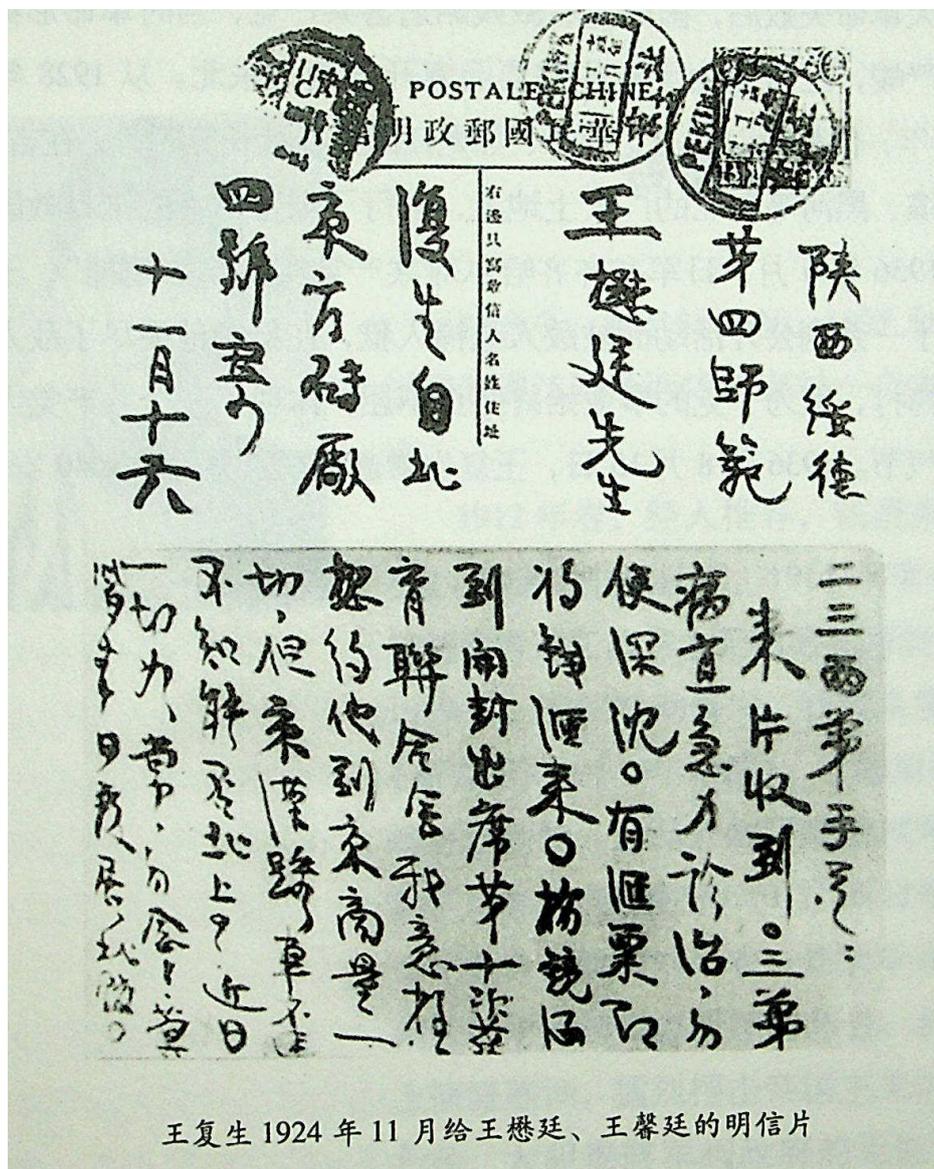
说研究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王复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王复生、王懋廷等为了配合云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积极组织了一些新派社团，其中最著名的是云南革新社，他们出版了《革新》周刊和《铁花》等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纲领。1924年，云南革新社更名为新滇社，王复生为该社的领导人之一。同时，在南京、上海、武昌、广州等地成立了分社，天津、唐山等地的滇籍学生也与他们取得了紧密联系，不少社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1922年3月底，王复生因学费困难，经北大同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杨钟健介绍，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国文教员。与先期到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魏野畴合作共事。他们以咸林中学为阵地，在师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热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2年冬，他带领进步学生潘自力、吉国桢、关中哲、杨慰祖、杜松寿等，步行20多里到赤水职业学校，和王尚德专门研究酝酿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之类的组织，结果成立了跨县、校的进步青年团体赤社（咸林中学叫青年励志社）。咸林中学在青年励志社的影响下，学生“自治会”、“青年读书会”等组织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王复生在咸林中学还组织过“民权运动大同盟”推动学校的民主运动。

1923年暑假，王复生离开咸林中学，回北京大学复学。一面继续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8月，受中共北方区委的委派到绥德师范任教至1926年初。在任教期间，王复生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绥德四师党组织在领导陕北地方的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926年夏，国民党中央招待委员会派王复生到广州以及云南工作，他和杨青山一起共同负责筹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左”派方面的活动。王复



生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员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并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国民党云南省右派党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王复生积极参加了“倒唐”斗争，促成了大军阀唐继尧的迅速垮台。1927年初，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成立以后，王复生和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共同领导并组织成立了云南农民协会，他还亲自到临时省委给干部讲课，对云南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残酷迫害共产党，当时革命形势已十分严

峻，王复生由于党的偷要而离开云南去东北。从1928年到1936年，他先后以教员、记者、黑龙江民报社社长等职务，在吉林、哈尔滨、黑河等东北的广大土地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救国斗争。1936年6月，日军在齐齐哈尔对共产党实行“大逮捕”，王复生由于一系列公开活动而被敌人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为了党的事业始终坚贞不屈，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6年8月15日，王复生惨遭日军杀害，时年40岁。



## 钱清泉

钱清泉，原名钱振标，1895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西郊能家村一个农民家庭。

1912年春，经人推荐，钱清泉到教会办的励实中学读书。1914年暑假后，钱清泉考进江苏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钱清泉接触到《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从而开阔了政治视野，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和刘半农、刘天华在江阴南苦中学发起举办爱国游艺会，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大胆揭露军阀政府的无耻嘴脸，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不久，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民国日报》上广泛征求发展党员，钱清泉怀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加入了国民党。之后，又跟随中共党员恽代英、侯绍裘一起工作，思想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5年春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派遣，到冯祥军中做政治工作。1925年冯玉祥所部刘郁芬的部队由内蒙古进入宁夏，远征甘肃。中秋节刚过，钱清泉、宣侠父等共产党员随军来到宁夏，在经过磴口、石嘴山、银川、王太堡、广武、固原等沿途各地，向广大回汉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国共合作的救国意义，宣传俄国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在宁夏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宁夏革命思潮的兴起，后来的革命发展和中共的活动，以及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6年秋，钱清泉到陕北绥德，公开身份是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师，同时执行中共北方局的指示，通过陕北党组织为兰州冯玉祥部国民军政治干部学校招募学员。11月，中共绥德地委选派了李麟铭、王兆卿、陶兴奋、贺维新、牛化东等2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在钱清泉带领下，从绥德赴兰州。路经银川时，应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要求，留下李麟铭、陶兴奋、贺维新等人，建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大革命失败后，钱清泉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革命地下工作。1928年8月，钱清泉与党中央派到江苏恢复党的工作的王若飞接上了关系，并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委员、省委特派员。10月10日，中共江阴县委成立，钱清泉化名高大鹏，任江阴县委书记、江阴农民革命军总司令，策划和发动了暴动。然而，轰轰烈烈的江阴暴动被残酷镇压下去了。江阴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以其地域之广、时间之久、人员之多、斗争之顽强，震惊了江南，在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0月18日下午，钱清泉在常州大成旅馆62号房间等待苏常特委负责同志和各县“农暴”骨干，正准备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突然，江阴县政府

侦缉队长黄秉忠带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冲了进来，将钱逮捕。

11月，钱清泉在江苏常州市英勇就义。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 徐梦周

徐梦周，安徽寿县人。

徐梦周 1914 年入私塾读书，1920 年春入寿县苟西国立小学。1921 年转入芜湖安徽省立第二农业学校学习。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暑假回到家乡与共产党员曹蕴真、評阶组成青年团小甸集特别支部。1923 年春，因领导“二农”团组织发起了驱逐蚕科主任的学潮，不久被迫退学。回乡后在小甸集小学教书。同年冬，同曹蕴真、薛卓汉建立安徽省最早的党组织一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任支部宣传委员。不久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毕业后受党中央派遣，于 1926 年 3 月到北京，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

1927 年 2 月，徐梦周任西安中山学院教育长。同年 7 月，脱离西安中山学院转为地下活动，任中共延安县委书记。11 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分管组织工作。1 卿年 1 月任组织科主任兼省委秘书长。1928 年春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被捕入狱。敌人软硬兼施，诱供逼供，但他正气凛然。1930 年 11 月释放出狱，经张汉民保荐到孙蔚如的师部任秘书主任。兰州收复后，留任高兰县县长。1931 年，回任三十八军军部秘书处长，开展党的军运工作。1932 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193 年 5 月初，与张汉民多次研究，制定川陕交通线计划，沟通白区的党组织与川陕苏区的联系，给川北红军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军用物资，为红军集

中力量粉碎刘湘的“六路进攻”、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年底告假脱离了孙部。1936年12月，就任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科长，从事情报工作。他在西安的家，成为革命同志聚会、落脚、避难的场所。1941年转入西北农学院，任教授、院长秘书。在校内发展数名青年党员。1943年春离开农学院。1944年，和杜斌丞等往陕南、汉中、城固等地发展民盟组织。由城固回汉中的途中，不幸因车祸而殉职。



## 苏士杰

苏士杰，又名醒民、继善。1903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五里铺苏家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苏士杰少时先后就读于家乡初小、县立象峰高小和华县咸林中学。1924年，苏士杰考入北京大学，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冬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编入第四期政治大队。1926年7月，苏士杰被党组织抽调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工作，任干事，宣传科长等职。

1927年4月，六军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击散。苏士杰被迫离开南京，辗转到了武汉，党组织安排他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带领十名陕籍黄埔军校毕业的党员、进步青年回陕做兵运工作。8月下旬被陕西省委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七军第一师（师长甄寿珊）部工作，

苏士杰任少校参谋兼党内交通联络工作。他和共产党员刘清和、周益三等人一起参与创办教导营，积极筹划训练青年军官，大力发展党员。驻防临潼县雨金屯期间，他还秘密送枪支给中共渭南县委，武装农民协会。是年冬，苏士杰调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当选为省委委员，参与省委军委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任职期间，积极协助省委负责人耿炳光、李子洲选派一大批党员干部到许权中旅充实领导骨干，指导甄寿珊部中共军支工作。

1928年2月，苏士杰调任中共五一县（又称渭南固市分县）县委书记。为了贯彻中共“八七”会议决议，准备武装起义，对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进行了整顿，吸收大批贫苦的农民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苏士杰领导党团员和农协会会员处决了恶霸地主贾雨天，将贾家的粮食和衣物分给了贫苦农民。是年6月，为了配合渭华起义，苏士杰以特别武装队为骨干，组织隆兴、固市等地的党团员和群众烧毁了为冯玉祥部储备军粮的板桥粮台的房子，将粮食分给农民群众。渭华起义爆发后，苏士杰领导固市等地农民群众摧毁地主阶级把持的乡村政权，建立了农民当家做主的两个区和十几个乡的苏维埃政权。

1928年夏，渭华起义失败，苏士杰被调回省委参加省军委领导工作。他先后深入到三原、长安等县巡视工作，认真调查研究，指示做兵运工作的党员要吸取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做过细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29年秋，苏士杰调任中共陕北特委常委兼特委军委书记。他和特委书记吉国桢及刘澜涛、常应黎（即常黎夫）等特委负责人到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开办了党团员

训练班，为陕北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他以体育教员的公开身份，利用国民党搞军训的条件，教授学生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后来党组织派遣学生参加武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们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相继进入甘肃、宁夏的国民党杂牌军苏雨生、王子元部，协助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为了争取陕北的地方武装，苏士杰等先后派十余名党员去驻守在宜川、延长的后九殿山寨的杨庚武部建立党组织，准备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至1930年，陕北党团组织遍及十余县，党团员达2000余人。在陕、甘、宁驻军苏雨生、王子元、高志清等部都建立有党团组织，党团员发展到百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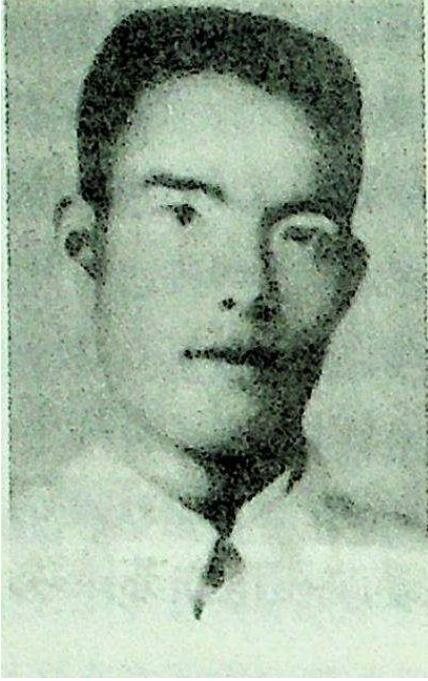
1931年冬，苏士杰被省委派到甘肃靖远做兵运工作。参与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地下党组织（当时称团党委）的领导工作，公开身份是教导队队长。苏士杰还兼任教导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队员在冰天雪地里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生活上同甘共苦，经常给队员上政治课，深入浅出地宣讲马列主义常识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对外不抗日、对内残害民众的罪行。还教育队员要以南方工农红军和陕甘边的游击队为榜样，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

1932年5月上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警三旅党组织发动了靖远兵变，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苏士杰任直属队队长。5月中旬游击队主力遭强敌包围而被冲散，苏士杰率领的一支游击队辗转到了静宁，多次与敌人激战，消灭了大量敌人，后因弹尽，大部分壮烈牺牲。苏士杰率领一部分队员突围到了兰州，向省委特派员谢子长、焦维炽汇报了游击队在静宁的情况。苏士杰根据谢子长的指示，在兰州同焦维炽和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地下党员傅剑寒

取得了联系，共同研究了该部的兵运工作计划。谢、焦决定派苏士杰等四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去马仲英部工作，成立了直属陕西省委领导的中共军支。军支由苏士杰负责。

1933年冬，苏士杰随马仲英部进入新疆。马部和地方军阀盛世才的军队在哈密一带发生激战，继而交战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结果马部失利，边战边退，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行军退到喀什。后与盛世才部谈判，马部撤到南疆的和阗、于阗、皮山一带驻扎。在复杂的环境里，苏仍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团结进步官兵，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

1936年冬，不幸遭反动派杀害，时年33岁。



## 吉国桢

吉国桢，又名纪凤洲，字干卿，化名纪浩如。1899年生于陕西省华县辛庄乡南吉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吉国桢9岁入私塾，1916年入华县高等小学。1920年春，考入华县咸林中学，在进步教师魏野畴、王复生的影响下，逐步接受新思想，同潘自力、苏士杰等同学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读书、讲演、演新剧以及体育等活动。

1924年夏，吉国桢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创办《新群》半月刊，热情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罪行。

1926年夏，吉国桢被党团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吉国桢奉调回国，到陕西工作。是年夏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9月，又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他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后，即召开特委会议，传达中共

六大精神，并根据省委指示和陕北的实际情况，提出继续壮大党团组织，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的任务。为了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主持开办党团员训练班。随后，又派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相继打入甘肃、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和王子元部，协助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为争取陕北的地方武装，还先后派十余名中共党员进入驻守在宜川、延长交界处后九殿山的杨庚武部，建立中共组织，准备创建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年初，中共陕北特委迁到绥德。吉国桢同志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员身份开展工作，给学生讲授社会发展史、世界史、中国近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亲自指导中共绥师支部（书记白如冰）的工作，还利用假期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回乡做调查，发动农民，在陕北各县播撒革命种子。

到1930年夏，陕北党团组织遍及十余县，党团员达2000余人。在陕、甘、宁边界苏雨生、王子元部，榆林高志清旅，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大力做争取士兵群众和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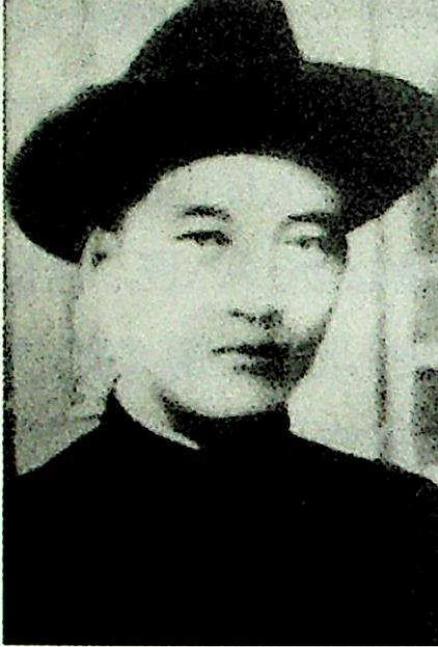
1930年秋，吉国桢奉调回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并参加省委组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一度主持省委工作。先后派了十多名有经验的党员干部打入杨虎城部，建立与扩大党组织，教育和争取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站到革命方面来，扩大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1931年2月中旬，吉国桢受命向河北省委和中央汇报陕西省委的工作。5月，吉国桢被党中央派赴河南任省委书记。他到任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加强巡视工作，整顿各地的党团组织。指导省委

宣传部和组织部门先后出版了《中州时事》、《中州新闻》、《群众周刊》、《党的建设》、《我们的生活》等刊物，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宣传红军作战的胜利及各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

1932年春，为了支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河南各级党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战争。在信阳设立了交通站，动员数千名农民参加红军，发动各界群众募捐支援红军，不断向苏区运送医药、被服等急需物资。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豫南、豫中建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同时派出不少党员，到国民党驻豫连队中去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动士兵哗变。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被敌人破坏而削弱了的河南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由几百人发展到2300多人，遍及全省90多个市、县，成立了开封、郑州两个市委，豫南和豫北两个特委，许昌、洛阳、南阳等五个中心县委，临颖、舞阳、西平等三个县委，孝义、淮阳等20多个特别支部。

1932年7月下旬，由于叛徒的告密，吉国桢和省委的其他同志共20余名党团干部在郑州被捕入狱。敌人对他们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是，吉国桢（当时化名周国荣）宁死不屈，使敌人未能得到机密。8月20日清晨，吉瞻等被秘密杀害于开封郊区。



## 白明善

白明善，字乐亭。1897年出生于陕西清涧高杰村。

白明善幼年时，大哥被土匪杀害，父母先后去世，依靠族兄抚养。小学毕业后即因家贫辍学，在本县折家坪、杨家园子等村小学教书。

1923年初，白以作文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高竹轩因循守旧，引起学生义愤。寒假前夕，绥师学生推举白与刘嘉善、杜嗣尧、高光祖、李明轩等为代表开展驱高斗争，并由白起草了致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信函，要求撤换高竹轩，另派贤能任校长。结果，高于1924年5月被免职，榆林中学教师李子洲接任校长。

李子洲校长到任后，在学校公开宣传马列主义，组建进步社团，学校成立了青年社，白成为其成员。后又被李子洲推荐加入共进社，是共进社绥德分社和陕北青年社的主要负责人，创办油印刊物《陕北青年》和《塞声》半月刊。

其间，被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推选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4年冬赴京途中行至山西汾阳，得知段祺瑞为抵制国民会议召开而公布完全由临时执政府操纵的“善后会议”《条例》，遂返回陕北。不久，经李子洲、王懋廷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转为中共党员。绥德四师党、团组织根据邓中夏来信提出的“有什么工人就组织什么工会”的指示，发动党团员到石匠、木匠、店员、从事贩运的脚户中去，于同年3月，白明善被推选为绥德“脚户自保会”会长。共青团中央接到团陕北特支的报告后，曾复信赞扬“脚户自保会很好”。

在绥德各界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上，白发表演讲，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功绩，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年11月到西安，为组织“九七”国耻纪念活动和鼓动工人捣毁军阀政府御用“省工会”而被省高等审判厅传讯的魏野畴等出庭作证。12月被派往上海大学学习，翌年8月赴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负责会议记录和讲稿吴玉章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和罗绮园在第四期学员毕业时的特别演讲等，都是由白记录整理后发表的。1926年冬奉调回陕，被派往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印刷局局长，参与编辑《新国民军》报的出版发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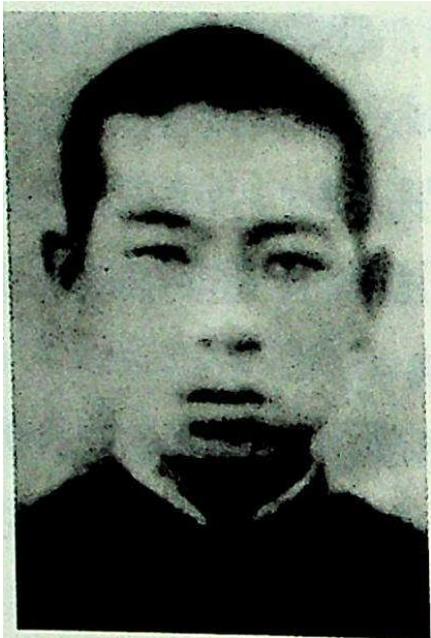
1927年7月，同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魏野畴和唐澍等来陕北巡视工作后，唐澍、白明善留井岳秀部石谦旅，与李象九、谢子长等一起领导部队党的工作。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10月12日晚，发动石谦旅在清涧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第一枪。

1928年10月，白明善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1929年2月调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在同月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被增选为特

委委员，兼米脂县委书记。在米脂，他的公开身份是米脂三民二中教员，因此还兼任中共三民二中支部书记。那年，陕北闹饥荒，他组织饥民进行反饥饿斗争，并征得进步校长杜立亭支持，召开师生大会进行声援。白明善在会上讲话，揭露官绅勾结压榨百姓的罪行，号召大家援助饥民斗争。米脂县政府派兵镇压，包围了三民二中。在中共米脂县委领导下，白一边选派学生去做围校士兵的工作，一边发动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市民示威游行，还到县政府说理。县长张仲瑜怕事情闹大，只好让军队撤离学校。

1930年春，白因病回清涧休养，不久又调任绥德县委书记，仍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同年秋，奉命赴天津、北平，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初，因为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复杂的党内斗争缺乏了解，被阴谋分裂党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派回陕北传达他们的“决议”。由于中共陕北特委明确表示反对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不同意在陕北地区传播分裂的观点，没有造成影响。同年元宵节后，白因叛徒告密在清涧县城被捕，押解至榆林第三监狱关押。当场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痛斥劝降的叛徒“没有骨头，出卖同志，出卖灵魂，是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义正词严地告知敌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不可丢。”在狱中坚持组织领导党员坚持斗争。凶残的敌人用酷刑逼供，他备受摧残，曾三次被吊上绞刑架，仍坚贞不屈，其革命精神曾感动有正义感的国民党狱卒。1932年1月21日，在敌人绞刑架下，自豪地说“杀我白明善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英勇就义。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他的家乡为他修建了烈士纪念碑。



## 高光祖

高光祖，字耀宗，1904年出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店镇神堂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高光祖1915年至1918年在本村念书，1919年至1922年在店镇高小上学。1920年，正在北京上学的店镇高小毕业生杜宝衡、杜宝丰（后均牺牲）通过母亲给母校寄回一封信和一些进步刊物，宣传爱国反帝思想。信上说，全国民众首先是教育界要团结起来救国，“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这封信向全校宣读后，广大师生深受教育，群情振奋。校教师刘建汉、薛欲农、王庭俊思想进步，主张革新教育。这些都对高光祖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3年夏，高光祖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刚入校时，校长是高竹轩。他们看到刚刚新办的学校，竟然没有一点儿生机，并且还出现克扣学生伙食费的现象。1924年春，受学生公推，高光祖和白明善、刘正平、杜嗣尧、李明轩等为代表，上书省教育厅，揭

发了校方的守旧行为和克扣伙食费等问题，发起驱高运动。要求撤换高竹轩校长职务，另委贤能接替，不达目的，就实行罢课。5月，教育厅另委李子洲任四师校长。从此，高光祖在四师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

李子洲任四师校长后，聘请杨明轩、常汉三、王懋廷、田伯英、王复生等任教员。这些人有的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有的思想很进步。他们同心协力，办好学校，培养革命人才。除在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列主义之外，还成立了图书杂志辅导委员会，向学生介绍《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高光祖一下课就到图书馆阅读，还省吃俭用，订阅了许多刊物。在王懋廷等老师的影响教育下，1924年7月间，他和李明轩、白明善等一齐加入共进社，1925年“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光祖投身革命事业后，工作非常积极，党组织分配什么就做什么。1925年下半年，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和其他党团员、积极分子联合绥德地区泥水匠、木匠、石匠等手工业工匠，成立了工会联合会，使陕北工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1926年，他和葭县旅外同学组建了“振葭会”，并创办《振葭》期刊，宣传土地革命，反对土豪劣绅。“振葭会”后来成为葭县农民协会的前身。这年夏天，四师在绥德创办“平民学校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开设党团组织的培训班，为革命培训了大批骨干。在他的宣传影响下，丁锦业、郝进德、李邦俊、杨重远等人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当地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高光祖是陕北青年社的负责人之一。寒、暑假同学返乡时，他都给他们布置任务，组织学生向农民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农协，成立“天足会”，并要求返校后总结、汇报。

高光祖对脚户自保会的工作也非常积极、认真。每当脚夫报告牲口被反动官府和军队拉了差，他就组织学生去说理讨要，迫使他们把牲口交还给脚户。这种事在脚户中影响很大，大家交口称赞高光祖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高光祖口齿伶俐，在讲演竞赛会上每每得到赞赏。在反对军阀吴新田游行大会、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和纪念“五卅惨案”等活动中，他走上街头讲演，讲者慷慨激昂，听者热血沸腾，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斗争劣绅大会上，他头戴草帽，腰系布带，手提烟袋，挤在群众中，经常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和很精到的议论。

高光祖积极从事各种革命工作和社会活动，但对各门功课也不放松。常常夜深入静之时，他还独自坐在油灯下苦读。同学们劝他休息，他总正笑笑。各门功课，他都考得很好。

1926年农历六月，高光祖四师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往盘龙镇的安定（今子长县）县立第四高小当教师，担任党的特别支部书记。他在这里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还负责秘密交通，保证了西安、延安、绥德等地党组织通讯联络的顺利进行，为这一地区的革命作出了贡献。1927年5月底召开的安定县第一次农他被聘请为指导员。

1927年暑假，高光祖回到葭县，与中共葭县县委负责人杜嗣尧、高锡爵等一起筹备召开了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被选为县农协的负责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后，井岳秀派兵到处追领导人。党组织指定高光祖临时担任县委书记。他一边追捕，一边继续秘密坚持革命斗争。同年11月，在神堂沟村召开了全县各支部党员代表会议，重新选举了县委会，高光祖被选为县委书记。1928年春，陕北特委决定，将葭县

县委改成特区党委（代号“贾志先”），划归米脂县委领导。书记仍由高光祖担任。

1928年2月间，上级党组织调高光祖到绥德西川苗家坪高小教学，以便在双湖峪、三皇峁、周家硷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他传递党的文件，发展党员，恢复党组织，恢复秘密的煤炭、盐业工会，使西川革命形势有了新的的发展。同年秋季，高光祖参加了在苗家坪高小召开的陕北党的紧急会议。这期间，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党的工作面临严重困难。但是，由于高光祖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想方设法继续进行秘密工作，使这个地方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寒假放学后，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离开学校回到葭县。

1929年至1930年，高光祖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在葭县坑镇、螭镇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

1930年夏季，陕北特委派毕维周到葭县，传达特委关于重建葭县县委的决定，书记仍由高光祖担任。1931年冬，陕北特委传达党中央指示，要求由工农出身的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加之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高光祖监视很严，他不便继续做县委领导工作。故经特委批准，高光祖回家种地，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1934年，高光祖又参与葭县县委领导工作。他和曹世华一起分管红六支队的工作，在葭县南部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从这年冬季开始，敌人疯狂“围剿”葭县红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1935年2月，高光祖主动与吴堡县慕生桂等协商，并经上级批准，将葭吴两县的武装力量四、六、十五支队合编为红五团。红五团建立不久被调离葭吴，高光祖等又秘密组织了一个土枪队。这支队伍有七八十人，同敌人周旋。

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是，高光祖仍不气馁，又与曹世华、马增前等人筹备建立葭县军事委员会，共同筹划成立新的第六支队。1935年农历二月二十日晚，高光祖等同志住在店镇附近枣林沟村的一个山窑里，叛徒李友夜去店镇向驻军郭福堂部告密，敌军于拂晓时将山窑侧，他们奋起抵抗，高光祖同志在这次突围中壮烈牺牲。

为了纪念高光祖烈士，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在高光祖的家乡——神堂沟村立碑，碑文曰“为人类求解放舍生取义，因自由杀身成仁”，以资缅怀。

## 刘正平

刘正平（1904—1931），原名刘嘉善，字鹏举，陕西省绥德县阳湾村（今属子洲县三川口乡）人。

刘正平幼年在米脂龙崖高等小学上学。1923年夏，考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由于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均属于守旧人物，教学方法落后，质量低劣，学校死水一潭，加上还有克扣学生伙食费的现象，学生对此深为不满。刘正平和白明善曾代表学生向校方提出意见，但遭到无理斥责。1924年春开学后，学生又公推刘正平和白明善、高光祖、杜嗣尧、李明轩等为代表，上书省教育厅，揭发了校方的守旧行为和克扣伙食费等问题。5月，省教育厅任命李子洲为四师校长。李子洲到职后选贤任能，革新教学，宣传革命思想，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25年初，在王懋廷、田伯英等老师的培养教育下，刘正平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时，来自绥德西川（今属子洲县）的刘正平、李策铭、徐博、安志翰（安子文）号称西川“四大名生”。他们不仅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而且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筹备创建了四师青年社、陕北青年社。李子洲介绍刘正平、安子文等人去北京中法大学学习。上学期间，刘正平又和安子文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初，他回家乡和曹鸿碧在三川口、西庄一带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协会，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秋，陕北特委决定选派党团员去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刘正平被党组织派到宣化高桂滋部以一〇九师少尉参谋的公开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刘正平结识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并送刘天章一笔经费，向天章表示“我跟你走，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遂按刘天章的指示，到互济会同高克亭一块开展工作。

1931年7月，互济会宣传委员李来宾被敌人逮捕，供出了刘天章、刘正平等，特委机关遭破坏，他二人先后被捕。1931年12月，刘正平在太原小东门外被敌杀害。

## 冯圣昌

冯圣昌，代号老宋。1906年出生，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坑镇沙渠村人。

冯圣昌 1914 年在媳镇和葭县县城高级小学念书。1923 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被党组织派到榆林师范学校念书，并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2 年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他当时在学校是革命积极分子，由于身份暴露遭敌人追捕。受党组织的指示，便与关甲村的刘德韩、吴堡县贾家山村的贾旭清等人化装出城，各自回家。冯圣昌以协助其父开骡马店记账为名，搞地下革命活动，1934 年为沿河区委负责人之一。当年由于天旱遭灾，收成不好，他将家中积存的 20 多担（约 7000 斤）黑豆、谷子，分发给本村及邻近七八个村的生活困难群众，还把自家喂的牲口借给群众耕地、磨面、打场，赢得了周围人民群众的爱戴和赞扬。在此期间，他积极发展组织，带领游击队参加过白家甲寨子、高仲家寨子、圪凹店、荷叶坪等多次战斗。1934 年，他在当地的革命影响已经很大，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捕。抓他未果，就将其母抓住捆绑吊打，坐老虎凳，把家中的牛、羊、驴及粮食、银器钱财抢劫一空，将其弟妹毒打赶走，致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不久，冯圣昌到延安刘志丹部下，开始在红军大学学习。经过军训后，

担任瓦窑堡红二十六军二团政委，跟随刘志丹东征，在山西下三交一带作战。返回后，驻防黑山梁。5月在瓦窑堡米粮山战役中，二团担任掩护中央首长及主力部队转移任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他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多次打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完成了阻击任务。在突围中不幸牺牲，时年28岁。



## 杨重远

杨重远，原名杨敬熙，号弘毅，陕西省绥德县四十里铺麻地沟村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

杨重远少时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念过两次冬学。1924年冬，杨重远在绥德城一家商号当店员。这时，共产党员李子洲、王懋廷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在绥德创建了四师附设的平民夜校。杨重远积极参加了夜校的学习。白天在商号忙生意，晚上上夜校，学习文化知识，接受革命思想。他借助字典，通宵达旦，苦读进步书刊，接触了《共产主义ABC》、《向导》和《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思想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自觉地投入到四师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

绥德县城有个劣绅被称为“高大老爷”，其大管家仗势欺人，无恶不作。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在四师党团组织的支持下，杨重远率领平民夜校的一些学员，冲进高家大院，狠

狠地揍了大管家一顿，救出了被欺凌的民妇。这场斗争震动全县，大快人心，反动当局却以“通匪”嫌疑要缉拿杨重远。在李子洲和绥德党团组织的帮助下，1934年冬，杨重远通过社会关系，打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不久扩编为旅）韩英盛连，先后任司务长和文书。

1926年上半年，经李象九、谢子长介绍，杨重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升任石部八连连长，先后驻防延川、清涧、宜川等地。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连队积极发展党团员。在他的领导下，这个连队除坚持每天操练，上政治课、文化课以外，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演新剧，民主管理伙食，实行官兵一致，提倡士兵自己缝衣服、鞋袜，禁止抽鸦片和喝酒，一扫旧军队的恶习。杨重远很重视做驻军附近的群众工作。他同部队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联合当地进步士绅和师生，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放足和破除迷信，并且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手工业工会、学生联合会和妇女协进会等群众团体。

1927年夏，大革命失败，陕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杨重远受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石谦部从事兵运工作。

1927年10月12日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石谦部近千人在清涧城举行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次日清晨，起义部队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率领挥师南下，15日到达宜川。杨重远领导的一个连和共产党员李瑞成、王振娃领导的两个连在宜川城内立即起义，接应清涧起义部队。在此之前，驻宜川之敌代旅长康子祥听说清涧起义部队南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杨重远、李瑞成、王振娃连发起攻击。杨重远、李瑞成、王振娃当即迎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康子祥率部弃城逃

跑，两支起义部队遂在宜川胜利会师。会师后，由于领导人在行动方针上意见不统一，加之后来指挥失误，在强敌进攻下，起义部队被打散。

1928年，中共陕北特委派杨重远去河北遵化，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做兵运工作，被任命为高桂滋部地下党军委书记，公开身份先是该军刘杰三师的副官长，后为军部军需。他同该部的共产党员黄子文、朱侠夫、陈一平、马汝骥、吴岱峰等人一起，在顺直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秘密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并在一些营、连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晋东平定县的起义，成为组建红二十四军的基本力量。

1929年高桂滋部被蒋介石南调山东作战。1930年，高桂滋参加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战争，结果损兵折将，所剩不到100人，于1930年8月退到山西平定，被张学良收编为陆军第十一师。杨重远在山东作战中身负重伤。伤稍愈后，即化装突破蒋介石军队的层层封锁线，于是年夏到了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适值乔国桢（北方局委员）要到陕北巡视工作，李杰夫要去陕西任省委军委书记，北方局便派杨重远以探亲为名，护送乔、李去陕。杨重远护送乔、李安全到陕后，还应邀参加了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做兵运工作的经验。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出席会议的同志存放武器和文件的场所，受到同志们的赞扬。

1930年秋，杨重远回到高桂滋部，继续担任军需，并很快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取得联系。这年冬，山西省委利用军阀混战刚结束的有利时机，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红军晋西游击队，杨重远受命参与筹建工作，担任省委汾阳联络站主任兼临时党支部书记。他到汾阳后，以开设骡马店作掩护，在离石、汾阳、柳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先后护送转移了

省委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以及农村抽调的 30 多名共产党员到吕梁山区。

1931 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现名西泉）一家老乡的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成立大会，杨重远任省委军委代表兼游击队党总支部书记，拓克宽、黄子文分任大队长和政委，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这是党在山西地区创建的第一支工农武装。

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事斗争。杨重远和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等一起，先后指挥了中阳县留誉镇、孝义县储家堖、石楼县水头镇和老鸦掌等战斗，歼敌数百人，游击队迅速扩大到百余人，威震晋西。8 月上旬，新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派七十二师、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围剿”晋西游击队。由于被叛徒出卖，山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游击队被困在山里，又失去兄弟部队的增援，处境极为艰险。为了解决队伍发展方向问题，杨重远和拓克宽于 8 月 2 日主持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打游击。在杨重远、拓克宽、黄子文等的率领下，冲破重重封锁，终于在 9 月 2 日到达黄河边的中阳县三交镇。此时，全队只剩下 30 余人（除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游击队胜利地渡过了黄河。

过河后，游击队进行了整顿。杨重远当选为游击队政委，阎红彦当选为大队长。以杨重远为首的新队委会派人积极寻找陕北特委，以便能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游击队在到达安定县（今子长县），找到了地下党员谢子长的谢德惠，通过谢德惠找到了中共马文瑞。马文瑞向陕北特委作了汇报，不久，陕北特委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扩充游击队的力量，陕北特委先后派了一批共产党员

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首先在安定地区开展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群众积极地送粮、送情报，并踊跃参军，使游击队很快扩大到六七十人。随后杨重远、阎红彦带领队伍转战安塞、保安（今志丹县）、靖边等县，歼敌八十六师一部和民团计百余人，缴枪近百支，成立了骑兵分队。他们将打土豪筹得的经费，除留一部分供游击队军需外，其余上缴给陕北特委。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游击队打开了局面，威震陕北。为了扩大革命力量，杨重远、阎红彦重视做联合、团结和改造保运商货的武装（简称保运武装，又称土客）的工作。10月上旬，游击队先后与保运武装首领萧永胜、杨淇、师储杰等人率领的百余人达成协议，并约定成立执法队监督执行。同时由晋西游击队给萧、杨、师所部各队派去政治指导员。在杨重远、阎红彦等人的教育和帮助下，保运武装队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后来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重远十分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10月6日营盘山一仗游击队取得了全胜，俘虏敌万宝山营和横山县民团40余人，缴枪50多支。杨重远亲自把俘虏集中起来，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指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表示欢迎他们参加游击队，对愿回家者每人发给两块银元作为路费，还把伤员送往安定县城帮助医治。不少俘虏听后，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10月中旬，杨重远、阎红彦率领的游击队与保运武装转战到安定县凉水湾时，接安定县委转来陕北特委关于避开敌人主力，必要时可转移到陕甘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

两支部队会合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陕西省委对于会合起来的武装力量十分关注。

1931年10月3日，谢子长按照省委指示来到南梁，杨重远积极协助谢子长开展工作。部队经过后，入冬便转移，水县柴桥子。这时，陕西省委根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局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不久，就于1932年1月5日，在甘肃合水歼敌军暂编十三师两个连。

1932年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新的指示，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李是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后叛变），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杨重远是委员之一，各大队都成立了党支部。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陕甘游击队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旬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活动区域，开展游击战争。

2月19日晚，游击队南下旬邑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谢子长、杨重远率部先后歼灭了耀县照金镇、宜君地区瑶曲镇等地的民团，还两次袭击正宁县城山河镇。4月下旬，谢子长、杨重远又率部打下旬邑县城，处决了反动县长。这是陕甘游击队打下的第一座县城。

战后，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谢子长、杨重远身上，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和杨重远等领导人，还撤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

1932年春夏之交，敌人又向陕甘游击队发动了新的“围剿”。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游击队在清水原集结后，召开队委会议，确定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方针。在半个月内，杨重远协助刘志丹指挥游击队挺进数百里，经过5个县大小9战，8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游击队发动的“围剿”。

7月23日，陕西省委派李艮任陕甘游击队政委，强令推行冒险主义和进攻计划，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处境十分困难。陕西省委为了扭转局面，8月底又派谢子长回游击队任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照金地区设伏，歼敌400人。照金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932年秋末，游击队两次攻打保安失利，被迫撤至甘肃合水县白沙川一带。敌人大军压境，游击队处境极端险恶，部分干部、战士情绪低落。杨重远和谢子长、刘志丹针对当时困难的局面，研究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按照队委会的决定，游击队分成三路，杨重远和阎红彦、杨淇带领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他们在照金以北老爷岭打了大土豪，除将部分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外，还为游击队筹得大批经费。10月下旬，杨重远、阎红彦率部返回南梁地区，接济留守在该地由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和伤病员，

战友们的热烈欢迎。随后，谢子长、杨重远率部挥师北上，在塞县真武洞打了大土豪，获马20余匹和大批烟土，扩编了80多。谢子长和杨重远还将筹得的一批钱，派党员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送往陕北特委和河北省委。

1932年12月上旬，杨重远、刘志丹、杨森分别率领各路游击队合水县

黑幕源、塔尔源地区胜利会合。此时，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根据党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杨家店整编。12月中旬，

衡以中央和省委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杜衡到部队后，认为杨重远、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阎红彦的领导职务，强令其离开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杜衡被迫同意将杨重远、刘志丹留在部队，但对他们根本不信任，不分配重要工作。

12月20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军只有这一个团），杜衡兼军政委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燕清任参谋长，杨重远被降为团参谋处处长，刘志丹被降为团政治处长。面对着这种错误的打击，杨重远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仍努力为党工作。

1933年3月下旬，杨重远协助王世泰、郑燕清率红二团在铜川北面打开金锁镇，消灭民团30余人，随后进入三原武字区，歼敌一个排。4月上旬，杨重远协助王世泰南下渭北，消灭了淳化南村寨子民团后回到照金。4月中旬，又西出彬县，途中消灭了旬邑土桥镇敌河工队30余人。接着又在龙马、高村消灭彬县民团30余人。至此，杨重远参与创建的以照金为中心，纵横近百里、面积2500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游击战争的开展，使敌人惊恐不安。陕西军阀于5月上旬急调3个团和6个县民团分四路“进剿”照金根据地。红二团根据省委的指示，由照金向西开进转移到外线，以打破敌人的“进剿”计划。部队转移到旬邑县阳坡头时，遇到陕北游击支队。刘志丹给一支队干部、

战士讲了话，他们积极开展战争。给一些枪支弹药，派杨重远去一支队任政委。5月29日，在安定县谭家岭遭敌军两个在转肖指挥部队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杨重远续撤退到杨沟村。这时敌人又蜂拥追来，情况万分危急。在这生死关头，杨重远不愿拖累战友，坚定地命令“不要管我了，撤出去一个就能保存一份革命力量。”同志们不忍心丢下自己的政委，坚决要求背他一起撤退。他严肃地说“不要因为我连累同志们，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你们赶快撤，我来掩护。”他以断墙为掩体，沉着地阻击敌人，掩护大家安全撤退。此时，敌人狂叫着“捉活的”冲到他的面前。杨宁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壮烈牺牲。他以身殉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时年39岁。

为了纪念杨重远，1934年底，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安定县的南区和延安、安塞、靖边三县各一部分合并，设立重远县。

# 贺 牛

贺牛，名文章，陕西省绥德县城背抓人，1907年出生，城市贫民。

1924年，贺牛入四师创办的平民夜校上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曾参加过绥德革命史上有名的“龙王斗县长”、“打蛋厂”等斗争。

1928 清涧、安定（今子长县）一带开辟工作。他与白雪山一起组织贫农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发动和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杀衙役、抗粮款。曾在解家沟一带领导群众镇压了收款委员、豪绅和衙役九人。

1933年11月，谢子长从北方局回陕北，贺牛与白雪山奉陕北特委指示，黄河岸边的白家川接谢子长。当时正逢天降大雪，他们宿夜行，拄着棍子跋涉于积雪中，护送谢子长安全到达目的地。

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贺牛任二同年9月，游击队在清涧土黄梁山与敌八十六师遭遇，雪山阵亡，贺牛被俘。贺牛经受种种而宁死不屈，最后惨遭杀害。时年27岁。



## 蒲子华

蒲子华，又名汝英、文锦，1906年6月出生於陕西省绥德县城一个小商贩家庭。

1923年秋，蒲子华从绥德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教育，被发展为共进社社员，积极参加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蒲子华受四师党组织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他先到井岳秀开办的军事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到杨虎城的部队任班长，后又转入驻安徽的高桂滋的四十七军任排长、连长、营副等职。

1928年秋，经杨重远、陈以平介绍，蒲子华转为共产党员，在党的地下军委领导下，积极宣传革命，秘密发展党团骨干。

1930年，高桂滋倒蒋失败，退到山西平定。这支部队的官兵多为陕北人，受革命影响

较深，当时已有共产党员 50 多名，其中有的还担任营、连、排级军官。由于蒋介石排斥异己，高部给养困难，几个月不发饱，怨声载道，人心思变。中共山西特委对这支部队特别重视，派特派员李志敏到部队整顿党组织，发展党员。蒲子华配合李特派员，加紧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工作，发展骨干，为策动起义创造条件。1931 年 4 月，山西省特委又派省军委书记苏亦雄（即谷雄一）、军官教导团吴耀礼和牛感（牛清明）三同志来部队，为武装起义做准备。蒲子华安排牛清明为自己的“护兵”，秘密开展活动。

正当全体共产党员加紧准备武装起义之际，1931 年 6 月下旬，敌上司电令高桂滋逮捕了高部一团八连排长刘玉珊同志。情况紧急，中共山西省特委书记刘天章仔细分析了形势，决定高部提前起义，并决定由省特委特派员兼军委书记苏亦雄领导这次起义。

苏亦雄到平定高部后，立即召集部队中的党员骨干紧急开会。蒲子华是与会成员之一。会议拟定了起义有关事项，起义时间定为 7 月 4 日夜 12 时。因这天高桂滋带团长等部下军官，要到北京给自己的父亲做六十大寿；同时，这天是星期六，军官要回家，是起义的好机会。会议同时拟定了起义部队拉出来后，各团的主要战斗任务。蒲子华领受任务后，回到营房，与牛清明一起进行紧张的准备。7 月 4 日夜 10 许，突然响起枪声，他知道情况有变，未来得及集合部队，便和牛清明以查哨为名赶往三团驻地，方知一团二营营长刘孔彰对起义有所觉察。为防不测，起义被迫提前举行。蒲子华和牛清明当机立断，冲出平定城外，加入一团的起义部队。7 月 5 日晨，起义军 1100 余人碰到盂县清城村外的交叉路口进行了整编。苏亦雄代表党组织宣布这支部队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的，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由山西特委直接指挥。接着宣布了领导人名单：赫光任军长，苏

亦雄任政治委员，寨时寻（窦宗融）任副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军以下分两个纵队第一纵队长靳树生，参谋长王子固；第二纵队长穆春芳，参谋长蒲子华，政治指导员牛清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终于在暴风雨中诞生了。平定兵变成功后，中共山西特委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红军第二十四军成立。红二十四军移师五台山，沿途受到敌人的重兵堵截。蒲子华参加指挥了歼灭盂县上社镇伪团队的战斗，生擒全部保安队员，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红二十四军遂改变行军方向，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外，蒲子华又指挥了攻城战斗，进入县城，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并打开谷仓，将谷米发给劳苦群众。当时天津的《益世报》报道“县仓库所存谷 300 余石，一发而尽，如此分粮者三日。一般穷人……遂欢天喜地，大呼我们的救星到了……”蒲子华协助军部领导，协同当地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经过几天的紧张筹备，于 7 月 26 日举行了千人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这个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的诞生，震动了华北，动摇了反动统治。《益世报》发表社论惊呼“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可满万，俟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红二十四军的壮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的心头之患。他们千方百计妄图消灭这支新生武装。由于红二十四军主要领导人丧失警惕，导致赫光、苏亦雄、窦宗融、刘子祥等同志中了沈克“假投降”的诡计，惨遭、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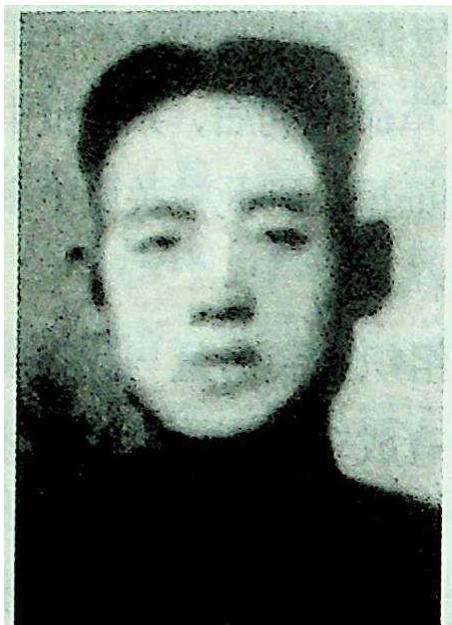
红二十四军由于突然事变失去主要领导，后在刘明德、王子固、蒲子华等人率领下，主动撤出阜平县，向灵邱方向转移。行军中，红军采用声东击西战术，攻占应县小石口，全歼守敌两个连。这时，刘明德派牛清明

前往太原找刘天章。刘天章说“问题重大，省特委需专门开会研究。”省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刘天章、梁子秀连同牛清明一起追赶红一十四军。当他们追寻到陕西时，得知红二十四军在陕北同井岳秀作战失利，损失惨重，余部已星散各地，惋叹之余，只好返回太原。

红二十四军转战到陕北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公推蒲子华为代军长，率军继续与敌作战。由于战事频繁，得不到休整，部队严重减员，蒲子华仍坚定不移，率军与敌苦战。在攻打府谷县城途经十里滩时，与敌段振西团作战失利，被迫退至木瓜堡、清水一带。在这里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天鸣取得联系，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不久，红二十四军遭到敌军三个团的“围剿”，经过激烈的战斗，突围到陕西绥远交界的杨肥峪、盒尔乌苏、大昌汗沟、王子旗、新庙等地，向西转移。这时，经蒲子华、刘明德、王子固等同志商议决定，由蒲子华前往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汇报情况和请示今后意见。蒲子华只身化装到太原，到刘天章，当即返回部队。归途中，他被敌认出抓捕，押解到榆林狱中。

蒲子华身陷囹圄，在酷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凛然以对。于1931年10月惨遭杀害，年仅25岁。

蒲子华的英名和英雄业绩，早在1931年12月11日中央根据地的《红色中华》上就留下了这么一段记载“陕北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蒲子华率领红军，配合当地群众，进攻陕北府谷、神木一带，与井岳秀师激战，敌方惶恐万状……”



## 刘善忠

刘善忠，原名善人，字芝亭。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何家山村一个农民家庭。

刘善忠8岁启蒙，13岁考入县第二高小。1924年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5年秋，进延安省立四中。该校时为中共延安特支活动中心之一，革命气氛浓烈。入学不久，正值延安开展反基督教运动，他便积极投身于斗争之中，成为骨干。导致被驻军高双成部捕押。蒙难后，不屈不挠，与难友一道同敌人进行尖锐斗争，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获释。

1926年，刘善忠经田伯英、呼延震东介绍加入共产党。不久，被党组织选送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同志实际领导)学习。讲习所毕业后被派到冯玉祥部二六四团任党代表。1927年6月，蒋、冯“徐州集会”联合反共，刘善忠被送出冯部。遂辗转于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同年9月，刘善忠回到陕北，投身于反对

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斗争。10月，被叛徒范意德告密，在绥德城东呜咽泉被捕，押解到榆林城陕西省第三监狱，同共产党员、榆中学生焦维炽关押在一个牢房。二人共勉“铁牢可坐穿，壮志不能变；革命胜利后，共话狱中难。”由于他平时做了充分准备，敌人抓不到证据，因此被关两个多月，于1928年1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无罪获释。

回到家乡后，刘善忠继续进行活动，欲组织武装力量与敌人展开搏斗。他曾多方联络过保镖武装，但都没有成功，便决定另谋他图。

1930年秋，刘善忠经延川共产党员梁毓珍、梁毓凤介绍，结识了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刘、高志同道合，相见恨晚，拟自筹资金，购买军火，创建游击队，打出红旗干革命。于是他们在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支持下，先后筹款300元，买得三支手枪，吸收杨秉权、高文清建立了游击小组，活跃于清涧、延川、绥德、横山、米脂、安定(今子长县)、吴堡等地。

1932年2月，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游击小组具备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刘善忠毅然决定和高朗亭、高文清以访友为名，闯淮宁湾山寨邱树凯民团枪。

3月4日，刘善忠、高朗亭和高文清，经演练化装，趁邱树凯离寨之机，来到淮宁湾山寨前。刘善忠化装为团总身份的小豪绅，自称是邱团总的老朋友，特意来拜访。凭着机智、勇敢，骗取了敌人信任，利用吃饭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厨房。刘善忠等用少吃快吃的办法，提前退席，快速回到会客的窑洞，提取墙上挂的四支步枪和子弹，冲向厨房。“不许动！缴枪不杀！”敌人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举起双手，乞求饶命。淮宁湾山寨夺枪凯旋而归。3月13日在，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召开会议宣布中

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

3月22日，延川游击队北上绥德，夜袭留仙嘴大地主白登高的石堡寨，活捉白的独生子白小山和女婿苏正文，缴获银币2400元，把白小山、苏正文处决，并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延川县游击队布告（第一号）》，扩大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影响。

4月18日拂晓，游击队在当地农会的密切配合下，兵分四路，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歼灭永坪镇守敌，缴获步枪17支。刘善忠亲自带领一个战斗组活捉了团总头目刘广汉，国民党县政府被捣毁。刘善忠代表中共延川县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正式成立。刘善忠任司令员，高朗亭任政委。

傍晚，先锋队被敌八十六师骑兵冲散。经刘善忠和高朗亭商议决定在距永坪镇15里的姐姐圪堆山上集合。22日下午，刘善忠队前点名时，只有一人牺牲，其余的队员全部到齐，还扩充了三名新战士。刘善忠就此做了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教育鼓舞了全体战士，大家觉得司令能自我批评，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4月23日，刘善忠率先锋队北进，与尾追之敌二五六旅的一个步兵营周旋于安定县的郝沟峪。24日到达绥德县的沐沟峪联络站。进站前，为了迷惑敌人，先锋队派出一个班，佯装向淮宁湾镇以北的小理河进军，沿路贴标语、路标等制造假象，把敌人引向歧途。25日中午，敌人又追到距沐沟峪只有5里的淮宁湾镇，敌军排长在村边盘问群众“昨晚有没有赤匪来你们村，路过有多少？”群众异口同声地答“没有看见。”敌人即去。这样，先锋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休整了三天。

4月30日，刘善忠率先锋队回到延川县的青坪川、永坪川一带。这

时，先锋队已发展到百余人，50余支枪。国民党延川县政府惊恐万状，立即发布告张贴于各关卡路口，赏500银元捉拿刘善忠、高朗亭。刘善忠看后风趣地说“咱们的生命，伪县长给定价了，好好干，抬高定价5万元10万元，才能证明把敌人打得更痛了。”

为了给陕北特委和先锋队筹措经费，经先锋队总支委会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刘善忠带一路，北上绥德田庄镇，抓捕大地主田子厚的孙子田嘉狗做人质罚款；高朗亭带南路在延安东北、延川县西南地区发动群众，开辟游击根据地。

刘善忠所带的北路分队在田庄抓捕人质未获。5月20日途清涧，绕道延川县东北华家抓村宿营时，刘善忠被混进先锋队的老会分子董凤青等三人暗杀，时年27岁。

## 张庚飏

张庚飏，陕西省肤施（今延安）城内大东门口人，1904年出生。

张庚飏自幼读私塾。1924年秋，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三班读书，并加入四师共进社，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积极参加党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1925年暑假，和同学罗百福组织参加肤施非基运动，宣传马列主义。1926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毕业后，回肤施历任小学教师、校长，肤施县教育局局长。张庚飏以教育为职业，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组织农民运动。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8月肤施也进行“清党”，张庚飏秘密负责高级小学党支部工作，并在艰险环境中担任延长、安塞、甘泉支部的联络工作。

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旦八小学教学，并开展地下党务活动，任中共永宁山支部金鼎党团小组组长。1932年任肤施县立高等小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坚持党的地下组织活动。

1936年奉党组织调遣赴西安，乘车至宜君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光荣牺牲。时年32岁。



## 拓克宽

拓克宽(1905—1931)，又名拓荒。乳名尚儿，字和卿。陕西省清涧县佟家圪村（今属子洲县周家圪崂乡）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拓克宽的父亲拓廷佐，从小苦心务农，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克宽7岁在本村人私塾，1920年春考入苗家坪高小，1921年春考入榆林中学。这时，杜斌丞校长已聘请共产党人魏野畴到校任教。不久，李子洲也到榆中任教。在这两位教师的熏陶下，克宽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7月，李子洲担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克宽随李子洲从榆中转入四师继续上学。到四师后，他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成为四师共进社社员。冬季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4月2日，克宽受党组织派离别母校，经其姑父文经章介绍，则往河南高桂滋部当了司务长，后来升任连长，开始了历时五

年的兵运工作。在党内先后担任一〇九师二团党总支委员、三团党总支书记等职。

这五年在转战冀、鲁、豫、皖、晋等省的戎马生涯中，他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并为开展兵运工作，接待了大批我党派往四十七军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的共产党人，与刘玉璞、李生茂、马汉章、吴依峰、胡廷俊等同志在士兵中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团骨干，扩大革命影响，使党的组织在四十七军的基层连队中建立起雄厚的基础。

1930年，高桂滋部驻防山西平定地区待编。中共北方局指示山西省委在吕梁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山西省委从四十七军中抽调拓克宽、黄子文、杨重远、胡廷俊、吴岱峰、党允亮、史俊才、蒲政平、曹鸿北、田有莘、陈玉清、符有坚等共产党员和陕北特委派来的阎红彦、白锡林、张免芝、杜鸿亮、白树梅等共产党员筹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亲自到这里确定了“晋西游击队”的名称、任务、活动方针、负责人人选和组织分工。在山西省委的领导下，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杨重远任书记，拓克宽、阎红彦、黄子文、吴岱峰任委员。

1931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省孝义县大麦郊楼底村（现名西泉）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副大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选择地势险要、群众基础较好的西宋庄为据点，积极开展游击战。

拓克宽的枪法很准，可以说弹无虚发。他的足智多谋、英勇果断，更受同志们称赞。游击大队成立后，经过短期训练，他指挥全体红军战士胜利地拔除了中阳县留誉镇敌军据点；化装袭击了吴城岭敌军哨所；巧设埋

伏，全歼企图进犯游击队的敌军一个连。同时在汾阳三道川、中阳上桥村、教乌家庄、西宋庄地主，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晋西游击队基本上贯彻了井冈山红军的路线、纲领，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群众的拥护。部队还开办了列宁小学、农民夜校，组织农民会、儿童团、青年团、妇女会，建立起以宋庄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这一切，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斗志，壮大了游击队的武装力量，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也了反动派的统治。

游击队在留誉镇、锄家沿、老鸦掌等战斗中获胜后，不断发展吕梁山、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告急求救，要上司派兵“围剿”。

1931年8月，新上任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力口派一个师、一个炮兵团会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向晋西游击队发动“围剿”。游击队在拓克宽等同志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迂回穿插，伺机打击敌军，消耗敌军力量。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游击队在晋西难以立足。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根据中共山西特委的指示，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

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后，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补充了人员和武器，在安定（今子长县）、安塞、靖边、清涧、延川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9月的一个深夜，游击队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安条岭行进途中，突然遭到300余名敌军围击，拓克宽等与敌激战。在侧翼出击时，未追上大部队，遭敌张廷芝部一个骑兵排的围击，拓克宽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6岁。

## 丁学浚

丁学浚，陕西省吴堡县丁家圪坨村人，1908年出生。

1924年秋，丁学浚于葭县虬镇高小毕业后，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编入三班读书。12月经王懋廷老师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四师共进社的各项活动。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师毕业后回乡任教，先后在吴堡小寺子、川口、丁家圪坨及葭县李家湾等村教书，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共产党员。1934年，在本村群众会上带头烧毁旧地契文约，组织农民抗债。一次，地主领着狗腿子向他村一户贫农讨账，因其贫穷无钱，地主强拉毛驴。村里人气愤难忍。丁学浚知道后，活动了村里几个年轻人，出面阻拦。地主、狗腿子蛮横耍赖，丁学浚等人用石块打跑了地主，替穷人出了气。

1934、1935年间，陕北红军各支队和国民党军队经常打仗，伤员很多，丁学浚便组织群众把红军伤员偷偷抬回家疗养。为掩人耳目，门上挂了红布条，意有“月婆”，以免闲人闯入和国民党搜查。

1935年，丁学浚调瓦窑堡工作。他发动群众，搞土地分配，开辟苏区，积极完成任务。1936年，王明“左”倾路线横行，许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受到打击、摧残，甚至被抓捕枪杀。丁学浚即在此间被错杀于瓦窑堡。

1985年，落实政策中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被追认为烈士。

## 马汝翼

马汝翼，1908 年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张家峁底村（今属米脂县）。1925 年春，汝翼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班读书。不久即加入共进社，1925 年加入团组织，1926 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 年毕业回家乡任小学教师，并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4 年 7 至 1935 年 2 月任中共米东区一区书记。

1935 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中共米东县委在小寺则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期间，叛徒刘复汉领着国民党李登科营两个连敌军，包围了村庄，乘夜色冒充红军四支队叫开寨门。在组织突围时，马汝翼同县委书记郭文华、委员艾楚南跳下寨墙，汝翼当场牺牲，时年 27 岁。

## 刘耀西

刘耀西，原名刘国梁，1904年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乌镇石板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24年农历七月，刘耀西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的四师在李子洲校长的主持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革教学内容，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共产党员教师在学生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革命气氛日益浓厚起来。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刘耀西逐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内，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校外，他利用假期回家的机会参加进步组织“振葭会”的活动，在《振葭》上发表文章抨击官僚豪绅。

1927年，刘耀西从四师毕业，不久，就当上了乌镇筒级小学校长，他努力办好学校，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国民党在陕北“清党”开始后，刘耀西仍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秘密地发展党团员，为革命积蓄力量。同时，还组织农民巧妙地同官僚豪绅作斗争。

1928年陕北遭遇大旱灾，庄稼没有收成，饥民四出逃荒，饥民吃大户的事件时有发生，党组织及时领导了饥民运动。冬春之际，刘耀西领导乌镇一带饥民分了地主的粮，解了一时之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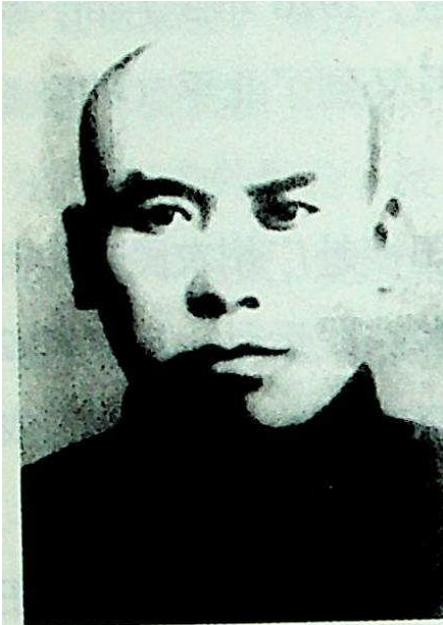
1929年，刘耀西被党组织派去搞兵运工作。他先到内蒙大汗太

吉部队中当兵，后来又转入神府驻军高志清部。1930宁夏投入骑兵第

四师苏雨生部。这时谢子长在该部任团长，谢子长借补充兵员的名义，收纳各地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而来革命同志。刘耀西到苏部后就在谢子长团当兵，他受谢子长之命与符宝珊、刘起源、王家英等在盐池专门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秘密地做接收兵员的工作。

1930年5月，部队向平凉开拔，刘耀西等几名地下党员受谢子长指派绕道定边、环县、庆阳等处收编零散的各地武装人员。到平凉后，他们与谢子长失去了联系，于是刘耀西托熟人介绍，打入了驻平凉的国民党军陈硅章部，担任了该部的政治教官主任。在陈部由高岗和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组成了秘密的中共甘肃第一军团委员会，刘耀西任团委书记。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团结了一些进步官兵。

1931年5月，因为一个秘密文件被敌人发现，刘耀西被逮捕，虽经同志们多方营救，仍未脱险。被捕后，刘耀西严守党的纪律，始终不屈服于敌人的刑讯利诱，使当时在陈部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如刘志丹、张秀山等得以安全隐蔽下来。敌人见他守口如瓶，最后将他杀害。牺牲时27岁。



## 乔国桢

乔国桢（1907—1945），乳名雄虎，原名乔如桢，化名乔干卿、乔胶治、焦复生、贺凝、高子香、王拯民、蒙子学。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店镇乔家寨村人。

乔国桢9岁至13岁上小学，1922年考入葭县单级师范班，三个月后，因生活困难，无力继续读下去，下半年去山西省汾阳县耶稣教办的免费学堂——汾阳铭义中学读书。1933年春转入榆林中学。在榆中，乔国桢逐渐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后因参加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

1924年秋，乔国桢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学后，后经常与共产党员王懋廷、李子洲、杨明轩等接触，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明确。不久即成为四师共进社社员。同年冬，国桢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学校他团结进步师生，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党团组织各种活动。

1925年，党组织秘密派他赴开封国民二

军（胡景翼军）学军事，费用皆由李子洲、王懋廷提供。在那里，他担任过班长、排长及中共党小组长、支部干事，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直奉战争爆发后，乔国桢随军参战。1926年3月间，学兵队兵败函谷关，乔国桢回到河南省委，4月又到了北平（即今北京）。

1926年5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乔国桢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9月毕业后回到陕西，在渭北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2月任陕西省党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他主持成立了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担任农协会主席。

1927年6月，乔国桢在富平县庄里镇被反动民团拘捕，关押在三原陆军监狱，后被中共地下党员在陕军任旅长的许权中营救出狱。12月他任华县高塘民团军事教练，组织农民加人民团，进行训练，使当地党组织初步掌握了一支农民武装。1928年3月，高塘民团被冯玉祥部缴械，乔国桢在华县再次被捕，由于他在当地威望甚高而获释。5月，乔国桢被省委派往许权中旅任连长，参加了渭华起义。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后，乔国桢赴顺直省委（后改称河北省委），任平汉、平绥铁路线的秘密交通员，与杜嗣尧一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1月，乔国桢化名焦复生，赴唐山组织工运、兵运。先后担任中共井陘县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在工人家中召开十月革命12周年的纪念会，第三次被捕，关押在唐山市国民党市党部。后设法越狱逃出，到天津找到党组织。12月担任天津赤色工会书记，同时参与顺直省委工作。他与交通员周铁忠结婚。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开会，筹备五一节示威游行时，

不幸被捕，被关在天津河北第三监狱。第三监狱秘密党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乔国桢化名高子香，担任支部组织工作。6月底，共产党员魏振华被迫害死于狱中，傅茂公和乔国桢召开党支部会，拟出八项要求，并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7月4日，顺直省委发出《动员广大群众援助天津被捕战士绝食运动的紧急通知》，狱内外配合，敌人被迫于7月6日接受八项要求。傅茂公被转移到陆军监狱，党支部改选后，乔国桢任书记。9月16日，政治犯要求向共产党员张宗信遗体告别，狱方借机报复，把代表关人单人牢房。乔国桢、张明运等商议后，于n日开始筹备组织第二次绝食斗争，密报省委，投稿《大公报》。敌人阴谋败露，被囚代表送回，恢复了稍有改善的待遇，第二次绝食胜利。

1931年3月，乔国桢刑满出狱。党组织任命他为特派员，赴内豕古工作。7月3日，在北平等路费时，再次被捕。在敌人军法处，他和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同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搞“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不久乔国桢被送到草岚子监狱，国桢任秘密党支部组织委员。因肺病复发，乔国桢被保外就医。在西山养病期间，为党组织做了许多联络工作。

1935年3月第六次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7月26日夜，在难友的协助下，再次成功越狱。

1938年3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乔国桢到了延安，向组织汇报工作并要求到苏联医治肺病。1939年夏，乔国桢由迪化（今乌鲁木齐）乘飞机到莫斯科住院治疗。1940年秋，身体刚有好转，就要求回国，因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他暂留迪化待命。

1942年9月，新疆督办盛世才将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全部集中于迪化软

禁，1943年2月，把他们正式投入监狱，乔国桢第七次被捕。

由于敌人摧残，乔国桢的肺病复发，被送进“养病室”关押。在养病室，他设法与狱中党组织联系，相互传递消息，根据多年坐牢对敌斗争的经验，奋力写下万余字的意见稿秘密传阅，斗争的原则、对策和办法。

1945年3月战友李握如患病住进养病室，照料卧床不起的乔国桢，敌人竟命令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临别前，乔国桢说“我恐怕不行了，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回延安！”他将从苏联带回的一剪刀送给李握如留念，并托他回延安打听他妻子和女儿的下落。李握如离开牢房后，另一位同志又“装病”去“养病室”护理乔国桢。但乔国桢病情日益沉重，1945年7月31日，与世长辞。



## 赵 搏

赵搏（1906—1941），出生于陕西省府谷县清水乡赵家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赵搏6岁丧父，7岁入本村私塾，15岁入县城南门高小读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刻苦学习，品学兼优，向往光明，追求进步。

1923年南高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保送到当时颇有名望的山西汾阳铭义中学。在汾阳上学期间，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

1924年夏，当得悉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新换校长的消息后，他就和李麟铭等同学回到陕北，到四师上学。

当时的四师，不少教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课堂内外到处宣传革命思想，整个学校充满了革命气氛。到四师后，他所感受到的完全是清新的革命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积极向进步社团靠拢，如饥似渴地听老师讲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阅读学校的进步书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利

用假期探亲的机会，向家乡青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他的影响下，本村青年学生赵希贤、赵宋贤都成为宣传革命的骨干分子，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先后参加革命。

1926年，赵缚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后，受组织派遣释广州，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成为该校第六期学员。其时，学员中的国民党“政学系”和“孙文学会”等右派政治力量大肆制造反动舆论，恶毒攻击共产党，竭力破坏国共合作，气焰十分嚣张。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赵缚对此挑衅十分气愤，他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同极右组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次集会上，一个极端家伙诬蔑共产党，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赵缚见此情景，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当即予以反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遵照党的指示，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他曾两次被捕，先后坐牢八年。在狱中，他是党支部学习委员。他经常秘密组织难友们学习，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研究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7年10月，赵缚同难友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随即党组他到冀东特委工作，不久又调任津南特委书记，化名王元，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初，他化装来到天津，等河北省委具体研究组织抗日武装。不久将京、津附近一带自发、散的群众武装联合起来，正式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八、一十九、三十支队。

1938年夏至1940年初，他又先后担任中共冀鲁豫边区党校校长、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和妇委书记。

1940年4月，他又先后担任中共冀鲁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委。当时鲁南根据地外受日伪军的重重包围，内有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的捣乱破坏，情况

极为复杂。他知难而进，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长途跋涉到达鲁南后，便立即投入紧张而复杂的斗争。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罗荣桓领导的八路军五师紧密配合，依靠鲁南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建立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统一了各地的抗日群众组织，成立鲁南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建立地方武装领导机构，壮大了抗日武装队伍。还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建立了专区、县的各级民主政权，从而使鲁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赵搏对群众非常关心，群众每有疾苦，他必设法解除。1941年，鲁南闹春荒，群众生活异常困苦，只能靠野菜充饥，春耕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他发动并带领所有机关干部帮助群众拉犁耕地，并想尽办法，终于缓和了春荒危机。

1941年10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鲁南区党委所在地苍山县甘霖乡银厂村进行突然袭击。当时赵搏与机关其他同志本已冲出敌人包围，但又发现中央的绝密文件没有带出。他当机立断，命令同志们继续撤走，自己只身返回原地销毁文件。结果文件销毁了，党的机密保住了，而赵搏却第三次被捕了。

当敌人从叛徒口中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始则设宴劝降，诱以高官厚禄。而他面对敌人，时而慷慨陈词，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时而怒斥敌人认贼作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残害共产党员的罪行。敌人恼羞成怒，妄图以各种酷刑逼他就范，但赵搏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无惧色，视死如归，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句党的机密。

当敌人的一切手段彻底失败后，便于11月19日深夜，将遍体鳞伤的赵搏押到村外早已挖好的土坑边。此刻，他仰望满天星斗，严肃地提出要

讲话的要求。敌连长不同意，赵搏厉声道“我就要牺牲啦，还剥夺我这点权利吗？”连长只好答应。赵搏屹立坑旁，从容不迫地从抗战形势讲到我党的主张，从全国同胞的苦难讲到国民党顽军官兵为反动政策卖命的幸。他句句动人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行刑士兵的心扉，他们听着听着不禁热泪盈眶，有的竟抽泣出声。正在这时，领受秘密处决赵搏任务的特务头子于大川，等了好久还不见行刑士兵返回，便亲自赶到刑场，当他看到刑场上的情景时暴跳如雷，大骂行刑士兵，厉声命令士兵立即动手。赵搏毅然跳下坑去，士兵们不忍心向他身上填土。最后，在于大川的鸣枪强令下，赵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他以35岁的壮丽青春，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崇高气节和英勇献身的正气歌。

赵搏在鲁南广大干部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在追悼大会上，整个会场哭声一片，久久不绝。就在他牺牲后不久，当地群众出于分%念的心情，自发地捐献铜钱铸造了一尊赵搏铜像。敌人知道私数次前来毁坏，均因当地群众冒死藏护而未能得逞。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永久纪念这位不朽的烈士，决定将赵搏烈士生活战斗直至壮烈牺牲的山东省苍山甚，改名为赵搏县。



## 孟芳洲

孟芳洲，又名介人、士元，亦名舫洲、瀛洲，化名老侯。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洛川县石头乡寨头村一个书香之家。祖父、父亲都是当地知名的财东，被称为洛川的“南半县”。

孟芳洲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塾，榆林、清涧高小。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共产党员李子洲等人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四师共进社社员。

1925年春转入渭南渭阳中学，当选为学生会的负责人，领导学生参加驱吴运动和“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是年7月，陕西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在三原召开，芳洲当选为省学联的执行委员，到西安参加省学联的领导工作，和张含阵等人一起带领学生同反动的省教育厅厅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发动学生赶走了几个反动校长。11月，孟芳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开始为西安党团组织的刊物

《西安评论》撰写文章，积极向青年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思想。

1925年冬，孟芳洲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校期间，他积极学习马列著作，并参加《新群》半月刊（以上海大学陕西同乡会的名义创办）的编辑和发行工作，热情宣传马列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孟芳洲奉党组织的指示回陕开展工作。因当时西安被军阀刘镇华部所围困无法进城，便回到家乡洛川探亲。在家期间，联合县城的几名党员和进步绅士，清算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反动军官杨袞向当地群众摊派的草料账目。1927年2月，芳洲到了西安，被分配在共青团陕甘区委从事宣传工作，同年4月调往三原任团地委书记。主持召开纪念五四、“五五”（马克思诞辰）和“五卅运动”两周年的大会，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夏，根据陕西党团省委的指示，三原党团地委均改为县委，芳洲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兼三原团县委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孟芳洲与几名党员一起在三原城内开设了一个小饭馆，作为兄团组织的接头机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春积极参与领导了震动全省的三原“交农”运动和武装围城斗争。4月24日，三原、富平的3万农民大军在芳洲和黄子文的指挥下云集县城周围，县长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贴出“免除粮款”的告示，围城斗争有了初步胜利。5月初，三原党团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为配合渭华等地的暴动，决定再次组织群众武装围攻县城，并成立了以绿洲为政委、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武装指挥部。还决定联络地方武装参加围城。5月上旬的一天，各地的农民武装和一些地方武装相到达城郊，由于三原城内驻军已备，攻城未克。又由千地方武装马仙洲部叛变，强行收缴武字区农民的枪支，扣押了黄子文等领导人，围城失败。孟芳洲机警糊用人马混

乱之机，在农民的帮助下扮作车夫逃出三原。

1928年秋，孟芳洲被三原的驻军逮捕投入狱中，受尽酷刑，但他宁死不屈。后在狱卒的帮助下，于1929年秋的一个夜晚脱离虎口。1931年冬，在西安接上组织关系后通过社会关系，在西安高中担任图书室主任（一说任省图书馆主任），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党组织活动经费十分困难，芳洲不但把从家中带的钱全部捐献出来，而且将领到的薪金的大部分交给了党组织。

1932年12月，孟芳洲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去陕南巡视工作。到达汉中不久，又担任了中共陕南特委书记。他积极投入配合红四方面军入陕和创建红二十九军及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2月20日起草了《陕南特委紧急通知》，提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入陕，党组织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汉南新苏区的号召。12月20日，孟芳洲以陕南特委的名义，向省委写了报告，汇报了特委和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建立红军游击队并和杨虎城部警卫团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的情况。1933年1月6日，孟芳洲主持召开特委会议，作出了《汉中特委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提出了红二十九军创建工作的原则、方针和战略策略。会后，芳洲连夜给党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了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红二十九军游击队和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特委的决议，孟芳洲和战友夜以继日地工作，先后起草了《西乡城固边新苏区政府组织法》、《土地法》和《革命法庭组织法》，调派干部成立了党的区委，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为了尽快成立红二十九军，他亲赴西乡与陈潜伦等人一起对红二十九军游击队进行整顿。2月中旬，红二十九军在西乡正式成立，孟芳洲任军事指挥部负责人、苏维埃政

府主席兼红一团政委。红二十九军成立后，加强了党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芳洲和军长陈潜伦、政委李艮等人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指挥红军多次歼灭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截至3月底，红二十九军发展到2000余人，苏区也得到发展。

1933年3月31日，孟芳洲出席红二十九军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西乡马儿岩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红二十九军的扩建和准备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问题。4月1日，混进红军内部的匪首张正万率走卒分四路袭击红二十九军军部。孟芳洲听到枪声知是内变，立即机警地持枪边战斗边向外突围，攀缘陡壁直下山脚，涉过牧马河，住在金家山洞里，观察动向。由于叛匪搜山，封锁道路，孟芳洲4天都没有吃饭。4月4日，他走出山洞到附近村庄找区苏维埃粮食委员严明发，想弄些吃的东西，以便去川北找红四方面军。不料严明发早已投靠张正万，当日晚，将孟芳洲杀害在梁河坝。孟芳洲同志牺牲时年仅28岁。



## 李嘉谟

李嘉谟，名正安，字助成。1903年12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柏树抓村。

李嘉谟的父亲李渥是前清拔贡，任过教谕官，后设塾兴学，在延川县内办九处私塾。所以，幼年时随父读书。他擅长书法。1924年秋，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勤奋学习，要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深得共产党员、校长李子洲和教务主任杨明轩的赞赏。他是学生中较早发展的四师共进社社员之一，1925年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员。1926年暑期，中共绥德地委派李嘉谟等延川籍学生，回县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建立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经过短暂的酝酿筹备，国民党延川县党部在县城老爷庙宣告成立，与会代表推选郝得仙为党部书记，刘兴汉负责组织、李嘉谟负责宣传。他们在城乡广泛宣传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并赶跑了延川城内的基督教会。随着革命形势的迅

猛发展，是年七八月间，李嘉谟等人在县立第一高小组建了第一个中共党的临时支部。

1926年冬，李嘉谟、刘兴汉在绥德四师毕业后，商定在文安驿筹办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以此来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1月21日，李嘉谟出席了国民党陕西省代表大会，了解了应如何开展陕西的大革命运动。会议之后，延川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正式创办，四师一班毕业的刘兴汉任校长，李嘉谟任教务主任。在二高秘密成立了中共延川党支部，书记刘兴汉，李嘉谟负责组织，石如瑶负责宣传。他们经常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启发革命觉悟，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耳闻目睹延川腐朽落后的教育现状，李嘉谟奋笔疾书，将大幅标语贴在县城内外。又组织师生前往国民党县衙静坐示威，强烈要求罢免反动的教育科长。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撤销了原教育科长，将我党一位地下工作者补为科长，斗争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军阀到处捕杀共产党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八九月间，李嘉谟、刘兴汉奉中共绥德地委指示，赴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在离开延川前，李嘉谟把党员召集在一起，说明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险恶形势，鼓励大家要讲究策略坚持斗争到底。

李嘉谟在省委秘书处工作期间，西安正处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省委机关的工作时刻受到匪特的监视。但他不畏白色恐怖，勇敢机智地坚持党的地下斗争。白天撰写文章，刻写油印党的机密文件，晚上出去搞社会宣传。

1928年3月22日深夜，省委秘书处不幸遭到破坏，李嘉谟、徐九龄（女）等五位同志被捕入狱。不久，打入国民党内部做秘密工作和参加渭华起义的

王德安、冀月亭、王文宗、李维俊又相继被捕。在狱中，惨遭敌人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1928年6月17日，反动派下令将李嘉谟和任醴、徐九龄、方鉴绍(女)、王德安、校明济、冀月亭、王文宗、李维俊九位同志押至西安北门外红庙坡。李嘉谟等九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惨无人道的敌人将他们活埋于土坑中。

为了纪念李嘉谟等九烈士，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于1952年12月21日，在西安群众礼堂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将他们的忠骨安葬于西安市南郊烈士陵园。



## 张承忠

张承忠，名晨钟，号子乾。1908年10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苏家岩乡张家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全家迁居清涧县张家硷村。

张承忠少年时在清涧第二高小读书。1924年秋，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四师上学期间，受李子洲、王愁廷等革命家的熏陶，阅读《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图书、杂志，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毕业后，张承忠先后在清涧店则沟、花岩寺、楼则塌小学任教。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担任清涧东区党支部书记。1931年任中共绥德南区区委员。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成立，张承忠任支队经济员。1933年4月，陕北特委将九支队改编为红一支队后，承忠任一支队政委。

1933年8月，陕北特委高起家抓会议后，绥清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迅速发展。11月初，红一支队再次南下返回后，他和副支队长马佩勋带两个分队留在安定（今子长县）地区活动。别日，枣树坪战斗失利，队长强世清负伤，张承忠、白德胜带一队去延川开展游击活动；贾仰青带一队转入吴堡活动。在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部队重兵“围剿”的严峻情况下，两队返回安定后，为保存实力，支队决定，分散隐蔽。张承忠带五名队员回到清涧地区，在小岔则村会合白如冰带领的红二支队一起开展武装斗争。并派遣一支队队员张家修、李向海和苏利厚返回安定黑窑沟，召回六名队员，带得12支长枪，在清涧地区恢复活动。1933年腊月初七晚，白雪山、张承忠、白如冰、王聚德等一、二支队的领导在清涧东区安家山开会。根据解家沟共产党员白玉华的报告，白天在解家沟集上，豪绅、衙役到处抓人，用铁链锁人，向穷人逼收粮款。于是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公开打击敌人，为民除害。快到半夜，红一、二支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解家沟，当场杀了九个半（一个被砍未死，后逃跑）豪绅衙役。红一、二支队的这次革命行动，成为清涧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转折点。

1934年4月，陕北特委派张承忠为神木县委书记。遵照陕北特委的决议，神木县委加强了党对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的领导，开辟了一块东到呼家庄、盘塘，西到崔白家沟，南到柳林滩，北到沙峁、刘家坡，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红色区域。县委即以窟野河为界，建立了东西两个区委，不久发展为沙峁、马镇、贺家川、太和寨四个区。6月，神木县委又派贺伟等四人，带五支枪和韩峰一起去府谷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府谷游击队。到1934年秋，神府地区创建了神木、府谷、佳芦、葭县四个县委，发展了270多名共产党员、1100多名共青团员。红军武装人员由七八个人的特工队，

壮大为多达数百人的红三支队。开辟了南北长 400 余里，东西宽 100 多里，12 万人口的神府革命根据地。

1934 年 9 月 18 日，神木县委根据特委指示，在一区王家庄将红三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并成立了神木县革命委员会。党、政、军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红色区域的巩固和扩大，标志着神府革命根据地已正式建成。

1935 年 5 月初，神府工作委员会成立，张承忠任工委宣传部长。9 月 12 日，张承忠任神府工委书记。他坚决实行集体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全力开展恢复和发展苏区的斗争。

1935 年 12 月，中央决定将神府苏区改为特区，由中央直接领导，调张承忠去中央党校学习。因敌人封锁，他暂时在组织部工作。1936 年初，张承忠任榆林工委书记，到榆林县东部、葭县北部毛谷 1 川、芦家庄一带开创根据地。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押送绥德。于 1936 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被害，年仅 28 岁。

张承忠短暂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一生。解放后，省政府出资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张承忠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

## 刘光显

刘光显，代号崔小六，楼光谢。1911年3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店镇村。

刘光显8岁开始在本镇读书，1924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的四师，李子洲校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学校购买《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图书、杂志2000多本，供学生自由选读；组织学生参加四师青年社、陕北青年社。创建了中共党团组织，并领导绥德民众建立工会、农民协会、脚户自保会、学生联合会等，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在这革命洪流中，刘光显于1925年初加入团组织，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2月回到家中，名义上劳动，实际上搞地下工作，有时晚上到葭县米脂边界参加会议。6月，组织童子军30余人，项戴红布条，唱歌，呼口号，在店镇街上示威游行，宣传革命思想。当时家中雇佣两三个长工，就向他们进行阶级教育。这些贫苦人经过启发，觉悟有所提高，常在山里劳动，说这些土地将来要归我们穷人耕种。

1931年至1933年，刘光显担任葭县特区党委书记。

1933年7月22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和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不幸被捕。8月3日，王兆卿等六人在米脂城南无定河畔被敌杀害。刘光显到米脂城内，刺探了解被捕六人的情况，

如实向张达志汇报了六人英勇不屈状况，圆满完地成了任务。

1934年2月，刘光显到安定县（今子长县）和贺晋年一块在王家湾活动。7月17日，为营救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经过和谢子长研究，决定战士们化装分批入城，先打进去几个人，又化装混入城内一些人，最后在城南、城北同时开枪，里应外合，打开了安定城，救出了被关押的200多名党员和群众，震惊陕北。

9月初，刘光显担任了红一团政委。一次在行军中，其兄刘光明带的武器和衣被丢失了，已走了30多里，刘光显返回去把东西找到，又追上了部队，这件事当时在红一团曾称颂一时。

同年11月，刘光显在杨家园则的勤英山上观察敌人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 马汝骥

马汝骥，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村人，1909 年出生。

1924 年秋，马汝骥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三班读书，受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老师影响，加入青年社。马汝骥不仅学业成绩优秀，而且在四师青年社及参与创建绥德县工会、农民协会、脚户自保会、学生联合会等各种活动中表现突出，1925 年加入青年团，1926 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7 年毕业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做地下工作，任中共北方局父通员。1931 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委员。陕西游击总队成立后，马汝骥任政治处副主任。

1932 年 2 月，马汝骥在陕西旬邑县上水坡战役中牺牲。

## 刘汉武



刘汉武(1903—1935)，幼名同申。陕西省绥德县中角乡后坪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

刘汉武幼时在本村读私塾。1924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李子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革命思想影响下，参加过闹学潮、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基督教等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井岳秀派车队查封了四师。他和弟弟成武被迫离校，回到家乡。当时他家雇用七个长工。他们一回来，首先把自己家里的长工当做宣传教育对象，整天和长工们一块干活，一块吃饭，一块休息，用自己家里地主与长工之间的等级差别，教育长工认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剥削阶级，为什么长工是被剥削者等革命道理。这一举动，使长工们十分惊奇。他们在背后偷偷议论：马列主义真厉害，能使“主人”和“伙计”站到一起来。“少爷”天

天说一反祖逆长的话，做一些背叛自身利益的事。长工们在他的热情帮助下，觉悟不断提高。马进武、刘明成等长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还与霍维德、马化麟（马南风）等人紧密配合，在中角、马川及吴堡西部的辛家沟一带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开展活动。

1928年10月，党组织决定由刘汉武任中共绥德东区（义合区）区委书记。这时，他郑重向父亲宣布“我已参加了共产党，你就不要管我了。”说完，不管父亲态度如何，离开了家庭。

1928年陕北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而反动民团却不顾群众的死活，横行乡里，催粮逼债。绥德东区的马富图、马向前更是为非作歹，欺压群众，老百姓对他们切齿痛恨，强烈要求清算这两个坏蛋。刘汉武挺身而出，到县公堂控告。他以大量的人证物证，揭露了他们侵吞民财、鱼肉百姓的罪行，使当局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不得不撤了他们民团团总的职。

义合镇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他们光用干草叶喂马，把牲口吃剩的干草梗节倒掉。用完了又在群众中强行征收。这一践踏民财的行动，激怒了周围的群众。刘汉武动员组织数十名农民手持木棍前往师部示威。敌师长自知理亏，便当众训斥马夫，并保证不再征收饲草，愿按市价收购。

1929年，刘汉武任中共绥德县南区区委书记，与崔田夫一起，领导南区上千农民参加了绥德历史上著名的“打蛋厂”斗争。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县政府。

这以后，他在陕北特委直接指导下，与霍维德、马化麟、范子文、高农斧、高克恭等人一道，创建了绥德县东区革命根据地。

不久，他与范子文、高克恭等人组建了红十二支队。他率队开展了革

命活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大造革命舆论，打击反动地主民团，镇压反革命分子，抓住有利时机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

1934年秋，在国民党八十四师疯狂“围剿”下，我党的机关撤离转移，红军武装暂时南下。刘汉武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的党团骨干和革命群众开展反“围剿”斗争。10月，汉武被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四处任职。1935年9月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搞的所谓的“肃反”运动中，他与刘志丹等人一起被捕。一贯性强、好胜的刘汉武被气得吃不下饭，身子慢慢消瘦下去。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刘汉武才出狱，但已处于生命垂危之中。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刘汉武被送到永坪红军医院治疗。他的警卫员刘长德和同桂荣的通讯员孙斌前往医院看望时，他十分感慨地说“我真想不到，闹革命还会自己人闹自己人。”“闹革命真复杂呀”“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救了我們”刘汉武在永坪医院留下了这简短的遗言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人世，时年32岁。



## 马承启

马承启，原名马光裕，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吉镇一个中农家庭。

马承启幼读私塾，1924年高小毕业，1925年春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四班上。由于马列主义在该校的传播，他积极参加学校党团组织发动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驱逐吴新田运动、非基督教斗争、声援“五卅惨案”、组织脚户自保会等活动。11月，加入共产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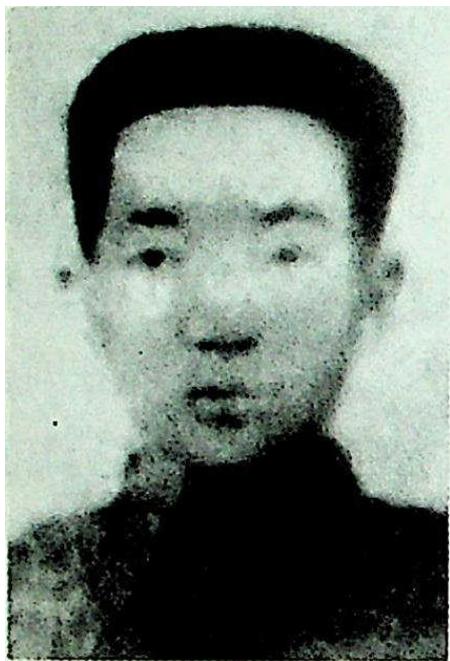
1926年9月，受党组织的派遣，由徐梦周老师带领，马承启和白雪山、崔仲英、张慕时、张志文、常宣、马云泽等八人到甘肃兰州，考入由冯玉祥部办的政治训练班。11月又转到银川。当时银川地下党的负责人是四师校友李麟铭，决定将马承启、常宣留在宁夏冯玉祥部吉鸿昌部队特别党部工作。

1927年，马承启、马云泽等追随冯玉祥部参加北伐，马承启担任连长。同年8月，冯玉祥总部又分配马承启到第二集团军军事政

治学校工作。

1931年，党组织批准马承启离开河南，回到绥德吉镇，任吉镇高级小学校长。以高小为秘密联络点，与陕北特委、吉镇、葭县党组织密切联系，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当时，陕北特委马明方经常以卖药为名来马承启家接头。吉镇国民党驻军司书董培义（关中人）也与马承启联系过。后来董培义叛变，暴露了党的组织，破坏了陕北特委机关，酿成了米脂枪杀毕维周等六同志的惨案。当时情况相当危急，马承启接到组织通知，离开了吉镇，同马建祥一起转移到葭县高长久家中躲避。

1933年8月，陕北特委张达志派遣马承启到安定县（今子长县）任家赆，担任了红一支队一分队政委。红一支队二次南下返回后，在树坪战斗失利，队长强世清等四人受伤。红一支队政委魏武又在温家坡战斗中牺牲。由白得胜代理队长转战安定山区。在县西一区谭家砭与井部张建南连队100多人展开激战，马承启英勇牺牲。时年27岁。



## 张慕时

张慕时，1901年出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店镇杼牛沟村一个农民家庭。

张慕时8岁时在本村上学，1924年从店镇高小毕业，1925年春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9月，学校党组织派遣张慕时和马承启、白雪山、崔仲英、张志文、常宣、马云泽等八人去兰州投考冯玉祥部办的政治训练班，后因情况有变，张慕时考入冯部设在平凉的随营军官学校。进校后，张慕时被分配到骑兵队。

1927年初，随营军官学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迁往西安。5月，冯玉祥东出潼关参加北伐，军事政治学校的30多名共产党员被调出学校，组成前敌政治工作团，随军出征。张慕时任前敌政治工作

团宣传员。他善于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具有宣传才干和相当的组织能力，在周围同志和党外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6月，冯玉祥部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不久，在蒋介石的拉拢下，背叛了三大政策，背离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正确轨道，将全军营政工人员集中在开封整训，进行“清党在这种逆转的形势下，张慕时的革命意志仍很坚定。在共产党员秘密召开的党小组会上，慕时总是带头剖析时局，谈出自己的看法，以鼓励和教育其他同志认清方向、站稳立场、坚定信念。由于张慕时在同志中有威信，因此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见。当时训练班里陕西和绥远籍的20多名共产党员，没有一个动摇的，这与他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开封受训月余后，张慕时被派遣到神府高志清骑兵旅任中校政治员，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做兵运工作。1928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失利，冯玉祥部停止设置政治委员，张慕时被免职。

1929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设立了一个军事行动委员会，张慕时就离开骑兵旅，回地方从事革命武装工作。不久，慕时利用以前的关系，又到神府高志清部做兵运工作，在第九连任排长。

1930年春，张慕时调入高部十一连任排长。张慕时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敌军士兵中逐渐树立了威信。经过半年时间，在他排里发展了四名共产党员。到今年秋天，终于促成了高志清的义子高广仁骑兵连起义。

1931年，陕甘保安一带兵运及游击活动很活跃，张慕时带领争取过来的10名士兵，准备去保安（今志丹县）同刘志丹部会合。他们绕过榆林、横山到达三边地区后，与当地驻军相遇，去路被阻。为了早日找到自己的队伍，张慕时率起义战士英勇突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张慕时牺

牲时年仅 30 岁。



## 田庆丰

田庆丰，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苗家坪镇（今属子洲县）。

1924年从苗家坪高级小学毕业后，于1925年春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勤奋读书，在党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不久，加入四师青年社。是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寒假，田庆丰与同班同学苗仰实、六班同学贺维新一起在苗家坪高小办文化补习班，并秘密创建了中共绥西苗家坪党支部，田庆丰任支部书记。

1927年7月，苗家坪高小党支部转为区委，田庆丰担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抗租、抗税和抵抗国民党拉差等革命斗争，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1928年4月，田庆丰与区党委成员苗仰实等积极筹备，并参加了在苗家坪南丰寨山上召开的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

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简称中共陕北特委）。

1937年，国民党绥德专署逼他当联保主任，田庆丰因未得到组织批准，拒绝担任。国民党绥德专署派人强行把田庆丰带到绥德，进行了拷打，将田庆丰逼死于绥德。



## 王兆卿

王兆卿，字子禄，1908年生于陕西省神木县王家后抓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王兆卿1922年春入神木县高小上学，1925年秋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编入五班上学。在校长李子洲和王懋廷、田伯英等党员老师的教育培养下，阅读《向导》、《共进》、《中国青年》和《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思想积极要求进步，踊跃参加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学校放假后，他回到家乡神木，利用私塾办起了平民补习学校。他给乡亲们讲故事，深入浅出地讲授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以及农民如何团结起来和豪绅、污吏作斗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的压迫以及反对封建迷信的道理。在本村及外村还组织起几个农民协会，开雇农村调查活动。

1926年9月，钱清泉到陕北绥德，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师的公开身份，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通过陕北党组织为兰州冯玉祥部国民军政治干部学校招募学员。11月，中共绥德地委选派了王兆卿、李麟铭、陶兴奋、贺维新、牛化东等2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在钱清泉带领下，从绥德赴兰州，参加了驻甘肃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甘肃天水受训后的王兆卿，被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

1927年，随部到西安。大革命失败后，王兆卿几经辗转脱险回到了家乡，经神木县党组织协助，任神木南区教育委员。他以教育委员的身份为掩护，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活跃在南区各地传马列主义，从事筹建南区党组织的工作。他介绍了贾怀光和贾怀清参加共产党，成立了神木南区第一个党小组。他在给战友温吉甫的扇子上题诗曰“铁链束缚全地球，重屋压迫世人悉；马列主义行天下，人解放获自由。”表现了他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然充满胜利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神木南区各个学校检查工作时，每次讲演中，总是要鼓舞师生走革命的路。还形象地比喻“学校是一个制造炸弹的工厂。毕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后，就是一颗投向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土豪、地主的炸弹，要炸得他们永不安宁。”他每年的薪俸仅有120元白洋，几乎全部用于党的宣传教育事业。

1928年8月，他组建了神木南区第一个党的支部——贾家沟支部。

1929年，王兆卿在王家抓、王家庄、刘家坡、沙峁、彩林、盘塘、杨家沟、贺家川一带相继建立了六七个党的支部，党员发展到100余人，堪称神木南区建党并开展武装斗争的先驱。同年，奉党组织指示赴山西汾阳做兵运工作，因身份暴露返陕。

1930年，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批示，在贾怀光等人配合下，继续发展党

组织，党员达 200 余名。不久，又被派往山西，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将他安排在驻守平定县的高桂滋部做兵运工作。

1931 年 8 月，高部两个团 1100 多人起义，改编为红二十四军，后起义军于河北阜平县遭到失败。他奉陕北特委指示回神木，以接应起义军转移。当他赶到神木县城以北时，红二十四军已在府谷县清水河、皇甫一带被敌打散，他冒险营救，只救出几个突围的党员，如梁子秀、牛清明等，就住在他家中隐蔽。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努力组织人民武装特务队，为开展神（木）府（谷）地区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1932 年春，王兆卿赴甘肃搞兵运。“清远兵变”失败后，11 月间，他由家乡前去陕甘游击队，路经瓦窑堡，找到了当时任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的马文瑞，接上了关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派杨庚武、雷云亭给陕北特委送来一批经费到安定（今子长县），让马文瑞转交特委。马文瑞一时找不到可靠的人，便让王兆卿把经费送给特委后再去找陕北游击队。王兆卿接受了这一紧急任务便和一老乡同路前往，当走到无定河畔时，老乡见利忘义，竟用石头把他打昏在地，将经费抢跑了。由于伤势颇重，在米脂、葭县休养了一段时间，方才回到特委。特委负责人马明方让他留在特委，派他去葭县、吴堡指导工作。

1933 年 7 月，陕北特委召开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王兆卿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这次会议为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和创建陕北根据地作出了正确的决议。会后，特委派他协助毕维胃对红一支队进行整顿。路经镇川堡，住在党员崔明道家，被叛徒出卖。次日早晨，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和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不幸被捕。8 月 3 日，王兆卿等

六人在米脂城南无定河畔被敌杀害，史称“无定河畔六烈士”。王兆卿时年仅 25 岁。

## 李青云

李青云，陕西省府谷县孤山堡人，1907年出生。1925年秋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此时的四师，教育、教学组织管理有序，教学内容新颖。李子洲校长以马克思主义为学生的必修课，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师资队伍教学有方，使学校成为陕北有志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绥德党支部和团特支在组织发动地方各种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组织师生广泛参加，培养教育进步青年加入党团组织。在五班读书的青云刻苦学习，积极进取，进校一年后就加入了党组织。

1927年8月，军阀井岳秀派军队包围四师实行“清党”，青云中断学业，回府谷孤山堡小学任教。是年冬，秘密担任府谷县孤山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秋，执行陕北特委指示，青云接应转战晋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十四军到孤山堡。后与红二十四军余部在突围中英勇献身。



## 白雪山

白雪山，字东岭，化名周凯。陕西省清涧县白李家河人，1905 年出生。

1925 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五班上学期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四师共进社，组织同学经常走出学校，积极参加宣传、发动农民起来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等活动，加入了学校党团组织创建的“陕北青年社”。

1926 年，白雪山由李子洲介绍加入共产党。9 月，奉党指示，同张慕时等人考入冯玉祥部随营军官学校（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次年春，任机关笔记员，参与唐澍组织的红色剧团街头宣传。由于表现出色，被调至冯军总部搞宣传工作。不久，随军北伐。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冯玉祥联合“清共”，他奉命扮作商人，先后在徐州、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1928 年夏，白雪山辗转回陕，参与组织

陕北农民协会，任宣传部长。翌冬，在本村开办冬学，同谢子长、白明善、刘善忠等密切联系，传播革命火种，领导当地农民开展抗租抗息，反对地主恶霸的斗争。

1931年秋参加晋西游击队后，受组织指派，偕同李宗白打入陕北保运武装师储杰部。在其耐心争取下，该部百余人悉数反正。1932年2月，任陕甘游击队经济处粮秣科长。次年秋，遵照陕北特委重新组织游击队的指示，以求医为名，复返故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创建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在白雪山等同志策划和指挥下，红一、二支队同赤卫军联合出击，在解家沟一举镇压豪绅衙役十人（九死一伤），群情振奋。井岳秀闻讯手慌脚乱，悬赏万元缉拿他。

1934年2月7日，白雪山率领二支队和四支队及当地赤卫队打垮了清涧店子沟民团一个排，缴获长短枪九支和大批弹药，接着又在绥德成立了五支队。7月初，五个游击支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白雪山跟随谢子长曾一度攻占安定（今子长县）县城，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震慑了敌人。2月，担任红二支队支队长。3月21日，在兄弟部队协助下，带队夜袭店则沟民团获胜。后配合红四支队，在绥德、清涧地区开辟红色村庄200多个。在谢子长领导下，我军集中红二十六军二团，陕北游击队一、二、四、五支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安定县武家塔歼灭敌人两个连，在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紧接着又激战清涧河口重创敌军。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这些大的战斗中，白雪山领导红二支队进行了有力的配合，起了重大作用。

1934年夏，当蒋介石在南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

时候，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陕北军阀井岳秀，对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围剿”。9月2日，山头哨传来消息，说有敌军30多人从河口回清涧县城，路经土黄梁。红二支队获悉后，在队长白雪山率领下快速向土黄梁前进，准备伏击敌人，不料敌军有一个连抢先我二支队守在山上，我军冲上山与敌交锋之际，山下来了民团100多人也上山增援，我军腹背受敌，敌我力量差距过大，土黄梁战斗失利。腹部中弹的白雪山，仍坚持指挥战斗，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29岁。

# 吴志祥

吴志祥，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五龙山乡白家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5年7月，吴志祥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学校受到了新文化教育和国民革命宣传的影响，以及马列主义和新思潮的熏陶，进一步激发了他除暴安良、推翻黑暗社会的决心。在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于1926年5月加入了团组织。

1927年8月，井岳秀派兵包围四师，进行“清党”，常汉三校长、蔡楠轩等党员被迫离校。吴志祥从此中断学业，遂以木匠职业为掩护，先后到榆林、横山、内蒙古等地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发动群众。1934年春，经白怀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白家湾支部书记。自此，他同鲁贲、魏岗等共产党员一起，以白家湾为中心，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扩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打击土豪劣绅。仅两年多时间，吴志祥就先后在响水、波罗、殿市、白高庄等地建立了14个党支部，有党员130人。组织起16个贫农会。在榆、横、内蒙古等地的上百个村庄里播下了革命火种，为横山县委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4年春，白如冰（化名常医生）和张浩华受陕北特委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乔装来到白家湾村，传达陕北特委关于组建横山县委的指示，志祥详细汇报了横山党组织活动情况。4月，吴志祥、白如冰、张浩华、白存

明分头在韭菜沟、吴岔、瓦高庄、二石缝、沙河、杨沙畔等几十个村庄视察党团组织状况，通知关于成立县委的筹备事项。按照通知精神，5月10日，各地代表60多人来到吴志祥家中，召开了中共横山县委成立大会。大会在白如冰的主持下，经过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了横山县委。由吴志祥、白如冰、张浩华等十人组成。吴志祥当选为县委书记。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农工部等工作部门。白如冰协助吴志祥主持全盘工作，议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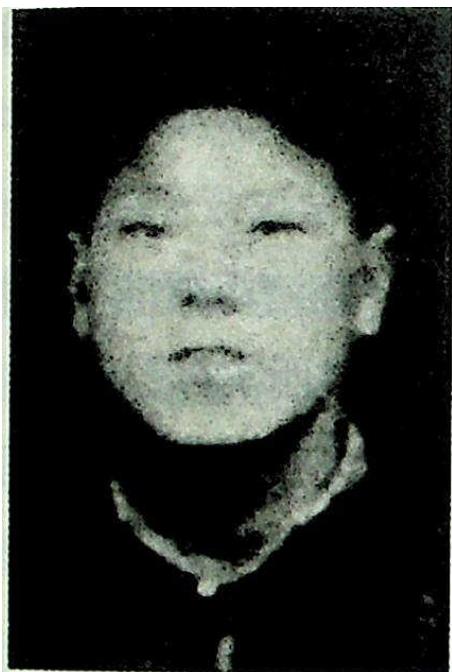
6月，县委派人去五龙山，秘密处决了一贯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国民党横山税务官史国鼎。同时，还派出游击队远道奔袭吴堡北区，狠狠地打击了该地的豪强地主，有力地支援了吴堡革命。为了扩展游击队的力量，8月，吴志祥冒着生命危险“单刀赴会一枪未发，说服并收编了流窜在定边、靖边、拓家畔、宋家川一带以吕天德、宋乐举（宋老二）、张俊发为首的哥老会武装。从此，横山县委声威大震，武装力量壮大，远近土匪望风归顺。县委决定趁热打铁，又派人分别收编了另一股以曹某某为首的土匪武装和活动在瓦高庄一带白存莲的“硬豆”队，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县委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地主豪强的极度恐慌。于是，白家湾村的保长王生德与无赖恶棍吴志德、李步深扬言要向当局告密。吴志祥闻讯，当机立断，亲自带领游击队处决了吴志德、李步深，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白家湾村周围接二连三地发生“闹红”事件，国民党横山县温县长和保安团头子曹仰汉、驻军万营长、闽连长蠢蠢欲动。9月，敌人派两个特务，秘密潜入白家湾村窃取情报，妄图里应外合，颠覆H均被县委先后破获，予以处决。

10月16日，吴志祥外出视察工作归来后召集各区乡支部领导在他家开会期间，因王生德泄密，小河沟绅士雷云廷向横山县政府密告，傍晚，敌驻军及保安团100余人，由曹仰汉、闽连长带领，分兵三路，偷偷包围了白家湾村。县赤卫队大队长周昌荣发现了沟底

有不少穿黄衣服扛大枪的白军涌上坡来，大喊一声“敌人来了”随即鸣枪报警。吴志祥听到枪声，手操马刀从屋内一跃而出。他临危不惧，命令其长兄吴志贞、侄子吴海生迅速组织人员转移，他自己和周昌荣留下阻击敌人。同志们隐蔽撤离时，敌人在两翼山头轻重火力的掩护下，散开队形，向山上冲来。在这危急之时，吴志祥深知两人同时突围已不可能，便命令周昌荣迅速突围。周昌荣紧握志祥的手，深情的泪水夺眶而出，说了声“请多保重”恋恋不舍地向后移去。敌人冲上来了，吴志祥猛地一跃而起，挥舞马刀冲入敌群，在一阵左冲右打狂砍猛剁之后，中弹牺牲。时年26岁。



## 高绪祖

高绪祖（1907—1935），字绳武，曾用名何通，陕西省葭县（今佳县）神堂沟村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1915年至1924年，绪祖先后在本村私塾和店镇高小读书，他学习踏实，门门功课都学得很好。

1925年2月，高绪祖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个时期，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四师的学生运动亦蓬勃发展。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高绪祖和许多进步同学经常深入城郊和乡村向农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这年秋季，国民党绥德县政府的“骡柜”（拉差机构）强拉牲口支差，群众非常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抗。四师师生目睹此景，十分愤慨。有一次学生刘维华向学生会的报告“骡柜”拉他们的牲口。学生会就组织学生去打“骡柜”，群众拍手叫好。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四师学生积极响应北京学生运动，举行示威游行，组织街

头宣传，还去城郊农村搞宣传活动，高绪祖每次都是积极参加者。这年暑期高绪祖同其他葭县旅输、旅绥进步学生集会，成立了“振葭会”，创办了《振葭》，高绪祖经常在《振葭》发表文章，宣传革命理论，揭露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冬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忘我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春，西安建立了党领导的中山学院，高绪祖被推荐进中山学院学习。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7月陕西实行“清党”。中山学院被迫停办。高绪祖秘密回到家乡，参加当地革命斗争，担任了神堂沟党支部（葭县农村建立最早的一个支部）书记。为了适应越来越恶劣的环境，神堂沟支部不仅经常同本村各家密切联系，而且常去南抓、枣林坪、高家塆等一些有党员的村庄进行工作。此外，还通过节日、庙会、过年闹秧歌等机会，广泛联系接触群众，使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党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1928年2月间，党派高绪祖到刘拴沟小学当教员，以此为掩护，在这一发展党、团员，建立革命组织。经过一年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秘密农会。

1929年陕北遭大旱灾，小学倒闭了，高绪祖被迫回家。这时，高绪祖家经济情况十分困难，但他还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小米背着父母卖掉交了党费。

这个时候形势紧张，葭县县委领导葭县南区党的工作很不便利，所以决定神堂沟村党支部改建为葭南区委，高绪祖担任区委组织委员。1930年，葭南区委派高绪祖到关甲村小学任教，开辟工作。这个村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工作很难开展，经过艰苦努力，才教育争取过来几名进步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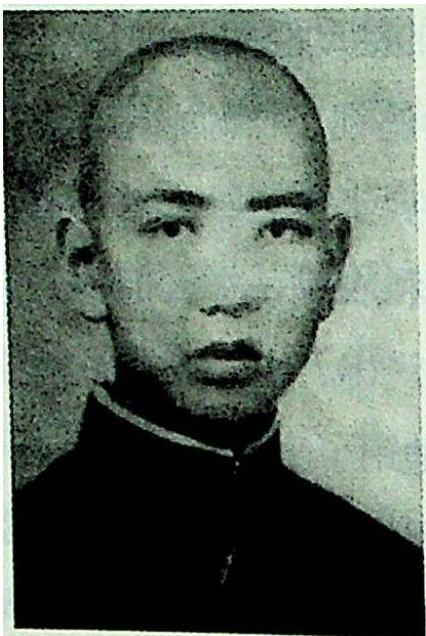
1931年至1933年间，他被县委指定为葭县互济会的领导人。互济会是党的外围组织，对当时党的活动曾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一次上级派一位叫老刘的人来陕北巡视工作，天气很冷了，他还没有衣服穿，互济会就筹款，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才听说他就是赵伯平。互济会还曾几次筹款解决了党的活动经费。

1934年4月间，陕北特委白如冰来葭县巡视工作时，指出贫农会有组织而无领导人，要县委派人领导贫农会工作。县委就让高绪祖当了县贫农会主席。他穿着像农民，劳动和农民一样，但一开起贫农会、妇女会，讲话滔滔不绝，道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写文章也很利索，群众说他事事精通，他却谦虚地用了个别名“何通”。

1934年冬季，葭县县委组织部长乔鼎铭奉命去特委工作，县委决定高绪祖任县委组织部长。不久，葭县红五团南下，敌人乘机大肆“围剿”葭县苏区，革命形势非常紧张，高绪祖和其他同志一起始终坚持斗争，机智勇敢，多次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安全脱险，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5年农历二月二十日，他和高光祖一起去枣林沟、李家圪崂村一带活动。开完会后，当时尚未暴露的叛徒李友仁等把他们安置在山岔住下，李却连夜去店镇给国民党驻军告密，敌连长郭福堂立即率兵于拂晓包围了整个山窑。高绪祖闻枪声出去观察情况，因前几天在梁家岗村突围时小腿受伤，行走不便，被敌人抓获杀害，将他的头悬挂在枣林沟村的树上。时年仅28岁。



## 田作勤

田作勤（1907—1931），原名田振亚。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安边城南巷旗杆院内一个贫苦手工业者家庭。

1925年夏，作勤毕业于安边高小。秋季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编入五班学习。在李子洲校长和共产党员、进步知识分子老师指导教育下，绥德四师已是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田作勤在校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实践的锻炼。1927年初，经同学吴志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盘踞在陕北榆林的军阀井岳秀，为配合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四师被封，绥德地委遭到严重破坏，作勤回到安边。这时的定边、安边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远离军阀井岳秀的统治，县的教育权仍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他一到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工作，还

被聘任为安边高级小学校的校长。作勤先后聘请了党团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

以学校为阵地，向学生做宣传鼓动工作，在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同时他还与安边党支部书记、高小教师朱子坚共同组织起“中山主义研究会”，宣传国民革命，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教育活动。导致当地反动绅士和地主民团把学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29年，白色恐怖波及定边、安边，党组织与上级关系时有脱节，活动越来越困难，相继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动摇了、消沉了，而田作勤却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春，为了寻求革命出路，他响应陕北特委关于“到白军和小股土匪中去，争取革命武装力量”的号召，毅然决然地抛下体弱多病的寡母和新婚妻子，去山东诸城一带的高桂滋部队当兵。在那里继续搞党的地下活动，后又随高部辗转到绥德。腊月，田作勤与绥德的高岐山和河北省籍的王庆恒等共产党员一起回到安边，与安边地下党团组织的负责人高尚信等，共同策动驻守安边土匪民团张鸿儒部的兵变。

张氏父子恃权逞能，在三边为非作歹，横行多年，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田作勤目睹张家的黑暗统治，早有为民除害、夺取反革命武装的夙愿。为了筹集兵变费用，作勤典卖了家中仅有的田产。妻子劝他说“你长年不在家，我和母亲都靠弟兄们养活，这样家人会不高兴的。”他安慰说“不怕，现在吃点苦，等革命成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是兵变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家也成了策动兵变的联络点和指挥所，几乎每天深夜都有同志来接洽工作。他起早睡晚，东奔西跑，采用拈香结拜及组织哥老会等多种形式，经过几个月的积极活动，做通了张团许多官兵的工作，张鸿儒的勤务

兵李廷甫也答应在兵变时亲自干掉张鸿儒。

1931年3月29日，兵变前夕，婚期已近的李廷甫生怕兵变后一时不能结婚，遂向其主子张鸿儒告了密。于是张立即下令逮捕田作勤和高尚信等人。这天上午10时许，作勤正在家拆看信件，忽见张鸿儒团数十名手持刀枪的士兵围住家门，大喊捉拿田作勤。作勤知兵变机密泄露，机警地把手中的信塞进炕洞，走到房门口大声说：“我就是田作勤，走吧”然后回转头来用目光最后望了一眼悲痛欲绝的母亲、妻子，大踏步地走出大门。

敌人先把作勤拉到团部，张鸿儒用尽威逼利诱手段，企图使作勤供出搞兵运工作的组织和人员名单。作勤厉声责骂“瞎了你的狗眼，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是用高官厚禄所不能收买的。”张鸿儒当即将田作勤、高尚信等拉到安边城内的老爷庙前，吊在一棵木瓜树上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的作勤破口大骂道“老子就是共产党，而且还是三边党的书记！老子就是要拾掇你们的。要吃张口，要杀开刀！”他身穿长袍，体魄魁伟，满面怒色，一身正气。张鸿儒气急败坏地命令士兵用香把子蘸油烧、用烙铁烙、用鞭子抽打，折磨得他遍体鳞伤、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令人目不忍睹。但他仍然面无惧色，骂声不绝。张鸿儒恼羞成怒，立即命令把田作勤、高尚信等四人拉到安边西门外枪杀。下午2时许，张鸿儒亲临法场监斩。罪恶的子弹从刽子手的枪膛中射出，年仅24岁的田作勤，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 高尚信

高尚信（1909—1931），又名志诚，陕西省定边县安边人。尚信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受新思想的影响，他刻苦学习进步书刊，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毕业后，回到家乡被聘为安边平民夜校校长。该校附设在安边小学内，学生多是手工业学徒、店员及贫寒市民子弟。尚信以此合法身份，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1928年，白色恐怖波及定边，环境急趋恶化，地下活动更加困难。次年春，安边地下党负责人田作勤被陕北特委派赴山东诸城，高桂滋部从事兵运工作。朱子坚也调往他处，领导安边党团组织继续开展活动的重任，全落在尚信的肩上。

1930年腊月，田作勤同绥德的高歧山、河北的王庆恒等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回到安边。时安边驻军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属高志清骑兵师的张鸿儒团，张氏父子恃权逞能，肆虐地方，为非作歹，草菅人命。尚信早有除恶削奸之志，但却力不从心，未能采取大的动作。田作勤等人到来，遂积极策划，周密部署，欲以兵变方式，瓦解张团，借敌人内部矛盾，制造火拼，为民除害。

尚信与作勤利用拈香结拜等方式，经两个多月的活动，做通1张团内不少官兵的工作，张鸿儒的勤务兵李廷甫答应兵变时亲手杀掉张鸿儒。但

是，兵变前夕，李廷甫动摇了，一则跟随张多年，感情较深，二则李婚期已近，恐兵变后影响结婚，遂向张告密。

1931年3月29日10时许，张廷芝、张廷祥弟兄分头出动，将田作勤、高尚信逮捕。敌人将作勤、尚信拉到团部。张鸿儒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要他们供出同谋者。二人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历数张氏父子残害百姓的罪恶事实。张恼羞成怒，将作勤、尚信拉到老爷庙院，吊在木瓜树上，用香把子蘸油烧、烙铁烫、皮鞭抽，二人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但仍面无惧色，骂不绝口。敌人无计可施，于下午2时许将高尚信等四人枪杀于安边西门外。

## 冯崇道

冯崇道，1904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冯家岔村一农民家庭。冯崇道于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毕业后，回吴堡教书。1931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葭县峪口一带做军运工作。他化装成商人，串乡走镇，秘密工作。

1934年，冯崇道任吴堡县苏维埃赤少部部长，宣传革命思想，扩大红军兵员。1936年春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保安（今志丹）县任军事部长。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崇道、慕汝勤、薛耀邦先后回吴堡，恢复县、区、乡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并以群众自发组合的名义，建立地方武装。冯回吴堡后与秦茂芳、薛英桂、冯学成等人秘密联系，商定收缴国民党民团和各联保义勇队的枪支，建立人民武装。之后，便积极串联，组织力量，于1937年8月2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晚，一夜的工夫，将各联保义勇队的枪支、弹药大部收缴，就是驰名县内外的“黑军暴动”。

9月，冯崇道等人进驻绥德梁家甲村整编“黑军”，被国民党当局发觉，偷偷派出大军，包围了梁家甲村。冯崇道在组织突围时中弹牺牲，时年33岁。



## 孙兰馥

孙兰馥，字香亭，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城内人。自幼聪明好学，读书写字、待人处事均优秀、公平、得人，为乡里同学所爱敬，

1926年春，谢子长和李子洲校长商议后，以两名士兵的月饷为资助，派孙兰馥进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为六班插班生。在四师时，每日除认真钻研功课，秘密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自学精神学（即中国旧术数、医卜）。不久，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反共军阀派军队包围四师进行武装“清党”。学校党团组织遭破坏。孙兰馥便中断学业，回到安定。

1928年，孙兰馥任安定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教员，党内任安考教育支部书记。1929年，任中共安定区委副书记，参加清涧文柏山中共陕北南路特派员召集的延安、延长、延川、清涧、安定五县县区书记联席会，接受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议，并参与筹谋对保运武装“后九天”士兵的反正动员计划。秘密布置接

送谢子长同志往返晋陕的安全工作。1930年，因安定另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插于区政及教育界而失业，但他依然如故，坚持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1931年，党领导开展的小股游击武装活动从乡间开始，反动军政统治相当严密，县城外无游击根据地，游击队急需城内敌人军政情报，孙兰馥以医卜职业为掩护，秘密活动传递情报。

1934年，他在安定县城内隐伏极为困难，只得往来于县城与瓦窑堡之间居住，一时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仍通过亲友给谢子长及其子侄亲友传送情报。

1935年正月，为摆脱敌人的监视控制，孙兰馥以到瓦窑堡附近走亲属家为名走出安定城，转入苏区。在入苏区前，因恐国民党反动派搜查赵通儒的家，于夜间将赵所藏十年的文件书刊烧毁，并教给其家人应对反革命讯问的一些方法。到苏区后，初任刘志丹同志的参谋秘书。后因身体原因，转做地方工作。

1935年冬，任赤源县苏维埃第六区区政府秘书。在禾草苑区政府，遭白匪民团夜袭，孙兰馥和区苏维埃主席徐怀生、副书记韩步云等人不幸殉职。

## 刘成武

刘成武(1906—1935)，幼名全儿，代号“六尺五”。陕西省绥德县中角乡后坪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

刘成武于1925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在李子洲、王懋廷、杨明轩等进步老师的影响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很快提高。积极参加闹学潮，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基督教等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因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陕北闹红的中心和策源地，被反动军阀井岳秀查封，成武同其兄汉武被迫离校。

回家后，他兄弟俩瞅准家里雇用的七个长工，首先把长工作为宣传对象。他们和长工交朋友，吃、住、劳动在一起，有空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联系地主和长工、剥削与被剥削的实际，讲消灭阶级和剥削的必要性，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途径。使长工们深受教育，不久，长工马进武、刘明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刘成武到义合区任职，不久任区特委书记。1934年，由于高桂滋八十四师对陕北特委进行“围剿党的机关转移，武装部队全部南下，当地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部队全部南下，当地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一次，成武正在安山召集积极分子开学习讨论会，敌人闻讯赶来，包围了安山，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成武因有疝气病跑不动，手里拿着个油印机

辍子，爬一会跑一会。敌人以为他手里拿着什么新式武器，不敢再追，成武才脱险。

不久，他同范子文、高克恭、刘汉武等人创建了红十二支队，开展革命活动，一面大造革命舆论，一面打击地主民团，镇压反革命分子，同时，抓住时机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

1935年春，刘成武奉命去吴堡巡视工作时被敌人发现。他一口气跑了30华里，才摆脱敌人的尾追。回到绥德后，疝气病发作，病情加重，不久去世。时年29岁。

## 杨凤歧

杨凤歧，1907年出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史家畔乡杨家河村一个农民家庭。

1926年7月，杨凤歧高小毕业后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期间，他以坚强的毅力，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学习，学业成绩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与同学的器重和信任。在学校进步教师及地下党员们耐心引导下，他学习马列主义，参加社会调查，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穷苦人得到解放。他追求革命，渴望解放，主动为地下党组织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927年秋，光荣地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从此他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活动，经常利用一切机会，参与组织同学罢课集会，进行游行示威，广泛宣讲革命道理。

1928年4月，绥师地下党组织领导革命师生进行的革命行动，闹得地方反动政府胆战心惊，坐立不安。他们丧心病狂地出动了部队，封闭了绥师，遣散了学生，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杨凤歧接受党的指示，回到家乡杨家河、湫峪沟一带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29年秋，党派杨凤歧到安定县任家砭小学任教。他以教师的合法身份和任广盛等同志密切合作，以学校为阵地，在学生和当地群众中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年冬，他利用寒假在家乡杨家河举办了一个冬季学习班，招来本村和邻村的党团员、高小学生约二三十人，名义上是学

文化，实际是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动员群展革命特。学习教材，紧紧围绕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自编自讲。重点是“穷人为什么穷”、“财主为什么富”，只要我们敢于起来革命，组建自己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创建穷人的政权，我们就完全能够打破旧世界，解放劳苦大众。在杨凤歧的精心教育下，学习班虽然只办了短短的五六十天，但为党培养了一批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坚强骨干，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0年底，革命局势由宣传鼓动转入建立地方政权，筹划武装组织。杨凤歧受党组织派遣离开任家砭小学，回到了杨家河和杨子蔚一道开展党的组建工作，他不分昼夜走庄串户，秘密串连，踏遍了邻近十几个村子，先后发展地下党员15名，成立了支部。在积极领导党建活动的同时，他还主动负责筹划党的地下武装一游击队九支队的给养和联络工作。把自己的家作为联络点，及时地给九支队筹划给养，传递消息，提供情报，从而保证了九支队在安定、清涧、延川等地打土豪、分田地、袭击地方反动武装的顺利进行。

革命烈火的熊熊燃烧，使驻守在延安、榆林之敌惊恐不安，敌人集结部队开始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使奔波在外的游击队员能休整过个好年，杨凤歧在腊月二七日接九支队全体队员在杨家河过年，支队长高朗亭等负责同志就住在他家。

由于一名战士叛变告密，驻永坪敌营长张云衢部带一连人马连夜向杨家河扑来。在这紧急关头，杨凤歧机智地组织群众，迅速带领九支队从小路安全转移。敌军赶到村里没有抓到九支队的一个人，便丧心病狂地把全村老百姓集中起来进行拷问。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将杨凤歧的老父亲吊起来严刑拷打，要他招出他儿子在什么地方。在山上观察的杨凤歧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他想到父亲和群众的安危，又想到游击队藏在自己家中的枪支，他置生死于度外，毅然下山，群众得救了，枪保住了，但杨凤歧被捕了。

在敌人监狱里，杨凤歧不为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屈服，不为陪杀恫吓所屈服，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遍体伤痕的疼痛，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敌永坪驻军首领看到在杨凤歧身上得不到他们所要的一点东西，就把他转送到延安军事监狱。之后，又解押到安定伪县政府看管所。1934年3月18日，经我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杨凤歧才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的情况下，经再三要求，组织任命他为安定东区游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为有力打击敌人，鼓舞和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杨凤歧率领东区游击队打土豪，惩恶霸，袭击反动武装，神出鬼没地活动于安定、延川、绥德一带，深受群众的信赖与爱戴。

1934年秋，东区游击队扩大到100多人。为了解决游击队武器装备缺乏问题，杨凤歧不顾个人安危，到安塞交界处，收编一股哥老会土匪。他以绿林好汉的身份打进去，很快取得土匪们的信任和重用，经过艰苦的工作和周密部署，在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里应外合，消灭了这股土匪，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充实了游击队的装备。

1935年春，杨凤歧调任红九支队政委。在他的带领下，九支队军纪严明，军民关系融洽，战斗力大大加强。5月，在冯家坪战斗中，在赤卫队的配合下，九支队将敌一个加强营（四个连）整整阻击围困了三天，为刘志丹主力部队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全歼了这个加强营。志丹同志以高度赞扬。

同年七八月间，杨凤歧调任红宜（宜川县边境）地区游击队政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他又调任陕西省军事部科长。

1936年，随着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杨凤歧坚决要求调开辟苏

区工作。4月期间，他调任米西分区游击师司令员兼政委，临行前周副主席亲自找他谈了话。就任后，为巩固地方政权，广泛开辟革命根据地，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他率部积极活动于米西（现子洲、安定、横山交界处）一带。8月间，游击师在米西地区与敌军相遇，双方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游击师师部被敌张云衢营包围。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杨凤歧沉着坚定，指挥自如，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组织突围。当大部队突出重围后，杨凤歧与警卫员率先断后，阻击敌人。为了牵制敌人，保护大部队安全转移，杨凤歧把生的希望留给大家，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他和警卫员一边撤退，一边放枪，把敌人引向与我大部队突围相反方向的一个山沟。当时，他和警卫员完全有脱离危险的条件，然而他想到的却只是部队的安全，他带着警卫员和敌人展开了迷藏战，爬过这个崓，越过那个山，最后当他退到一个山峰的断崖边时，后面追来的敌人越来越多，这时他想到的不是后退无路，前进不能，生命危险，而是使他欣慰的大部队已经安全突围，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当机立断地对警卫员说“跳崖自杀，不当俘虏！”说完两人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

敌人从山脚下抓住受伤的杨凤歧，用毛驴将他驮到绥德县，打入狱中。当敌人得知杨凤歧就是当年曾在延安军事监狱里关过，现在是威震米西一带的游击师司令员兼政委时，如获至宝，随即给他调养治疗，并以高官厚禄软化，金钱美女引诱，企图从杨凤歧身上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然而敌人的这些伎俩丝毫动摇不了杨凤歧对党对人民的忠贞信念，相反，更激发了他对敌人的憎恨。他断然拒绝接受敌人治疗。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在敌人法西斯非人的残酷严刑面前，杨凤歧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他把敌人的监狱和审判庭作为宣传我党主张、揭露敌人罪行的战场，义正词严的

斗争，使敌人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1936年10月的一天，敌人在对杨凤歧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残酷地将他杀害。在绥德城外的刑场上，杨凤歧同志面对残酷的敌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临刑前高呼“共产党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要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

年仅29岁的杨凤歧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

## 崔玉瑚

崔玉瑚，1910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贺家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起在高杰村小学读书。1925年秋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学不久，即加入共青团组织，并担任学生支部书记。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四师学生党支部书记。

1927年，崔玉瑚回到清涧，在店子沟第三高级小学任教。协同校长周继丰（党员）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组织学生到街上和农村演讲、演戏，向农民广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组建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一次店子沟基督教堂的牧师杨彩英殴打一农民，党组织利用这一机会动员群众打教堂。为了领导群众，担任三高团支部书记的崔玉瑚经过化装，亲自领导和参加群众的打教堂活动。他还组织了店子沟一带的农协代表会。

1928年初，敌人捕捉白如冰不成，将其父亲捕去，企图让白如冰寻父自投罗网。组织上派崔玉瑚到县城侦察情况，与城内党组织接头，设法营救。进城后，不慎被敌人便衣发现，机警的崔玉瑚与敌人巧妙地周旋，当全城禁严、到处捕捉的时候，他已安全地躲在小岔则村的亲戚家里。

这年，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以清涧县立第三高级小学为中心的苏家塔、林家圪崂等村先后建立了党、团支部。为了配合农村党团工作，崔玉瑚等利用夜深入静的时候，组织党团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7月，成立中共清涧东区区委，崔玉瑚任区委书记，后被选为中共清涧县委委员。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周家砭、张家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党的工作主要方向是加强农民运动，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迎接革命高潮。据此，党员崔玉瑚、白志强、王怀德来到高杰村第二高级小学任教，在学校和附近农村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领导学生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由于形势急剧变化，全县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通缉逮捕共产党员，一时风声很紧，组织上决定由他带两名同志，东渡黄河到山西石楼县一带活动。他不畏艰险，深入农家土窑洞，和农民群众谈心，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唤起他们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1930年4月，在山西义碟的一个客店里，崔玉瑚被敌人逮捕押进石楼县监狱。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想从他口中获得党在黄河沿岸的活动情况。崔玉瑚坚贞不屈，与敌人坚持斗争，受尽折磨。5月被组织营救出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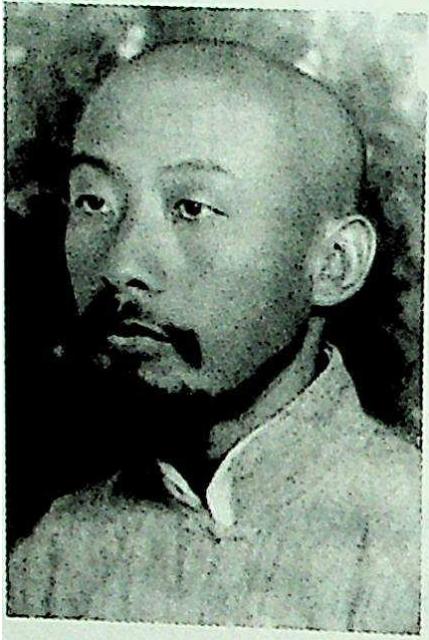
冬季，陕北团特委举行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对团特委进行了改选，由杜洪章、常应黎（即常黎夫）、乔乃文、李俊德、崔玉瑚等五成领导机构，常应黎任书记，崔玉瑚负责清涧、延长等十多个县的团的工作。

1931年，崔玉瑚受党的委托，来到山西永和、石楼交界地的李家崖村，以经营饭馆及杂货店为掩护，进行党在黄河沿岸的情报传递，接送和掩护来往于两岸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此间，他组建了永和第一个党小组。

1932年，崔玉瑚回到陕北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加入陕北游击队红一支队。10月，一支队在安定受敌“围剿”，为保存力量，支队安定分散隐蔽，张承忠、崔玉瑚和部分队员回清涧。党组织决和清涧二支队在一起联合行动。11月，中央北方局代事特派员。谢子长到袁家沟和白如冰接上头，为确保谢子长安全，党派白雪山、崔玉瑚前去护送谢子长返回安定。腊月初七，解家沟逢集，豪绅衙役拿着铁绳向农民逼债，集市一片混乱。面对这

种情况，解家沟党支部派人报告二支队，白如冰、白雪山、崔玉瑚、张承忠、王聚德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打击敌人，为民除害。这天夜里，红二支队和一支队部分指战员，捉拿并处决了十个豪绅衙役（结果有一人未死），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后，敌人加紧了对革命武装力量的“围剿”。党为了保存力量，决定一、二支队分开活动。

1934年春，为解决部队经济困难，奉谢子长之命，同刘明山到安定和横山交界一村没收地主20两大烟和部分银洋，继去北区贺家湾贺晋年家取枪。归途中，被折坤德民团包围，突围时不幸牺牲。



## 高农斧

高农斧，原名高承训，1912年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深沟村。幼时在私塾读书，后到义合高小上学。

1926年秋，高农斧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学校，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思想日趋进步，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农斧决心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和广大贫苦农民站在一起。12月，高农斧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27年8月4日，军阀井岳秀派军队到四师“清党”，革命形势急剧恶化，高农斧回乡后，接受绥德东区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和高克恭一起，走乡串村以卖货为名，做宣传鼓动工作。

1928年至1929年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饥民成群。中共陕北特委提出在农村广泛开展抗租运动的口号。转为中共党员的高农斧响应党的号召，耐心说服父亲高有业，宣布他家两年不收租子。在那饥荒年月，党的活动经费也极度紧缺。中共义合区委同志的衣食和其

他费用，全由高农斧供给。在绥德东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党团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开辟了以高农斧为主的深沟村，以霍维德为主的雷家沟村，以刘汉武、刘成武为主的后坪村，以范子文为主的李家岩村，以马南风（化麟）为主的梁家甲村等方圆 30 多里的红色区域。

1934 年，绥德县东区、南区的革命斗争逐渐高涨，党组织壮大了，红军武装也建立起来了，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深沟村是一个地主较多的村庄，方圆几十里的土地被高家五兄弟霸占着。共产党领导穷人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后，劣绅们反攻倒算很厉害。中共义合区委决定打击土豪劣绅的气焰，为贫苦农民撑腰，镇压高有原（系高农斧的三伯父）父子和刘三（系高农斧五伯父的狗腿子）。9 月 22 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深夜，高农斧悄悄返回深沟村，和赤卫队长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中秋深夜，高农斧、刘拴全和赤卫队员分头行动，将高有原父子和刘三就地正法。

高农斧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不久，一些人“左”倾思想作怪，信不过他，把他降为县委秘书。到红军二十七军七十八师任政治部民运科长时，又在“左”倾思想影响下，“认为他出身不好，不可靠”，把他降为文书。但他为了党的利益，从未消极动摇，坚决不离开部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纠正了“左二的路线，恢复了他在部队中民运科长的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农斧被分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政治部民运科长，从甘肃出发，开赴抗战前线，驻守在山西省潞城县安昌镇。摩年 8 月，他调任旅政治组织科长。

1940 年冬，高农斧担任了新四军第四师十旅政治部主任。时值皖南事变前夕，部队奉命从华北南下。由于蒋介石一心要蚕食我根据地，指令八

路军、新四军只能在黄河以北作战，对我南下的部队重兵围阻。高农斧所在的十旅，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区，受到日伪顽军三面夹击，艰苦奋战了近半年，伤亡比较大。到淮海区后，名为一个旅，实际上只剩两个团（四个营），部队处境极为艰难。在进入敌伪区的联庄时，国民党顽军开枪堵住前进的道路。他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进入敌营，用抗日前途和民族大义，有理有节地说服了拦路的国民党军官和县长，使部队顺利通过了联庄，避免了一次恶战。

1941年7月底，十旅转战到达淮海区，接到华中局从盐阜区发来电报，要刘震旅长和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到华中局去。两人接电报后，当即从旅部驻地陈圩子出发，加鞭催马奔往华中局和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盐垦区，受到刘少奇和陈毅热情接待。刘少奇、陈毅告诉他们，华北斗争已进入一个更加紧张、残酷的阶段，华中的局面必然随着紧张起来。日寇会更加频繁、残酷地“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继皖南事变之后，会继续发动对江北各根据地的进攻。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更加残酷的战争十旅必须在淮海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这是坚持发展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他们一个旅化下去，用不了多久，将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成长起来。回旅部传达了华中局领导的指示后，有一部分同志想不通，他们说：“查查十旅老家谱，从红军时代就是响当当的力，怎么变成地方部队呢？”

“人家地方部队升级，咱们十旅降有：位谋长，听说要侧泗阳县大队当大队长，他坚决在主力部队当连长，也不干县大队长。作为政除利用会议和集体场合做主力地方化的必要性和还，营和基层连队，用谈心的办法一个人，直到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涨，精神振奋起来为止。

十旅和淮海军区合并后，取消了旅的番号，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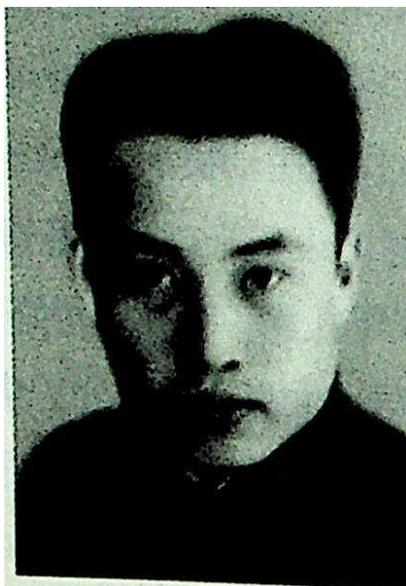
地委书记金明兼任军分区政委。他虽是一个长期搞地方工作的老同志，部队工作经验少，但高农斧对他很尊重，经常请示汇报工作，主动向他介绍部队的情况，随时提供“参谋”性的意见，使这位同志很快熟悉了部队工作，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1942年春天，刘少奇回延安途经淮海区时，表扬十旅“你们坚决地化下去了，并且作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刘少奇还告诉高农斧等分区领导淮海区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往来的咽喉，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要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

11月中旬，日寇投入更多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四路向淮海区扑来。不到三个月，将淮海区分割成四大块，新建了140多个日伪据点。根据这一新的斗争形势，淮海地委决定在敌人分割的地区，组织四个中心县委、四个武装支队。高农斧被派任为中县委书记兼二支队政委。高农斧带领二支队主力，在县、区、《乡武装和民兵队醜合下，发动驱武紳基千民取“冷枪阵”、“土炮战”、“火鸡阵”等策略，对付缩在“乌龟冗据点里敌人，开展了拔据点战斗。他们械出动，破路、炸桥，袭击的据点，一个星期内，把敌人拼命修起来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坏，摧毁了敌人“接点连线”的计划。高农斧率二支队经八个月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1943年3月底，党组织调高农斧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担任了党员队党支部书记。

1944年10月11日，高农斧患了急性肺炎，同心加夕当时往中央医院治疗。但由于他身体过于虚弱，抵抗力极差，加之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急救无效，于14日逝世，年仅32岁。



## 胡廷俊

胡廷俊，幼名灯儿，1911年3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城背抓一个贫苦劳动者家庭。他的父亲胡世青是绥德的名厨师，长年在外做活，以养家糊口。

胡廷俊少年时期刻苦读书，成绩突出。1924年，上绥德县立高小的胡廷俊受新文化教育和国民革命宣传的影响，思想就积极上进，开始参与四师学生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

1927年春，高小毕业的胡廷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编入八班学习。这时，四师党、团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下，胡廷俊踊跃参加了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军阀统治，支持工农革命运动等活动。

经朱侠夫、田有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陕北军阀井岳秀残酷镇压革

命运动，派兵包围了清理学校的党、团员。校长常汉三，教师蔡楠轩、何寓础、关中哲等人被迫离校。绥德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腥风血雨中，绥德团地委整顿了组织，胡廷俊担任了共青团绥德城区的团委书记。他参加了绥德革命史上有名的“打蛋厂”（外省人办的鸡蛋厂）、“龙王斗县长”、反“骤柜”（反动政府向赶牲口的脚户搞摊派、索款的组织）以及“斗老总”等革命活动，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转为中共党员。

1928年秋，在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胡廷俊的情况下，党组织派他到河北省遵化县，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开展兵运工作。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高桂滋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方振武部队战斗序列，开往山东济南。胡廷俊被分配到驻泽县枣庄一带刘杰三团五连任排长，是该团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同拓克宽、吴岱峰等一起开展兵运工作。由于他深入实际，勤奋工作，很快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他兼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成为地下军委领导下的骨干力量，为后来的平定起义和晋西游击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1年，四十七军随晋军退往山西平定整编，原属北方局领导的我党地下军委转归山西省委领导。省委指示地下党进行整顿后，胡廷俊负责三团的组织工作。同年冬，省委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在晋西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省委先后调杨重远、拓克宽、李成兰、胡廷俊等同志脱离高桂滋部，与陕北特委派来的阎红彦、白锡龄等同志一起，在吕梁山区筹建红军游击队。

1931春夏之间，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汾阳、孝义、离石三县交界处的孝义县大麦郊楼底村（现名西泉）正式成立。大队长拓

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在汾阳），杨重远任总支部书记，政委黄子文（在太原），胡廷俊担任了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在队委领导下，胡廷俊首先抓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坚决执行队委会制定的制度，开展练兵活动。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对同志诚恳，态度和蔼，乐于助人。在他的领导下，二分队战斗力较强，对敌斗争坚决，同志们都说他们有个好领导。

在晋西离石县吴城岭的一次战斗中，胡廷俊同拓克宽、李成兰、董金芝一行四人打扮成商人模样，奔袭百余里外吴城岭敌团部哨所。他们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大摇大摆地向哨所走去，敌哨兵看他们的打扮，以为真是商人，也不在意。拓克宽走到敌人哨兵跟前，用手枪逼他不准出声，不准动。胡廷俊、李成兰乘机扑向敌哨所的奋洞。正在取枪的敌兵被他俩击毙，其他几个团丁做了俘虏。缴获步枪数支和一些弹药，武装了游击队。

为了扩大游击队，瓦解敌军，队委会决定争取驻汾阳县永安镇晋军一排的士兵起义。汾阳联络站会同地方党组织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条件逐渐成熟。联络站党小组委派阎红彦、白锡龄、胡廷俊三人前往永安镇接应，他们与该排地下党员排长牟某某、班长冯金福接头，并制订了起义方案。在白文轩、景其贵二人的协助下，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阎红彦、白锡龄、胡廷俊领导和发动了这个排的士兵武装起义。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部队击溃了尾追的敌人，克服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安全地到达山区与游击队会合。盛夏的一天，游击队部署石楼县水头镇附近的伏击战，胡廷俊率队占领制高点。敌人发觉后，企图抢占制高点，冲出伏击圈。胡廷俊指挥战士们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反攻，适时发起了反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勇猛冲杀，杀伤不少敌人。顽敌遭到我军的致命打击后，除少数几个敌人逃跑外，大部分都当了俘虏。这一仗打得干脆

利落，缴获了敌人全部武器弹药。

这年农历七月间，红军晋西游击队受到万余敌人的“围剿”。游击队采取夜间突袭敌驻地，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进行反“围剿”。后来敌人封锁山区，山西省委也受到破坏，游击队失去了和上级党组织及群众的联系，加上战斗频繁，伤亡、减员严重，情况极为困难。队委会决定按省委预先指示，西渡黄河，转战陕、甘。

晋西游击队冲破重围，西渡黄河，到达安定县（今子长县）南沟岔附近，进行整顿。他们召开民主大会，改选了大队领导，一致选举阎红彦任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下辖四个组，胡廷俊担任了第二组组长。部队整编后，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在涧峪岔打了土豪薛华英。群众怕游击队走后敌人报复，不敢要土豪的粮食。胡廷俊和战士们把粮食送到贫苦农民家里，宣传我党政策。群众纷纷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游击队西进找谢子长到枣树坪时，不明真相的群众都躲了起来。经打听，得知谢子长到甘肃去了，找到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请他帮助找到中共安定（今子长县）县委书记马文瑞，并转告中共陕北特委，要求派党团员参加红军游击队。

党组织先后调派马云泽、强龙光、强世清等青年农民 20 多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胡廷俊高兴地说，找到了党就有办法。

晋西游击队北进靖边县沿长城一线活动，打土豪，分牛羊，组建了骑兵连。这时，得知红二十四军由晋西北渡黄河到陕北神木、府谷一带，胡廷俊报名志愿去迎接红二十四军。队委会同意后，廷俊化装成农民，经内蒙古乌审旗北去。当得到红二十四军在榆林以地两岔河失败的确实消息，

他才返回部队。

1931年农历九月间，游击队分两路西，一路上战胜了敌人的堵截，于下旬到达甘肃合水县南梁堡地区。部队经过整顿，除战斗减员外还有步骑兵约300人，在太白镇20里外的阎家硷会见了刘志丹同志。

10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去南梁堡领导晋西游击队。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党委会），谢子长任书记，胡廷俊任队委委员，分工负责宣传组织群众工作。胡廷俊具有宣传组织才能。他善于接近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当时本地哥老会迷信活动很厉害，他就向群众讲革命的道理，使群众的认识逐渐提高，自觉起来抵制哥老会的封建迷信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12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将活动在甘肃宁县柴桥子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号召西北所有武装部队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胡廷俊参加宣传工作，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带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宣传，为抗日和筹建陕甘游击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胡廷俊任骑兵队队长。不久，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胡廷俊任警卫队政委。2月17日在阳坡头战斗中，胡廷俊右腿膝盖中弹后，他不顾自己的伤势，继续指挥战士痛击敌人，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才被同志们抬下战场。

游击队负责同志十分重视胡廷俊的伤情，迅速派胡廷璧（胡廷俊兄长）等人护送到西安广仁医院治疗。当时缺医少药，又加长途转运，致使胡廷俊的伤情日益恶化，伤口感染化脓。根据这一情况，院方决定锯掉他一条伤腿，保全生命。廷俊弟兄商议后，同意了这一决定。事后，史唯然、蒲政平等同志前往探视，责怪廷璧说“廷俊是你的兄弟，也是我们的兄弟。

你爱他，我们更爱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要把腿锯掉呢？”廷俊听了，在一旁插话说“革命么，流血牺牲算不了啥！只要以后还能工作，怎么治都行”他这种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深深打动了同志们的心。

1934年春，党组织拨经费让胡廷俊到上海配了一条义肢。党中央留他在上海中央军委担任交通联络和特工科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往来于上海、南京、江苏、江西、福建、安徽等省市，负责福建和皖南地区党的巡视联络工作。他的义肢给他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又为他隐藏了许多重要情报及文件。有时候，敌人搜查很严，连他的义肢也不放过。在紧急关头，他把纸条吞进肚里，凭脑记口述，转达党的指示和情报。

1935年春，胡廷俊到皖南完成一项重大任务时，不幸被敌逮捕，押送到南京伪宪兵司令部。胡廷俊坚守信念，经受了多次审问和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久，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25岁的胡廷俊为革命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 王 文

王文，原名王学善，化名老井、罗文，1912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王文绥德县城文庙高小毕业后，于1927年春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八班上学。

1927年的四师，已经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的中心。王文一进校，就被浓厚的革命气氛所吸引。在这里，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学校党组织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4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军队包围了绥德四师，清理校内的党团员。常汉三校长及蔡楠轩、关中哲等教师（均系中共绥德地委成员）被迫离校，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正在镇川、绥西一带农村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王文听到消息后，当即与同行的同志商量对策，决定在回不了学校、无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回家乡宣传革命。

回乡后不久，王文接到校方让回校继续上学的通知，他与耿光清（即耿红）等同学认为学校的校长已换，正在执行“清党”措施，还是不返校的好。从此便离开家乡，到枣林坪集镇上当了店员，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影响下，周围村庄后来有不少群众参加了共产党和红军武装。他的舅舅、哥哥、妹妹、弟弟先后参加了革命（后来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成为革命干部）。

1930年初，王文在李景林介绍下，由团员转为党员。为了开展革命活动，组建党团组织，他协助李景林在介首村开办了一所小学校。李景林任校长，他当教师，以此为掩护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组织活动。介首村在绥德县城东南130多里的黄河西岸，由四个自然村组成。这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区，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王文与李景林选了这个地方，很快就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李景林任支书，王文任支委。以后与铁前坪党支部、王家沟党支部、清涧县党的地下组织互相联系，在黄河沿岸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团骨干力量。

1933年7月，陕北特委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决定把绥清中心区委改为中心县委（后又分成绥德、清涧两个县委），李景林到县任职，王文担任了黄河沿岸的特区书记（后特区改为绥德县一区，王文仍任书记）。他带领全区共产党员，积极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团员，广泛建立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开辟了蹇林坪以南、定仙塬以东、解家沟以北、黄河以西的60多个村庄。

1935年5月3日，我党在绥德县南区榆抓村召开全县工农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绥德县苏维埃政府。李万春（化名罗成）当选为主席，王文、贺治国当选为副主席。李万春是王文童年时的好友，又是王文发展入党的，

职务在王文之上，思想上有顾虑。王文给他做工作，出主意，当他的得力助手，使新诞生的红色政权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年冬，王文担任了中共绥德县委书记李万春仍任政府主席。两人协作得更加密切。有一次，自卫军分队长把一个货郎的货物抢来交公。这件事很快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红军一位负责同志让王文和李万春查证落实，如属实，立即处决。这个分队长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临刑前，他从衣兜里掏出几角钱和一个荷包，哭着说“请把这点钱给我的老母吧，这是做儿子的最后一点孝心；把这个绣荷包交给我的媳妇，见了这个就如见了我一一样。”王文见此情形，就和万春商量，暂不执刑，连夜给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以参加工作不久，不懂党的政策和革命纪律，凭一股子热情蛮干为理由，请求不要杀掉他。第二天，派人带着报告押送这个分队长去省政府。经省政府马明方、霍维德、崔田民等人批准，对这个分队长做了宽大处理。后来，他经常现身说法，告诫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守党的纪律，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1936年5月，汤恩伯的国民党十三军从山西西渡黄河，妄图一举扼杀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军“围剿”，在党中央领导下，党政机关人员和红军主力有计划地后撤。同时成立了陕西省东区党委和政府、绥德中心县委等机构，负责领导反“围剿”斗争。王文担任了东地区工委书记兼吴堡县委书记，奉命前往黄河岸边的吴堡县把红军武装拉出来。吴堡红军领导成员中个别人受“左”倾思想影响，面对强大的“围剿”敌军，提出硬拼蛮干的口号，说什么“保卫家乡”、“人在吴堡在”，干扰了党的反“围剿”计划。王文到吴堡时，当地党组织和红军武装已遭到严重损失。他立即不分昼夜召开紧急动员会，传达上级指示，指明蛮干硬拼的危害，陈述暂时

退让、保存实力的策略是反“围剿”斗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就这样整整熬了三天三夜，才把这部分人的工作做通，撤出了敌军包围圈，挽救了同志，保住了一批革命力量。

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王文以抗敌后援代表身份担任了中共米脂县委书记。3月，王文进入延安中央党校，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抗日方针和科学文化知识，怀着满腔革命热忱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38年春节过后，郭洪涛带领王文、王子文、霍士廉、苏杰、白炎波等50多位赴山东的同志携带两部电台整装待发。行前，毛主席亲切接见并讲话，强调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量地组织武装，在各县各区普遍成立游击队，以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并选择较好的游击队逐渐培养成为主力。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据点。

王文等一行人从延安到达西安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换上国民党军队服装，以八路军政训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辗转抵达山东。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调派，王文于1938年5月担任了胶东特委书记。到职后，王文首先抓军队建设。他到第三军和三支队去宣讲抗日方针，力口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培训，于1938年9月18日在掖县沙河镇宣布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下辖六个基干团，成为一支能独立作战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他还狠抓了地方民兵、游击队的组建、整顿，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力量。胶东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建立了以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权为基础的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创建了白海银行。胶东抗日斗争形势空前大好。

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胶东特

委改为中共胶东区党委，王文被任命为区党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9年9月，山东第三军区（后改为胶东军区）成立，王彬任司令员，王文任政治委员，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成立后，在短时间内组建了两个基干团，广泛建立地方武装，开辟了北海、西海东海地区，向南海发展。从1939年夏到1941年春，胶东军民在王文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仰望顶、灵山、良蒙山、葛门口等战斗，粉碎了日军三次千人次以上的“扫荡”。

1940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各部队进行了整编，王文任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委，兼区党委副书记职务。

1942年9月，王文任胶东行政公署主任。王文同区党委、军区的领导同志一起，领导胶东800万军民开展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他深入各地，广泛地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拆桥断路，开展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短时间内取得歼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等战术驰名中外，在胶东抗战史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1943年春节刚过，王文忽然大量吐血而昏迷过去。医生检查后，要他绝对卧床休息。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派了一个警卫班和一个炊事员，负责王文的安全和生活，并设门岗，规定除医生和主要负责同志外，不许任何人见他。王文在昏迷两天后，刚一清醒就躺不住了，写条子要警卫员找来干部谈工作。同志们急得没法，就把他的鞋藏起来，不准他下床。但仍无法阻止他工作。领导同志决定将王文的养病住所搬到村头（当时机关驻地在海阳湖西村）的一所空房子里。王文见众人忙于搬东西，溜出驻地，去军区参加会议了。

一天晚上，军区搞文艺晚会。正在发高烧的王文把警卫班长叫免没什么事，我想安静休息一下，你们都看戏去吧。”警卫班长信以为真，全看戏

去了。五旅旅长吴克华调回在敌占区工作的王伦以（王文的爱人），专门照顾他。吴克华对王伦以讲明了情况，叮咛道“要好好照顾他，不能离开他。”王伦以责怪丈夫道：“自己发高烧，为什么不留个同志照顾？”王文笑着回答“年轻人都喜欢看戏，让他们去着吧，反正我这病是老毛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个月后，王文的病情稍有好转，又投身到工作中去。当时正是林浩调回山东分局，王文全盘负责胶东党政军重任时，他马上住进军区机关，仍像一个健康人。不分昼夜地召开会议，了解情况，批阅文件，布置工作和战斗任务。时间不久，他高烧、低烧持续不断，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纵队政委朱瑞马上给王文打电报说“我郑重告诉你，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并于1943年9月派林浩回胶东，让王文离职休息。

在区党委书记林浩外出学习的半年多时间里，王文全盘负责胶东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在领导胶东军民扩大抗日战果的同时，狠抓了经济建设，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还创办了多种抗日报纸和刊物，组织了各种文艺团体，使胶东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打开了新局面。他领导胶东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直到1943年底，终于闯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保卫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3年11月16日，王文终因积劳成疾，肠穿孔不治而逝世，年仅31岁。

## 崔曙光



崔曙光(1911—1942)，原名崔世荣，幼名天怀，参加革命后曾化名铁匠。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铁茄坪村一个农民家庭。

崔曙光8岁起，在本村私塾读书，后跟父亲学农活。1926年秋插入清涧县立第三高小（校址在店则沟）学习。当时，这一带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党组织发现崔曙光是一个好苗子，便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1927年春，店则沟高小闹起了学潮，进步师生们一致起来斗争坚持反动立场的校长刘镇汉，并且取得了胜利。崔曙光参加了这一革命运动，被选为学潮的学生代表之一。学习和斗争的实践，使曙光更加热爱共产党。他说“我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推翻这个黑暗社会。”这年4月，由周继丰、高在位二位老师介绍，崔曙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高小毕业后，他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学后，四师学生的革命活动经过一个短暂的低潮后很快又发展起来了。在活动中，

崔曙光斗争勇敢，被推为全校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之一。19 烈年 4 月，国民党反动派派军队包围了绥师，用枪杆子把全校学生全部撵出城外，封闭了学校。

崔曙光回到本村，很快与共产党员崔田民、崔凤荣（后叛变）接上关系，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开始在铁前土平和周围村庄宣传革命，发展新党员。崔曙光和崔田民先介绍雇农崔文宪（田夫）入党，后在雷家硷、林家新庄、林家寨、西属湾等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个直属绥德县委管辖的铁茄坪党支部，崔曙光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崔文运、崔正杰、崔正富、王正候、雷合、韩生杰等著名革命先烈和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崔田夫、崔正冉、崔德权、林蔚森、崔正岭等，都是那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铁坪党组织发展很快，后来县委就把铁茄坪支部、王家沟支部以及定仙塬至黄河西岸一带党的组织连接起来，组建了中共绥德县第一个区委会，统一领导绥德东南方向广大地带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

1928 年冬，受组织派遣，崔曙光到清涧县店则沟开展建党活动。他先到李家坪村开办了冬学，宣传革命理论并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以后又到楼则塔、东陈家山、东里河等村庄，以小学教师、校长的身份做掩护，与周继丰一道搞建党工作。到 1930 年冬，在楼则塔创建了一个区委，这使清涧起义失败后这一带一度处于低潮的革命运动，又很快活跃起来。

1934 年 2 月，马佩勋带领吴堡红四支队路过铁茄坪村，曙光随四支队连夜赶到店则沟，会合了马万里领导的清涧红二支队，袭击了店则沟民团，缴获了该团的全部枪支弹药。3 月，陕北特委特别通讯员崔正冉请曙光回绥德协助他筹建红五支队。崔曙光到绥德南区王家沟村，与正冉一起以王家

沟游击队为基础，创建了红五支队。

1935年，崔曙光先后任陕北特委巡视员、西北工作委员会巡视员、陕北第三分区区委书记等职。是年冬，曙光被任命为中共延安县委书记，承担起带领全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解放延安县的艰巨任务，团结干部，兢兢业业，忘我工作。

1936年4月，崔曙光担任了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不到十天，又任中共绥德县委的秘书长，后又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军事部长（军委会主席）等职。他先后同崔文运、崔德权、崔正冉、苏杰、苏海宣、崔正杰、王季龙等一起，跑遍绥德各地，大力开辟红色村庄，组建红军武装。

1936年7月，崔曙光担任了陕西省委的秘书长。这时候，他的家乡和他的家遭到了“围剿”敌军的洗劫，家里的窑房被烧，在逃难中三个女儿相继去世。崔曙光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虽十分悲痛，但丝毫没有动摇他为党做好工作的决心。

1937年10月，崔曙光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党委的秘书长。他除了协助党委一班人做好党务工作，还兼搞机关总务、招待所等事宜。当时他带领机关工作人员种粮种菜，喂鸡喂猪，使机关生活得到改善。曙光每天都要接待一批批从抗日前线回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学习的同志，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他说“我们接待的同志，不管是来的还是走的，大都是抗日英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这些同志。”他还亲自为住招待所的同志端茶递水，和这些同志热情交谈，了解抗日前线的情况鼓励奔赴抗日前线的同志好好杀敌立功，争取抗战早日胜利。

1939年上半年，崔曙光在中央党校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眼界

更加开阔，志向更加远大。他坚决响应毛主席“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积极要求到抗日前线去。1940年初，组织同意崔曙光请求，准备派他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为了把他培养成具有较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工作干部，组织决定让他先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两年，再到敌人后方去赴任。他刻苦学习，认真攻读马列主义，准备为国献身。妻儿来看他，他对妻子说“我自入党以来，就一直背着人头闹革命。这次出去，很有可能回不来。你把兰芝拉扯大，革命胜利了，没有我，你们母女也会得到幸福的。”走时，他还动员在延安部队里的王步元、雷光明随自己一块儿上了前线。

1941年10月，崔曙光带领王步元、雷光明和到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的干部一行30名同志从延安启程赴山东分局工作。他担任了临时支部书记。为了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他们绕道从神木东渡黄河，由晋西北到晋东南，艰苦跋涉两个多月。第二年元月底，崔曙光一行终于到达中央北方局党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一晋东南。

由于敌人严密封锁，这里聚集了200多名地方干部，一连几个月都不能过境。崔曙光他们一行也等了两个多月。曙光同志肩负重任，内心感到焦急，但在行动上又特别谨慎。他在长途行军中，经常告诫支部成员和其他同志“我们是延安来的，党培养我们这批干部花了很大的代价，每一个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胜利通过敌伪封锁线，山东的同志和老乡正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我们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

在等待过平汉线时，遇上了“五一大扫荡”。崔曙光和其他100多名干部由冀中武装部队一个团保护。一天上午，他们不幸陷入敌军包围圈。在突围中，遭到日军机枪、小炮的疯狂阻击，队伍被打散。崔曙光的警卫员雷光明、王步元失散，崔存厚壮烈牺牲。他自己则头部中弹，生命垂危。

在给跑到身边的田海山交代了两句话后，年仅 31 岁的崔曙光就壮烈地牺牲了，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 李成荣

李成荣，1913年8月出生，陕西省绥德县城人。先后在绥德高小、续德四师就读。1927年参加共青团。1929年转为共产党员。曾任四师团支部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宣传委员、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等职。

1931年春末夏初，李成荣奉上级指示，带十多个年轻人前往山西省碛口镇接运一批枪支弹药。他在碛口镇买了一口好棺材，雇了两头骡子，把枪弹装在棺材里。枪弹上面堆了一些羊骨头，洒上臭猪油，罩上红布，盖好棺材盖，平枪支弹药运回绥德田庄。

1931年7月，李成荣不幸被捕。1933年5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

出狱后，陕北特委派他和马万里、栾新春、毕维舟等去安定（今子长县），会同强世清将分散隐蔽的红军人员重新组建起来，在延安、延长、延川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在马河川杀了反动保长，在三十里铺袭击了反动民团李丕成、李丕胜的碉堡，在盘龙村攻打了反动

民团宋应昌的天字源寨子。在战斗中，这支队伍不断壮大。于是在此基础上组建成红一支队，李成荣任政委。一支队成立后，李成荣率部分队员在延川、清涧、瓦窑堡、安定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在李家岔川周围的胡家抓沟、龙嘴河、庙岔、南沟等村庄建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巩固和扩大了这片红色根据地。

同年9月，红一支队发展到百余人。李成荣率70多名队员南下照金根据地。9月25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古城川，与红二十六军四团会合。李成荣成为陕甘红军指挥部成员，他带领一支队配合甘肃正宁地区游击队，攻克张洪镇（旬邑县政府所在地），歼敌50余人，打死伪团长，活捉伪县长。不久又攻克合水县，缴获长短枪50余支。

不久，李成荣受陕北特委派遣，到神木、府谷地区参加红三支队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分别多年的哥哥李成兰（红三支队队长）。有一次一位同志不慎枪走火，打穿了李成兰的膝盖骨。成兰受伤后，组织将他送到神木县张家寨群众家里养伤。

12月15日，成荣前往张家寨看望养伤的哥哥。不料被叛徒告密，他刚到就被尾追而来的一连敌人包围。李成兰与陪伴人乔六十被捕。李成荣藏在地窖里，敌军头目向内喊话，他一声不响。敌军一靠近地窖，他就开枪。最后，敌军将燃着的柴禾投进地窖，夺去了这位年仅20岁的年轻红军指挥员的生命。

## 杨岐山

杨岐山，又名杨凤鸣，化名杨青山。1907年2月23日出生于陕西省府谷县元蛇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杨岐山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三。从小在本地私塾念书，13岁时，到府谷南门第一高小（简称“南高”）念书。在校期间，他尊敬老师，帮助同学，团结校友，学习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反帝爱国思潮的影响下，府谷县城的爱国人士和南高的进步师生纷纷响应。他们上街写标语，散传单，声讨帝国主义。进步师生的爱国行为对杨岐山很有启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春，杨岐山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常汉三校长和进步师生的教诲影响下，他聆听革命真理，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爱国活动，走上革命道路。8月，井岳秀派军队包围四师抓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使他更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懂得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才能走上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就在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杨岐山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他除认真读书以外，积极参与党的地下工作。秋后，他返回府谷，任小学教员，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冬季因参加教育界寒假的“索薪”斗争，被捕入狱坐牢一月。

1930年，受党组织派遣，同刘世英、高宏轩三人去太原并州中学上学。在校期间，同刘世英一起做党的地下印刷工作。由于初次进城，情况不熟，在一次散发传单时，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将他逮捕。在监狱里，他不畏严刑逼供，与敌人顽强斗争，敌人终因没有确切证据，三个月后将他释放。出狱后，他回到府谷，在孤山镇小学以教书为职业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府谷县委派杨岐山到府谷县木瓜区委工作，并担任区委书记。10月任府谷县委宣传部长。他经常翻山越岭，深入山区，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与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

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反动武装，向神府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反革命“围剿”。府谷县委遭到了破坏，根据地已沦陷为白区，大部分党员分头向神府苏区和内蒙古一带转移。于是，杨岐山离别家乡，告别亲人，转移到给远省包头西部进行革命活动。他广泛接触蒙汉同胞，宣传马列主义，为开创革命根据地积极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李井泉等带领八路军到大青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次年春，杨岐山来到大青山，与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杨植霖取得了联系，参加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为早日打开平川地区的抗日局面，他化名杨青山，深入到敌占区的托和托县、和林格尔县一带，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八路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同时，发展地下党员，组织了抗日的革命团体，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冬，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杨岐山任绥远敌占区托和县（托克托、和林格尔）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绥察游击行政公署在小西梁村召开各族各界的抗日力量代表

会，会议正式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员公署和九个县政府。在托和清（托和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县政府建立的同时，中共托和清工委也进行了组建（属绥西地委），杨岐山任托和清县县长和工委委员。托和清县政府其主要工作任务是深入托和清敌占区，打击敌伪反动势力，开展、扩大平原工作。他经常活动在县境的永胜城，什力法图，水泉，南、北的力兔，朱什拉和耳林仿等村，组织群众开会，组编政府游击队。杨岐山带领游击队除大力开展平原工作和积极为大青山部队征集给养外，经常深入耳林访以及和林地区，打击日寇，使党的抗日威望在人民群众中不断提高，群众纷纷支援抗日。

1941年4月的一天，杨岐山奉命带领游击队员20余人，从大青山下到平川给部队征集给养。在什力色图村将游击队分为三个小组进行工作，杨岐山带领一个小组到永胜城地下党员胡三旦家和工委书记李云龙接头，研究情况，会议决定由杨岐山带领五名队员至旧匕的力兔村去筹款。北的力兔伪保长阎扣得知杨岐山县长带领游击队来征款的消息，立即和伪主任白明谦串通，处处刁难破坏筹款。在杨岐山给白明谦做工作时，阎扣趁机溜走，前往古城向伪警察告密。杨岐山看穿了伪保甲人员的阴谋，随即押了白明谦连夜向西云寿村转移。

次日清晨，北的力兔的保甲团兵20余人，由王占标带领闯进村来，接着古城警察署的伪警长邢喜太带领伪警察和自卫团十几人也赶到西云寿村包町杨岐山和游击队的住处。战斗打响后，杨岐山二面组织队员还击，一面待机突围。中午伪警长邢喜太看到游击队着应战，难以取胜便向西云寿村日伪警察署告急，又调来100多人，包围了整个村子。

在敌众我寡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杨岐山沉着冷静，带领队员坚持战斗，

组织突围。在突围时，游击队员曹五、王高小先后牺牲，突围未能成功。杨岐山遂带领部队转入院内牛棚，继续抵抗敌人。这时，敌人向院内冲来，伪保甲兵卢大难手持冲锋枪向牛棚闯来，杨岐山开枪射击，并迅速杀出牛棚。冲上村西南角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 34 岁。

## 惠泽仁

惠泽仁，1910年出生，祖籍陕西清涧，后随父亲定居瓦窑堡。1918年进私塾读书。1927年春毕业于瓦窑堡第二高小，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大革命失败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绥德，四师的党团组织活动转入地下。在此期间，惠泽仁和吴志渊一道从事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生军”的领导工作。他们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印发传单和小册子，在学生和群众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讲述革命道理。他们遵照陕北特委的指示，以学生军为核心，有计划、有组织地举行罢课斗争，泽仁带头闯进校长、训导主任房间，揭发他们压制学生的行为。同时在开展校外活动中，泽仁将写好的传单、标语装入烟盒，分发给同学，乘敌不备带出校外，在绥德四处张贴、散发。

1929年冬，惠泽仁揭露反动派镇压革命的言论和砸碎绥德县党部招牌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为此，陕北特委命他回安定(今子长县)，随同谢子长参加武装斗争。

1931年秋，晋西游击队转移到陕北后，惠泽仁率先参加了游击队。9月10日侯家砭战斗中，他偕同几名突击队员，镇压县政府班头张发华，击溃民团的两次堵截，缴获一批枪支弹药。10月4日，部队在安定寨儿山击溃横山石湾来犯之敌。当晚奉阎红彦之命，到土客武装杨琪、杨丁、肖万

胜部做说服工作。在他的争取下，土客武装接受条件，编入晋西游击队。

1933年9月，惠泽仁随同一支队到安定西区开展游击活动。他乔装打扮，活动在敌人眼皮之下，得空便率众打民团、惩恶霸，扰得敌人坐卧不安。10月下旬，他奉调回陕北特委分配工作。其时，恰值红一支队决定攻打安定枣树坪，他自愿加入奋勇队。11月2日晚，枣树坪战斗打响，强世清、刘明山、惠泽仁抢先攻进敌高德全连部时，发现村外敌人反扑过来，强世清命令奋勇队迅速撤退。为掩护战友，惠泽仁担任断后任务，与敌展开肉搏战，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3岁。



## 马子骧

马子骧，又名马承德，外号老骧，1908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店镇乡西山村。1925年在店镇高小读书，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下半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29年四师被封闭后，马子骧回乡在乔家老庄补习学校任教，兼搞葭县特区委工作。一次敌人荷枪实弹四面包围，子骧赤手空拳冲出包围圈，勇敢地逃出虎口。下半年和张俊贤、贺大增、乔鼎铭、刘国栋等人到东胜搞兵运工作时，不慎被敌人抓走。子骧和鼎铭在法庭上据理力争，驳得敌人哑口无言，查无实据，当时就释放了。

1929年到1933年间，担任西山、张顺家沟党支部书记。当时的子骧家，已成为革命据点，张达志、高长久、高长直、高光祖等人，经常在此召开会议，开展革命活动。

1934年，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党组

织在本地难以立足，马子骥等被迫转移到吴堡一带活动。他转到清涧搞苏维埃运动。冬天返回葭县，领导本村贫农会，8月，革自己家里的命，把十多石粮食分给贫民吃，还准备把100多亩土地给贫民耕种。后在兴隆寺烟洞山一带活动。一天，子骥等五六人同行，见前面来了三个带枪的国民党士兵，子骥灵机一动，暗中约定，待三个士兵临近，他们突然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三支枪，当三个士兵醒悟过来时，已做了俘虏。

1935年到1936年，子骥任靖边县委书记。一天晚上，敌人包围了县委机关，子骥手拿驳壳枪，不着衣服，神勇地打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奔向延安后，找到党组织负责人马明方，组织分配子骥到东风区（即现延长、延川、宜川一带）特委任巡视员。

1936年7月13日，马子骥等人到宜川去巡视，路经延长下川王家河过河，当骑马走到河中时，突然洪水爆发，被洪水淹没而亡。时年26岁。



## 李景波

李景波(1911—1944),名广年,字景波,幼名温儿,参加革命后化名白老婆(也称李老婆、老婆),陕西省绥德县韭园乡李家寨村人。

李景波自小聪敏过人,逗人喜爱。在本村冬书房里念了三年冬书,便能通书信,会写农村各种应用文,使他成为全村群众看得起的小“知识分子”。

1926年春,李景波到绥德北区初小(校址在薛家河乡高家沟村)上学,1927年春考入绥德县城内文庙高小上学。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利用国民党做掩护,同时也便于发展我党的组织,四师的党团骨干在绥德各城门口、机关、学校门前,在大街上设立桌案,拿出国民党入党表格,公开征求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3月,李景波就在这种宣传声势中加入了国民党。当时绥德的国民党组织,在我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组织,多次派出大批国民党员(领导骨干是共产党员)下乡组织农民协会,

展开和军阀、土豪劣绅的斗争。李景波也多次下乡进行调查、宣传，组织基层农民协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大批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屠杀。绥德国民党县党部至此也由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成为反动派的政治工具。李景波在寻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性，准备重新选择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

1928年春，李景波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五月间，反动派出动大批军队，把四师学生全部赶出校门，关闭了学校，景波被迫回乡。第二年春天画币重新开学，李景波遂回校继续上学。

1930年9月，经共产党员马福周介绍，李景波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党小组长。

11月7日，四师举行纪念十月革命13周年大会。会后，全校师生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呼喊革命口号，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李景波等学生还在街头给群众讲演，控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的滔天罪行，号召贫苦百姓起来革命。国民党县政府当即派出军队冲散游行队伍，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李景波被追到本城杏树吃崎，在一个拐弯处迅狮进一户居民院里。这户人家立即把他藏了起来，躲过了反动派的抓捕。过了三天，李景波告别了隐藏他的全家老少，回到了家乡李家寨村。

李景波回到家乡后，积极向乡亲们宣传革命，结合农村实际，揭露反动土豪剥削压榨的罪行。

1931年初，党组织调派李景波到定边国民党任和亭部队搞兵运工作，打入任和亭团第三连当了文书。他与定边县小学校长杜嗣尧（四师毕业生、中共党员）单线联系。在杜的指导下，在连队里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宣传

共产党的政策，在士兵中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建党工作。定边是回、蒙、汉等民族杂居地方，银定的士兵成分复杂，思想混乱。因下层官兵发生哗变，李景波到部队不久又回原籍，与党的负责人马福周联系，开始筹建红军武装。

1931年5月，李景波在家乡任党支部书记，负责李家寨、吴家畔、折家检、西雁沟、魏家塬、雷家坡、刘家梁、王茂庄一带村庄的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他利用人熟、情况清楚的有利条件，把贫苦百姓发动起来，开展抗粮抗税，反对高利盘剥和富豪压榨等斗争，把其中最积极、有觉悟的青年发展成为党团员。以这批骨干带动全体群众，为后来建立绥德北区根据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2年5月，李景波担任北八区区委宣传委员，介绍青年农民刘子厚加入共产党。当时绥德南区的崔家湾、定仙塬至黄河畔一带，已经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东区的马家川、中角连同吴堡一带也成为半红半白的区域。只有北区和西区大部分仍被敌军占据，成为切断南北红色通道，割裂葭、米、绥、吴四县苏区的严重障碍。建立红色武装，开辟北区成为当时陕北特委和绥德县委的重要任务。基于这种情况，李景波积极配合来韭园沟的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郭洪涛、张达志和崔正冉等人筹建红十四支队。

1934年春，党组织安排他去陕北特委搞秘书工作。

1935年初，李景波任陕北特委特派员，检查了绥德、葭县、吴堡三个县的革命斗争情况，重点巡视指导了绥德北区和东区的工作。5月，李景波回陕北特委（已改为西北工作委员会），汇报巡视工作情况之后，在西北工作委员会继续做秘书工作。以后成立陕甘晋省委时，他担任了省委秘书长。

1936年4月，李景波进瓦窑堡中央党校学习一个月后，调中央白区工

作部主任哥老会干事。6月受罗迈（即李维汉）同志指示，李景波加入哥老会，打入其内部工作。不久，受组织委派到定边县回民救国军任政治员。

回民救国军是兄弟民族为抗日救国而自发组织起的一支武装力量，是我党争取、团结和大力协助的对象。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宣传和敌特分子的挑拨离间，这支武装的前途和命运处于极端严峻的时刻。李景波到任后，向回民救国军阐述了我党的民族政策、抗日方针和对这支武装的信赖、期望，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策、歧视少数民族和企图瓦解这支武装的阴谋，同时深入下层地做士兵教育工作。由于情况复杂和上层分子的顽固，1937年2月，回民救国军第四支队叛变了。正在该支队工作的李景波遭到逮捕。5天后，该队受到马鸿逵骑兵的突然袭击，在混乱中，李景波与另一名共产党员迅速脱险。由于身体受到摧残，病情沉重，经组织批准在家养病一年。

西安事变后，绥德政权由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专员兼县长）操纵，军事由陈奇涵司令员为首的八路军警备司令部负责。1938年6月，李景波和我党的一批优秀干部组成秘书班子，被派往我军司令部，随之建立了中共绥德特委，由郭洪涛、刘澜涛、张秀山、习仲勋等同志先后任特委书记。在此期间，李景波先后任特委的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统战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务。他协助主要负责同志，团结特委其他成员李合邦、杨和亭、李景廷、李仲银、白炳义（马义）等同志，在敌情复杂、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中为党勤奋工作。

1939年秋，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日益猖獗的摩擦，保卫陕甘宁边区，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从敌后来到绥德驻守。这一行动震慑了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引起了何绍南一伙的恐慌。绥德特委和三五九

旅紧密配合，有理有节地开展政治和军事攻势，1940年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日）赶走了广大军民切齿痛恨的何绍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李景波在这场斗争中，亲自编写了一首《摩擦专家何绍南》的歌词，配上民歌曲调，印发绥、米、葭、吴、清五县各乡镇，让全区群众唱起来。他到民众剧社指导排练《抗日战争歌曲大合唱》、快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棋局未终》等文艺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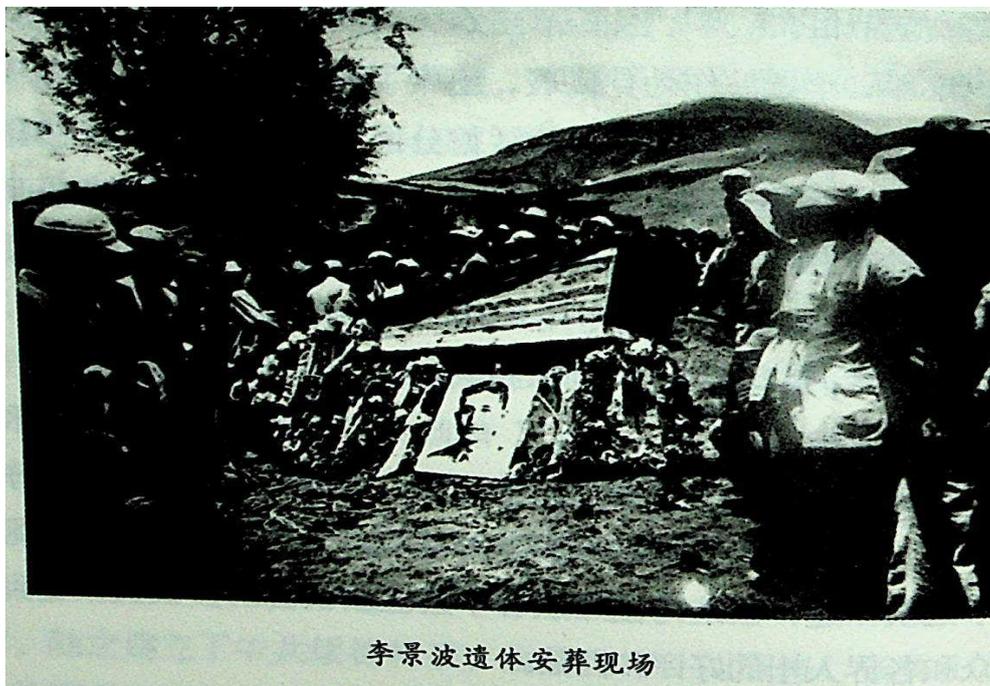
1939年，李景波作为党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何绍南政权垮台后，他被任命为绥德分区的首任副专员（王震同志兼专员）。李景波担任副专员后，致力于处理旧政权造成的民间诉讼积案和新旧势力斗争中发生的新案件。他排除干扰，秉公办案，仅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短短几个月内，就亲自办案100多起。

1941年8月，李景波来到米脂县。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他亲自筹备、安排和领导了米脂县的三级选举。在这次普选中，把爱国抗日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选为米脂县参议长。同时，与王震、马明方、贺连城、姬伯雄、李建侯一起，被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拥戴。

1942年初，李景波同志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这时候，正是边区面临极端困难，党中央、毛主席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时期。当时，陈正人部长有病，西北局组织部的工作实际是李景波同志主持的，他领导边区党的整风运动，与党内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他具体制定“精兵简政”实施方案，审查调配干部。面临繁重的任务，李景波夜以继日，不辞劳苦，搞得非常出色。当时，借整风运动之机，康生搞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好多同志被打成“特务”和“反革命”，

延安大学是重灾单位之一。李景波根据党中央决定，派李万春等同志到延安，把大批好同志解脱出来。同时，他主持了所属单位的甄别平反工作。

长期超负荷的辛劳，李景波同志积劳成疾。1944年7月60：午，李景波急性盲肠炎（阑尾炎）发作，在中央医院手术抢救。管经过两次手术，



仍然无效，次日午夜，李景波长眠在中央医院的手术台上，年仅 33 岁。

1944年7月16日下午，任弼时、李富春、徐特立、李鼎铭、谢觉哉等领导同志和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默默聚集在延安边区参议会礼堂，隆重追悼李景波同志。毛泽东同志悲痛中，奋笔疾书，写了《李景波同志简略》，由石匠刻写在李景波同志的纪念碑上。毛泽东在《简略》中写道“李景波同志一生革命，团结群众，受人爱戴，任劳任怨，奋斗不息，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谨择简略永远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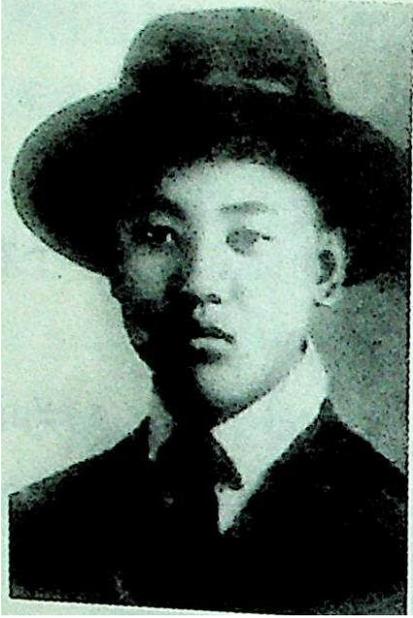
## 惠金瑞

惠金瑞，陕西省清涧县双庙乡吕家河村人，191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清涧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上学时加入共青团。

1929年，惠金瑞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冬四师被查封后回清涧，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白明善在榆林惨遭杀害，团县委书记王希勃以身殉职。惠金瑞、周继丰、霍建国等组成新县委，坚持全县党、团县委的领导工作，继续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他经常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刻蜡版，印刷宣传品，积极为党工作。他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贫农会。特别注意利用各种机会购买枪支弹药，发展地方武装。他常常将购买到的短枪弹药藏在挂面箱内，长枪掩在皮袄下带出县城，转送给游击队。

1934年5月，井岳秀部八十六师对我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勾结地方民团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县委立刻召开会议，对当时形势作了充分的估计，对内部的危险人物已有察觉，有人提醒他尽快躲开，但他说还有些事不能离开，仍继续坚持工作。月初，由于叛徒出卖，他（担任清涧县团委书记）和县委、城区区委负责人周继丰、霍建国，县委委员惠志儒等一同被捕，被杀害于清涧县城。时年24岁。



## 许志云

许志云，原名金合、登霄，化名小合。1914年3月10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城一个贫民家庭。

在亲朋的资助下，许志云先后在绥德平民学校、高级小学上学。他自幼贫寒，仇恨强暴。李子洲在四师发起革命运动后，他即在局小参加了儿童团。1927年，他与李成荣、崔田民、马仰西等人参加了高小的学潮，赶走了反动校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29年，许志云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支部书记、团区委书记、团县委宣传委员等职。他积极组织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公开向黑暗的旧制度宣战。由于他斗争坚强，对党忠诚，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1930年冬四师被封闭后，一片“抓许胡子”的白色恐怖中，经党组织安排，许志云伪装成国民党士兵，逃离绥德到河北省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他与一批陕北老乡

打入北平国民党二十五师做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地下党小组长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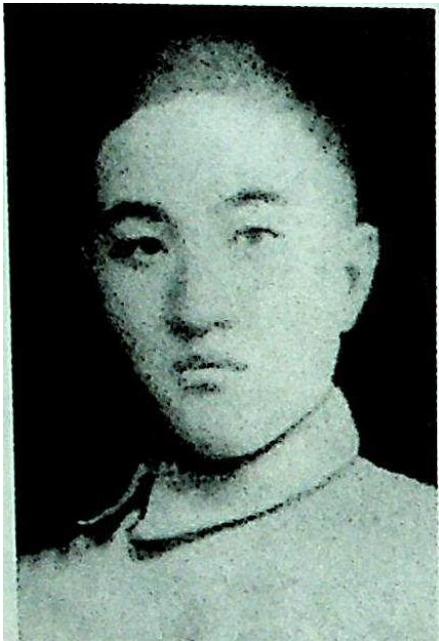
1935年4月28日，以看病为名离开部队搞地下活动的许志云侦缉队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起因是不久前由于叛徒出卖，二十五师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霍世英、马云程、赵二虎、刘绳甫、王振兴等共产党员被捕（5月日惨遭杀害）。但叛徒不掌握许志云的具体情况，只知道与以上同志来往密切，他是以“嫌疑犯”罪名被捕的。

许志云入狱后，虽多次受到严刑逼供，但他矢口否认，咬紧牙关不吐露半点儿真情。当时监狱规定，“犯人”每月只能向家里写一封家信。许志云知道敌人拆看他的信，便在写家信时采用隐讳的语言，揭露敌人随便抓人、残害无辜的卑鄙行为，不承认自己“犯法”，并以自己“交友不慎”为由，借以掩护自己与党内其他同志的关系，搞得敌人无据可查，无从下手，只好将他长期关押。

许志云虽被关在北平，但仍关心着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对妹妹宛如抱有殷切的希望。他在信里暗示后来者不要悲伤，挺起腰杆，跟共产党走。他写道“……今天所以要写这封信，是为了使她高兴。希望她不要因现实悲惨，躲在角落里啜泣。现在她还不能理解求知欲很强的青年之痛苦莫过于无书可读。我更希望她务要听教导者的话为盼！”

四年零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严重地摧残了许志云的身体，他患了很重的胃溃疡病。他咬着牙，一直没有告诉家人。直到1939年10月6日，也就是他病逝的当天，才给他姐夫写了一封信谈到病情，墨迹未干，他就溘然长逝了。许志云去世后，刘澜涛曾给马文瑞写信谈到他的埋葬情况“金合同志光荣牺牲后，即将葬于原监狱附近。因当时与许多烈士及其他被害者共葬一地，现无标志甄别，实属无法觅得尸体，惟已立碑纪念。”现在只

知道这位忠贞的共产党员的遗体葬于北京郭家井的一块芦苇地里。



## 霍世英

霍世英(1914—1935)，字俊卿，陕西省绥德县义合乡楼沟村人。其父霍祝三当时是义合局小校长，后来是陕北知名进步人士。

霍世英自幼上私塾，后到义合高小上学。1925年秋，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批党团员走向社会，准备在义合高小建立党团组织。年仅十二三岁的霍世英已是高年级学生，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任义合高小学生会主席、绥德县学生联合会主席团成员。1926年霍世英在义合高小加入共青团。1927年暑期到四师预习功课，准备参加入学考试。不久，井岳秀叛变革命，开始“清党”，封闭了四师，霍世英便转到榆中求学。后来仍返回义合，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再转入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世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不仅学到了新科学文化知识，也懂得了一定的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1929年夏秋之间，绥德大旱，义合一带农民集会，反

对井岳秀军阀政府向农民摊派烟商税。义合党支部的霍维德当时负责北川片组织农民请愿。从古历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仅北川片去区上请愿的农民代表就有 300 多人。霍世英是当时北川发动与领导青年农民的主要骨干。是年冬，转为共产党员。

1930 年底，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查封了绥德四师。霍世英回到家乡后，在义合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积极在贫苦百姓中宣传革命，秘密发展党团组织。1933 年秋因在绥德城内张贴标语，遭国民党当局追捕，连夜逃离县城，返回义合。随即离家，同陕北同乡的部分党团员外出。

1934 年秋，党组织派霍世英打入驻北平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师教导团，当少尉学员。霍世英利用合法身份，为我党提供敌军编制、人员、武器装备及“围剿”我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调配等情报，通过北京大学党组织负责人马云程，和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该教导团有三四百人，多为高小、初中毕业，具有少尉、中尉军衔的青年军官，是我党要争取的重要对象。世英担任了该教导团地下党支部书记，他通过交朋友等方式开展党的工作，宣传党的主张，伺机策动下层官兵起义。他不怕艰苦危险，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他以“北京陕北党员”的署名，向北方局写了“两个士兵谈话”的报告，指出南京蒋军和人民群众的四大矛盾“蒋军虽有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国际援助，但因上下不一致、军民不一致、军政不一致、党军不一致，终必失败。”这一结论后来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赞同和引用。这一报告带回陕北苏区后，给当时为粉碎国民党五省联剿而战的陕北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1935 年 4 月，由于党内出现叛徒，在敌二十五师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霍世英、马云程、赵二虎、刘绳甫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同时株连陕

北同乡多人。党在敌二十五师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关押在北京监狱的霍世英，受尽了敌人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残暴的敌人动用种种酷刑，又是坐老虎凳，又是睡竹钉床，还用刺刀割开他的脊背，把丝线埋在刀口内，待刀口刚愈合，又将线拉来拉去。世英被折磨的昏死过去时，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用冷水泼醒他，继续逼供。但霍世英依然坚强不屈。党组织多次设法营救未果，1935年5月1日，24岁的霍世英殉难于狱中。



## 延振伦

延振伦（1915—1941），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延家岔村一户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爱国进步乡村绅士，对延振伦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有力支持。

延振伦幼读私塾，1925年考入绥德县立高级小学校，时值陕北共产党发起人李子洲在绥德四师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党、团组织，派周梦熊、周发源、冯文江等共产党人在高小担任校长和教师，延振伦在此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7年秋“清党”后，反动当局为了阻止革命洪流，撤换了校长，对学生实行高压政策。崔田民、李景波、李成荣、马仰西等同学带头闹起了学潮。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斗争取得了胜利，校长不得不对学生采取让步政策。可是，第二年开学时，学校宣布开除了崔田民、李成荣等八名学生。为此，延振伦和学生会的其他负责人发起了新的罢课斗争，要求

当局收回无理开除学生的成命。这一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年仅 13 岁的延振伦受到了锻炼。

1929 年春，延振伦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学团组织的秘密组织领导下，他和进步同学一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到农村宣传革命思想。不久加入共青团组织。1930 年 2 月，为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队，冲散游行队伍，关闭了学校，延振伦失学回乡。

1932 年春，延振伦到榆林中学上学。在榆林中学，延振伦转为共产党员，并被选为学生会负责人。

1933 年 4 月的一天，当得知反动军阀井岳秀勾结地方土豪劣绅强迫农民毁庄稼种大烟（鸦片）的消息后，延振伦、马祥林等在榆林中学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揭露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声援广大农民抵制种大烟的正义斗争。榆中校长、井岳秀的走狗徐绍林急忙调来一连武装士兵，包围了礼堂。正在主席台上讲话的延振伦毫不畏惧，讲演更加洪亮激昂。反动派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以“与学生无关”、“小心上赤匪的当”等欺骗手段，驱散了集会学生，并把延振伦、马祥林带去“谈话”。事后，延振伦又一次被迫离校回乡。

延振伦多次利用回家的机会，向父亲宣传马列主义，讲述革命道理。这对父亲后来走上同情、支持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大作用，也为他自己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父亲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1935 年春，延振伦到北平中华中学上学，后进入大学预科。在北平，延振伦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任北平民先队第九区队长。他向父亲写信要来银元 2000 元，交给党组织，作为学运的活=费。校党组织让他

参加了学生剧团，主演《放下你的鞭子》深得群众好评。因他经常在平、津街头上演出，引起敌特分子的注意，准备抓捕他。党组织及时安排他带部分流亡学生，于“七七”抗战后不久，来到西安，进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延振伦到西安后，在城市和农村开展抗日文艺宣传。由于工作劳累，他得了肠胃病。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他于 1938 年春给父亲写信说“我要回家，但手中无钱，请速汇来白洋 400 元。”这笔钱寄来后，他又全部用在抗日宣传和党的活动上。敌特见延振伦出身富门，才气横溢，曾以给高薪企图收买他，振伦以轻蔑的一笑，作为回答。

1938 年夏，延振伦奉调回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除钻研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学习戏剧业务书籍，认真钻研有关戏剧的编导、表演艺术。后因肺结核加重，组织安排暂回家中休养。病情稍有好转不久，就到米脂县女校担任了校长。

1940 年初，延振伦从自己家里拿钱，在米脂县办起了民众剧团，任该团团团长。他领导的剧团以演出歌舞、现代小戏剧为主，在宣传抗日救国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民众剧团更名“绥德民众剧社”后，受中共绥德地委、专署和联防司令部直接领导。延振伦成为剧社的主任，亲自编写、导演和演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歌曲大合唱》、《棋局未终》、《新编小放牛》等。这位留着偏分头，圆脸蛋，20 多岁的小伙子，一会儿是昂首挺胸的合唱团成员，一会儿是风趣的老大爷，一会儿是凶残的敌军官。他精湛的演技深为绥、米、葭、吴、清等县民众喜爱和赞赏。

1941 年春，由于长年奔波，疲劳过度，延振伦的肺病加重。在家养病期间，绥德党政军负责人王震、袁任远、李景波等同志，都曾亲自前往探

望，并派医生积极治疗。

1941年8月4日，病魔夺去了年仅26岁的延振伦年轻的生命。延振伦同志去世后被追认为烈士，绥德党政军各界在绥师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袁任远主持追悼大会，王震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追悼大会，并送了棚。诗人高敏诵了长篇追悼诗。他的故乡延家岔小学，为纪念他改名为“振伦小学”。

## 张继增

张继增，化名苏山、老苏。1912年出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店镇乡张顺家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1岁时开始在村里上冬学，13岁入店镇局级小学上学。

店镇是葭县中南部一个偏僻小镇。乔鼎铭等共产党员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学校组织进步师生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张继增经常参加革命活动。校长思想守旧，经常压制进步学生。继增和进步学生一起极力反对、公开斗争，终使县政府罢免了其校长职务。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绥德四师学生赴葭县、米脂一带宣传革命，组织示威游行。张继增和张贤等学生一道，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宣传会，使整个山区小镇为之轰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店镇学生又一次组织了示威活动。为防止坏人破坏捣乱，张继增等组成纠察队，负责游行队伍的安全。这年秋，杨明轩来葭县，以店镇小学为据点，在周围乡村宣传革命并组织成立葭县农民协会筹备会。在集市上召开群众大会时，张继增裹着绑腿维持大会秩序，保护杨明轩的安全。在党的支持下，店镇小学组织了学生自治会，继增被公推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

他们提出改革教育方法，提倡师生平等，组织学生学习新知识、新思想。

1927年6月，继增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葭县县委的秘密交通员，负责葭县各区委及米脂、吴堡、绥德等县委的秘密联络和党内文件、情报的传递。他机智、勇敢，及时地完成了县委布置的各项任务。

1928年初，葭县县委改成由米脂县委领导下的特区党委（代号叫贾志先），张继增任巡视员，兼管党内文件的印刷和传递工作。他把县委的批示传达到各区委，把地下党活动的情况收集起来再上级党委汇报。是年夏，刘澜涛等来葭县检查工作，张继增负责将他们安全护送到特区党委的驻地。张继增还多次与张达志、毕维周等人联系，接受任务，开展工作。

1928年暑假，张继增参加了由特区党委举办的学习班。他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以及《向导》等书刊。在这里，他进一步受到了教育，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1931年春，张继增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2月四师被查封后，继增回乡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先后组织了地下赤卫队、秘密农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他带领的中区游击队白天隐蔽，夜间活动，主要打击当地民愤大、有血债的土豪劣绅，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继增带领的游击队对贫苦百姓秋毫无犯，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在葭南楼底村一次游击战斗中，他们曾营救过红军干部贺大增。这年冬，刘志丹赴榆林开会路过葭县，曾与迎接护送他的张继增在张顺家沟村的关帝庙里畅谈了一夜，刘志丹对在白色恐怖下尚能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十分赞赏。

1933年腊月二十三日，高长久、高录忠、刘子义等组织策动了木头裕暴动，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张继增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配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这时葭南区组织了不少农会、妇女

会、互济会，有些村还成立赤卫队、少先队，党团组织迅速发展，革命队伍不断扩大，为建立葭县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夏，张继增任葭县贫协主席、区委书记、特委巡视员等职。

1934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天降大雪，张继增从东区到中去开会，路过西山村口时，与驻守牛沟的国民党匪军杨相芝部相遇。因踏雪摸黑躲闪不及，敌人发现了他，开枪向他射击。张继增机智地摆脱敌人的包围，迅速退下山来。山下的敌人听见枪声大作，发现有人跑下山来，便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张继增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3岁。



## 薛世丰

薛世丰，又名马尚千。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马家川乡薛家坪村。世丰7岁读私塾，13岁考入本县吉镇高小。

1930年，薛世丰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得到共产党人的启蒙教育，使他对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和革命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在《国文讲义》里做过这样的摘录和批注“因为工农群众革命形势的发展，吓了国民党统治者，它用严密的组织，反动布置，来镇压革命；因为反动组织的增加，……旧地盘的缩小，所以统治者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因为老百姓负担的增加，一定要加速他们的斗争。这样下来，中国革命的形势一定要日趋发展……根据以上的论据，必然要延长军阀的混战，更造成产业的破产，产生出更大的革命的主力军。所以他这一狗计，不但不能压下革命的形势，不但不能稳定自己的狗权，反而更促进了革命的到来，和狗命的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我们失掉的是锁链，得

到的是全世界。追求，革命者的力……’ ”

薛世丰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经受 7 考验，于这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政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下令停办了绥德四师。世丰遂林中学继续上学。刚半年，榆中停办了，他只好离校回乡。

1931 年下半年，按照党组织指示，薛世丰在本村开办了一所小学校。他抛弃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旧课本，新编了一套宣传革命道理的课本，一字一句教给学生“我要做个革命军，拿上快枪打敌人，再等几年长大了，搭救受苦的老百姓。叹世事，太不平，虽的虽来穷的穷。劳苦人民反遭穷，不劳而得的有钱人。驴门（衙门）汉，没良心，何苦欺压老百姓，对上镜子照一照，自己也是个穷光蛋。”这朗朗上口的课文，深深地刻印在学生的心灵上。他的 20 多个学生，后来全部参加了革命，其中不少人担任了领导职务。

世丰白天教书，晚上和周围村庄的共产党员曹光治、刘世宗、霍明超、张继良等人秘密会合，外出搞革命活动。两年中，在绥德县东区发展了一批党团骨干，在各村建立起党团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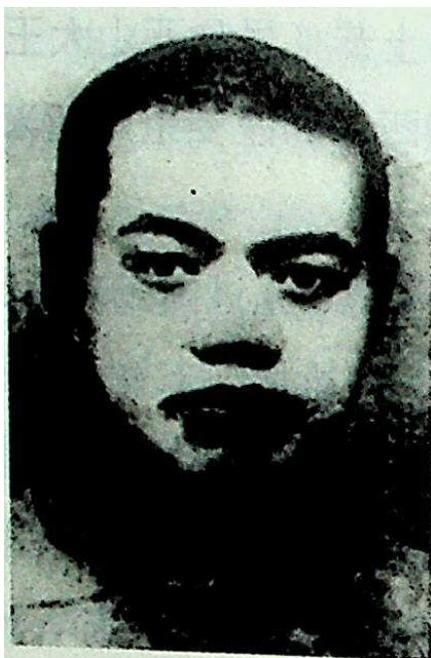
1933 年底，薛世丰由陕北特委调派，前往神府地区开展工作。临别时，他在全村转了一圈，看望了父老兄弟和他的学生。他再三勉励学生，要好好学习，学通革命的道理，参加革命斗争，彻底推翻人吃人的罪恶社会。

1934 年 3 月，薛世丰和张毅忱参与组建神府地区红三支队的工作。4 月，陕北特委又派他与张毅忱主持神府工委的工作。张承忠任工委书记，乔钟灵任宣传，薛世丰任青年书记。这时薛世丰化名为马尚千。

1933 年 5 月，他带领刘北垣等同志首先开辟了神木县区的工作。他们

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组织赤卫队、儿童团和妇女会，斗争梁家仓村地主恶霸梁士恭（号称西山大王）等土豪劣绅，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将一区 and 四区的区委组建起来成为我党控制下的红色区域。

1935年春，特委特派员王达成调他和张承忠、王进修三人负责红三团工作。他到职后，以革命利益为重，积极协调同志关系，团结所有革命同志一道战斗。夏天，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军队“围剿”红三团和地方革命政权。红三团转战到马家新庄子时，发现北面石窑上、东西沙铺镇两路敌军包剿而来。红军一面阻击掩护，一面将部队分散冲过一条大沟，到山上郝家岭、盘地岭会合。刚到盘地岭，便与尾追之敌展开战斗，他不幸中弹负重伤，无法跟上大部队行动。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发现21岁的马尚千（薛世丰）的遗体。在他的身子下，压着那支王兆相送给他的心爱的八音子手枪。



## 蒲政仁

蒲政仁(1916—1949)，陕西省续德县大会坪湾蒲家检村人。他8岁入私塾。

1930年春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此期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设在校内。12月，学校被查封，正仁中断学业蒲家磁村任教。

1934年又考入绥德四师。1937年冬，蒲政仁离开学校参加了国民党十七军战地服务团，到山西做民运工作。后该部队日趋反动，他借“回乡探亲”离开战地服务团，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从1940年5月到1946年9月，他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互济会干部，边府民政厅科员、秘书等职。由于他思想觉悟高，工作吃苦耐劳，于194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9月，组织答应蒲政仁提出的“我一贯坐机关，需要到群众中锻炼一下”的请求，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团，到三边盐池搞土改工作。1947年4月，马鸿逵军队进犯三边，蒲政仁不幸被俘，被匪兵押解到兰州。从此开始了地狱般的铁窗生活。他经受了“坐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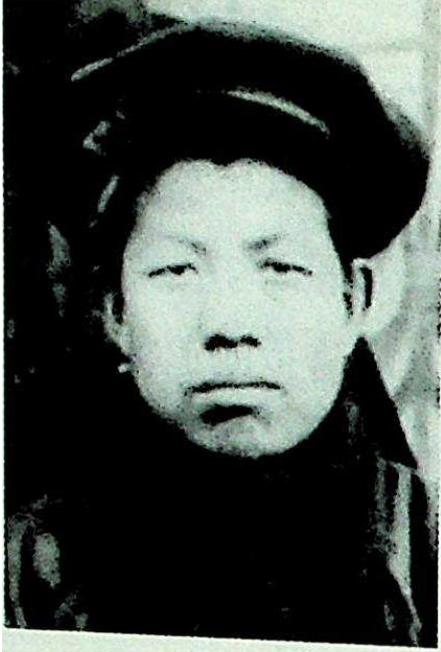
机”“上老虎凳”、红铁锨烙、火香烧、灌尿水、灌辣子水、吊打、“疲劳审问”等，仍坦然地笑骂那帮企图征服他的刽子手。

兰州解放前夕的1949年8月10日深夜，在兰州广武路140号国民党军统所属西北行辕第二处的监狱里的特务，用铁甲车将这位坚贞不屈的“囚犯”运往沙沟，进行残酷折磨后活埋于沟壑中。

蒲政仁牺牲后，原陕甘宁边区民政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王子宜、吴志渊、曲正等同志主祭和陪祭，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等单位送了挽联，《甘肃日报》、《群众日报》登载了他的事迹和消息。王子宜、吴志渊送的挽词是：

劲系盐池，凛然大节光青史；

血洒兰郊，山河解放慰泉壤。



## 贾仰青

贾仰青(1910—1934)，原名贾鸿德，1910年7月24日出生于陕西吴堡县贾家山村的一个农医并兴、耕读传家的富裕家庭。

仰青幼年在家办的私塾读书。1924年春，14岁的贾仰青跟着本村拔贡先生贾云书来到本县川口高等小学读书。这里教学内容和方法与私塾不同，除部分经书等古文外，还开设算术、体育等课程，背书不要下跪，进步的先生还给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些，激发了贾仰青的爱国觉悟和民族自尊心。特别是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陕北，他听了绥德四师学生到川口高小讲演顾正红烈士的革命故事后，激发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这年秋，贾仰青带领同学到本县杨家畔村和岔上镇等地，向群众宣传推翻旧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他表达能力很强，讲得生动，深受群众赞赏。

贾仰青十分向往四师这所“马列学院”。1926年高小毕业后，考上了绥德陕西省立第



四师范学校。但其父认为绥德四师的学生不好好念书，成天造反，不是下乡“胡说”，就是上街贴标语、闯乱子，坚决不允许报名上学。仰青无奈先后在吴堡、绥德县的小学边当教员边自学。

1930年春，贾仰青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四师深造。此期，共产党员马济川任四师校长，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设在学校。在四师党组织的领导下，贾仰青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并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买了马列书籍，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浅说》、《向导》等革命书刊。他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决心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因此改名“仰青”。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7日，绥德四师举行纪念十月革命13周年大会，贾仰青参与组织筹备工作，并于7日凌晨和张汉民等同学，到绥德县衙门、街道、商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在游行队伍中振臂高呼革命口号。国民党军把游行队伍冲散后，贾仰青还和同学们在街头进行讲演，强烈抗议军阀镇压革命运动，控

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滔天罪行。这次革命行动使反动当局惊恐万状，12月，遂派兵封闭了四师。

1931年春，贾仰青转到榆林中学学习。在这里，他和慕生桂同学组织了吴堡旅榆学生同乡会，组织同学们纵谈天下大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仰青和张汉民、宋德福等同学不顾生命危险，爬上城墙，给哨楼散发传单。还以访友为名，到榆林城井岳秀炮兵连宣传鼓动士兵哗变，让大家把枪口对准井岳秀。

1932年夏，贾仰青担任了榆中党支部书记。他按照陕北特委关于纪念红色五月的通知精神，积极筹备和组织各种纪念活动。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制定斗争纲领，研究行动计划，发动学生向学校当局提出三条要求一要成立学生会组织；二要召开各种形式的纪念会；三要进行各种讲演活动。学校当局拒绝后，仰青等同学便召开了学生大会，成立了学生会，民主选举出学生会负责人，举行全校大罢课。学生三五成群进行演说，纪念“五卅运动”。学潮斗争轰轰烈烈，井岳秀慌了手脚，忙给榆中派了特务队，采取高压手段，导致学潮斗争低落下来。面对当局进一步抓捕、迫害进步学生的局势，党组织要求身份已暴露的贾仰青尽快离开榆林。6月，贾仰青离开榆林，特委派他到吴堡、绥德一带进行地下活动。

1933年7月25日，贾仰青受陕北特委的派遣，和张毅忱、樊文德同到安定（今子长县）北区，参加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简称一支队）。贾仰青先任一支队第一分队政治指导员，后任一支队中队长，带领红军游击队在安塞、延川、清涧、横山等地打游击，抓土豪斗地主，抗粮抗税，同反动派作斗争。11月2日，在枣树坪战斗中，一支队队长强世清负了重伤，惠泽仁等同牺牲。温家坡战种，一支队政委魏武殉难，战斗失利。两

次战斗使一支队遭受严重损失。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一支队分成两路（即两个中队）进行活动张承忠（魏武牺牲后继任一支队政治委员）、白德胜等带领一个中队到延川、清涧打游击；贾仰青、王孝增、刘明山 11 等带领一个中队向吴堡、绥德进发。仰青等于 11 月 30 日从安定黄家抓出发，经过老君殿，深夜渡过无定河，于 12 月 1 日夜里到达吴堡霍家山，住在贾仰青的姨母家。

贾仰青的父亲得到消息后，连忙赶到霍家山，向贾仰青的脸上吐土唾沫骂道“给老子回！领这几个土匪毛毛兵顶个屁！撂下婆姨娃娃不管，杀人放火败门风！”贾仰青怒目注视，根本不理。贾仰青将游击队转到贾家山附近他家的山圈里。在这里，贾仰青一边与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接洽、联系，一边挥笔书写标语，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同志们劝他回家走走，他说“这山圈就是我的家，那个家（指贾家），革命成功了才能回。”群众得知贾仰青带领红军回来了，奔走相告，纷纷给红军送好饭和红枣、旱烟等，进行慰劳。

12 月 4 日晚，贾仰青带游击队来到晓寺则村，杀掉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两个收税爪牙。深夜，又转到周家塬村，去打劣绅辛寨沟区长霍含章。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闻讯出逃。游击队烧了他家放债账簿，砸烂屋下挂的牌匾，没收并给群众分了衣物。

随后，12 月 5 日夜，贾仰青带领游击队离开吴堡到绥德刘家川附近的一座古庙里，向大家讲述了一个血案刘家川有个大地主刘俊德，是义合区长，绥德东区的霸王，血债累累。他的大儿子刘汉光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东渡山西给共产党买枪械，偷得家里的粮食给穷人救济。他的革命活动，使其父刘俊德、其三弟刘汉杰恨之入骨，1933 年秋，刘俊德、刘汉杰惨无

人道地杀害了刘汉光，使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大家听了这个惨案，个个火冒三丈。次日凌晨，贾仰青带领游击队员，冲向刘家川。刘俊德见势不妙，赤身钻进厕所，从后墙窟窿里仓皇脱逃（1947年被贫农团处死）。作恶多端的刘汉杰被游击队员从被窝里揪出来，绑起吊在大门上揍了一顿，拉到土地岔枪决了。杀了坏蛋，讨还了血债，人心大快，当地老百姓忙给红军杀羊、压饴饬吃。

红军游击队在贾仰青等率领下在土地岔与敌人激战后，回到安定任家砭，与李光胜、张承忠部会合，执行组织决定，分散隐蔽。2月中旬，贾仰青和七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来到绥德郊外的辛店。他们研究如何进城侦察敌情，与城内党组织联系和购买手电筒、油印机等用品问题。当时，贾仰青自告奋勇承担了进城任务。他穿上袍子，带着手枪，化装成商人，进了绥德城。中午，贾仰青提着一包手电筒，赶回辛店。这次，没有同城内党组织接上头。大家讨论研究第二次进城。同志们争先恐后要求进城执行任务。贾仰青对大家说，城内敌人戒备严密，加岗加哨，情况紧张，我刚进过一回，城内情况又熟悉，还是我去好。说罢，贾仰青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又进了绥德城。二次进城，贾仰青不幸被捕落入虎口。吴堡的劣绅、贾家山的坏人和绥德东区的刘俊德以及其他地方的反动分子，闻讯纷纷“告状”。

姜梅生听说贾仰青不好对付，便亲自出马审讯。英勇顽强的贾仰青没等姜梅生开腔，就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贾仰青！是红军、共产党员！”这突如其来的一举，弄得姜梅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紧接着，贾仰青喝道“有啥事快说！”姜梅生在惊恐中嚷道“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枪藏在哪里。”贾仰青冷笑一声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秘密，不能让你们这号人知道！”姜梅生无计可施，下令“上刑”。会丁子手用压杠在贾仰青腿上压，

烧红铁锨在贾仰青背上烙，把竹签扎进贾仰青指头里。但贾仰青坚贞不屈，丝毫没有暴露党和红军的秘密。

深夜，贾仰青忍着剧痛和寒冷，在石板地上挪动，铁镣声打破了牢房里的寂静。他火焰般的革命热情，温暖了一个看守那冰冷的心。这位看守低声问仰青“听说你家是财主，有吃有穿，你为甚当红军受这大罪？”仰青笑着说“好老兄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是为了天下穷苦人的解放，不是为自己享清福，为革命杀头也心甘情愿你这看守更要起义闹革命，不要再给反动派卖命了！”看守唉声叹气地说“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在这里受气了，只要你弄得一二百块银洋，把我的家安住，咱俩一块找红军闹革命走。”仰青答应了看守的要求。一天晚上，这位看守给仰青传了一个消息，上面来了电报，要把你这个重大“政治犯”往榆林押解。仰青坚定地说“送到天边外，还是这个样！”一天，贾仰青提出要笔和纸。姜梅生以为他要写自首书，给了纸和笔。谁知贾仰青先写了两封短信，一封是给家里写的，一封是给陕北特委的。然后，他写了一封长长的告姜梅生书，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日暮途穷，痛骂姜团一伙末日来临。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人民一定不会便宜军阀狗强盗！

两封短信，由探监人员贾明林和贾仰青的三舅父带回吴堡。吴堡党组织把信送到葭县神堂沟高长久家，特委秘书郭洪涛接信后，立即派人与绥德城内的党组织一起营救。贾仰青的父亲贾世雄接到信，看见信中写道“送来银洋二百块……”便破口大骂“败家子！死了就死上他一个吧。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放他回来，这家人就要散包！”

姜梅生用硬压手段失败后，贼心不死，又改用欺骗手段。冬至这天，姜梅生命令看守卸了贾仰青的“双镣”。把他从牢房押到团部，摆下酒席，

并以伪团长职务引诱仰青投降。贾仰青早已识破了这个吃人魔王的诡计，进门二话没说，飞起一脚，踢翻酒席，大声喝道“别耍这套鬼花招！”姜梅生气急败坏地下令“上刑场！”

1934年1月7日，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中队长，遍体鳞伤，戴着沉重的脚镣和手铐的贾仰青昂首挺胸，从绥德城九真观庙院（国民党驻军团部）走出来。一群荷枪实弹的匪兵，押着他向南门外的刑场上走去。

这时，姜梅生仍不死心地说“贾仰青！老话重说，你还年轻，好好想想，现在回头还不迟。只要你当众宣布脱离共产党，能供出游击队的秘密，要官有官，有钱有钱。如还不悔，剜眼杀头！”

贾仰青说“你别做梦！要杀就杀，共产党和天下的穷百姓是杀不完的！今天杀了老子，日后会有千千万万的红军来收拾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狗东西！”

恼羞成怒的姜梅生高声吼叫“跪下！”

贾仰青轻蔑地冷笑一声，骂道“老爷爷是共产党员，是铁打的，岂能向杀人魔王下跪！”

“把他剁成肉馅子！”姜梅生歇斯底里地狂叫。一个刽子手拿鬼头刀残忍地向贾仰青的腿上乱砍，皮开肉绽，鲜血飞溅。但贾仰青毫无惧色，他挺胸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没等口号落音，一把罪恶的刺刀扎进贾仰青的喉咙。另两个匪徒急于求功，用刺刀在贾仰青腿上乱捅，姜梅生从一个匪兵手里夺过屠刀，向贾

仰青的头部砍去……年仅 24 岁的共产党员贾仰青英勇就义了。万恶的敌人竟还把他的头颅悬挂在绥德城门上示众。



## 马克昌

马克昌（1912—1942），字建宏，出生于陕西肩米脂县杨家沟一个地主家庭。

马克昌 1921 年上杨家沟扶风小学，1927 年进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在四师，他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经历了学校两次被封闭，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由高潮—低潮—高潮反反复复的过程。但坚定的爱国思想不变。1930 年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后，买东西宁肯贵一点，也要买国货，不买日货，宁肯拐弯绕路也不进日租界。

1935 年，马克昌考入天津北洋大学，读电机工程专业。上大学后，学习刻苦用功，思想进步，除做功课外，还自己安装矿石收音机，收听新闻，关心国事。他坚持每天学习和阅读抗日宣传刊物，如部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等进步刊物，为他日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天津的求学生活，使克昌目睹了日寇的侵略行径，激发了他

的抗日救国热情。他除自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还积极引导鼓励其他同学（如同宿舍的田庚锡同学）也阅读进步刊物，跟随他外出散发传单，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2月9日，为了响应党中央“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北平学生冲破国民政府禁令，举行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天津各校纷纷响应，并在法商学院教授杨秀峰的策划下，举行了全市学生参加的“一二·一八”游行示威，克昌积极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为了把这次活动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平津学联商讨倡议，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沿途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克昌同志积极推动和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活动。由天津学生组成的第四团，于1936年1月1日从天津出发，拟定在河北省固安县与北平学生汇合。在南下宣传过程中，因北洋校当局派人赴南京“聆训”事件，天津学生在固安会师后返回。克昌则被推选为继续随北平学生南下的十名天津学生代表之一。宣传团到达省会保定后，克昌与北平学生一起，被武装军警押送回北平。克昌等十名天津同学被北大同学接到北大三院住下后，受到北大学生自治会和同学们的欢迎，举行了座谈会。平津南下宣传团召开了各团代表会议，克昌等十名天津同学也同时参加，正式通过了成立“民先”的保定倡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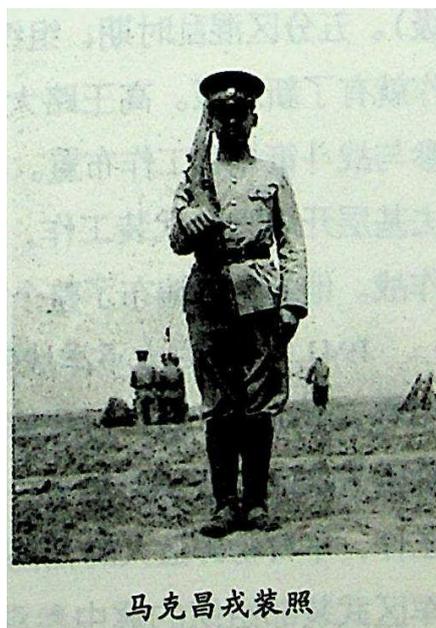
1936年2月，北洋大学最早建立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克昌任副队长兼组织委员，之后任队长。从此，克昌成为北洋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不少同学在他的动员下参加了“民先”。“民先”的主要活动是出版进步刊物（如《北洋学生》、《民众周报》等），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剧团、歌咏队、读书会等学生团体

到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民先”由最初的 20 余人，发展到“七七事变”后的 60 余人。田庚锡同学就是克昌首先介绍加入“民先”的。正如田庚锡在后来《怀念革命的带路人》的纪念文章中所写“最初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马克昌同志。”北洋大学“民先”的创立和发展，克昌确实起了卓越作用，功不可没。

1936 年春，克昌积极参与北洋同学开展的驱逐反动院长李书田的斗争，受到学校当局的严重警告处分。1936 年 5 月，他和同学们针对海河浮尸（修建日军工事的中国壮丁），纷纷上街做讲演，散传单，抗议日军暴行。政府当局派遣特务搜捕学生，天津一片白色恐怖。天津学联为纪念“五卅运动”，防止反动军警破坏，提前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即“五二八”游行示威。以克昌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北洋同学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次游行示威后，克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克昌还担负着天津学联的组织联络工作，每天忙个不停，深夜回来，休息的时间很少，还坚持写日记，从不间断。由于斗争的需要，北洋大学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克昌为六名成员之一。

1937 年上半年，北洋同学参加当地驻军二十九军某团的军事训练。在训练中，克昌积极向部队官兵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且在训练队中成立了民先组织，任负责人。这次训练，使民先队员与部队官兵建立了共同的抗日感情。

“七七事变”后，这个团在保卫天津东



局子机场的战斗中，抗击日韩常英勇。后来，他经常带领同学到该团对官兵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暑假期间，克昌还带领于奇、孙洞、任学敏等几位“民先”队员，在学校附近的柳滩兴办农村夜校，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直至天津沦陷后才撤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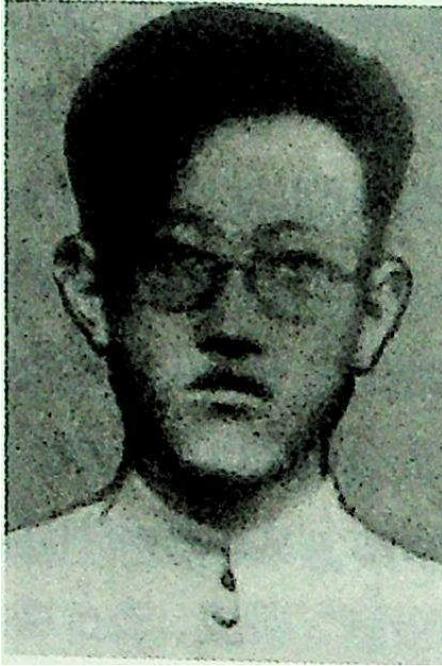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克昌作为流亡学生同学会代表，率部分同学赴南京、上海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克昌受党组织派遣，转赴延安，先入安吴堡战地青训班受训，后上陕北公学，进入前期学习。克昌在陕公学习期间，多次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坚定了他的抗日意志。其渴求真理和钻研马列主义的精神，深为学校领导所敬佩。故在结业后，他再三请求到前线参加抗战，仍被留校任教。由于他在教学工作中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适应抗战需要”的教学原则，严格施教，不久被提为训练科科长，并兼任大队长。

1938年，日军相继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领土，抗战进入战略防御阶段，能组织和带领民众抗日的干部严重缺乏。冬天，身在陕北的克昌，一直没有回米脂看望家中亲人，毅然奉命率70多名陕公学员赶赴华北，被派往冀南，先任冀南军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军区武装部建立时调任动员科科长，1940年调任组织科科长（团级）。五分区混乱时期，组织派他前往，参与整顿，很快五分区的工作就有了新进展。高王路大破袭时，他不分昼夜，极少休息，坚持参与战斗策划和工作布置。在冀南期间，他经常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去基层开展民兵武装工作，组织民兵，训练民兵，带领民兵与日寇作战。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冀南地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确保华北的占领，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对我解放区进行大规模连续扫荡，抗战进入艰难困苦阶段，

战争形势十分险恶。为了更好开展群众武装工作，早日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进攻，1943年3月，克昌奉命任冀南军区武装部组织的冀中参观团团长，率团赴冀中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交流冀中民兵的敌后作战经验。为避日寇扫荡，参观团遂提前南返。到达饶阳县境内时，适值5月11日的日寇大扫荡，不幸于野地被日寇包围，克昌在突围冲杀时中弹牺牲，时年30岁。一同牺牲的还有他的通讯员郭小福同志。

克昌牺牲后，被当地群众就地安葬在饶阳县境内四区的王桥村西边。烈士事迹被收入《“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市委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10月编辑出版）、《冀南烈士传》（冀南抗战史料编纂委员会1986年编印）和《河北省名人辞典》，以及《榆林人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绥德革命烈士陵园碑刻其名，《米脂县志》为其立传。



## 慕生桂

慕生桂，名玉仁，化名范尚贞。1911年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慕家源村一个富农家庭。

慕生桂7岁在本村上学，19%年考入吴堡县城局小。在局小就学期间，本县旅榆、绥学生于寒暑假常来吴堡散发传单，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县城高小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师生经常秘密宣传马列主义，都对他影响很深。其父慕汝康方欠局利贷、雇长工，成为附近有名的富户。慕生桂很厌恶父亲的剥削行径。

1928年高小毕业后，17岁的慕生桂就在本村办起了平民学校，自己担任教师，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但是农村的封建势力十分顽固，使学校无法生存，不得不解散。

1930年春，慕生桂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在校热心宣传民主思想，被学校地下党组织接收为中共党员。2月四师被封闭后，慕生桂和同乡学生贾仰青转入榆林六中继续上学。

在榆中念书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书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等革命书籍。

1932年，井岳秀在榆中搜捕共产党员，慕生桂身份暴露，没有毕业，就被迫离校回乡，在郝家山教书，暗里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秘密发展了慕纯农（原名慕汝恩）、慕汝正、慕步德、慕步恩四人人党，建立了慕家塬党团支部。秋季建立了慕家塘农会。

1933年，他和王国昌、慕生忠、慕纯农组建了吴堡县中区、南区中心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

1934年4月，中共吴堡县委成立，慕生桂任宣传部长。当时正是敌人第一次围剿陕北苏区之际，为了转移敌人视线，他和王国昌以去山西太原念书为名，向家里要了200元大洋。走后，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假称他已经考入国立太原大学，敌人信以为真，再不来搜查了。实际上，他们在山西汾阳买了一架油印机和各种红绿纸张，偷偷潜回吴堡，隐蔽在庙岔上、钻天咀等村，印发传单，指导革命。7月，吴堡县委改组，慕生桂任秘书长。由于原县委书记樊士乐不识字，领导不力，陕北特委指定慕生桂接任县委书记。他和县委的同志一道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开辟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下旬，吴堡县委组建了红五支队，不久扩建为红五团。粉碎国民党井岳秀部对吴堡的围剿后，生桂任绥、吴、佳、米东中心县委书记。7月调任清涧中心县委书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西北局办事处调慕生桂为三边特委副书记。1935年11月下旬，慕生桂到瓦窑堡向中央西北局汇报工作后，偕同派往三边特委的军事处长刘景范、秘书李育英去青阳岔。行至靖边焦家湾村时，得知靖边七支队叛变，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以被害。于是，他们几人便暂住

赤安二区李家嘴则村，结果遭七支队叛徒金林、宗文耀夜袭，慕生桂跳崖殉职，年仅 24 岁。



## 王聚德

王聚德（1909—1941），字逸仙，又名撰忠。陕西省清涧县解家沟乡王家山村（今东王家山）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忠厚勤劳，虽埋头耕作，仍不能养活全家。聚德聪明好学，1923年入袁家沟小学上学，1927年考入清涧县第二高级小学。在学校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1927年春，王聚德由高小教师景仰山介绍加入共青团，三个月后转党。

1930年春，王聚德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因家境贫寒而失学，回家务农。这时，正遭灾荒年景，他领导当地群众进行了抗粮抗捐斗争。反动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口头答应减免粮税，可是过了几个月，政府公然逮捕了贺生荣等群众代表。直到花了1400元大洋，才将贺生荣释放出狱。为此，王聚德向上级党组织建议武装群众，再次进行暴动。但上级党组织不但没采纳他的意见，反

而将其训斥了一顿。他一气之下回家务农。

1932年受特委派遣，王聚德到山西冯玉祥部做兵运工作。他被派驻柳林镇任招待所主任，秘密与晋西党组织发生关系，接组织领导。

1933年春和刘善忠率领一支30余人的队伍，过了黄河打清涧东区花岩寺韩起圣民团，结果因与当地党组织没接上关系，未能取胜。入夏，回到清涧的王聚德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白如冰接上头，组织上派他到土匪中活动枪支。不几日，他从冯玉祥部哗变过来的进步青年罗永宽、王根兴手中获得三支驳壳枪。罗永宽本人由王聚德、王有贤（王家山党支部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以这三支短枪为基础，在绥、清筹建红二支队。8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王家山成立了。罗永宽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王聚德任副队长兼经济员。10月，高朗亭、罗永宽调往神府组建红三支队，陕北特委任命聚德为红二支队队长，崔正冉为政委。

1933年腊月初七晚，王聚德、白如冰、白雪山、张承忠一起部署，指挥红一支队、红二支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解家沟镇，当场杀了九个半（其中有一个砍数刀未死）催款的豪绅衙役。红二支队这次公开的武装斗争，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成了清涧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的转折点。

1934年春，党派王聚德去南梁和红二十六军接洽，沟通了红二十六与陕北游击队的联系。不久，两支兄弟部队在南梁会合之后，聚德被派往安塞县开展地方工作和发动游击战争。年底，安塞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王聚德任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县委书记。

1935年9月，王聚德在错误肃反中被诬为“右派”、“反革命分子”，解

送到瓦窑堡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审处。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王聚德与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同时释放出狱。接着入中央党校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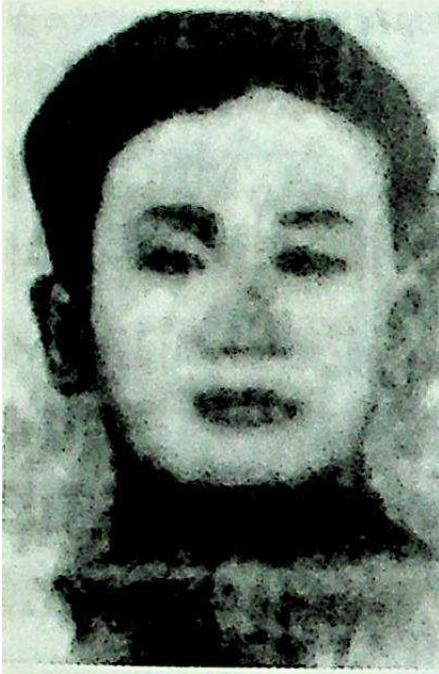
1936年2月，王聚德跟随红军东征，在途中因病返回。5月又随红军西征到三边工作。曾任定边县委书记、三边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三边分区党委宣传部长等职。

1939年7月，王聚德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办公室工作。

1940年4月，王聚德受中央社会部的派遣，随同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进入大青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担任绥蒙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他在大青山地区工作时，直接受中央社会部的领导，重大问题都直接向中央社会部请示和联系。为了完成好中央社会部交给的艰巨任务，王聚德常常带着工作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战斗。有时爬到直插云霄的山巅，有时隐蔽在枝叶茂密的林中。在工作中克服严寒酷暑、衣物短缺、粮食断绝等种种困难。王聚德虽为领导干部，但他总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和同志们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绥蒙区党委和游击队司令部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照顾他的身体，常给他派去警卫员和勤务员，王聚德从来没把他们留在身边。他常说“我也是一名普通战士，不能有任何特殊。”

1941年12月28日，王聚德和高风英（蒙古游击队长）等人在万家沟小火烧的窑洞里相聚。谁知由于叛徒胡定良的告密，当天夜间，敌人从万家沟爬上山来，把他们包围了。直到第二天拂晓敌人才开始偷袭。王聚德发现被包围以后，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和珍贵电台。战斗打响后，王聚德迅速把文件烧毁，接着就地掘坑埋好电台。一切处理完毕，他拿起武器，投入激烈的战斗。

敌人人多，又居高临下，集中全部火力，把王聚德所在的窑洞口死死封住。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王聚德和 12 名抗日志士壮烈牺牲。



## 薛翰臣

薛翰臣(1913—1935)，化名老乔，陕西省吴堡县前薛家抓村人。少年就读于宋家川高小。1930年春，以优异成绩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由于四师于年底被国民党封闭，1931年，他转入榆林中学上学，在榆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1933年毕业回到家乡，1934年5月端午节接替了慕生桂在郝家山村小学教学之职，暗里做共产党地下工作。7月，党组织派他到县城与地下党联系，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他有胆有识，深入虎穴，积极工作。12月28日，被国民党军警抓捕，经县城地下党营救出狱，调入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任经济员。

1935年葭、吴红军游击支队组成红五团，薛翰臣任政治部主任。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转战到清涧，又编入陕北红军二十七军，薛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他经常深入班排，

与战士谈心。9月，薛翰臣所在营编到十五军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他任二四一团三营政委。同年10月1日，红军与奉军在甘泉县劳山激战时，翰臣奋勇指挥战斗，带头冲锋陷阵，光荣牺牲，时年22岁。



## 杜修杰

杜修杰(1917—1938)，字维垣，又名苗逢春，陕西省米脂县周家圪崂村(今属于洲县)人。

修杰性温和，拙言词，聪敏好学，业著前茅。1933年7月由薛子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入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求学，后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7月，随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军中谨言慎行，多谋善虑，颇受敬重。

1938年在绥远省兴县(今山西省兴县)任组织部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次下乡途中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 马 洛

马洛（1919—1954），原名马履元，曾用名马牧之。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村人。

1936年前就读于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1937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伍，后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前线，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先后任工作人员、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团副政委等职。在反“扫荡”及破袭战中，身先士卒，破坏日寇的铁路交通运输线，曾多次负伤。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奉命潜入天津，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51年任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副主任。

1954年2月奉命赴朝鲜协助志愿军修建烈士纪念塔工作。同年6月23日回国述职时坠入鸭绿江牺牲，享年35岁。遗体葬于石家庄革命烈士陵园。

## 强 雄

强雄原名强登第，陕西省米脂县龙镇人。1919年6月6日生，是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二八级学生，1938年2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强雄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到学校部队列科任干事，后分配到八路军警备五团政治处宣传股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1944年调到警三旅七团三营七连任连政治指导员。同年7月12日，在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大窟联战斗中英勇牺牲。

## 白力锋

白力锋，又名白万年，1911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城南关白家沟。



白力锋于城关小学毕业后，1935年秋考入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编入二八级乙班。他直爽开朗，乐于助人，为同学所赞扬。

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的消息传入绥德师范后，师生普遍开始关注国家大事，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绥师已经可以读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马列主义和进步的书籍、我党的书报。白力锋和进步同学们积极参加“学生战地务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组织读书会，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38年4月，白力锋同志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编入绥师支部的二八级党小组，久担任党的小组长。

1938年，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绥德专署和国民党绥德地区党部破坏绥师的革命力量、撤换原校长刘春园的斗争中，以及抵制国民党绥德警察专署所组织的绥师学生暑期军训斗争中，力锋被同学选为保护绥师的护校队队长。经过斗争，教育了广

大青年学生，大家更加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

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派保安队武装进入绥师，企图逮捕进步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员。当时学校已经放假，中共绥德特委和青委为了保护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学生和进步青年，组织安排他们转入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边区中学学习，只留少数党员在校继续斗争。白力锋被派往延安抗大学习。

1938年8月，白力锋等进步青年投奔民主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习。他学习积极，工作热情，被评为抗大一大队三分队的模范学员，并由队部决定作为党员模范标兵。

1939年7月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去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坚持敌后抗战六年。在整整六年的抗战中，他忘我地英勇战斗在前线，没有给家中的亲人和挚友捎转过一个字的信息。

1946年，白力锋随部队转战到热河省，在我东北民主联军一三五师四零四团政治处任副主任。1946年冬季在凌源县山嘴子组织全营战士掩护主力突围的激烈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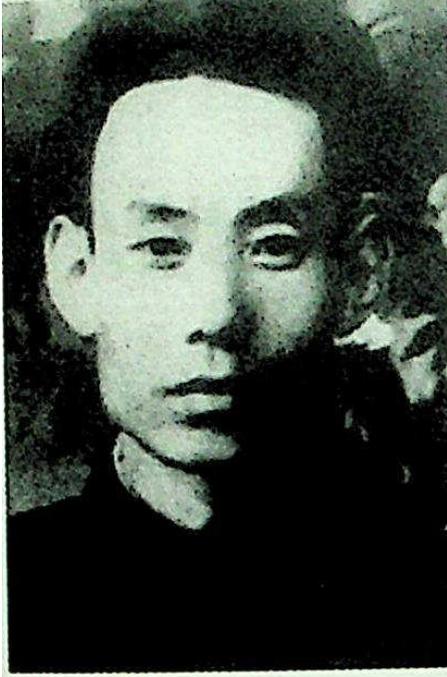


## 赵先锋

赵先锋原名赵定国，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冯家屯乡后桥村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二九级学生。1938年5月在绥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十二队学习。

1939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任作战参谋。1943年调八路军警备九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1945年7月在靖边县一场战斗中负重伤。

1946年随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同志去东北解放区，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 王立功

王立功（1923—1960），陕西省绥德县城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三级学生，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绥德南关小学、保育小学、米脂中学、绥德工农速成中学负责人和中共绥德县委副书记、榆林专署文教局长，在教育战线上作出了显著贡献。1960年8月5日因患脑溢血，经省、地领导调医运药抢救无效而逝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 英烈遗文、遗墨

# 陕西师范学校应革新的几点

李子洲

新思潮的波已涌进潼关了，新学制的实行已开始运动了。陕西的学校有改革的必要，是不待说的，至咸林与渭北两校，这一年来，大事革新，省城各校虽尚无具体改革的表现，但撤换校长例，辞退旧人咧，添聘新人咧，未尝不是一种根本改革的动机。当这既有改革的必要，又有改革的动机的时候，我把我的改革意见的一部分——师范学校——写出来，或者可以供当事者参考，帮他们的筹划思维的忙。所以不顾简陋，把我所见到的拉杂写成此篇，不免挂一漏万，尚希读者原谅！

## （一）应采新学制

新学制的中等教育段，规定六年，前三年为普通科，后三年为专修科。这新制的适用完备，全国教育界的大多数已表示认可；更经了中外教育专家的研究与批评，以为比旧制完善，可以实行。再以现在的形势观察，各通都大城的有名中学如天津南开、北京高师附中等皆已实行此制，各专门大学也都筹备改招新制学生的办法，恐怕不出三四个年头，全国的中等学校就统统非行新制不可了。我们陕西的中等学校，为经费所困，实行期不能不落人后；但待各地中等学校全改为三三制，各地的专门大学全非六年毕业生不收，那时为势所迫，无论如何艰难，也得适应潮流，改行六年的新制。不过人类都有一种惰性，喜欢安故，厌恶改新，当这经费拮据的时

候，正给他们以安故的理由，要他们于这持之有故的时候，改四年为六年，不是容易的事。唯师范学校旧制即是五年，转新制只少一年，改为新制，经费并不受影响。兼之师范生皆应具有中学的普通知识，所以欧洲的师范学校，都非中学毕业生不收；师范生应学的师范功课，又绝对不是一年所能授完备的。中国的旧学制是采诸日本，师范比中学只多一年工夫。若是注重师范专科，则普通功课就学不完备；若是注重普通功课，则师范的专识又难免缺乏。结果弄得不是普通知识不够，就是教育专识不足，或者两方面都不完备。这种制度，早就不满意于教育家。现在的三三制，于三年普通科毕业后，专门学三年师范功课，普通专识，双方都可完备。所以新制于其余中等学校，尚可缓行，而在师范学校有不能不行，而且不能缓行的必要。在我们陕西，唯师范改行新制，不生经费问题，有尽先改行、单独改行的可能。所以我主张各师范于下学年起，一律采用新制，定为六年毕业。

## **(二) 减少每日授课钟点**

现在中等学校最大的弊病，都是授课钟点过多。师范学校因时间短促，功课繁多，尤其多犯这个毛病。以我所知道的说，每星期授课钟点有多至四十几点钟的，每日普通要上七八点钟的课。要知一个人的精神是有限的；每天二十四点钟，休息八点，吃饭游戏应该也得八点，作业八点，才算适当。我们退一步说，把游息时间减少，作业时间加长，但总不能过十点。若是过了这个限度，精神休缓不过，身体就要受亏，脑力也感疲倦。每天十点的作业工夫，就有七八点要上讲堂，只剩两三点，为自修时间。统计起来，每上一点的功课，在堂下只能作二三十分钟的预备与练习。而功课

之中如英文与算学，每授课一点，非做加倍工夫的预备与练习，不会学好的。而英文算学两门功课，每天总有两点，结果弄得学生拿出全副精神来预备这两门功课，也要感到时间不够的苦痛。其他一切，只有在堂上应酬一应酬，到考试时想办法对付一对付，平时则束之高阁，考后就把他置之脑后了。一门功课授完之后，真正能明白这门功课的内容、关系，得到这门功课的实益，能应用这门功课的能有几人呢？教比不教，学比不学固然强一点，但是学而不能得其实益，与不学能差几许呢？至于教员，也都知道学生的工夫不够，不能多作预备，所以也只有采用敷衍主义，讲演式的教授，照着课本讲讲；不能采用自动的教授，于课本以外指示参考书，使学生自己去研究，于授课以前指示范围，教学生先作预备；授课以后，提出问题，使学生多加练习。所以授课钟点过多，学生教员都不免敷衍了事。若是不用功的学生，则学如不学，糊里糊涂过上几年，仍是依然故我；遇上用功的学生，则因自修时间过少，不免把睡觉游戏的时间拼命减少，以预备功课。久之精神疲倦，身体虚弱，不是脑海生病，日夜昏眩，发生失眠脑炎的病症；就是肌黄肉瘦，咳喘时作，发生肺弱胃虚的病症。这样看来授课钟点，绝对不能过多。我以为每星期以二十四至三十点钟为适当。每天授课四点或五点，就给他定四点或五点的自习时间。这几点钟一定要在自习室里练习本日所授的功课，或预备明日所授的功课。至于各种功课自修时间的分配，外国文与数学每授一点钟，须自修一点半或两点，其余功课或半点一点皆可。在自修时间内，教职员须常常临视，一方面是监督学生自习，一方面是预备学生发生疑问时，就便答复。所余一点或两点钟的工夫，作为自由读书看杂志的时间。吃饭分配时间三点钟，游戏运动分配时间三点钟，睡觉八点钟。这样分配，学生的精神自无不振，身体也无

不强，脑力充足，对于功课分外清晰，学程自然进步的格外快，而且学一门功课能得一门的实位，而再学一门与这有关系的功一课，就能得事半功倍的利益了。

### (三) 应授的功课与选课的规定

新学制虽已有了实行的趋向，但总算在试验期中，所以对于六年中应授的功课，尚未规定。我们要将师范马上改为六年制，那末，这六年中到底应授些什么功课，每种功课的成分应有几多？不能不先讨论一下，定一个暂时的标准。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功课定得过多，则又失之于贪多嚼不烂；定得过少，则又失之于挂一漏万。个人的见解不同，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应用科学，不免有偏轻偏重的成见，而定下的标准也就难免有偏轻偏重的毛病。现在就我个人的意见，定出一个标准来，希望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职业教育与对于教育素有经验的人，各抒所见，严加批评，然后再集合各方面的见解，斟酌去取，则就敢说“虽不中不远矣”了。以每周授一小时，授满一学年为一单位，前三年应授的功课及其成分表列于下：

学科	单位	学科	单位	学科	单位
本国文	一八	外国文	二〇	数学	一四
本国史	三	世界史	三	动植物学	四
本国地理	三	世界地理	二	物理与化学	四
地质大意	二	生理卫生	一	图画音乐	四
手工	二	体操	三		

本国文应以语体文为主，文言文亦可选授若干单位，但作文则应完全用语体。选读作文以外应酌加演说、语法、作文法等课。外国文应以养成看书能力为最要目的，故应该注重识字与文法。数学应教算术、初等代数、

二角法、平面几何。矿物应归入地质大意中教授，不必另列一门功课。

前三年因学生年纪尚轻，知识有限，无有选择功课的能力，故所有功课应定为必修科。

后三年的功课，应分为必修科目与选修两部分。仍以每周授课一点满一年为一单位计算。

(甲) 必修科

学科	单位	学科	单位	学科	单位
心理学	三	哲学概论	二	逻辑	二
社会学	二	生物进化学说	二	教育学	三
教育史	三	教授法	二	儿童心理	二
学校管理	一	外国文	一二	本国文	八
试教	三	参观	三	教育心理	一

(乙) 选修科

组别	学科	单位	学科	单位	学科	单位
一	世界近世史	三	本国近世史	三	史学研究法	一
	地理研究法	一	史地教授法	一	高级地理	六
二	本国文学史	二	文字学	三	文法	一
	诗文戏曲选	三	外国文修辞学	二		
	外国文选读	三	本国文教授法	二		
			外国文教授法	一		
三	科学教授法	一	立体几何	三	高等代数	三
	解析几何	二	初等微积分学	一	高级物理	四
	高级化学	四				
四	教育行政	一	教育统计	一	学校视察法	一
	乡村教育与	二	簿记学	一	经济原理	二
	复式教学法	二	音乐及教法	三	手工及教授法	二
	智力测验	一	体操及教法	三		
	图画及教法	三				

以上(一)(二)(三)三组中的功课，令学生须选习一组。第四组的功课可随意选习。学生如已选习一组，则其他各组的功课，皆可任意选习

一种或数种，惟本组的功课，与必修科相等，须尽数学习。

这三年中的本国文以养成读书能力为目的，故注重文言文，古子古史皆可选读。但作文练习，仍须注重白话文。

教授法以经验为贵，应于第三年的上半年每星期试教四点钟，下半年则每星期出校参观一次。试教之后，再行参观，则试教时所感的困难与所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再者自己亲身阅历过一次，然后参观，对于他人的教法，就可以有相当的批评。

#### **(四) 设立图书馆**

授课时间减少，原为要学生自动地研究功课；但是参考书籍，绝不能责学生自备，应由学校给他们预备周全。就是教员要采用自动式的教授，也非多看参考书籍不可。若学校能筹备一图书馆，对于教员用的书籍，择要各购一部，对于学生课内用的书籍，各备数部，则教员每授课一点，可以把参考的范围指出，让学生自去看书。好在一个中学的图书馆，筹备并不需多大款子。有五六百元钱，就可以把急用的书籍购齐；然后年年设法加增，不过几年就可以成一很完备的图书馆了。

#### **(五) 筹备实验室**

自然科学，皆贵实验，空谈理论，是无用的。不惟要教员教一样试验一样，而学生也应每学一样，就自己亲身作这一样的实验。这样的实验过去，不惟使学生对于所学的功课分外明白，更可以养成学生一种实验的态度。我们中国人性情是喜欢玄想，不重实验。哪里知道经过实验证明的理想才是真正适用的理想。实验可以帮助理想之不足，并且可以启发理想的

路径。所以养成学生实验态度是学校一个重大责任。师范是造就师资的地方，若师范学生不能有实验的态度，则由他们所教的小学生自然缺实验的精神。那末这实验室的设备，在师范比其他学校更为重要。以所规定的功课看来，物理、化学、心理、生物、生理等皆有设置实验室的必要。不过目前的陕西各师范经费不足，无力设置这许多实验室，是无可讳言的。但这可不能用“不完全勿宁无”的主义，就一概不管，老等有一天羽毛丰满，一翅冲天。应当采集腋成裘的办法，今年筹备一个，明年再筹备一个，今年购置几样，明年再添购几样。无论经费如何困难，对于实验室的筹备万不可因噎废食，致有停顿，总要设法抽挪点款子，使他年年增进。若拿出这等精神，则六年期满，我敢保各门实验室就都可观了。

陕西师范应加革新的去处，一定不止四五倍于我提出的，但是我离开省城有八九年了，我对于他的病症未加诊察，不敢冒开药方，至于上边所谈的多是现在的普通流行病，我想陕西的师范也免不了，所以我敢大胆的按书本上的成方针他几针。果真把针下到病脉上了么？我自己也不敢说有把握。

十一，四，二十，于北京。

（原载《共进》第十四号第一版，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 释教育的意义

李子洲

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解答。所以古今以来为教育下定义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却没有许多人能提出兼容并包、完备无缺的界说。这样说来那么人不知道教育的意义，也不足为怪了！是又不然。教育意义的易知难知是一个问题，所谓教育家——身任教育事业的人——应知教育的意义与否，又是一个问题。办教育的人能把教育办得有效与否，不入歧途与否，全视乎他对教育的意义见解而定。没有美满的见解，就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我们陕西现在的教育界人物——上至教育长官，下至初小教员，日每间纷纷扰扰，苦心积虑地办教育，而教育终无起色，原因固然甚多，“不知教育为什么？”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我不敢说他们都不知道，但是除过极少数受过新洗礼的人，敢说他们对于教育二字没有正当的见解。一班嗜孔臭害复古迷的人，以教育为读古人书，希圣希贤，所以他们专以教人做孔二的信徒为务。见解谬鄙，真是不值一谈。即一班稍具新知识的人，仍不是以教育就是读书，就是以教育是教人学习各种科学，没有几个人能知教育的真正意义。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来研究研究，或许与我们陕西教育前途不无小补。

教育有广义狭义的区别。人多以学校教育为教育，其实学校教育是狭义的教育。从广义一方面说，人自初生以至老死，凡家庭、社会都可算是教育场所，从那里能得许许多多的常识、常能；父母兄弟以及一切相接触

的人都是良好的教师、学习的榜样。不有这种广义的教育作根基与引导，则学校的狭义教育大有无从入手的趋向，自然不能有完满美好的效果。况且由广义的教育中所抽出来的原则用到狭义的教育里边，多半是最妥善圆满的标准，所以要知道教育的意义，也应当从广义方面研究起。

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独立的事体，是一个复杂的、与多方面有关系的抽象名词。所以要明白它的意义，须从各方面合笼起来研究，才不至于有空泛弊病，一偏谬见。若是仅由一方面去观察推究，笼统地给他下一个三言两语的定义，如培养、预备、陶冶、变迁等说，绝不能作完满无缺不偏一端的解释。

教育的对象为人，所以我们就用人作一线索，依次说明他的意义。人是有生死，生死相递的。人生最大的限度，在世不过百年。方其初生，除先天的几种本能——食、哭、动等而外，别无什么知识与技能。必须其父与母掬之抱之，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经过若干年后，才能成为成人，独立生活。教育就像是一只渡船，把人从无知无能的婴孩渡到有知有能的成人方面，若是人没有这只渡船，则就陷于黑暗的绝地，永无生活的希望。若使这只渡船只能向衣食物质方面渡，而不能供他知识精神的需要，则人仍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白痴，生与死无大分别。方其死也，则呼吸既停，运动亦失，不久而肌腐骨化，无影无形。若使他不把所有的新知旧识，常能奇技，一传给后人，则后来的人对于生活所需的能力，须一一自寻经验，这种不娜的办法，

还是蠢如猪豕，为不开化的野人呢！由此看来，人类能生活，能得知识技能，全凭捕育。教育就是生活，也就是人类的经验相传；但人的经验不是固定不增加的。若是一成不变，无可增加，无进化可言。人类得了前

人所传下来的经验，再加上自己新的经验，传于下代，一代一代的相传，一代一代的增加，所以才有进化。就是儿童吸收经验，也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逐渐增加进去的，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经验都接收了去的。所以教育不仅是传递经验，并且是增加经验。这种增加，不是一样一样地填进去，积累起来，前后没有相互关系的。是用已有的经验作根基，加上新来的经验，或事物所发生的条件，重新组织过以成一种新的经验。是同化过、融会过的活经验，不是积累起来、漠不相关的死经验。

儿童能受教育，由他有一种固有力量。这种力量是儿童内部出来的，自动地发生出来的。就好像一粒种子，原有一种发展的力，所以加以灌溉，就能发芽生长。儿童惟其有学的力量，所以施以教育，才能发展知识。教育就是儿童固有力量，发展开导，不是由外边灌输进去的。是自动的，不是被动的。但是种子的发展，还有一个预定的范形与限度。例如豆子长成是豆子的形状，绝不能变为玉蜀黍；玉蜀黍只能长八九尺高，绝不能长得如松柏一样，高十余丈。人虽有个性的不同，而其发展是无止境的，成就不能有预定的模范与目的，以为发展至什么地步，就算满足了；成就什么样子，就算完成了。所以教育的发展知识，是继续不断的，而经验的增长也是一直往前的。

前面已经说过，教育即是生活，换言之教育即是发展经验，改造经验，以图完满的生活。人的生活处处离不了环境的影响，能适应环境才能有完满生活。人的经验改造增加，就是为适应环境。这似乎说到教育目的上去了，但是不明白他的目的，也不能明白他的意义。至效果方面，则教育能养成人一种良好的习惯，使人能以最经济的时间作最准确的动作，以主宰他的经验，支配他的知识。

总括起来说教育即是本人固有的能力从事发展，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使经验无止境的往前生长；更使人能以经济的时间，准确的效率，增长他主宰经验的能力，以适应环境，作完满生活。

我的解释多半是以杜威的学说为本。我以为杜威的教育定义是从各方面研究的结晶，是由广义中抽出来的准则，比较完满，可以包括一切的教育意义。而且是从目前讲起，以教育为教育，不是悬一个将来的远大目的，以教育为预备。是以儿童的本能作基本，由内开发，不是强由外面灌输。这样讲法，可以使教育的兴味加增，不至使人视为枯燥可苦的事情。以教育为生长经验，是进化的良侣，不至落守旧的弊端。虽主张发展个性，但不是任意的发展，含有指导的意思，使人的经验由不正的路途，导人正当的道儿上，改造成良好的经验。

我的解释有不完全的地方，是我自己知道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研究解释教育的意义，至少总可以纠正那些以教育为读书的谬见，所以我大胆地发表出来。若有人肯加指正，更所欢迎。

十一，五，二十一，于北京。

(原载《共进》第十五号第一版，民国十一年六月十日出版)

# 陕西的选举应亟谋根本澄清

李子洲

我们中国现行的选举制本是由西洋钞（抄）袭来的。这种制度在先进的民国中早已弊窦百出，到了我们中国更是每况愈下，糟不堪言了。行这种代议制的民主国，只有美国的选举办得最完密精确，但是因为这种制度根本上有缺陷可乘，所以也免不了恶劣政党的利用。至于我们中国，则捏报选民，包办投票，运动惟恃金钱与人情，当选全凭势力和活动，政见人才等条件是无所用。尤可怪者，选民的数目有时超出人口数成以至数倍不等，选民的名册纯是闭着门空造出来的鬼名，没有一个是真名实姓。这种选举如何能选出足以代表民意的好人！无怪乎那班议员先生们寡廉鲜耻，卖身叩头。我对于这种代议制度根本就有些怀疑，对于我们中国的选举更是不敢少表赞同；我虽然不赞成这种制度，而在这种制度未改革之前，我以为也应该力谋整顿，使就轨道。各省的情形不同，整顿的方法当然也不能一致，我是陕西人，仅就陕西的情形来说罢。

陕西历次的选举，可以说没有一次是合法的。这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语，实有事实可证。不必多求，即以选民一项说，无论那一县的选民有一次是确实调查来的真名确数？其余种种不法行为，更是数不胜数。这一次改选省议员，因为刘镇华任意增减选民数目的缘故，引起了十三个县的罢选风潮。他们一再宣言，认为这次选举是违法，要想推翻另选。就他们历次的宣言看来，他们只知道这一次是违法，不知道历来几次就都不合法；只是

要推翻这次选举，并不谋根本的澄清以后的选举。他们的动因是由于他们几县的选民减少：他们的目的是为给他们几县多争几个卖票捞钱的无耻议员，见解有些过于狭窄；但是他们的运动可以给我们一种大教训，就是陕西的选举，应亟谋根本的澄清，否则这种争端一开，此唱彼和，你仿我效，愈闹愈糟，将来闹得糟不堪言那一天，就无法收拾了。

澄清的方法，在目前应做的犹不过是些初步的。这种初步的澄清法，就是为使以后的选举渐上正轨。上了轨道以后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改革，以图达到精密完善的地步，就比较容易得多了，我个人的意思，我们陕西的选举，目前所亟应注意的有四点。

（一）选举筹备处的委员，应按区公推。十县以上的选区公推二人，十县以下的选区公推一人，共同组织一委员会，筹备一切。这种委员绝对不能听省长一人去委派，因为省长委派，不能使各区的分子加入，那些委员就不免为自己那一区的利益，上下其手，违法作弊。

（二）由筹备委员，先用可靠的标准——人口、负担、学校、高等小学以上的毕业生及中学以上的肄业生——作客观存在的研究，规定一种较为可靠的选民标准。这种定标准的方法，我以为应将人口作四分负担，学校、学生各作二分计，例如陕西的人口，前一次的调查是八百四十万，虽不是确数，但比较的还差不远，就以八百四十万的那一次调查作根据，则以八十四个议员配分，每十万人口应作一个单位。十万人人口中有半数女子，而半数男子中又有儿童及犯罪等根本无选民资格者若干，所以十万人人口中，充其量选民也不能过三万。这三万之数再以四分为标准，三四是一万二千，这就是说每十万人人口，在人口一项的标准下应有一万二千选民。负担、学校、学生三项用同样的统计法，各求得一个单位数目，则每一单位数目，

亦以二分之三万为标准，各单位的标准应代表选民六千。假设负担以五万元为单位，学校以一百二十所为单位。学生一高小以上毕业生与中学以上肄业生合计——以四百人为单位，作一实例如下：

甲县

(1) 人口 150000 则  $\frac{150000}{100000} \times 12000 = 18000$

(2) 负担 60000 则  $\frac{60000}{50000} \times 6000 = 7200$

(3) 学校 100 则  $\frac{100}{120} \times 6000 = 5000$

(4) 学生 600 则  $\frac{600}{400} \times 6000 = 9000$

故选民的标准数为 39200

乙县

(1) 人口 180000 则  $\frac{180000}{100000} \times 12000 = 21600$

(2) 负担 50000 则  $\frac{50000}{50000} \times 6000 = 6000$

(3) 学校 60 则  $\frac{60}{120} \times 6000 = 3000$

(4) 学生 300 则  $\frac{300}{400} \times 6000 = 4500$

故选民的标准数为 35100

这种标准数目，是一种最大的数目，在目下教育不甚发达、人民程度未提高的时候，各县的选民绝对不能超过这种标准数。

(三) 确实调查。在这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人民的政治责任心与道德心都是薄弱的。原为防这两种的弊病，所以要有第二层的办法，先规定一可靠的标准。标准规定后，仍不能不实地调查。但是调查的责任也应由委员分任，不能委诸地方。若是委诸地方办理，仍免不了荒（谎）报捏造的

弊端。分任调查的法子，凡某区的委员不能任某区的调查，并不许其两区或三区交互择任。最好是用组织法分配，使得全数都有关系，不能因私作弊。

（四）分配议员。调查终了，即以标准数为根据，详加审查，多者该减，而过少者亦应复查。审查终了，然后依选民确数分配议员。

以上四步功夫若做到，至少可以免三种积弊（一）荒（慌）报数目，（二）捏造名册，（三）无意味的议员多寡争执，然后派专员监督初复选投票，凡是一个选民，都得亲自投票，则包办的弊端亦可免除许多。恶神土棍即不能从中作祟。则当选的人或许可以代表大多数的民意。做到这个地步，固然离清明还很远，也可以说是渐入轨道了。陕西的父老兄弟们呵！我们每年为这八十四个议员多加二三十万负担，是要他们为我们谋幸福，而今十二年了，他们除吸P允我们的脂膏外，那（哪）里理过我们的痛苦呢？这实在不能怨别人，怨我们莫把选举看重要，任他们从中捣鬼，借我们的刀来剥削我们，我们要急（及）早觉悟，同心合力地来澄清选举。举些可以代表我们的人去做议员；再不要马马虎虎，如醉如梦地任那些土棍恶绅卖弄我们了。我更希望这次抗选的各县同胞，速快将你们不彻底的谬见抛弃了，再勿作狭小的人数多寡之争。你们应放大眼光，认清题目，改倡根本的澄清。要知道你们那种狭窄的题目，绝对引不起全体陕人的同情，或许还要引起一些持部落主义者的反感。不幸而也有一部分只知给他们争几个捞钱议员的县分出而反对，你们的运动就非失败不可。

十二，二，二十一日

（原载《共进》第三十二号，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 施、林及“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sup>①</sup>

李子洲

阶级战争开始了，  
我们平民阶级的先锋已被敌人戕害了！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鼓舞起奋斗的精神，  
拿定了牺牲的决心，  
手枪，炸弹，  
前仆，后继，  
争我们最后的胜利！  
那才对得起为我们牺牲的诸烈士。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要知道“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革命的平民”；  
“为革命而死的人虽死犹荣”。  
勿愁不能成功；  
勿惧牺牲性命！  
手枪，炸弹，  
前进，冲锋，  
杀尽那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军阀！  
那才能使社会平等，

那才算得血性男儿。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懦弱者”的徽号不好听呵！

如若是甘心受人压迫，

永远为人所屈服，

能兑了“懦弱者”的讥诮吗？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诸烈士的担子移在我们的肩上了，

诸烈士的成功与失败全看我们的进退。

前进！

前进！！

一齐前进!!!

完成他们——诸烈士——的革命工作，

争我们的自由幸福。

前进！

前进！！

一齐前进!!!

(原载《共进》三十四号，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①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以暴力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造成空前未有的流血惨案，工人领袖林祥谦和总工会律师顾问施洋等四十余人惨遭杀害。2月22日，北京各界人民群众在北京师范大学为“二七”被害诸烈士开追悼大会，李子洲参加追悼会有感而作。

# 纪念“五一”

李子洲

“五一”是世界的劳动纪念日，专纪念八小时工作运动的胜利。这一个“五一”纪念，从她诞生的那一年——1886年算起，到今年——1923年，已有38年的历史了；但是她光临我们中国还不到五个年头。五年前的中国人，简直莫有几个知道“五一”纪念的，更说不到这个纪念日意义。民国八年的五月一日，《北京晨报》出了一个劳动纪念特号，一般的青年学生才渐知道“五一”是世界的劳动节。第二年的时候，居然有许多的出版物，在这“五一”的新纪念日特表庆祝，而“五一”纪念的意义逐印入知识阶级的脑海中了。但是那时的“五一”在我们中国并不是劳动阶级的纪念日，只不过是几个学者、少数的青年与几家革新的报纸文字纪念罢了。这三四年来，一部分的工人，已渐渐地明白自己的地位，组织工会，实行罢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这个“五一”纪念，渐渐由知识阶级纸面上的文字运动，变成了劳动阶级实际的群众运动。因此就引起了军阀的忌畏，横行干涉，暴力摧残，现在则全国的工会都被他们封完了，各地的工人都被他们监视起来了，自由都被剥削尽了，哪里还顾得纪念这劳工胜利的“五一”。但是纪念日都是碧血痛苦换来的，要使我们中国的“五一”增加些新的意义，还得于这惨淡森严、不自由的情况下，努力，奋斗，牺牲，流血，去争最后的胜利。

“五一”纪念在我们中国的情况如此，但是在陕西呢？其淡漠的情形，

正如五年前的中国，除过极少数很少数的几个新进的青年外，一般人恐怕还梦都没有梦见呢。我不敢说这就是我们陕西人的羞辱，但是能说他不是文化程度跟不上外边的一种表现吗？所以我们今年特于这“五一”时节，提前刊印一期，以表纪念，并将“五一”的历史渊源，从略叙述出来，以尽我们的天责。

1884年10月7日，国际的与国民的八大联合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议决从1886年起，每年5月1日举行要求八小时工作的示威运动。1885年冬天美国的劳工组合会及劳工同盟大会，为要使八小时工作实现，议决全国劳工于第二年的“五一”齐向雇主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为八小时，若要求不遂，即于“五一”起同盟罢工，决不再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他们运动得很激烈，5月1日以前就有许多工人已得到八小时的工作，到5月1日那天，美国全国的工人都停工游行，并唱着他们的歌：

从今以后，  
一个工人也不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教育！  
八小时休息！

他们不到一个月，得到八小时工作的有20多万工人，这样的胜利成功，遂成了美国劳工的“五一”纪念日。

但是美国的劳工阶级同时也作了很大的牺牲，这一幕悲剧就出在芝加哥城。这次的“五一”运动，芝加哥的劳工成功的固然很多，但是也有三四万人未曾达到目的。他们的要求既未得到，他们就继续着罢工。资本家运用金钱，收买没出息的工人，破坏罢工工人的同盟；更雇武装警察，

保护这些被收买的狗獠。双方遂起冲突，劳工平民无辜受伤很多，于是激怒了一般民众，开会追悼惨死的工友。不忆（意）官府与资本家，同议陷害，一方派警察一队，强迫解散，一施人暗暗地抛进一个炸弹，两方遂开枪互射，结果互有死伤。于是解散所有的工会，逮捕重要的人物 8 人。审判的结果，7 人判了死刑，后来 5 人处绝（决），2 人改为终身监禁。审判的手续既不合法，证据且多伪造，而又不充足，硬弄成一个不白的冤狱，这冤狱过了六年，才得昭雪，但是死者已死，只有使人空怀悲恨罢了。

美国既于“五一”运动得了很大的成功，欧洲的劳工界感想到联合一致的大示威，定能收更大的效果。于是于 1889 年在巴黎所开的万国社会党大会上议决举行“五一”纪念日，第二年的“五一”纪念日，全欧的工业都市，一齐起来举行示威游街的运动。这一年的第五次万国社会党大会，议决以后每年继续不断在 5 月 1 日举行纪念运动。“五一”遂成了欧美两大陆永久的“劳动纪念节”了。欧洲的“五一”纪念日，也同样的受过鲜血的洗礼，就是法国礼路和塞奴两个地方，于 1891 年的“五一”同时所演的惨剧，同样的因军警的虐杀，牺牲了很多的生命。

“五一”成为万国的劳动大节后，每年都有新胜利获得，而每年就有新意义加入，所以一年比一年发展，一年比一年热闹，直至 1914 年欧战起后，大规模的运动稍微停顿了几年，到了 1919 年欧战告终，各国的工人仍旧的联合起来，与的真敌人——资本家宣战，而“五一”纪念又恢复原状了。

我们看这“五一”纪念的经过，可以得到几个教训。第一是胜利是拿牺牲换来的，成功是从奋斗得来的，一时的失败不要紧，军阀的虐杀不足畏，只要有奋斗的精神，抱牺牲的决心，莫有达不到目的的。第二是八小

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是劳动解放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劳动者的第一个要求的目的。他们也是人类，应享人类知识生活的快乐，但是工作时间过长，终日劳碌，困苦万状，哪里还有工夫求知识。况且机械的单调生活，是一种苦恼的生活，毫无一点人生乐趣，基本上不成为人的生活。所以减少工作时间，好加教育时间，是一种人道的运动，不能说他与我们的社会情形还不大需要，就可以不注意呀！

十二，四，二十七日

（原载《共进》杂志第三十七期，民国十二年五一出版）

# 绥德县教育局问题

——常士杰<sup>①</sup>露布

## 引言

杰自承之绥德县教育局局长，到今天才五十余天。这五十余天来，县高小免职校长刘嗣祖会同辞职司事白联第及教员王锡爵等八人，在县公署连告了杰两次。杰以为这种排斥异己的任意雌黄，实在没有声辩的价值，所以始终守默。现在进而将杰控告到榆林了，以后留意舆论，谈此事者当然不仅限于绥德人了。外县的任何人，对于绥德县的情形，总不能彻底地明了，所以杰不能再守安默，任人作弄，只得将关于此事的始末详情，照实地一一写出来，公布于世，以资社会的评谈。至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话，杰素来就不大避忌的，而况现在是不扬也不能了。

### （一）前教育局长张秀甫先生就职及辞职的经过

旧教育局局长王铭旗先生于十四年前半年一再辞职，苗县长挽留无效，因于六月间召集各机关人士及学生代表共十数人，在教育局开会公决。出席人我略记得有苗知事、安文卿、白敬舆、李子洲、霍映九、张秀甫、王文卿、王锡爵诸先生。讨论结果，咸以为铭旗既坚决辞职，应另选举，并议定只举一人，就请苗知事即刻加委，向教育厅亦只呈报一人，以便被举

者好立刻接事，免得使教育局陷于无人主持情况。杰记得霍映九先生于选举之前即提议要杰担任。杰曾以在四师担任职员，不能兼任为辞，恳切地表示不愿任意。选举结果，张秀甫、王锡爵与杰都是四票，因为只要一人当选，所以议定决选。在决选之前，杰又将不能担任的理由及不愿担任的心迹反复陈说，并声明放弃决选当选权，本已得了众人的许可。不想决选的结果，仍有不肯相谅而投杰之票者。适逢张秀甫与王锡爵的票数又恰相等，所以又无结果。第二次决选，张秀甫当选，苗知事于第二日即委张秀甫为绥德县教育局局长。过了三两日，王铭旗由家到局，即行交代，张秀甫于十四年阴历六月十九日到局接事，正式就职任事。自十四年十月，曾一度辞职，十五年正月，又向李知事提出辞职，六月间又提出辞职，李知事挽留无效，因于七月十日用下列公函：

为函知事案据教育局局长张聚锦呈称，“复申前情，再请辞职，缘职员无力胜任教育局事务，春间曾经辞职在案，彼时各学校正在停顿，蒙县长温语挽留，令暂方组织学校，不得已，竭尽绵薄，勉维现状，现在一学期又满，学务事宜复告一段落，职拟于下月出外一行，别图他计，恳乞另委贤能，以便接替，而利进行。去志已坚，决不肯复事迁延，倘再不允准，惟有停滞一切，宣告脱离关系而已，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呈悉该绅服勤教务，乐育英才，莘莘学子，同深景仰，供职将届一年，何得遽萌退志，仍热心乃职，提倡学务，不胜挽留之至。如谓去志已坚，托故而逃，亦俟本知事行知议会，遴选维任接替后，方准宣告脱离，此批。查县议会现已闭会停议，应归教育局董事会议相应函请。

贵会查照，召集学界员绅公议，或留该员辩理，同众酌商妥洽后即希见覆为盼，函知教育局董事会，令请学界人士公议解决。董事会于第二日

上午八时，即遵李县长函谕，召集学界员绅会议，出席人有安文卿、李子洲、张子山，县高小教职员全体、女校教员、南关小学校教员、教育局职员、四师绥德学生代表十数人，余为县高小学生，共七十人。张秀甫未出席，有一公函致出席人士

敬启者：

锦辞职一事，业经声明，无论如何，决不能再事迁延，顷闻县署函请诸位公议。

体谅愚衷，另选贤能以便接替而利进行，望勿劝锦留职，徒费手续。锦去志已决，即将得罪地方人士亦所弗顾，

临颖惶恐，莫知所云，谨祈。

鉴宥为荷，此致

董事会董事

学界各员绅公鉴

开会以后，发言者咸谓：秀甫之辞意既如此坚决，留亦无益，沐如准其辞职。主席白寿亭以之付表决，绝对多数通过，张秀甫之辞职遂不成问题了。这是秀甫先生就职与辞职的经过。在这一段中还有一点应请读者留意的，即秀甫自就职以至辞职，满满的经过一年，不知是历任的知事都为呈报教育厅了，抑是教育厅未暇顾及，总之是始终没有接到教育厅的正式委任。

## （二）杰任教育局长的经过

会众既承认张君秀甫辞职后，进而讨论继任人选问题，咸以为应照前例，由众公选。言及法律手续，则以省邮不通，应变通办理，先举一人，

即请县长加委，俾便早日接事，俟省局奠定，再行呈报。一致赞成，并无异议。惟对于选举方法，李子洲提出指名票举法，马瑞生主张用不指名的票选法，双方争持甚久。后主席以双方提案付表决，赞成不用指名者为大多数，遂散票选举。选举结果出席者七十人，有效票六十八票，田均四票，刘晋宾十四票，杰五十票。当时杰曾坚决地表示不能就职，请众另商解决办法，并声明不是客气，不是畏难，亦不是不能牺牲四师训育主任事，完全是由杰个人有不能言的苦衷。当时除李子洲一人知杰苦衷，表示相谅外，其他发言者都不原谅，迫杰承认。就是现在告我的王锡爵亦谓“既已举定，应当就职。”相持甚久，杰始终不肯承认，主席即宣布散会。当时有人提议此事若如此行去，即陷于无办。地位，应请县长于本日下午，再召集学界人士，共商解决办法。所以董事会于七月十一日下午又在高小召集开会。董事会召集开会的启事：

教育局局长辞职，经敝会本日上午召集以上全学界人士共同商议，结果认可该局长辞职，另行改选。用票选法计共六十八票，常士杰五十票，刘晋宾十四票，田均四票。应常士杰当选，但杰坚不承认，嗣议定请县长于下午借高小地址，召集原人，重为商议。

杰早即定于十一日回家，故于早晨散会后，即离城回家去了，下午会场情形如何，杰未出席，不敢妄谈。杰回家后之第二日，县署法警忽送来县长委任状一纸，委杰为绥德县教育局局长，杰未承接，原封退回。直至阴历六月十六日，杰由家到校，即有人来劝责，谓“十一日下午会议，仍决定要你担任。至于你个人的苦衷，李子洲先生已代你表明。但由白寿亭先生证明，张秀甫先生辞职在前，你的辞职在后（杰先任教育局董事会董事，于此事发生前十余日，向教育局提出辞职），皆认为理由不充足。若再

故事推托，我们即认为你为重私忘公，对桑梓的义务不肯尽责，对自己的利益不肯牺牲。”杰实在承受不起这种非难，不自觉地就软化了。随后，李知事又邀杰到县公署，以大义相责，并劝杰“勉为其难”，杰不得已遂提出五个条件：（1）更换县立高小校长；（2）改组董事会；（3）添设一视学员；（4）八个月期限，限满即须另委接替人；（5）纯尽义务，概不支薪。但此项款子之用途，由杰指定，呈明县长核夺，李县长谓“此皆你份内之事，算不得什么条件，准照你的意思办理”。杰始承接委状，于阴历六月十九日到局任事。杰所提的第一条件的理由，是因县立高小校长刘嗣祖只于辛亥那一年受了月余的师范传习所教育，常识既然缺乏，思想更谈不到。从前两次办理模范国民学校，不惟成绩太劣，且留下许多笑柄。袁刚到陕北视察学务，曾考查出他的种种不合，有过将他明令撤换这件事，并闻他曾染过鸦片嗜好，现在有瘾与否，杰不深知，不敢妄谈。他的学识、思想、人品，根本上都不配当县高小的校长，兼之自今春任事以来，不惟不能尽他的管理重责（有县视学考语“惟管理方面无系统之组织、一定之规；致诸事多呈紊乱气象”可证），而且又闹了许多笑话，如因校门口偷偷地洒溺被学生捉获，无法自解一事，闹得满城风雨，真是自有学校以来未有的奇谈。杰早就认定他不称斯职，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更换他。第二条现未实行，理由也可以暂不宣布。第二条现未实行，理由也可以暂不宣布。第三条件的理由，是因绥县现有局级小学一百零八处，一年上下学期要视察两次，每学期截头去尾，能够实行视察的时间，不过一百天左右。平均计算，每日需视察一处或两处，而学校与学校往往相离四五十里或六七十里者不等。视学员的职任，于视察学校的设置状况、教授方法、学生成绩等而外，还要负积极的指导筹划等责任。在这种状况之下，如何能做得到呢？而况教

育局内常常发生需要派员出外调查的事故，所以结果闹的所谓视察，只能视学校之有无，察学生之足否，而董事会反因视学员常常在外，无人召集，不能开会。这是杰早已见到的，所以在今年的第一次会议时，竭力主张添设一视学员，经费亦曾筹有办法。后因种种问题，议决添设一事务员。杰视察今年各区初级小学增加情况，认为非添设一视学员，实行督促改进，难免要流于质不称量的歧途，所以决定要于下学期添设一视学员。至于第四条的理由第一，省局于八个月后总可以奠定了，省局奠定，即可依法请委，那时就不难找一相当的人来负斯责，自不需杰肩此竹梢了；第二，杰预计所要做的几件事，于此八个月中，总可以整理出一点头绪来；第三，杰只能牺牲八个月，若再长久，生计与精神方面都耐不下去。第五条件的理由，上半段无须申述，下半段是因有许多特殊事情，如平民学校的修理费，划分学区的调查费等，皆无法分拨，拟由此规定出款项下，择要提拔。且不愿使因杰一人的缘故，致使有才识能力堪负此责而尽不起义务的人，视教育局局长为已有成例的义务苦事，不敢问津。所以要将指定用途权仍留与杰。杰担任教育局局长的始末详情，至此为止，他事都是接事以后发生的，分段陈述。

### **（三）县立高级小学校更张的经过**

杰于阴历六月十九日接事，因县长对于县高小校长问题曾嘱杰先应讽其辞职，以全颜面而免纠葛，所以杰于接事以后，即托人向刘嗣祖示意，请他自动地辞职。待了十天工夫，犹不见丝毫动静，眼看高小就要开学了，这一件事不能不急行解决，因于阴历六月二十九日，呈请县长明令撤换，呈文的主因是“思想陈腐，办学无状”，同时并呈请委任白超然为县立高小

学校校长。李县长于第三日即一方撤免刘嗣祖县高小校长职，一方委任白超然为县高小校长。白超然于阴历七月初九来城，随即通知刘嗣祖，请他于第二日交代。不想刘嗣祖一味推延，不肯交代。兹将白超然的辞职信录后，即知详情了。

汉三局长先生：

八月十三日接到县长委任第四十号，委超为县立高小学校校长。超于十六日由家来城，当即致函刘校长，谓“子兴先生超拟于明日上午八点钟到校视事，务请先生届时驾临学校，指示一切。专此函达，顺颂暑旗！”第二日早晨，接到刘校长复函云“连复者鄙人现在抱病，步履艰难，有违所请殊深，至于学校账簿及器具等项均由白镜蓉经理。今春接事时并未有人向鄙人交代，因之内中详情，一概不知，此候，超然先生大鉴。”超随即复函刘校长，原文谓“子兴先生来示敬悉，所言‘有违所请’不知究何所指？超之请于先生者，届时到校办理交代斗。若有人替先生负责交代，则先生到校与否，原无关系，若别意，则祈明言。至于先生接事时，有无交代，与超无关。超则若无交代，绝对不能接事，此非超之性与人殊，实觉不敢以先生言‘应继任者也。专此，敬请文安！附交代事项（一）教育一览表（祈将薪金及所任功课之钟点、科目及班次注明）；（二）职员一览表（三）学生一览表；（四）夫役一览表；（五）收支清褶及各种账簿；（六）校具清褶；（七）各种卷案；（八）学校各种图记。当日又得到刘校长复函，函开：

“敬覆者先生请嗣到校，只因抱病拟难应命，并无它意。交代一节，日前已托白镜蓉先生完全负责办理一切，嗣虽欲与先生交代，

以当日未受人交代，此时与人交代个什么，请先生谅之。镜蓉现在公出，嗣已函催急速回校办理交代，此上超然先生大鉴。”超原拟于接事后，即请各教员到校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今逾超预定接事期已两日。而白镜蓉回校犹无确期，刘校长之交代，何日始能移来，更难预定。兼之开学以前，尚有种种预备，接事之前，无法进行，似此情形，开学日期，延游无定，贻误青年光阴，于心实觉难安！用此函恳。

先生转呈

县长准超辞职，另委贤能。委任令随函附上。专此，敬颂公安！

白超然 八月十九日

杰接到白超然此信后，一方慰留，并约定以四日为期，如于四日内无办法，即准其辞职，一方面呈李县长请其设法催促刘嗣祖速行交代。至七月十五日，才由县高小白联第交出一颗铃记，几方图章，开了一个教员姓名及所任功课单子，一个夫役名单，其他如账簿品物等都未点交。白超然接事以后，即公布开学日期，并函请各教职员进校任事，不想教职员等一再迟复，已到开学定时，忽然函告白超然，谓不能来校。白君无法，因请旅京旋里的学生暂行代课，一方又函请教员捐除一切，进校任事，教员们回了一信，表示不肯到校。白君无法，因次第聘得教员七八人，担任各级功课，以免贻误学生光阴，兹将白超然的报告信录后：

“敬启者超于二十二日下午五点钟到校接事，即时函知各教员。函开。”

“敬启者鄙人于本日下午两点钟到校视事，兹定于二十四日‘礼拜二，上午八点钟，举行始业式，同日即行上课，务希先生于先一

日驾临，是为至禱，特此奉闻。此致，某某先生台鉴。”

翌早七点钟，又函请各教职员莅校开会，磋商进行事宜，函文如下：

“敬启者谨定于本日上午十时，在校开全体教职员会议，讨论学校一切进行事宜，务祈届时驾临为禱，此上。某某先生台鉴。”

至时复遣听差持单去请，听差回校，谓诸先生不久即来，超因由上午十时起，直待至下午七时，乃有王君选卿，安君子乐，马君才丞来校，谓奉县长面谕，暂经校务，但需回家一趟，去取行李。超随即恳诚挽留，请其共经校务，并请于翌早举行开学式，全体出席。王君等慨然应许，并约定翌晨到校磋商学校进行事宜。不意次早（二十四日）八时，学生已齐集教室，静待开学，而教员犹全未到，候至八时四十分，忽接一函，内开：

“超然先生鉴敬启者，现闻开学秩序第六条，列有教育局长演说一项，同人等对于法局卷，始终反对，绝对不承认，若果如此，同人等碍难到校，维持校务一节，可作罢论。专此敬请刻安！并候回玉！弟王锡爵、延凤桐、白筮乾、阿尔凯、马英、柳鸿宾、周荣祖、白联第同启。”

开学定时已过四十余分，不便再延，故即摇铃开会，并因原先布告学生，定于二十四日开课，兹已失信，不能再事延误。故于开学时，特向学生声明原委，请其原谅，特再延迟一日，定于二十五日上课。超于行开学礼后，辗转思维，无法解决，故一方请旅京旋里学生数人，暂行代授功课，一方再去函，恳请各教职员顾念学生之光阴，捐弃一切，早日到校。原函如左：

“某某先生吾人忝列教育界，负牖启青年与领导青年之重责，

一切行止，自应以学生利益为前提。吾校开学定期已过多日，学生亦纷纷来校静候上课，目前急务，首在开学授课。超于接事之日，即定开课之期，函催先生期莅校者，原为早上一日功课，学生即可少牺牲一日光阴，日昨蒙先生不弃，慨然允许如期到校任事，超窃以为期早上课之初衷已得实现也，故不胜雀跃，今早八时四十分，忽奉华章，拜读之下，殊深诧异，县立高小学校，与县教育局有密切关系，不能轻于脱离，开学之期，请教育局长出席演说，亦事理当然，至于先生之所谓合法与否，似与吾校开课无关，不应混为一谈，致误青年光阴也。超于今日开学仪式中，已向学生宣布，明日定行授课，故一方请人暂行代授功课外，特再函请先生，垂怜青年，捐弃一切，即日到校，则吾校幸甚矣！专此，敬请文安，鹄候回示。”

今早十时余，奉到各教职员复函如次

“超然先生昨奉大札，洞悉先生关怜青年，热心教育，钦佩莫名，本应遵命到校，追随先生之后，惟是弟等所争持者，只在非法与合法，局长既不合法，弟等绝难听其演讲，如果听其演讲，无异承认其合法。先生所谓县立高小与教育局有密切关系，不能轻于脱离，开学之期请教育局长出席演讲，亦事理当然。窃以局长虽与学校有关，不能脱离，而非法局长亦岂与校长有关，不能脱离乎？开学之期，教育局长出席演说，虽属事理当然，而非法局长，亦肯认其出席演说乎？先生是承认非法局长者，谓合法与否、似与学校开课无关，不宜混为一谈，弟等既不承认非法局长，谓合法与否是与学校之开课有关，自应认为一事。且日前县长面谕，非法局长不能过问高小之事，是以弟等有暂维现状之意。今于高小开课之时，彼

以局长名义出席讲演，是与不能过问之语，绝对相反，弟等绝难到校。况先生已请人代授功课，亦不至有误青年光阴，弟等更毋庸到校。专复，敬请铎安！弟王锡爵、马英、柳鸿宾、周荣祖、阿尔凯、白筮乾、白联第、延凤桐同启。”

事已至此，超实无力再事斡旋，拟于短期之中，聘请教员以免贻误青年光阴，致累教育前途。候教员聘齐以后，

再为续报，如以为事有不当，请明以见告，此上，汉三局长钧鉴！

白超然敬启 八月二十五日

兹有一事需注意的，教职员等每次来信，总是全体署名一刘嗣祖，可是白超然接到周荣祖君两封信，表示并不知情，县立高小更张的经过，至此已完。其中还有一点最为奇怪，就是刘嗣祖将下学期的经费，从学生的学费及所卖的图书费项下偷偷地抓用了。不开课，不到校，盗用公款，这就是身为人师、声言维法的先生们所做的事。关于此事，杰曾呈报县长请予追索。兹将原呈录后，一看即知原委，不需另叙了。

呈为窃用公款，恳请追还事县立高小教职员薪金向以十个月计，分上下两学期开支，上学期分支五个月，下学期分支五个月。该校今年于阴历二月中旬始开学授课，于阴历六月六日即停课放假，计日犹不足四月，但以向例为准，当然仍应以五个月开支。惟旧校长刘嗣祖在交代账项中，将阴历七月份薪金亦提前支用，共计上学期已开支六个月，下学期只余四个月的经费。查刘嗣祖校长一职，职局于八月七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九日）呈请撤换，钧署于八月九日（即阴历七月初二日）指令免职，校长白超然于十三日接到韵署委

任，于十六日由家来城，随即专函通知刘嗣祖，定于十七日上午接事，函信往返，至再至三，延至八月二十二日（即阴历七月十五日），始由县高小司事白联第将钤记图章代为交出，遂于二十五日（即阴历七月十八日）开学上课。而旧职教员一再反复，终未到校，经过详情，前已面为呈明。教员等既未上课，当然不能支薪，旧校长于阴历七月初二日即已免职，而故为稽延，不肯交代，准诸通例，亦只能支六日薪金，司事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向新校长正式提出辞职，态度甚为坚决，十六日又自请复职，十八日又随教员等声明不复到校任事，亦无支领全月薪金理由。不意刘嗣祖竟将教职员及彼自己之七月份薪金一百一十六元全数提前窃行支用，有违通例，理应追索。且此项公款并非从职局备文支领，系由所收学生之学费及贩卖图书等款项下窃行抽支。查学生学费，向例交职局保管，作为教育基金，图书系由职局担保，向太原商务印书馆购买，所卖之款应交由职局汇偿太原商务印书馆。职局经费处对于此两项公款一再催收，而刘嗣祖不肯报解，竟于免职之时与职教员等朋比窃用，未免有非师道。抑犹有奇者，所交账目中有请送及招待教员费五十余串。详查连年报销，下学期并无招待教员之例，该教员等于阴历七月中又并未在校，直至阴历七月十八日。犹未见其莅校筹备开学授课等事，不知刘嗣祖何所为而须招待教员，且招待于何所也？职局据以上情由，于九月十四日及十五日连请局差催请旧校长刘嗣祖及旧经理账目司事兼代交代之白联第探询追索，乃白联第始终诡避，不肯莅局，刘嗣祖一味支吾，抗不承缴。职局本年度预算入不敷出者一千余元，现犹无法补救，若再任其窃取滥支，则教育经费即将破产矣。此端

一开，后将何济，理合呈请县长如数追还，以重公款而维教育。谨呈。

#### （四）杰被控的过去一段

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忽有人对杰说县小教员因更换该校校长事发生误会，以为对于教职员等亦将一齐更换，所以现拟在县署呈控。杰当时即谓，此真笑话，校长属于行政范围，有不合处，即可随时撤换；至于教员，有聘约关系，若非学生不满或发生特别关系于人格问题的事故，如何能于半途更换。况此乃校长的职权，杰何能越组代庖？杰不惟无此存心，实不敢生此妄念。杰随即去高小访诸教员先生，拟详为解释，不料到高小时，仅见到王锡爵一人，且有他客，不便直言，其他诸位不知是避不相见，还是真不在校二杰无根据，不敢冤人。第二日午前路过白友三先生家，杰又托友三代杰解释。杰于当日午间，将呈请撤换刘嗣祖的呈文送到公署后又去高小相访，不料尝了一勺闭门羹，终于“不得其门而入”。或许是已皆离校了。杰即未得进高小之门，随即转至职业学校，友三一见即谓：“事已糟了，我去时，他们已将控你的呈文递进县署了。”这是控杰以前所知道的详情。至于控我到底是为什么，这些隐情外人如何得知？而表面的理由，请看县公署训令第四十四号内所引的他们的原呈：

为令知事案据县立高初级小学校教职员周荣祖、柳鸿宾、延凤桐、王锡爵、刘嗣祖、白筮乾、安尔凯、马英、白联第呈称为呈请依法推荐局长转呈教厅选任以重学务而免纠纷事，查县教育局规程第四条，县教育局长，由县知事选具有第三条资格者，推荐三人，呈请省区行政长官选任，并无由地方团体推举之条例。前次教育局长张聚锦辞职，县长函达教育局董事

会，招集学界同人共同商议应否挽留，亦未令进行改选，而董事会招集同人开会后，除认可张局长辞职外，竟由到会绥德一部分学生一致主张，即行另选，当时在场少数绅董虽以其不合规程，而彼众我寡，亦难矫正，遂由该学生等一同票选而以常士杰之票数最多，即决定为局长。似此违背总统公布之规程，侵夺县长推荐之主权，虽属公举，无异一部分专主。是以常士杰当场声明，有种种之苦衷，不能应允，否则人格破产，宁离绥德，亦不承认，职员等见其态度坚决，以为绝难就职，不料迁延日久，想出种种无理条件，秘密向县长要求，以便遂其阴谋。所提条件，一为更换校长。查全县校长非一不知更换何人，抑尽校长而更换之？况办学纵然不善，局长亦当随时指导，令其改良，若不照更换可也，何能一言未发，一面未见，遂然撤退？假公济私，党同伐异，显系人的问题，非事的问题，此其背谬者一也。二为局长兼职不支薪。勉育局长，雜任重，专责尚恐办理不及，

兼职岂能措置裕如？况常士杰充任四师训育主任又兼教员，事务亦已繁剧，再兼局长，难免贻误，此其背谬者二也。三为局长任期八月。查教育局规程，教育局长任期三年，诚以教育事业非期月之间可以收效，而常士杰以八个月为限，想象别有作用，非为振兴起见，此背谬者之三也。四为增添视学员。查县视学，数年以来，具系一人视察，未赏不详，况财政困难暂且毋庸增添，而常士杰为酬报私人，增添视学，取己之薪付之，虽云纯尽义务，其实任意支配，何异支薪，沽名钓誉，自欺欺人，此其背谬者四也。以为自认破产之人格，提出种种无理之条件，凡我同人，誓难承所有违章选举、非法局长，理合恳请彻底纠正，并请依法推荐，转呈教育厅选任，以重学务而免纠纷。至于正式教育局长未经教厅选任以前，局内事务应由旧局长暂维现状，或由董事会共同负责，以免停滞。为此，具文

呈请鉴核示送等情到县，据此当经批示在案。嗣据该员等复呈，内称为复申前情，恳求解释，明示事缘，生等前联呈请依法推荐局长，转呈教厅选任一节，原为遵照总统公布之规程，以重教育而免纠纷，并非为吾人之行止，亦非为吾人之去就，更非为彼此互争，第以吾人黍居士林，对于教育界不合格规程之事，不得不呈请纠正，前次所请，不过各抒管见，何敢晓读？究竟县教育局是否应当依然推荐转呈选任，请即明白指示，至于常士杰要求条件是否合理，亦请逐条解释，为此具文复请鉴核示送等情前来，除批示外，合行令知仰该局知照，切切此令。

第一次：

来呈阅悉，古语云“先器识而后文艺”，以此观之，吾人之行止，当以敦品为先，吾人之去就，尤应高尚其志。况常士杰之所请只在一人，更毋庸多士晓读，若彼此互争，不但有失地方之感情，且恐贻各界之讹议，合则留，不合则去，理势使然。至前教育局局长张聚锦，一再辞职，去志坚决，已无挽回之余地，所厚薄于其间也，所呈各节应毋庸议。此批。

并非本知事有第二次据呈阅悉，教育局长是否应当依法推荐并请明白指示等语。张聚锦一再辞职，曾经本知事温语挽留。该员坚不承认，具有辞呈在案，遂致教育局之主权竟无专责，各小学校之进行因滋阻滞，胄欲呈请教厅而南路邮路不通，若再稽延时日，而暑假光阴有限。前次董事会投票选举，常士杰得票多数，原系学务公开，非本知事个人私见，况选举之时即在高小校内公议，既不赞成当时何无片言，更何无一纸呈文？条呈亦不见。当该局长被选之始，总是执意推辞，事隔十余日，学界亦无异议，及至接收委任以后乃更换一校长之故，该绅等一再具晓读不已。岂知本知事对于该局长要求各件，既未赞成，亦未滨驳，何也？此系该局长分内之

职权，而知事不与也。若云前次选举系一部分组织，而该绅等此次呈请，是否系各机关各绅董之公开？抑亦系一部分之组织？本知事不得悬揣也。此批。

第二次批驳以后，就有人说教员先生们要到榆林上控去了。杰始终抱了一个不到申辩时绝不申辩的宗旨，而且县长既已批驳了，杰似无再申辩的必要，至于任意雌黄的几条，基本上就不值得辩白。至阴历九月十八日忽奉县署这样的纸训令：

本年九月十三日奉

榆林道公号指令第三二五八号内开据该县呈请委任教育局长，因南路邮政不通，恳请旨道择尤委任俾职务一案，蒙批呈。查此案，复据该县省立单位级师范学校毕业生对刘嗣祖等以否认非法局长等情呈控四师训育处主任常士杰一案，恳请依法纠正到署，除牌示呈悉查此案前，据该县李知事呈报到署，当经指令按照县教育局规程办理，仰该员等静候依法解决可也。此批外，仰该知事查照教育局规程第四条之规定，推荐三人，呈由省区教育行政长官选任，其省委未至以前，仍由前教育局长张聚锦维持现状，以息浮议，而免废弛。所请择优委任之处，看无庸议等因奉此，合行令知仰该局长知照切切此令。

在道署告杰的是些谁们？共有多少人？怎样告的？控告杰些什么？杰因未见原呈不得而知，惟只领衔的就是那被杰帛1胃了的旧高小校长，在前清的师范传习所肄业月余，而现在假冒毕业的刘嗣祖，那是道署指令中所写明的。杰接到上顷训令后，随到县署请县长速催张君秀甫接事，以便早日卸责，下午又奉到县长信一件：

汉三先生鉴顷谈公署发来

道尹指令教育局暂由旧局长维持一节，查旧局长来接事以前仍应阁下暂为经理。俟接任局长至日，一切手续再行交代。相应函知，即查照，此请。

杰接读此信后，反复思维，此时既不能立卸斯肩刻，安能再守安默？而且既已控到道署，道尹又一再批令依法解决，但其具体办法，则谓“省委未至以前，仍由前教育局长暂维持现状”似乎控诉人与官厅所主张的都是合法的，只有我常士杰不是寡廉鲜耻，就是丧心病狂了，不然为什么硬要当这教育局局长。为什么要牺牲精神，牺牲金钱，当这义务的教育局长！所以当晚即给县长上一呈文，并希转呈道尹，将执法与不法的问题，约略分辨分辨，免得使杰挨了“不法”的暗砖，还都以为是“依法加惩”。杰的呈文如下：

呈为呈请迅速依法委任教育局局长。以便交代事，倾奉韵署指令第三二五八号内开（原文见前）等因奉此，不胜欣欢，缘杰前碍于学界之敦促，县长之劝委，不知已勉任斯职。且于接事之前，即声明纯尽义务，原恐才不胜任，有所陨越，即便自慰耳。今得卸责，私慰如何，惟于交代之前，犹有不能不祥为申述，以读者钧听者，持恐默而不言，公理将由此泥灭也。查王君克勋于十三年六月，一再辞职，苗前县长挽留无效，因请教育界人士公决。时间虽不复记忆，而地址在教育局前院。出席人有苗知事，高小职教员，女学教员，里民局长，财政局局长，县议会议长，四师绥德学生及高小学生代表，共十余长，是杰所言也。商议结果，群以为王君一再辞职，无法挽留，应另行推选以利进行。当时亦有提议选杰充任者，杰曾

恳切表示，不愿担任，并反复声明不能担任理由。选举结果张君聚锦，王君锡爵与杰三人票数相同，但因众意咸以为应举一人，单独呈报，被举者方能即时接事，绥县教育庶可免停顿之虞，故有决选之决议。选之前，杰又恳切表示不能担任理由，并声明放弃当选权。经众许可，故仅就张君聚锦王君锡爵二人决选。不意决选时犹有不肯相谅与杰投票者，而张君与王君所得票数又恰相等，故无结果，复又决选。第二次决选，结果张君聚锦当选，苗县长因于第二日即委任张君聚锦为教育局局长。不三四日，王君克勋由家来城即行交代。从此，全县教育界人士咸认张聚锦为正式教育局长，未闻有所非议。张君聚锦自接事以来，直至辞职业已经年，苗前县长与县长皆未呈报教厅，故始终未得教育厅之正式委任，亦未闻绥教育界有合法与否之究询也。本年阴历六月初二早八时，教育局董事会根据县长公函，召集各机关及教育界人士共同解决旧教育局局长张君聚锦辞职问题，地址仍在教育局前院，出席人则为高小全体职教员，女学校职教员，教育局职员，教育局董事会各董事，参事会参事，南关小学职教员，四师绥德学生代表十数人，高小学生二十余人共七十人，旧局长张君聚锦，未曾出席，特致出席人，坚决表示不愿再商事维持，讨论结果，发言者咸谓张聚锦辞职付表决，大多数通过。因继续讨论继任人选及产生方法，由大多数同意决定共同选举一人，请县长加委。选举结果，杰五十票，刘君晋宾十四票，田君均四票，废票二票。杰当时坚决表示不愿担任，奈众不我允，致无结果而散。本日下午，县长又召集各机关及学界人士在高小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彼时杰已返里详情不得深知。杰不意于返家之后第

二日，忽由县署法警函来委任一纸，委杰为绥德教育局长，杰随即奉还，来之承接。后因多人诘责，谓杰对地方不肯尽责，对自己不肯牺牲。杰于来城之后，县长又邀请至署，以大义相责，杰不得已，以维持八个月之条件勉为承担。法律与手续不完备，杰故早审之熟矣。但念前局长张君聚锦已有成例，且同样未受教厅正式委任，杰之就职与否，与法无关也。不意县立高小教员王锡爵等八人与被杰呈请撤换之旧校长刘嗣祖，一再呈控谓杰非法，并请仍由旧局长张君聚锦维持，是认旧局长张君聚锦为合法也。同一情形在他人则为合法，在杰即为非法，岂此法专为杰一人而定耶？杰于去年、今年两次选举都表赞同，认定此种变通办法为犹可行，故于就职之前，虽曾坚决表示不担任，而始终未提此法律问题，刘嗣祖等于会议场中，既表赞同，投票时亦随众投票，选举后犹有劝杰就职者，而于杰就职之后，乃一再呈控，谓杰非法，而王锡爵于去年选举，亦曾在场，彼在决选被选之列，当决选时并未闻其有合法与否之辩证。包杰就职之前，可以无法，杰就职之后，即必须有法？抑利于彼等或无损于彼等者可以无法，若于彼等任何人之利益有关，即不能无法耶？若非疯狂，则伐异之情，无异自供也，事既因法而起，自应依法解决，若仍以非法继非法，则与杰之继张君事出一辙，杰虽不言，其何以示大公于众人耶？若县长无善法而便合于法，敢祈据情转呈道尹，请示核夺。至于杰四师训育主任一职，杰于接事后即向四师正式声明辞职，当时四师校长李君子洲，因公赴榆，延至八月十五日始由榆回校，当即正式批准，另聘韩君树功继任，合并声明。谨呈。

这就是杰被控过去一段的原委，以后如有进一步的事情发生，当再继续布露。

## （五）我的话

刘嗣祖等在县公署控告杰的呈文中，关于合法与否的问题，杰于呈县长文中已约略言过。所谓依法纠正，由旧局长暂维现状，杰实不解所依的是什么法？若不是我大总统给先生们特颁的规程，准其一法两用，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判别这“依法”与“不合法”的真面目。除此而外，还有许多“不合法”，那都是出席六月十一日上、下午两次会议者的问题。杰现在无暇为他人搔秃疮，仅把关于杰个人的几点简短地说一说。（1）杰以为张秀甫先生的辞职在后，杰的辞职在前，恐秀甫的辞职是由杰引起的，那就对不起张秀甫先生，故有“否则人格破产”之言。杰之辞职既在张秀甫辞职之后，则杰之人格，自问无愧。（2）杰所提条件之理由在前“杰任教育局局长的经过”一段中已宣布过了。有理与否，请众公决去。至于刘嗣祖等说这是无理那是自然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戴了蓝眼镜，还能强他看出白颜色来吗？（3）我不知道怎样叫秘密？什么是阴谋？是不是未同刘先生等几人送量，就叫秘密？不能得到刘先生几人同意的事，就是阴谋？如其不然，杰所提的条件从未避免过任何人的。（4）杰自问尚不是贤愚不分的混蛋，如何能尽校长而更换？杰指名是要换县立高小的校长刘嗣祖，是因认定他不称斯职。请刘先生等还是少事挑拨，这有什么用处呢？“肚内无寒病，不怕喝冷水”。别的校长未必就自觉不称职，是在被撤之列啊！至于杰与刘嗣祖过去的私人关系，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既无私怨可言，何须假公作报？若言党同伐异，杰实不知谁是我党，谁与我异？

如以为杰所请委任的就是杰党，杰所请撤换的就是因与杰异，那么杰之索性与王锡爵等几位先生有殊，宁愿党与白超然，不愿党与刘嗣祖。(5) 杰于接事后即向四师正式提出辞职，将四师训育主任职务辞去。所谓“兼职”未免近于揣测。(6) 刘嗣祖等谓以八个月为期是“别有作用”不知是何作用？如照袁世凯的存心，要求以终身为期，那就是“另无作用”了罢！(7) 添设视学的薪金，是移用董事会所议定添设的事务员薪金。杰的薪金支配权现犹保留，还未支配。与支薪有异与否，杰也不管他，总之杰是不予备拿教育局的钱。事实不合，说不到酬报不酬报。而况杰自问从没受过马瑞昌君的点滴私惠，本来就不需酬报，而马君又原已将事找妥，经杰强为劝责，始行承允，也不愿受这种所谓“酬报”。(8) 杰之尽义务不支薪，是沽名钓誉。好，请刘先生王先生等也沽一沽名，不要说尽八个月义务，只不窃用县高小阴历七月份的经费就得了！否则“破产人格”就是先生们自己给自己加的好形容词。

杰向来是不讲名节的，绝不是为博看，只喝茶，不吃烟，只做事，不拿钱，以教育局头衔来向大家夸耀的。也不是对张秀甫有什么不恰意。杰与秀甫先生的私人感情，那是没有说的，杰对于法规问题本来就不重视，还能反对秀甫先生的不合法吗？就是秀甫先生的办事，平心说来，比杰稳妥得多，若说到学业人品，更是杰深表钦佩的。杰之不能已与言者，实觉得刘先生等开口“依法”，闭口“依法”而实际还是一种非法的主张，竟能蒙上蔽下，未免太不平了。只要刘先生等现在他们自认是“对人的问题”，揭去那维法的假面具，而主持合法的官方，也明白宣布其所以如此主持者是一种权宜办法，并不是什么“依法纠正”，则不论如何解决，杰绝对不再开口。否则还请照刘先生们“彻底纠正”的话，先将所已请准维持现状之

旧局长的法律问题弄明白，再谈下文。

现在别无话说了，待演至相当地步，再续披露。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①常士杰（字汉三），即常汉三。

# 在党的“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王懋廷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云南党部的发展，是在最后一年中，中央的政策，因远隔的关系，未曾见到，所以我不能多说话。在三、四月的旅行中，对一切的报纸，读得很少，估量政治材料很少，所以我只能就很小的范围说一说。

我来得很迟，布哈林及秋白的报告我都未能听着，所以就我个人的意见，以及在车上我们的小组所讨论的几个问题来说一说。

一、 革命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秋白说现在不是高潮而是高涨，# 是不大满意的，因为高涨或高潮是字面上的分辨。我以为夹定革命的潮流，是要分两方面看的：客观的、主观的。我认为客观上革命直到现在是高涨的。第一，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冲突，因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说，并且这个问题牵涉到第二次大战及日美冲突问题上去了。第二，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稳定，蒋介石虽然打到北京了，但他绝不能统一中国，其原因这是由于经济的分裂。第三，工、农、小商人及士兵的生活不能改进。所以客观上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根据各地的报告，经济的衰落，工人失业，苛税增加……，这些客观上的条件，不能不使革命向前发展。但是革命领导的作用非常重要。我们主观的力量如何？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之下削弱了。根本的问题，就是直到现在。还未能成布尔什维克的党。党到现在还是“招兵买马”的形式，所以白色恐怖以来，就使这些重要城市的党部崩

坏，干部的牺牲太多。党员农民成分太多，这都是很大的缺点！更要紧的是党与群众的关系隔离，群众要求党去领导，而党不能去领导。所以，在主观上的分析，党的力量是削弱了。虽有客观的条件，但是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党的问题，如何抓住群众的问题。

二、 革命性质——我在车上已同许多同志讨论过，我认为当然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然而，在名词上能否换工农兵的民权革命，呢？因为“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这个名词已成代数式了，群众不能够了解。不是照中国革命来规定他的性质，而是把中国革命代以革命性质的公式。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不像欧洲一样必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所以不必要这个历史上的术语。

三、 过去的教训——首先，即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不大明了中央情形，不能说多少的话。不过我听了许多同志的话以后，我不大满意。大会的责任，不只是分析某一个同志的错误，而是在整个党的政策上着眼。机会主义发生，根本上在落后的经济关系中，无产阶级的幼稚，党的基础没有建立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上，党的政治估量的错误所形成的。在过去主要的是联合战线问题，联合战线的分化愈明显，则机会主义表现的愈明显，对敌人阶级让步，不相信群众。这种倾向，我们应坚决与之斗争。不过我们也要估定党的历史上的价值，否则也是错误。中共有其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是党很重要的关键，决定了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路线，坚决领导工农去斗争。今后我们还要继续着这种政策，不过我们要估量他工作中的错误。

盲动主义问题。中央现在或是过去并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路线，但我以为在“八七”后，党的领导有革命感情的表现。也不估量当时的实际情

形，只注意到敌人的弱点，而就忘了自己的弱点。例如小区域的农民暴动或某工厂发生很小的罢工事实，即认为革命高涨了。这样以局部事实为全部政策的前提的主观病，在将来工作中很值得注意的。盲动主义也是这种革命感情的表现，过去对政治估量的错误而出来的。例如，云南党的历史太短，革命运动的发展，不能跟上中央的政策。所以省委接到中央关于暴动通告的时候，开扩大会议讨论。结果决定说，中央的政策是很对的，但是，云南目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是准备暴动，而不是即刻暴动；即刻暴动则又陷于另一面的机会主义。但在中央政策影响之下，一般同志均感觉省委策略右倾。以后蒙自县委决定暴动，虽被省委制止了，但从此省委也动摇，结果决定在3月后开始暴动。这就是中央政策的影响。总之，过去中央未能指出暴动条件，影响各地而发生盲动主义。

现在要说“八七”后的情形。“八七”后党在经常工作上不好，各种经常工作都没有多大成绩。我们知道各种经常工作，如组织宣传工作，这不仅是简单技术工作，而是有政治意义的。一切策略正确，没有技术工作也是不会实现的。

其次，所谓农民意识，的确影响到政治路线上了。根本的来源，还是犯了革命感情的毛病。大家以为党过去的机会主义是阻止工农向则发展，而现在就有成为“群众”的倾向。农村斗争高涨，遂只注意农民问题，于是无意中抛弃了城市工作，为农民意识所影响。

我的意见，暴动是不能抛弃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第一，党与群众隔离的事实，应怎样抓住群众；第二，中共还不是群众性的党，而是一个“招兵买马”的党，党员的意志不能反映到党的生活中去，这样使党的政策有

离开群众的危险。所以，我以为六次大会以后，即应当使党群众化，抓住群众，这样才能够完成中国的革命。革命感情的问题，我们应改正它，否则就不能抓住实际。须知革命情形每一分钟都是动的。

我希望大会能够注意到这一点，若不能强固我们的党，不能抓住群众，否则一切策略都是空话。

（转载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

# 在党的“六大”关于 农民与土地问题讨论中的发言

王懋廷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

我希望用很少时间讲我的意见。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我同意的不再说了，只说几件零碎的具体的事实。

一、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现在我们材料很少，要明确的规定是非常困难的。对土地分配的关系，不能以南北为绝对的分别开来。土地分配不平有几方面（1）近郊的田地与穷乡僻壤的不同，近郊的土地是比较好的，而且生产力也高些；（2）近铁道两旁交通顺便的地方的土地也比较好些，那里为帝国主义所侵及，有些半资本主义化；（3）沿海的土地与内地的也不同，因为交通便利，为帝国主义侵入的缘故；（4）各部分的差别，主要是水利。对于水利的问题，11月扩大会议的草案，完全以人工灌溉来决定中国土地关系，我是不同意的。但是人工灌溉在中国的农业经济中是一个特长。我们分析土地关系应该注意，不能以南北为划分界限，应以水田旱田做分别。许多旱田，面积虽然非常宽大，但是收入是非常少的。一个农民经营100亩的旱田，与经营水田10亩的结果相差不远。所以应以水旱为分。土地问题中的分析，是不能用数目字来做计算，决定谁是地主，而应按照各地的情形来决定，要以地上来分，而不应由天上来分。分析农村的阶级关系，不以地的多少规定有几等，应以当地实际情形来分，不可笼统

规定。在土地问题里的，应当注意土地与政权的关系，封建的统治是有影响于土地的关系的，北方如此，南方也是如此。如陕西及云南的状况，在乡村或镇市有权力的人，民团与豪绅等，可以用政治势力渐渐得到土地。获得土地的方法，可以看见一方面用资本，一方面用政权，我们在乡村中，可以见封建之复活。政权对土地有这样的关系，这里就可以明白地主与豪绅是很难分开的。地主就是豪绅，豪绅就是地主，在政治上的表现，并非两个阶级。亦有豪绅而很少的土地，地主而不握政权。但是普遍情形，没有地主没有政权，也没有豪绅不是地主的。豪绅确实是代表地主政权的，是不能分成两个东西的。农村阶级的划分，立三说得太模糊，我以为应以土地关系划分为：

- (1) 地主（附豪绅）——依靠土地剥削农民；
- (2) 自耕农——能够自己独立的，不受地主剥削，不剥削农民；
- (3) 佃农——自己没有土地，而租地主的土地来耕种的；
- (4) 雇农——出卖劳动力的。

分成这样四种就够了。

二、雇农问题——雇农是我们在农村的基础，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要注意，很多地方是没有雇农。因为中国土地是划分得很小的，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是没有的，除广东和江苏的沙田以外。所以雇农耕种的田是很少的。雇农既然很少，假若我们要以雇农为农民协会的基础，那我们在很多地方找不到基础了。所以，我认为雇农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但不是中国目前农民组织的基础，农民组织的基础是佃农。因为佃农是很广大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总是租田的，与雇农不同，实际生活与雇农是一样的。雇主与雇农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封建关系，他们的斗争，往往没有

佃农与佃主之间那样明显。我们要以佃农为农民组织的基础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得到（对）整个农村的领导。至于农村无产阶级的组织，应以手工业者与佃农合组之，另组织农村工会；而农村工会加入农协，成为农协的领导力量。

三、农奴问题——中国农奴虽不是普遍的，但很多地方是有的，如云南、贵州、广西一带很多。在云南，农奴的形式，是在土司之下的农民，占人口五分之二，即百分之四十，大都是夷人、傜人。他们在文化上与汉人并无十分相差，而他们所受的剥削都是很大的，如安南、云南、贵州、广西一带，都有土司。这些土司，实际上就是大地主，他们对农民可以施用肉刑，任意加税。

四、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民族的问题，如回族及上面所说的各种民族，在农民问题中是很重要的问题。陕西、甘肃、新疆、云南的回民都很多。云南、贵州、四川的落后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很易团结，他们的斗争反抗是很有力的。我们在云南曾屡次讨论，很多同志反对提出民族口号。我以为在农民运动中是值得注意这一问题的。

此外，还有几点意见：

1. 游击战争问题，是今后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出路，能在群众（中）发展，是可以发动群众的。

2. 合作社问题，我们应提出注意，在苏维埃已成立的地方，可以作合作社运动，可以用合作社的方式去经营土地，可以少量的土地容纳多量的失地农民。如其建立农村合作社，对经济上、文化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3. 对于群众的意识问题，在农民运动中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农民群众，不可以只依赖主观，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很生硬的应用口号，这

是很困难的。如苏维埃的口号，当然已经有了很长期的宣传，但是很多农民并未了解，农民很难懂这个名词，用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名（称）是一样的内容，而且容易懂得。口号是要群众了解的。

4. 有同志提出土地国有，我以为要仍如原草案一那样规定好些。土地国有这个口号，农民将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了。农民的私有观念很重，不能了解，或者竟要怀疑，问题是在这里。

（转载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

# 狱中遗书

王懋廷

父亲：

当儿昨夜想到写信给父亲和儿媳的时候，禁不住流下泪来了。儿自受难到昨天，都是很解脱很达观的。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人类，只知道社会，完全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不独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看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那（哪）里晓得儿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

父亲：儿的思想信仰，完全与父亲不同，但是儿愿曲意解释，来宽慰父亲。其实任何道理，都是相对的，都具有时间和环境的条件。父亲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形成了父亲思想和信仰。儿虽曲意解释，均出于至性至情，只是用婉曲的话，把意思写给父亲。儿还想写一信给儿媳。但是现时都还没有想定究竟如何写？如果不再写的话，这一封信将来可以交给儿媳看，孙儿们看，当他们想念到儿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信看看！

我们的家庭，是所谓书香寒士的人家。祖父一生没有做过一件错事。他不是个什么伟大的人物，而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一生没有吸过洋烟、黄烟，没有喝过酒，饭食有定量，起居有定时；不苟言，不苟笑；没有挖苦过人，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有沾过公事，而为乡里排难解纷，化除一切讼事。王、胡、朱、张四姓四村，成为仁里德邻，没有一个游手的人，

没有一个偷盗好讼的人。我家从来不讲势力。但是祖父、父亲、伯叔们的德望，可以移风化俗。祖父的学生遍布下川三甸。全家七十余口，分家时候还是和和气气地随便分开。我们的家庭，实在是古典社会中的模范，祖父就是那样社会中的理想人物。祖父活到九十四五岁，享尽了一生清福，有父亲那样好的儿子，孙子们又很争气，社会对他又很尊敬，只有母亲不很满意祖父（虽然没有什么不好的表示，儿深知道，母亲早年因祖父偏袒伯母，是不很满意他的）。别的没有任何人说过祖父一句坏话。儿对祖父，觉得没有任何遗恨的地方。

就是祖母死得较早，可是父亲那样孝道，晚上梦见祖母，连夜就回家来看。母亲待祖母也最好。儿幼年多病，与祖母相依数年，祖母性气很怪，吃饭要先把小鸡拴起，儿现在都忘不了。可是也没有什么挂念的地方。

最使儿不能忘记的就是父亲、儿媳同那已经死去的母亲和三弟。大哥身体很弱，做事也比较软，可是他是聪明有思想的人，他与儿自幼同学同处，而长后各自分飞，各能自立。他不是一个事业家，儿对他的希望是多从学问上努力。儿最挂心他读书做事不改因循习气。大姐是母亲、父亲最爱厚的侄女，儿是在大姐臂上长大起来的，可是她现在生活最好过。外甥们已经长大，只是会赶马，全不读书，也罢了，她家那样环境，不会出读书人，不必强勉。才女给大姐做儿媳，也很好，虽然在血统上（生理的）不应当，可是大姐必定喜欢。只是才女那样聪明可爱的女孩，儿辈不能供她读书，家里又把她的脚缠起，太亏苦了。儿念到才女和凤妹的小孩们常这样想：莫非到了我们弟兄三人，就把人才出到绝顶了？我们弟兄不能生聚教养子女，使他们成器，这也是社会铸定了我们家庭的命运。凤妹是父亲、母亲的独女，幼不成才，儿恐她出嫁受苦，又念儿辈读书，父亲母亲

太劳累，故把她招婿家内。而妹夫又不成才，倒使父亲淘气。儿屡次请父亲把他分出另居，使他受些磨炼。凤妹的小孩，儿也常想使他们受些教育，可是亡命在外，怎能做到？今后只有望大哥扶持他们！大哥现在已有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儿的那个小孩，如果能够长大，父亲已有六七个孙儿女，或者他们中间还有几个可以教育成才？

我们家里从来都穷，但穷不会穷死人，以后也不必积钱。只要教育子女，让他去充分发展个性，不要过于爱惜他。像父亲对儿辈，这就是培养人才最好的方法。把他送到社会上去，让他在艰难困苦中，在各层的社会中去增加阅历，求得知识，培养得冒险勇敢的精神。艰难困苦不会磨折死人。孟夫子说得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很好的教育原理。不过应该要处处提高他的自动自觉的精神。儿辈弟兄三人，就是在父亲这种教育精神中培养出来的。儿幼时本来是个多病怯懦、怕鬼怕死的人，每天想到地狱的苦痛，会独自在广场中拜空祈祷；三人同坐，要坐在中间，大姐一说“张国亮（打死的木匠）来了”，就会把我骇叫起来。可是自入小学以后，父亲那样上心教育我们，九岁就会讲《四书》，我记得一次讲“不有祝托之令而有宋朝之美”一章，全堂讲不出，我解释“而”字是“而不有”的省文，很得父亲夸奖。我在父亲手里，只为赌钱着打五个戒板。后来父亲不有教学，我就不耐烦去读，闲在家里，父亲并不责备。大哥从大理写信来约我，我只十一岁，就跑去大理入中学，父亲也许可我去。我和保生叔上大理去，学堂已上课半学期，我进去一转，问都不有问，又跑回来，只用了半元钱。第二年才去考高等小学。读了年半，同校长斗气，又跑回来，（校长是个很好的校长，我现在还忘不了他）父亲也不责备。在家里混了一年，读《四书集注》，看《西厢》，

吸草烟，父亲也还是好好地教育我，只是把我的烟袋丢了。第二年父亲知道校长换了，才领我去耍水木（目）山，暗地送我到学校去，到清华洞才同我说出，我也就去。从此我在小学毕业，又到中学去。三年后，闹了很大风潮，不能在大理存身，我约着一个同学回家，要转学省城，父亲也不责备，好好打发我来省。当然我并不把闹风潮的事情告诉父亲，只说要学英文，预备升学。这时大哥已去北京读书一年（民国七年）。可是临走时父亲嘱咐要再闹，好好读书，我才知道丁其彦校长（丁先生办事能力不好，但是一个心地很好的校长，待我很好。我民国七年[八]年到省，和萧四先生去找他，他不理我，可是我常思念他）到云南驿，已经把学校风潮说出。我自民国七（八）年到省，只是专心读书，不交朋友，不做什么活动，那时省城的学生很少认得我的。民国八年（九年）到北京，考期已过，我补习一年，非常专心，连同乡都很少来往。我在北京穿的棉衣，是家里缝的粗布面子，裤子袜子都是家里带去，布做的。我们随去哪里，只带很少路费更不管以后用度。中学以前是父亲给我们的教育，中学以后，是自己磨炼出来。

我在高级小学二年级以前，是读经复古的旧学气派，秦汉以下的书不读，我最恨同学们读《东莱博议》。禅二科遍、规后的文章不读，中学三年才读明清诸家归、曾、姚的文章，到省后5看《新青年》。可是我自幼却爱学数学，学校考试数学总是一百分。不过在中学以前，总觉得数学和别样自然科学不有什么深远的学问，我们的数学教员周南先生告诉我们“数学好可以读《易经》”。我们的理化教员周谟先生是学庄子、学佛经的人，学校的风气只是读古文、写字。我在中学时候是最用功的一个，每天早上三点钟就起床，用功过度，脑部得病，可是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读古文上。

民国八年以后，我专心想学数学物理。民国十三年后，因母亲和三弟的刺激，我被社会的潮流卷进革命来。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在安宁州的路上被捕。

我详细写出幼年生活，在于叙明我的生活方向发展的基点。人的生活 和思想，并不是孤立地自由发展起来，而是社会环境所规着。如果没有母亲和三弟的刺激，没有父亲这样严的广大的教育，没有现在的时代和儿半生艰苦冒险的生活，也锻炼不出你的这样的儿子。儿的幼年以至现在的思想的发展，代表着所处的时代的发展。儿在性格上得到母亲很深刻的影响，幼年时代得父亲优良的培养，而壮年始被社会潮流所卷入。

父亲！儿恐难与父亲见到一面！儿写到这里，心里是怎样的难受！儿自民国七年离开父亲，日夜思念！然无由得见父亲，一则为我的事情羁绊着；再则不能不硬着心同我的父母兄弟朋友隔离，以免彼此牵累。父亲虽然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但父亲相信我是正直的人。从前，就是现在，我也只能用移孝作忠的道理来安慰父亲。父亲是最达观的人，儿现在已满三十二岁，颜子也不过活了三十三岁，他并不有做出什么事业，好端端地病死，孔夫子空夸他一场。安弟比儿尚小几岁，已死去多年。儿不忍也、提到的二弟他也短命死去，又有什么法子？如果谣言是实，大哥真正病死，那就是儿尚残存，对父亲也是最伤痛的事情！大哥空生一世，也是最可惜的事情。所以儿那时听见谣言，非常伤恸，决心冒险回家见父亲。现在儿已打听确实，大哥尚康健，近且添一男孩，这是可以安慰父亲的一件事情。儿生三十二岁，身体处处康健，只是脱了三个牙齿。儿自信不有做了什么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人类的事情。而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从表面看来，父亲活生生的儿子，儿媳最亲爱的丈夫，纪儿最伟大的父亲，

被人夺去，是最可悲恸的事情。可是父亲是最达观的人，古言说“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天下人听见云南就要骂王懋廷是个无耻的人；云南人提着王字，就要指着祥云县说些不好听的话！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儿并无痛苦，儿常想，病着慢慢地死，比立刻死去要痛苦得多。一般经历过的人说：枪打不疼，过后才疼。那么认得时已经死去，有什么痛苦？儿对人生，层层看透，自信比和尚还了悟些。不单儿毫无痛苦，说穿了，也是使父亲在无法中从宽处想的一件事情。儿久在穷人土匪中在过，那些人把杀人看成杀鸡一样，就是他的父母妻子被人杀了，也并不在意。儿再解释一层，曾国藩弟兄死在军中多人，曾温甫头都找不着，曾国藩还说笑说，他是先轸丧其元<sup>②</sup>。就是儿那聪明多情的媳妇，当她看见这信也总会宽心一点。父亲和儿媳，你们看了这信，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忍着心离开你们！你们应该用更伟大的爱安慰你们自己！你们大家可以常常想着父亲的儿子，儿媳的丈夫，纪儿的父亲，还是活生生地同你们在人世上，不过因为他的事情，在着远处，不能来同你们见面。儿幼时独自一个骑着青马去找朋友，走着僻静小路，忽然想到：“如果我被贼来杀了，我的魂魄还是要回家去，随着父亲、母亲，常此读书。”这是痴儿说梦，可是有真正道理。我们只要把“祭如在”的话，改成“记如在”，就会大家安慰了！

儿所做的事情，是反对官府的，这是主义上的事情，私人不有什么仇气。儿被捕后，龙主席也很优待，他打发人问我有什么话说，也允许我写信回家，不过要经他看过。

儿已写给他一信，第一，望他把这信保存，将来成为历史上有价值的

文章，让历史来证明儿的眼光；第二，托他在个人关系上优待家属，因为我家从此只成历史的家庭，与人也了无恩怨；第三，我也希望再活些时候，能够在学问上再做些事业。儿想写点云南历史上的著作，写点少数民族（苗夷）问题，分析法\_来云南后的社会经济情形。儿被捕后已经没有再做革命的希望，儿也决不变节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如果政府许可我单做学问上的事情，我也不固执小节，一定要死。可是我也并不强求要活。著书立说，只是一些皮毛事情，儿的真正价值不在这些！

儿一两年来，在工作上有许多烦闷。儿自信对云南事情有些看到的地方，可是大家不大了解。我有我的事情，不能常在云南，他们又不放我出去，以至于闹到这样现象，全局都吃很大的亏。他们也许抱怨我、骂我，可是儿是一个刚强的人，不怕什么。也许我写给龙的信，是他们骂我的材料，可是我并不怕。就是儿媳们听见任何难听的话，也不必着急。儿有儿的志节，儿有儿的见地，让历史来证明儿的意见，批评儿的意见。儿是真理的拥护者，是至刚至烈的人物，不隐藏自己的意见。儿绝不带害朋友，可是要拥护自己的意见。云南还一事无成，现在更发生很大困难，可是儿有许多意见一直相信是对的。人们看着我是一个英雄，有领袖观念，其实儿是一个性情固执而无私心、度量宽大的人，对朋友太严厉，常引起妒恨，其实事情一了，从不与人计较。事久自明，只是证明他人的褊狭自私。儿在这里有些牢骚，因为他们这些褊狭自私，是败坏事情的主因。可是儿绝不卖朋友，他们可以大家放心，也许儿是一个处处讨人厌的黑老鸦，人们还是要乘我不会说话时来诬枉我，我在临离省的一晚，还听见一些诬枉的话。他们的主张错了，扯些谣言来掩盖。可是个人的是非不要紧，大家总要用诚实的态度去迎接真理，才算一个真正的“人”。我希望儿媳、纪儿和

侄儿们，勇敢地去做一个“人”！他们的丈夫、父亲和叔父学问很浅，性情偏执，可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值得他们永久纪念的！

儿想到母亲也很安慰！母亲上前死去很好！如果她还活着，当她的爱儿被人夺去的时候，不知如何伤心！儿不有法子向母亲解释！母亲！但愿你饶恕你那狠心的儿子！你的儿对着你流下泪了！

儿最不放心的，就是那热爱难舍的媳妇，她为儿受尽一切人世的苦难。生别已急得她吐血，当她知道儿的消息，不知如何情境？儿不忍在此多提及她。凭她和那“人芽”在人世中去赌她们的命运，就像赌钱一样，凭着偶然的定则。如果她一个人残存人世的时候，我不愿意她孤灯独守，这话也许使她更伤心，她常骂我残忍，可是这是苦的真情。当想到那孤灯如豆、孤影独衾的境况，我为她如何难堪！她永久不会忘我，她的黄金时代，无论如何不能再现！我们的甜蜜生活，每一秒钟都引起她和我的深刻印象！我常同她说深情的话，计较到一言半语，弓1起她的多心，她一定会饶恕我！我爱到她的每一根头发！

父亲！这说不完的话要从此收束了！我最后还是还是要解脱一切，像那和尚一样的安定。儿现在说点乐观的事情，再来宽慰父亲。我们的家庭已经成为历史的家庭，与人世了无恩怨。如果是可能的话，把家里照料得出头绪，父亲可以领着孙儿们到省城来，把大媳妇、二媳妇都聚在一块，待纪儿、侄儿们长大，好好教育他们。就是大哥一时不回省来，也有媳妇、孙儿们来安慰父亲。其实就大哥也只是一个教书匠，他不过为儿担了虚名，今后也再不会有人计较什么！

儿往时与朋友同游安宁州澡塘，心爱那里的山水，那水是碳酸泉，不独可以浴身，并可饮。儿每就潭捧服，每饮至饱。儿常与朋友谈及，愿与

王友同葬洗澡潭。而此次又恰在安宁州遇难。在父亲说来这是定数，在儿说来这是偶然的事情。数的事情，都是偶然的。儿自笑中国人对遗体的重视，可是说在这里可以安慰父亲。其实儿一直到现在还不有经过审讯，一切都还在偶然的定则下管束着。我这里只是把要说的话早早写下，因为这信是否能够达到父亲手里，还要看治舟先生是否允许？儿想为父亲写一传，并给儿媳一信，还要看以后情形。如果一时不致有什么事情，也想请父亲来省一见，但是也还没有想定。

此叩

安好！

儿正麟叩于五华山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转载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

# 耶稣是什么东西？

王复生

耶稣诞日兄弟问哥哥道：

“耶稣是什么东西？”

兄——耶稣是古代犹太国里面一个木匠的儿子，并且是一个私生子。耶稣和我们一样，生得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肚子饿了要吃饭，身子困了要睡觉，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有时神经病还带得很重的。

弟——那末圣经上所有的记载都是假的，都是撒谎吗？

兄——完全是假的，完全是撒谎，丝毫不可信！丝毫不足信！这里有个道理，待我说来原来古代的人，知识能力比较薄弱，有许多要想知道的事，想不通，有许多要做的事，做不来，越想越急，希望有一天早早的知道有人能做，日子久了慢慢的便把大家心里面所想的、所希望的人格化了，觉得要是有这么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神，——知道我们所不能知道的，做我们所不能做的，帮助我们知道现在所不知道的，做我们现在所不做的，使我们智慧，使我们幸福、享乐，那就好了。于是自然而然的，赞美讴歌自己心目间平常所想象希望早日出世这个人格化的神。日子久了，种种灵异的梦幻的奇迹就发生了，一天比一天加多。于是这个古代犹太木匠的儿子，带有神经病的耶稣就变成灵异的集箭操，种种诞妄无稽、滑稽可笑的东西，都附会在他身上了。于是这个一头两脚，肚饿要吃饭，身子困要睡觉，平平常常和我们一般的犹太人，就变成一个神奇鬼

怪、全知全能耶和華上帝的兒子耶穌了。老實說，耶穌不過古代西方一個誠實可靠，宣傳希伯來宗教教義最熱心最勇敢，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至死不悟”的迷信家罷了。

弟——哦！哦！我明白了。

兄——所以我們應該相信我們自己，不應該相信什麼上帝、什麼神；我們就是上帝，我們就是神；除了我們自己外再沒有什麼上帝，再沒有什麼神。只有我們自己全知全能；除了我們自己外，再沒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再沒有全知全能的神。

弟（恍然大悟）——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此文是王復生于1925年為陝北反基督教同盟作的傳單。原載1926年1月22日《革新》第六期，署名甦。轉載自中共黨史出版社《一門三傑——王復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紀念文集》）

# “三一八”流血的代价

王复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五卅惨案”曾经证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的仇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三一八<sup>①</sup>流血证明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是我们的仇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们既认清了我们的敌人，我们仍旧伸长脖子，挺起胸膛，让我们的仇敌，人类的蛇蝎屠杀、宰制呢，还是觉醒、奋起，奔杀前去，打开一条生路呢？

此次事变的起因，大家都知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援助奉系军阀，及安福卖国党，压迫国民军退出津京，操纵中央政局，恢复已失的优越地位。假借日本商船旗号，率引奉天军舰，攻击大沽不遂，联合其他帝国主义者，借口辛丑条约，提出通牒，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奉系军阀张目。北京民众，因反抗帝国主义者无理通牒，请愿游行，横被卖国政府枪杀 50 余人——因此我们平素所主张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互相结托以危害中国，欲求中国独立，自由，须打倒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官僚的理论完全证实。

国民军平素号称接近民众的武力，竟纵容卖国政府枪杀请愿民众于其统治区域——因此我们认识军阀官僚，原是一丘之貉。“誓死救国”，“保国卫民”，全系骗辞，必须彻底澄清，国民革命，只有民众自己担负责任，从新建筑基础。

惨杀发生以后，吴佩孚、李景林等曾致电卖国政府，诬陷民众为赤化，

为共产党，主张严办，助长段贾<sup>②</sup>杀人罪犯的凶焰。——因此我们认识军阀卖国，仇视民众，原属一气，彼此互相结托，民众应该一致觉醒，联合战线，以扑灭之。

此次惨变，无耻的新闻记者，大学教授，及反革命团体，陷害，指示，或为之回护，曲辩——《晨报》、《社会日报》等，硬诬民众携带手枪、木棍、洋油；梁启超、徐志摩，硬将责任归诸民众领袖徐谦、李石曾等，师大教务主任查良钊、北大教授燕树棠等且以是主张提出九校教职员宣言始终不能发出；北大教授陈源等硬诬女师大校长易培基，“三一八”放假一日，强迫学生前往参与，杨德群女士因病不去，易为之雇车，并出车钱 40 枚，其他中小学学生，多系教职员强迫，不能不去，惨案发生的前后，国家主义分子大形活动，研究系亦然，事前一晚有假充北京学生代表的幕某<sub>2</sub>，坐在贾德耀床上密谈竟夜，贾且为之供给茶点面包，事后恣恣段祺瑞、章士钊，借端洩忿，通缉清室善后委员长兼农大校长李石曾、中俄大学校长兼俄国赔款委员长徐谦、北大教务长顾兆熊、女师大校长易培基，更欲通缉各校教授陈启修、朱家骅、周作人、鲁迅等数十人，学生百余人，希图排斥异己，一网打尽，夺取几个肥缺、位置。几个国立大学及教授，以便私分赔款，把持教育，传布谬说，一弓此，们认识知珊级滔天罪恶。这种罪恶，平素为他们伪善的态度辩的言辞所隐蔽，极容易夺取我们的同情，为我们所容恕。知识阶级，原为一种游离的附属阶级，经济地位，极不确定，往往随物质与金钱而转变，本是有奶就认娘的一种下流无耻的东西，我们不仅不当迷信他们的言论，受他们的欺骗，且当设法裁制，使其不为害于社会人心。他们本是延长恶势力，替恶势力辩护的渊藪，他们的罪恶不下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官僚！

被压迫的民众们！我们的敌人，张牙舞爪，四方八面的向我们进攻，宰割吞噬我们，我们也应该一致奋起，联合战线，向他们反攻，求最后的胜利。

（转载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

---

①三一八：即“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侵人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人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罪行，遭到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云南籍旅京学生、共产党员范士融、姚宗贤遇难。

②“段贾”：即段祺瑞、贾德耀，北洋皖系军阀首领。1924年直系政权垮台后，段祺瑞被奉系及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贾德耀的为总理。1926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

## 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

吉国桢<sup>①</sup>

大会<sup>②</sup>闭会最后一天，即决定西安市委工作由我兼负，特别讨论了陕北工作，因陕北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有发动游击战争的可能。即决定以绥、米为中心，在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之下，配合横、佳灾民，并与延安、榆林军事工作配合，以发动陕北的游击战争。此时[陕北]有组织者

榆林：二十人左右；

米脂：四五十；

绥德：近百；

清涧：近百；

延长：二三十；

神府：四五十；

[盐]池横山：二三十；

士兵<sup>③</sup>榆林八九十；延安二三十（井<sup>④</sup>的中心部队）；神府二三十（高志清部）；陕甘交界五六十（苏雨生部）。

（转载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北革命根据地》）

---

①原署名为纪国桢，即吉国桢。

②大会：指1930年7月上旬召开的中共陕西省第五次扩大会议。

③士兵：指士兵中的共产党员。

④井：为井岳秀。

## 钱清泉遗嘱

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我死后，切勿棺葬，可火葬后投人大江，随滚滚东流而入大海，何等干净！现在中国社会之坟墓制度，以一袭臭皮囊，占据能生产之土地，实为万恶。望革命当局，将此制度随我同葬江海，亦革命事业之一也。我家遗产，仅破屋两间，荒田十亩，我母在时，谁也不能变动。我母死后，伯父家遗田，可悉归金姊才妹主持，屋及西边降堂后六分，可分给四姊外甥家，西田给保根抵债。刑家田二亩，西边田一亩三分，除母亲丧费外，可捐入公家作为教育费。此嘱！

此纸义贞、四姊、金姊、五姊、才妹同执。

中华民国十七年 x 月 x 日

钱清泉临行亲笔书

# 我寒假内的工作<sup>①</sup>

王兆卿

近来一般青年，都说“到民间去啦”，“妇女解放啦”等等名词，其实不过是纸上空谈了。我们要免此弊，应该怎样呢，就是足踏实地地到民间去宣传，以达我们之目的地。照这样说来，我们非实地工作不可。可是，我们现今正是求学的时候，怎能够这样办呢？以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假期中宣传。假期中工作，我们对于他要特别注重，才能得到好处。所以我去年在寒假中就留心，但是也没有得到大的效果，不过我现在把去年寒假中办过之事写出来，一则看关于哪一类的事好办，哪一类的事难办，再则以备后日之遗忘。我去年寒假的工作，今分别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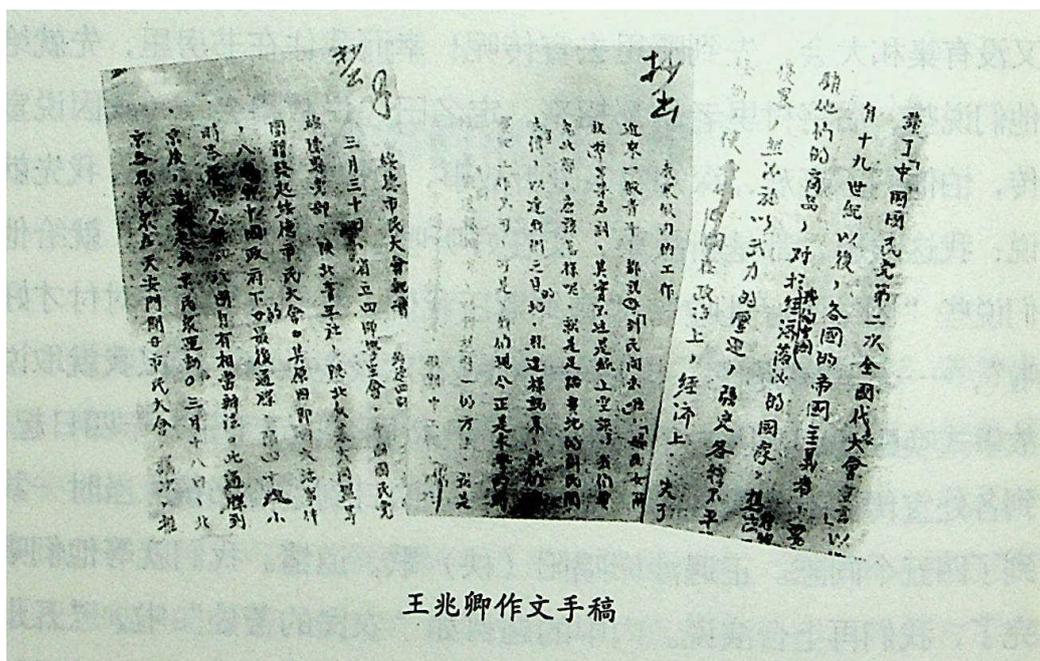
1. 关于教育的：当我去年腊月十二日回在家中的时候，适遇我村有一私塾，将要下学，我就没叫他们下学，给他们接续地往下教，教了两天时，我就把书房定了一个名为“平民补习学校”。后又有本村几个人也加入了，内中有一高小学生（现今在兴县二高住着）我一下不在时，就叫他照料。可惜内中都是些好青年，了无用的些杂字，却（恰）好我回家拿几本《平民千字课》，就给他们教了些。后又抄的几本，他们都是爱念，以为那是一种很奇怪的书。后又要求我给他们捐的买，我就给应允下。办了一个月，因我要到校求学，没有人继续，想请先生，没有银钱，所以也就关门了！

2. 宣传：我既然住在一个偏僻（僻）的乡村里，居民也不多，又没有集和大会，先到哪里去宣传呢！幸而我住在书房里，先就给他们说些，后

将村里老幼都招来，定名曰“说故事会”（我因说宣传，怕他们不喜欢，深知农人爱听故事，所以定名说故事）。我先就说我这故事，都是新故事，实在好听哩。于是有闲工夫，就给他们说些“团结的好处啦”，“官绅欺压我们，我们应当怎样对付才好啦”，……一类的题目。以后他们很是喜欢我说故事，所以我就取说故事式唤醒他们。因去年我和旅榆的几位同乡，定下正月十四日起，到各处宣传。于是我就阴（历）正月十四日到了沙峁镇。当时一共到了四五个同志。正遇沙峁唱阳（秧）歌、道情。我们就等他们唱完了，我们再上台演说。内中的题目如“农民的苦处”啦，“五卅惨案”啦，人家都欢迎。就是说了几句不要信神鬼的话，几乎把一部分人就恼地跑了……一直说了四天。十八日又到了菜园沟，因那个地方那几天正是买卖骡马大会，四方人民，大半都去赶此会，我们到时，又加了几位同志。那日午后唱完戏，我们照样又说，当时有一个基督教，我们就说了一场基督教对我们中国的，他们和我们驳了一阵，终究他没得了胜，我又说了女人也可以书有一般人都恨我，及至我回村里酬，我们村里人说那顶不好的……

3. 组织：我们同乡会去年议定，回去可以在本地创立农民协会，我就先在我村说了农民协会的种种好处：能免官绅的欺压，款项的多摊他们一听这些，都很是喜欢，于是农民协会也成立了，后又在村外立了几个，成绩很是不好，因为乡村没有能办公益事的人才的缘故……

4. 调查：去年我们学校制了一种“农村调查表”，我就回去到各村调查，调查完，我统计了一下，各村所受的痛苦，大半是绅士、衙役、警察、保卫团……唯绅士、衙役最利（厉）害。



王兆卿作文手稿

①注本文是 1926 年春王兆卿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时的作文。

# 绥德市民大会纪实<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书于绥德四师)

王兆卿

三月三十日，省立四师学生会、中国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青年社、陕北反基大同盟等团体发起绥德市民大会。其原因即因大沽事件，八国与中国政府下的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不然，八国自有相当办法。此通牒到京后，遂激起北京民众运动。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开市民大会。议决，推举代表去执政府请愿，使政府对于八国最后通牒，严重抗议。此种举动，为世界国民应有之表现。当赤手空拳之民众，至国务院门前时，而段琪瑞贾德耀等之卫队，早已实弹以待，故民众要求使段贼对于此事严重交涉时，而卫队即开枪向民众射击，如临大敌。结果当场打死学生三十七八人，受重伤者二百余人，其残忍实不堪言！此事传到绥德，各团体异常愤慨，所以才开市民大会。

是日下午一点钟在四师操场出发，各人手执白旗一面，上书“打死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取消辛丑条约”、“援助被难同胞”等字样……经过大街，各商人是日闭市半日，皆扶老携幼跟来，一路秩序井然，旁观者皆赞称。不一时，走至会场，地方甚是宽阔，移时各界都来，摇铃开会，首由主席杨明轩先生报告开会理由“……大沽口为吾中国之土地，而列强压迫满清订下条约，彼时满清因义和拳之乱，恐惧外人，始订下此种不平等条约，现在我国已成共和，当然不成问题……吾等民众去执政府请愿，系

爱国运动并无轨外情事，而执政府尽杀吾等民众，视如草芥。无轨外情事，而执政府尽杀吾等民众，视如草芥。诸位以为可惜不可惜……”说毕，民众异常悲愤！后由张秀甫、韩叔勋、王子修诸先生相继演说，台下之人，竟有流泪者。后通过议案四条：通电慰问被难诸烈士家属，通电警告各公使，宣告卖国贼张作霖段祺瑞罪状……继而游行，沿途呼喊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抵抗二次八国联军……此为当日之大略。

---

①注本文是1926年春王兆卿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时的作文。

白明善一九三一年在狱中写给惠仁闻的信

仁闻：心思散乱，神情恍惚，予既步地，不知从何说起。只有  
有良辰，一切顺其自然吧！  
君有移此次房（籍），另你姓？  
每一念及，殊为难安。不过你拜月少至长，原属深知。兼之  
至我情谊，只好老厚其款，好受感愧了。我的事现在不  
是初尚一样的，不过只知进出来，随我的是张鸿猷，郭狗官  
又不知及什么人的指示，在呈款时也说了许多坏话，所以不能早  
为结束，不过都一样的，是场空惹梅，言言事实，将来此  
何？全属难料，但六房每如此，何心已。前此不卷，  
顺祝  
台好均好！

白明善 丁丑

# 杨重远家书

炳文兒：

自二月廿日以後，先必尋爾信三件，此  
 刺也已收到了。我的傷已好，八九成了。前  
 日方同師教人，面謁醫院院長，請求慈憐，  
 出院證書，請補助川資，以便旋里。均  
 允准照辦。不料三月一日，津浦路北段交  
 匪斷絕，共軍軍事行動，暫時不能起  
 程。似在醫院等候，惟信件可由青

島海道轉寄津平。

死了的和生人，都死在荒涼的野地裏，  
 埋着。我看見他們的尸骸，倍覺悲慘。  
 如果津浦線交通最近不能恢復通  
 車，我預備先到濟南，由膠濟路到青  
 島，乘輪赴平，再定行止，此意實不願  
 友位。  
 我前番寄回的像片上的五個人

中的高捷，高陣亡，其餘均各自東西，且  
 其時尚未離陣亡，此則不知在何處，我  
 很擔心，我很想念。

大向前途，漸趨惡化，雖各方有  
 和平和議，女電優渥，但恐事實上不可  
 行也。能再述此間

父重遠字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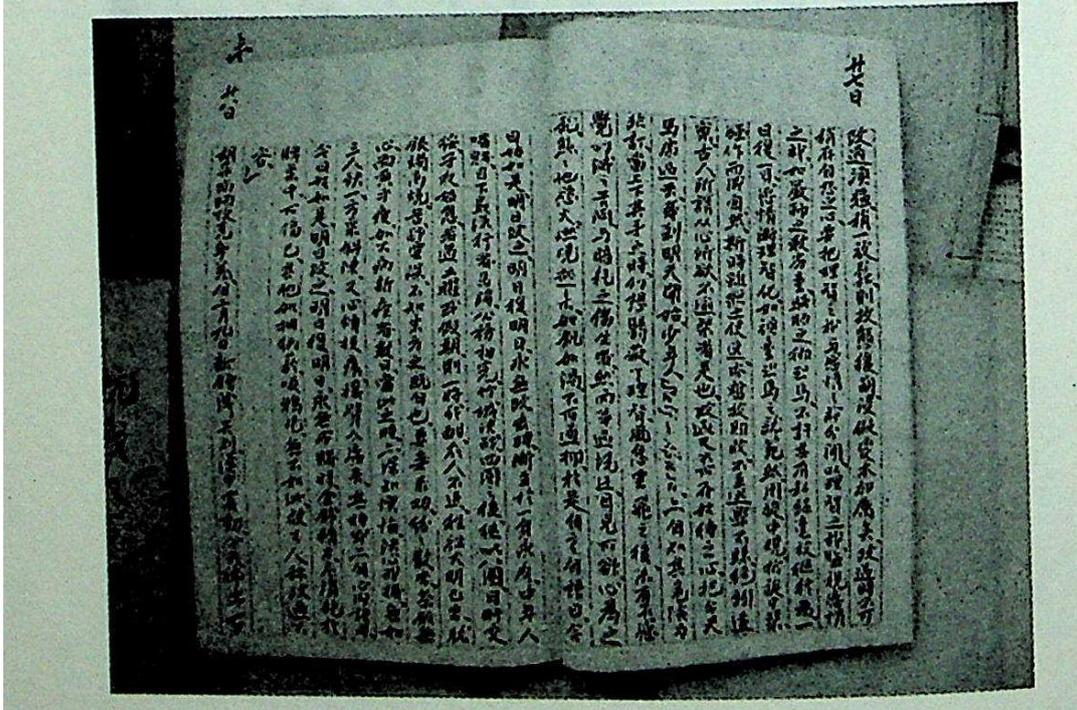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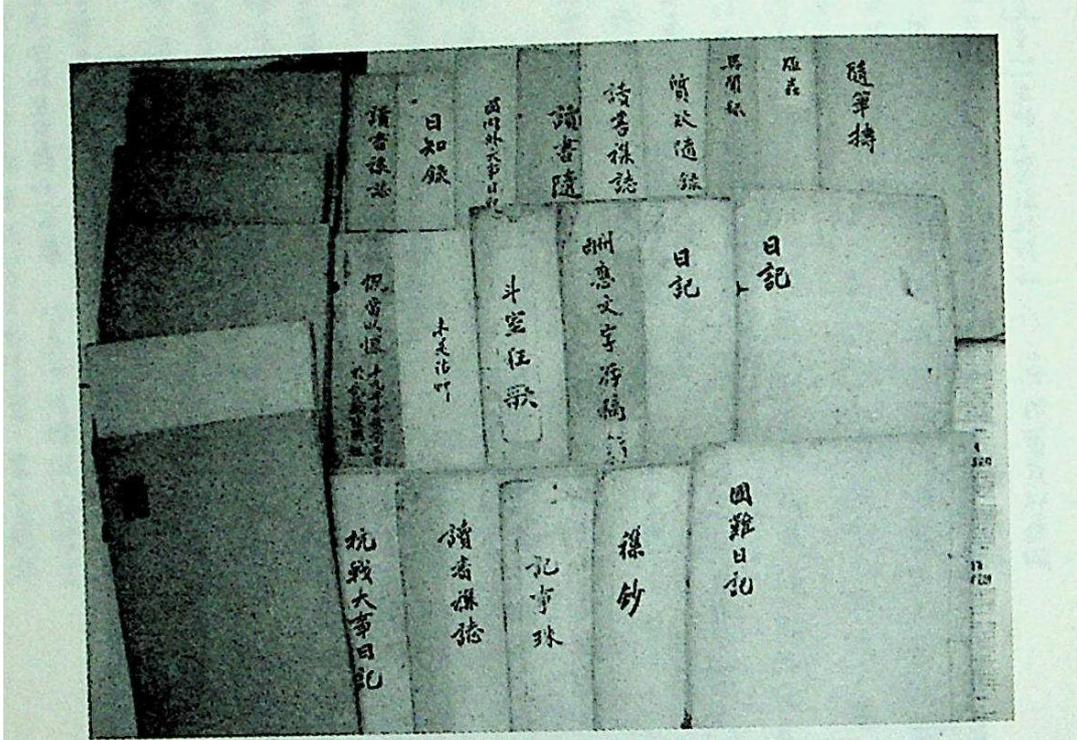








# 徐梦周手稿



# 回忆、纪念文选

# 纪念李子洲同志

(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

杨明轩、赵通儒、常黎夫

李子洲同志原名登瀛，1892年生于陕西省绥德县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银匠）。青年时代在西安三秦公学求学，中途因家贫回绥德任劝学所视察员，后得地方公费资助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求学，1923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毕业。

在北京求学时期，子洲同志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干事，直接参与了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1921年他和刘天章、魏野畴等，以在北大的陕西旅京学生为中心，创办了《共进》杂志，次年成立了共进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西北的进步青年学生，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1922年他曾在《共进》杂志上著文批判封建教育思想，阐明教育的意义及其发展，积极传播文化运动。子洲同志是西北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参加李大钊同志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北大毕业后，他曾执教于三原渭北中学及榆林中学。1924年秋，到绥德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通过党组织调派并从各方面聘请进步的知识分子充任教职员，亲自给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浅说等课程，并在校内组织《共进》分社，推销《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1925年至1929年，他一方面以四师作阵地，以师生为核心，批判封建思想，

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建立中国共产党绥德特别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四师党、团组织为据点，在陕北各县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和团的组织。还发动和领导陕北一些县的学生成立学生会和陕北学生联合会。同时，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号召，组织了陕北国民会议促进会；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国民党成立了陕北特别党部；并于1914年派杨明轩同志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

子洲同志十分重视群众运动和社会教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一四师教职员和学生除星期日经常有组织地向近郊农民和城市手工业工人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外，还利用革命节日（如红色五月要派学生下乡工作一两个星期）和假期大量组织学生下乡。到1926年，绥德、米脂等县农村大部组织了农民协会，城市工人和儿童也都有了；自己的群众组织。他对于学生的课堂学习抓得很紧，绝不因参加社会活动而有所放松。教学计划周密严谨，经常举行测验，督促学生认真学习。为倡导社会教育，他改组绥德劝学所为教育局，清理教育经费。创办简易师范，培养小学师资。解散了有名无实的县议会，以其经费兴办平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并且利用平民学校校址举办夜间教学班，由四师学生担任教员，使绥德的贫苦儿童和成年人受到免费教育。推动榆林米脂等县也兴办平民教育。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绥德地委成立，子洲同志是地委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冯玉祥、刘伯坚（中共党员）率国民军入陕解围西安。党在西安建立陕甘区委后，他被调负责组织工作，还参与了建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工作，领导建立了陕西省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小学教师联合会以及西北青年社等群众组织，参加了建立武汉全国

农协筹备会的工作。为了培养西北党政、民运、妇女、青年等各方面的革命干部，党决定由子洲同志创办中山学院，由刘含初和他担任正副院长。

1927年，子洲同志到武汉，代表陕西省委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回陕后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领导陕西的党组织清算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和巩固了陕西党组织。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子洲同志任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他参加领导和组织了1927年的清涧起义、1928年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斗争和“三原缴农”等农民运动。

1929年2月间，省委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子洲同志被捕入狱，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于是年6月间牺牲。

子洲同志是西北党的创建人之一。他为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坚贞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善于把革命理论运用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在任何危急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冷静沉着，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研究，周密分析、洽商，因而能够自如地恰当地加以解决。

子洲同志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和宣传说服才能。他善于团结干部，善于联系群众，善于使用和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他善于用谦虚诚恳的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帮助别人改正缺点，因此他在同志中有很高的威信。党内外发生的许多问题和纠纷，别人难以一下解决的，经过他的调和评判，就会比较快地得到解决，并使大家心悦诚服。

子洲同志气量宏伟，善于掌握革命的原则性和工作中的灵活性、机动性；善于掌握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及组织形式；善于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

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同志们敬佩他深沉练达、刚毅果断；敌人则恨他骂他“阴谋可怕”。

子洲同志有优良的民主作风。他对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十分注意，对重大问题总是先和大家商量，非常重视和相信群众的创造力量，绝不轻率作出决定。他在四师时，校务和教育会议经常吸收学生代表参加；还常把学生中的优秀党员大胆地选拔到党内外基层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锻炼他们。

子洲同志牺牲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不朽的业绩，崇高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仍清晰地存留在同志们的脑海中。子洲同志精神不死，他将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转载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原载1951年7月《群众日报》，题为《李子洲同志事略》。1984年入编《李子洲》时，经常黎夫同志校阅，在文字上略有修改。）

# 民族的柱石祖国的骄傲

屈 武<sup>①</sup>

在人生漫长的路途中，人们总会有一个或者几个伟人和英雄，作为楷模和榜样，学习他们的思想，效仿他们的品德，寻觅他们的足迹。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拿我来说，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是我心目中最杰出的伟人和英雄，最崇敬的楷模和榜样。在我的心目中，革命先烈李子洲同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曾经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 （一）

我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与李子洲同志相识的。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干事，在北大及整个北京学生界，是一位很出色、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公认的陕西学生运动的领袖。李子洲同志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一名先锋战士，是“火烧赵家楼”的一员勇敢的闯将，而且，他也是这一伟大运动的组织者、发动者之一。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李子洲和其他学生领袖们一起，写标语，制旗子，散传单，作讲演，组织罢课、游行、请愿、示威，营救被捕学生……协助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他崇敬的老师—李大钊同志，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

五四运动爆发时，我正在西安成德中学读书。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西安的爱国学生，以北京学生为榜样，如像江河决

堤一样，纷纷离开书斋，走上街头。到处组织讲演团，散发传单，向商人和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高举抗强权，内除国贼”、“牺牲一切，为外交作后盾”的大旗，尚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诛卖国贼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和“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口号，举行了西安市空前的示威游行。爱国学生的呐喊，使僻处西北、死气沉沉的西安古城苏醒了。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为了表达陕西爱国学生的决心和意志，为了与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取得直接联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推选我（当时我担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和李伍亭为代表，前往北京请愿。我俩于五月下旬到达北京，住在陕西会馆。

李子洲知道我们来了，便和刘天章等人来到我们住地看望我们。来了，他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北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的行动计划和决心。他对陕西的学生运动十分关心，向我们详细询问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听了我们的汇报，李子洲显得十分高兴，连连点头称赞，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语。他和刘天章等人还发动了陕西在京的大中学校学生一百多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李子洲同志热情洋溢地致了欢迎词，我们向大家汇报了陕西学生如何学习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开展游行、示威、抵制日货运动等情况。欢迎大会之后，李子洲和刘天章还引我们会见了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方豪、许德拓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特别是还领我们拜望了李大钊同志，我们有机会亲自聆听他的教诲。这些，都使我们深受感动。由于李子洲、刘天章的引见，使我们有机会向李大钊和北大学生会汇报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弓 1 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我们这次北京之行，大约住了两个星期。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到北大红楼去。北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都设在红楼上，李子洲他们所在的哲学系的教室也在红楼上。因此，李子洲常到这里来。我们在红楼上经常与李子洲同志见面、接触、交谈。我们看到，在那些急风暴雨般的日子里，李子洲同志的工作相当繁忙。他常常忙得饭顾不上吃，脸顾不上洗。但是，他那双聪慧而深沉的眼睛总是闪烁着亮光，总是那么自豪乐观，那么精力充沛，那么满腔热情。他在讲话中常常激动地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决不做亡国的奴隶！爱国第一！”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支配下，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狮子，那样忘我地工作着，战斗着。

那些日子，正是子洲他们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即十人一组、十人一组地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的爱国要求），大规模地开展讲演活动的时候。参加讲演的人数很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多名学生参加。子洲和他的同学们，布满北京城内外的街道、小巷、胡同，甚至家庭院落，讲演团的旗子到处飘扬。他们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有许多同学讲到激动处，声泪俱下，情景十分感人。子洲和同学们还到处散发、张贴传单，并组织民众团体，使运动向纵深发展。这些唤起民众、振奋人心的历史场面，至今回想起来，还如同一个个电影镜头，重新从我眼前掠过，令人激动不已啊！

北京爱国学生的壮举，声势浩大的讲演活动，使军阀政府极为震惊，惶惶不安。反动军警由蛮横地干涉学生运动，进而采取镇压手段。6月1日至3日，北京被捕的学生已达两三千人之多，监狱容纳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但是，反动政府的压力愈大，北京爱国学生的反抗愈强。他们已下定这样的决心为了救国宁愿牺牲自由和生命！

我们从北京爱国学生身上，特别是从李子洲等五四群英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受到了极大鼓舞。我之所以敢于在中南海勤政殿与徐世昌总统辩论，之所以敢于有“血溅总统府”之举，是与北京爱国学生，特别是李子洲等五四群英们的支持、鼓励和影响分不开的。

6月3日下午，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北京爱国学生及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代表，包围了新华门总统府，向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请愿示威。李子洲和我们也都加入到请愿示威的行列。

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集中到新华门前，人数有一两万人之多。当年，新华门外的场地不像今天这样宽广，一两万人就密密麻麻地把西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连“洋车”也过不去了。大家强烈地要求当时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出来与学生见面。但是，徐世昌无视爱国学生的正义要求，躲在中南海避而不见。他满以为，这样一避，似乎就万事大吉了。

他哪里知道，学生们这一回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总统”不收兵！

只见新华门外的学生，这里一群，那里一堆，高呼口号，发表演说，斗争热情十分高涨。我看到李子洲也在场，他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惩办卖国贼！”“我们不做亡国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释放被捕学生！”他在新华门外的场地上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罪行。他还鼓动大家坚持斗争。他说“不见徐世昌决不罢休！”“坚持到底，才能胜利！”

李子洲平日里给人的印象，似乎有点儿文质彬彬的样子。但他演说起来，感情非常激昂，嗓音特别洪亮，很有鼓动性。在新华门外的场地上，李子洲是个引人注目的活跃人物。当年有人评论说，李子洲的演说有“气

壮山河之势”。的确，事过 60 多年之久，李子洲同志高大魁伟的身影，振臂高呼口号和发表演说时慷慨激昂的英姿，以及他那鼓舞人心的洪亮的声音，还是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已到掌灯时分，“警察总监”吴炳湘才大摇大摆地从新华门走来，慢条斯理地对大家说“总统不在，你、们等也没用，时间已经不早了，赶快回去休息吧。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政府以后自有答复。”但是，广大学生根本不听他的鬼话，不上他的当。大家坚决表示：“不见徐世昌决不回学校！”吴炳湘毫无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去禀告主子去了。

这时候，新华门外人越聚越多。许多过往的行人，或是前来看热闹的，也都被爱国学生的热情深深感动了，自动参加到请愿示威队伍中。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人力车工人，他们干了一天的苦力，已经很劳累了，但顾不得回家去休息，而是把一天拉车挣来的血汗钱，买了烧饼、糖果、茶水送给学生，热情支持爱国学生的革命举动。这种真诚的友谊，进一步鼓舞了同学们坚持到底的决心。大家一个劲儿地连着高呼：“我们要见徐世昌！”

“我们要见徐世昌！”

躲在中南海里的徐世昌，听到了新华门外的怒吼。他的走卒们也向他告了爱国学生的行动决心。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晚上十点多钟，徐世昌打发两个秘书出来传话说：学生可以推派十名代表，有何问题到里面去谈判。

这十名代表，是由在场的北大学生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临时围成一个小圈儿，开会协商推举的。李子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北大推举了段锡朋、方豪等五名代表，北高师、法政大学等校推举了四名代表，我荣幸地被推举为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代表。

我们十名学生代表，由段锡朋、方豪领头，一同进了新华门，到了中南海。我们只有十个人，而且手无寸铁；但是，整个中南海却戒备森严，布满双岗，如临大敌。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层层设防。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爱国学生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的确使北京军阀政府着了慌。

徐世昌总统在勤政殿里接见了我们。首先讲话的是北大学生代表段锡朋，他代表全体请愿示威的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对于爱国学生的这些正义要求，徐世昌采取了含糊其辞、敷衍了事的态度。他讲话的大意是学生们的爱国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陈述意见，情有可原。但是，你们学生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被人利用。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好了。你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安心读书，今天游行，明天示威，成何体统！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云云。

徐世昌这个大滑头避而不谈我们提出的三点要求，而是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代表们对于徐世昌的这种恶劣的行径十分气愤，相继发言，和他据理力辩。我激于一时义愤，冲着他涕泣陈词“我们的国家现在都快要亡国了，我们都快要做亡国奴了，你还说安心读书，不要操之过急！像这样，今天丢青岛，明天失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还是如此麻木不仁，无视爱国学生的正义要求，我们就只好以死力争了！”说罢，就以头碰壁，血流满面。人们把这称为“血溅总统府”事件。见此情景，徐世昌一扭身回里面去了。消息传到新华门外，激起了请愿学生的更大愤怒，李子洲带领大家要往中南海冲，找徐世昌当面讲理，并且和军警发生了冲突。

直到深夜一点钟，徐世昌才又派了一名代表（据说是内务总长）匆匆

出来，说刚才内阁阁员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要求，即日起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命其拒绝签字。……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李子洲同志和请愿队伍这才解散。

在请愿队伍解散回校的路途中，反动军警大批出动，李子洲同志和许多学生被捕了。他们被关到北大三院临时监狱中。至此，从5月4日以来，在李子洲等同志率领下的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几乎全体会员，都被关进牢房了！

请愿回来以后，我进医院养伤。同伴们不断带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被捕的同学们全都释放了！”“卖国贼曹、陆、章已经被免职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字！”伟大的五四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 （二）

五四运动三年之后，我在北京又与李子洲同志朝夕相处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1922年6月，我从天津南开高中毕业，来到北京，住在三眼井，准备投考北大。由于我和李子洲同志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后来也有联系，所以在北京重逢，就显得格外亲热。他对我的思想、学习及生活等各个方面，都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

那时候，李子洲与刘天章、杨钟健等人在《秦钟》月刊的基础上，又组织了一个《共进》半月刊社，社址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6号。《共进》半月刊发行很广，影响很大。我这次来北京之前，就曾在南开中学看到过这种杂志，颇受启发和教育。陕籍学生争相阅读。在《共进》半月刊社周围，

团结了一大批陕西进步青年学生。

为了便于陕西青年升学，《共进》半月刊社专门办了一个补习班，为旅京青年进行复习指导。我一到北京就参加到这个补习班里去。参加这个补习班的，有二三十人。李子洲给我们指导国文、史地方面的课程，刘天章等人给我们指导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课程。

李子洲同志对补习班的工作十分热心，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一方面给我们讲解有关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法、修辞及历史、地理方面的基本知识，一方面给我们拟定若干道作文题、习题，让我们做。他对我们的习作尤为重视。时值五四运动不久，李子洲同志又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要求我们一律写白话文，废止八股腔，要求文章写得有血有肉，切中时弊。我们把文章写好后，他又当面给我们一字一句耐心细致地修改、评讲。好的地方，他就表扬鼓励；有毛病缺点，他就循循善诱地提出纠正的方法。就这样手把手地给我们指教。李子洲是北大哲学系的高才生，他在文学、哲学、史地方面知识渊博，很有修养。他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有研究。他给同学们辅导，不但热心细致，而且方法得当，效果自然良好。我们参加补习班的同学们普遍反映，在李子洲的亲切指导下，经过一两个月时间的复习准备，大家都有明显的进步，在高考中文科成绩一般都考得比较好。那一年，我在北大文科考试中，得了第二名，主要得力于李子洲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我到北京大学不久，1922年10月，李子洲等人又发起将《共进》半月刊社改为政治性的社团组织——共进社。李子洲、刘天章二人很快介绍我加入了这个组织。

《秦钟》月刊也好，《共进》半月刊社也好，共进社也好，发起者、组织者、前期领导者，几乎都是当年“三秦公学”的进步学生。被人们称颂为共进社的“四大金刚”的“大脑”（李子洲）、“小脑”（刘天章）、“赵龙”（赵国宾）、“杨虎”（杨晓初）全是“三秦公学”的学生。

“三秦公学”，当年是陕西最有名望的一所学校。校长及许多教员，都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因而，全省各地的进步青年纷纷赶来报名应考。李子洲从陕北绥德，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十四“马站”，赶到西安，来上“三秦公学”，正是出于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无比崇敬。

在这所名牌学校里，在这些思想进步、知识渊博、很有声望的教育和影响下，培养出了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晓初、杨钟健、杨明轩等一批奋发有为、充满革命朝气的青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西北地区著名的革命者。

李子洲的崭露头角、为人所知，始于1915年。这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风雨飘摇的政治局面，使年轻的子洲再也不能安坐书斋了。他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眼下国难当头，有志男儿应当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于是，他便联络了刘天章、魏野畴、杨晓初、赵国宾、杨钟健、杨明轩等同学，在校内校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积极参加到陕西民众反日、反袁、驱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的斗争中去。在那样黑暗的年代，一个中学学生，敢有如此壮举，确实不可等闲视之。从此，这个勇敢的青年的名字，就开始印入一些人的脑海中了。到了北京，进步学生们依然继续拥戴他为首领，这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由《秦钟》月刊而到《共进》半月刊社，由《共进》半月刊社而到共进社，标志着陕西旅京学生运动步步前进的光辉历程。在这一光辉历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子洲同志。

人们尊称他为“大脑”。“大脑”者，首领、司令、指挥之意也(他的头确也比一般人大)。他对共进社的“大脑”作用，他对陕西及西北地区青年的“大脑”作用，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直至1929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李子洲同志高大、魁伟的身影后边，跟随着浩浩荡荡、千千万万的陕西及西北地区的革命青年，与全国革命青年一道，为我们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冲锋陷阵，勇往直前。

1925年7月，在三原召开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时，张仲超曾经题词“共进社是西北文化的晨钟！社会改造的导师！国民革命的先锋！”这个题词，很好地说明了共进社与西北文化、西北革命的关系。但是，这个“晨钟”作用、“导师”作用、“先锋”作用的发挥，却经过了艰难的战斗历程，李子洲和共进社的社员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个重大代价，不只是艰苦的劳动和心血，而且有不少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张仲超烈士是共进社里最早为革命而献身的优秀战士。他牺牲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年仅22岁。

当年，共进社的活动，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而是在反动军阀的眼眉下开展工作的。反动军警——“白腿狗”（“白腿狗”是民众给当时的保安警察起的绰号，因为他们一律穿黑制服，用白布裹腿），经常以“查户口”等名目，来到三眼井盯梢、监视、干扰共进社的活动，这给共进社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共进社的各项工作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并且日益发展壮大，这是共进社的广大社员，在李子洲等同志的正

确领导下，紧密团结、英勇机智、坚持斗争的结果。

李子洲同志对社务工作极为热心负责，从组稿到编辑、印刷、发行，各项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特别是他所负责的发行工作，搞得更为出色。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尽量打开销路，扩大宣传效果。《共进》杂志发行很广，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远达日本和东欧许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志们在他手下工作，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数千份《共进》，十来个同志，边谈边笑，于数小时内即可包封完好，付邮或托人转运。

为什么大家在他手下工作，都感到思想活跃、心情舒畅呢？这是因为，李子洲同志除了具有“敢”字当头、旗帜只鲜明、老练沉着、深谋远虑等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特点之外，他还突出地具有光明磊落、热情诚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许多优秀品质。因此，他在我们心目中，就不仅可崇敬，而且使人感到温暖、亲切，可以信赖，可以向他交心，可以跟他做知心朋友。同志们有什么事情，不论是政治方面的、思想方面的，还是家庭方面的，甚至连个人的婚姻恋爱问题，也都愿意同他交谈。请他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在他的周围，就总是围绕着一大群青年。

子洲同志是革命青年的良师益友，对同志们简直像一团火。他幼时因家贫上学很迟，当他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年已30了。他比一般同年级的学生年龄大五六岁。在我们眼里，他是兄长，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在他眼里，我们都是他的小弟弟。我们称他“子洲兄”“子洲大哥”，他叫我们“经文老弟”（经文是我的号）、“干才弟”（干才是方仲如同志的号）等等。彼此之间，亲如骨肉，情同手足。

他的确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从思想、学习、衣、食、住、

行、婚姻、恋爱等各个方面，都无微不至地予以关怀照顾。他自己生活极为节俭，非常刻苦，不吸烟，不喝酒，不进饭馆，花一个铜板都要掂一掂重量。但是他秉性豪爽，当同学们遇到经济困难，急需资助的时候，却肯慷慨解囊，十分大方。他在热心关照同学方面，在陕西是很有名的。学生家长们在打发孩子进京时，大都嘱咐到了北京，找你子洲大哥，他会关照的！

这是李子洲同志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又像一块坚冰，对封建官僚、军阀势力冷若冰霜，斗争非常勇敢坚定。他在五·四运动中英勇斗争，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就是这样一个同时具有冰与火的性格的人，在他身上，冰与火——对同志、对人民、对祖国深沉的爱与对封建势力、对反动军阀刻骨的恨，对立 1923 年夏，李子洲同志从北大毕业，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的委托，就要回陕西开辟革命工作去了。在他离开北京之前同学们纷纷为他饯行；他向许多老师、同学告别。7 月一天，李子洲同志来到前门外山西街我和部均、武止戈的住处，看望我们，跟我们告别。我们在一起依依不舍地交谈了很长时间。分手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就要回陕西参加实际工作去了，希望你们继续完成学业，为参加革命工作做好理论和知识技能的准备。我们青年一代，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爱国第一、团结斗争的光荣传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做中华民族的柱石，做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谁能想到，这一次的分手，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李子洲同志回陕西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到关中三原及陕北撒播革命种子，后来担任中共陕甘区委、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职务。我于 1926 年春赴苏留学，一去就是 12 年，再没有能够与李子洲同志相见。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天空乌云密布。蒋介石把孙中山先生积一生革命经验而总结的“三大政策”置之脑后，积极反共反人民，同室操戈，枪口对内，杀我同胞，戮我骨肉，此情此景触目惊心，不堪回首。有多少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五四以来所集结的中华民族的精华，倒在反革命大屠杀的血泊之中啊！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令人痛心的篇章！

1929年6月，李子洲同志牺牲在西安西华门监狱。噩耗传到苏联，我和同志们都悲痛至极。一次次空望茫茫南天，遥寄哀思无限。1930、1933年，又相继传来邹均、武止戈同志牺牲的噩耗。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灾难深重我的可爱的祖国啊，您何时才能重见光明？！子洲同志，您在哪里？！邹均同志，武止戈同志，你们又在何方？！极端悲痛中，我对故友的思念之情更切。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轩洲同志来職门外山西街与麵均、武止戈告别时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李子洲同志激动人心的临别赠言“……我们青年一代，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爱国第一、团结斗争的光荣传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做中华民族的柱石，做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特别是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每当我看到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幸福地胃动着、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的情景的时候，每当我和同时代的老同志、老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天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起了革命先烈李子洲同志，想起了邹均同志、武止戈同志，想起了许许多多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们。我在想不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五星红旗，铺平了我们民族胜利前进的康庄大道吗？我在想这样的英雄人物，不正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繁荣、昌盛的柱石吗？我们的

民族、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人物，这样的优秀儿女，难道不应该引以为豪，引以骄傲吗？我在想我们更多的后来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的一代，应该怎样继承先烈们的遗志，为振兴中华，加快祖国现代化建设及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呢？

1982年5月于北京

（转载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

# 亢斋岁月西北风雷

——忆李子洲同志

罗章龙<sup>①</sup>

1918年暑假期间，我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预科。那时候，我和毛泽东、蔡和森、陈绍休等八位同志，寓居于三眼井吉安所左巷7号院子里。与我们一墙之隔的左巷6号，便是李子洲（即李登瀛）、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陕西进步青年学生的住地。共进社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其前身为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秦钟》、《共进》半月刊社等。6号院共有十来间房子，全被他们包租了。住在那里的陕西学生朝夕相处，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居住在别处的陕西同乡，也多来左巷6号聚会，更是热闹非凡。其中最活跃者，除上述诸君外（以上诸君都是我的北大同学），有刘含初、屈经文（即屈武）、耿炳光、方仲如、营尔斌、潘自力（以上也均为我的北大同学）、杨明轩、魏野畴（以上为北高师学生）等。

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杨钟健、魏野畴等人与毛泽东、蔡和森、陈绍休、萧三等新民学会的同志是一墙之隔的近邻，比较熟悉，来往也比较多，饭后茶余，我们常聚在一起谈天，从国家民族大事，到学术思想问题，及至生活趣闻，多所谈及。毛泽东同志虽然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和我们都对李子洲等人有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对李子洲的印象更深一些。别的姑且不论，单从身材、长相、举止诸外形方面来看，李子洲与李大钊十分相似。我们一谈到李大钊，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李子洲了。李子洲喜欢

散步，他常背抄着手在巷道里踱来踱去的鼠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学中庸》上曾有过“北方之强”、“南方之强”之说。我们觉得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他们质朴，豪侠，勇敢，坚强，言必信、行必果。李子洲他们对我们湖南同志的印象也极好，谈话中常夸我们敏于事、慎于言，好学广思，具有“南方之强”的特点。

在黑暗的旧中国的漫漫长夜里，在20年代前后的一段峥嵘岁月中，我们为争中国人民的神圣尊严，为争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团结一致，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令人终生难忘。

## (一)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中心和发源地，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指挥部。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就设立在北大红楼上。

我们的寓所一吉安所左巷，距红楼很近，只有“一箭之地”，钟声、鼓声、哨声、呐喊之声相闻。在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会或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有号令，吉安所左巷一带便闻风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有号令，吉安所左巷一带便闻风而动，“揭竿而起”。北京学联有个总务科，几乎全是陕西籍学生，在李子洲等同志的领导下，他们工作得十分出色，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在很短时间内，大旗子、小旗子就制作好了，标语、传单就写出来了、刻印好了，队伍就集合起来了。李子洲嗓门洪亮，声若响雷，他在那儿振臂一呼，马上就应者云集。游行、示威、请愿、罢课，每次斗争，总是与我们一道，并肩战斗，首当其冲。

5月4日，在有名的“火烧赵家楼”的斗争中，我们就是冲到最前列的。那次斗争中，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以湖南和陕西学生为中心的行动小组，湖

南有我和易克嶷、吴雨铭、罗汉、匡日休等，陕西有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杨明轩、郝梦九等，共十余人。

下午四点以后，当我们赶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只见朱门紧闭。我们高呼口号，让他出来，他硬是不肯露面。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用“踩人梯”的办法，先登上窗台，打破窗户跳进去，从里边打开大门。最先跳进去的是匡日休，他个子高，体力好。紧接着，李子洲和我们几个人都跳进去了。当我们打开大门以后，潮水般的游行队伍蜂拥而入，在这里进行了震动中外的“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在与反动军警的搏斗中，李子洲非常勇敢。他和许多同志都流了血，负了伤。他和呼延震东受伤最重，被打得鼻青脸肿，臂部也受了伤。在这场斗争中，有32人被反动军阀逮捕（学生31人，市民1人），其中有陕西的杨明轩、郝梦九，我们湖南的易克嶷、匡日休、罗海潮等人。“行动小组”被捕同志竟达半数以上！我也负了伤。

5月5日上午，北大召开了学生大会，蔡元培校长也出席了。大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立即决定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简称学生会，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学生会），把斗争坚持下去，推向高潮。鉴于李子洲平时的声望，以及他在“火烧赵家楼”斗争中的英勇行为，大家推举他为学生会干事。在罢课斗争、“救国十人团”的演讲宣传等项活动中，李子洲都是积极的参加者、组织发动者之一。

6月1日至6月3日的演讲、请愿斗争尤为激烈。几天来，从清，到1傍晚，北京及全国各地赴京请愿的学生，布满大街小巷，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到处是呐喊的声音。特别是6月3日下午，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动了一两万人围攻新华门总统府，向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请愿，

要求他亲自出来接见学生，回答学生提出的正义要求。这次请愿规模、声势之大，斗争精神之坚韧、顽强，在我国学生运动历史上，是空前的。

爱国学生的革命行动，使军阀政府极为震惊。当晚，徐世昌在中南海召开了内阁阁员紧急会议。以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为首的一些武职官员，认为学生无法无天，“太猖狂了”，曾叫嚣用“武力解决”，并建议把大炮架到景山，轰平北大。徐世昌等人主张“和平解决”。虽然内阁会议作出了“和平解决”的决议，虽然未把北大轰平，但事实上，“和平解决”与“武力解决”是在交替地进行着。一方面，徐世昌在接见段锡朋、方豪、屈武等十名学生代表之后，表示同意学生提出的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要求；一方面，徐树铮等早已做好了镇压学生的部署。当我们请愿队伍在深夜解散回校途中，遭到反动军警的大逮捕。我和李子洲及共进社和湖南小组的许多同志都被捕了，被关进北大三院临时监狱。

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激怒了全国各界民众。罢课、罢工、罢市之举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在举国一致的强大压力之下，北京政府才不得不向爱国学生低头，于6月5日下令释放学生，我和李子洲及被捕的一千多名学生获得了自由；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伟大的五四运动便胜利地告一段落了。

## (二)

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领导我们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张国

焘、何孟雄、王复生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准备。

中共“一大”会后，北方区委决定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1921年11月初，我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崇焕、王复生、宋天放等十余人，在中央公园（即今之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会，讨论关于发起公开征收会员的《启事》事宜，到会诸人一致推我执笔。半月之后的11月17日，我们的《启事》在《北大日刊》上正式刊出。在《启事》署名的有我和邓中夏、高崇焕、黄日葵、王复生、王有德、吴汝明、黄绍谷、杨人杞、李骏、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宋天放、高尚德、何益雄、朱务善、范体仁等十九人（全系北大学生）。《启事》开宗明义，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如“皓首穷经”，是极为艰巨的工作。我们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大家热心地赞助，并欢迎大家加入共同研究。

《启事》刊出后，北大乃至整个北京立即为之轰动。热烈赞助、积极支持者有之（应该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当年还仅为极少数人所理解，因之赞助支持者为数不是很多的）；漠不关心、若无其事者有之（这是大量的）；强烈反对、横加指责者也大有人在。当时“国粹派”人物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异端邪说”自不待言，且对《启事》本身百般挑剔，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孔子经书典籍浩繁，马克思著作何能与中国群经比拟，指责《启事》文字未免过分夸张，纷纷提出异议。当时，宋天放立即为文驳斥有云孔子亲自著述如《春秋》与《易经系辞》，文字本来不多；《论语》乃孔子门人笔记。今之马克思的《资本论》皇皇大著，非常渊深，何能云言过其实？！闻者始惊服其博学。

正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之际，李子洲等人，坚定地与我们并肩战斗。

战斗。对于我们的工作鼎力相助，对于“国粹派”的流言飞语进行有力批驳。李子洲同志是最早报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会员之一，刘天章、魏野畴等人，也是研究会的骨干会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室在“亢慕义斋”。地址在北大二院西斋。“亢慕义斋”是德文译音，中文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亢，者，高亢之意也。宋天放云••“亢”见《易经系辞》，原文意思是说“‘极高明而致幽远”，即“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具有革命前进之意。

后来，“亢慕义斋”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办公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便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如果说吉安所左巷距北大红楼“一箭之地”，那么距“亢慕义斋”可谓“近在咫尺”。这对于李子洲等共进社诸贤踊跃从事研究会的各项工作，也是一个有利的地理因素。凡是我们的组织的活动，李子洲等人是莫不积极带头参加的。

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除了组织翻译组、讨论会、辩论会，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外，更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比如，宣传群众，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斗争的工作。

1921年1月，我们最初参加研究会的几位同志（主要是我和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我们的同志经常在那里给工人当文化教员，了解工人的疾苦、愿望、要求，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主要工作是规划工人运动，发动工人斗争，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我们经常派研究会的同志，到铁路沿线各站去做发动工人、组织工人的工作。各站普遍建立了工会、党团组织。

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研究会的同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边当然也包括李子洲及加入研究会的其他同志的一份功劳。杨钟健一段时间固定

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工作。李子洲等人多次到长辛店及铁路沿线的一些地方演讲、宣传，参与了组织革命工会、建党建团、发动罢工斗争诸项工作。

为了沉痛悼念“二七”死难烈士，3月22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分别组织了两个追悼大会（均由北大学生会出面主持）。一个大会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一个大会在东城区一个学校。李子洲作为北大学生会的干事，参与了北高师风雨操场那个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这个大会组织得很出色，很成功。参加大会的有五千余人。会上，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铁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及施洋夫人等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台演讲的有30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了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

李子洲参加了追悼大会并书写《施、林及“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的诗篇。诗中写道：

……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要知道“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革命的平民”；

“为革命而死的人虽死犹荣”。

勿愁不能成功；

勿惧牺牲性命！

手枪，炸弹，

前进，冲锋，  
杀尽那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军阀！  
那才能使社会平等，那才算得血性男儿。

.....

这首诗，感情真挚，语气激昂，思想深刻，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诗言志如果没有与工人父老、兄弟、姐妹们一同参加实际斗争的实践，如果情感不是与工人父老、兄弟、姐妹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篇的。他的这首诗在学生界、知识界是很有影响的。在我所接触到的此类诗词中，这首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突出的。

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嘱我编写一本《“二七”纪念册》。我看到这首诗喜出望外，欣然收入。

至今，我还记得看到这一诗篇时候的情景。那是三月末的一天傍晚，我盘腿坐在炕桌前灯下看书。当我从《共进》杂志上看到这首诗歌时，我被诗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住了，一口气读了两三遍。我的心弦与这首诗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二七”斗争的场面又重现眼前。

### (三)

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始人，多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陕西及西北地区也是如此。

1923年夏季，李子洲从北大毕业，受李大钊同志及北方区委的重托，回到陕西开展工作。在此前后，北方区委还委派王复生、王想廷（即王德三，系王复生之弟）和魏野畴等著名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前往陕西工作。特别是李子洲、王生、王懋廷等同志，于1925年在陕北绥德建立了中

共特别支部。党的组织迅速地扩展到榆林、延安等地。

虽然我同李子洲同志在北京握别之后再未相见。但对他回到陕西以后，卓有成效地开展建党建团的情况是清楚的。一方面，中共绥德四师特别支部及其后的中共绥德地委、中共陕甘区委，或是派人到北方区委请示工作，或是写书面汇报，同时我们对陕北及陕西的工作，也有过不少文件、指示。李子洲同志给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写过几封信，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也托人给他带过几封信、刊物等。另一方面，我在赴各地巡视工作期间，也常听到同志们议论李子洲的巨大影响。西北地区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是共进社社员，他们或是李子洲的同学、同事，或是他的学生，大家一谈到他，总是多有赞美之词。

1925年，直奉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向北方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区委开始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926年夏，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我党在张家口召开了西北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与陕西的工作关系十分密切。

这次大会以京绥铁路总工会为基干，西北各革命阶层、各民族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冯玉祥的国民军数千人也出席了大会。这是张家口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苏联政府对于这次大会极为重视，委托加拉罕大使到会祝贺，还派了一个顾问团（内有不少中共同志参加）。李大钊同志和我都到张家口去了，我们带了由北方区委十余人组成的一个工作团。会议开得很隆重，很热烈。

就在这个时候，陕西西安的局势，出现了严重情况。已被陕西人民驱除出境的反动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下，于1926年春，纠

合十万之众，由潼关入陕，围攻西安。党组织和西安人民协同留陕的国民联军及一部分陕军，进行了异常艰苦的反围城斗争。昔日繁华的古都、闹市，到处是断壁残垣，瓦砾遍地。冻饿而死的军民，达四五万人之多，啼饥号寒之声遍于三秦。

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北方区委几经研究，确定采取以下两条重要措施一、加强和统一党对该地区的领导，经请示中央同意，委派耿炳光（当时耿在北方区委工作）、李子洲等同志，组建中共陕甘区委；二、在苏联顾问团帮助下，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举行了有名的“五原誓师”，南下解围。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及苏联顾问团乌斯曼诺夫、谢依夫林等随部南下。国民军经宁夏、甘肃和陕北榆林，于10月底分兵两路抵达关中。这样里外夹击，给刘镇华以致命打击，11月28日，被围困8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解围了。

李子洲他们开始组建陕甘区委的时候，面临重重困难，工作千头万绪，问题堆积如山。但是，以李子洲为代表的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同志，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气魄，率领广大党团员和各阶层人民，团结奋斗，闯过难关。在很短时间内，促使陕西形势发展很快，出现了大好局面。同志们都称颂李子洲同志为“西北守常”（守常是李大钊同志的号），“陕甘党组织的顶梁柱”。

1926年9月至1927年7月的一段时间，我到中共武汉分局工作，对陕甘区委的工作也是十分关注，多有来往。我们曾先后派汪士楷等十余名同志，前往陕助轩洲同志及陕甘区委开展，他们到陕西以后，在陕甘区委领导下，在成立政治、青年、妇女等方面的训练机构，培种急需人才方面，做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1925年夏，为了加强党的军事工作，北方区委曾经选派了一批同志去黄埔军校学习。李子洲的学生刘志丹就是其中之一。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东路军中工作。后又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任第四路军马鸿逵部政治处长。1927年夏，冯玉祥叛变革命，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刘志丹等32名中共党员被扣留，押解出河南。刘志丹历尽艰险，来到武汉。

当时，我担任武汉中央分局工委书记，同时又是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刘志丹与我们接上关系后，我们安排他到武汉军分校去工作，大约有两三个月时间。其间，我与刘志丹同志多有接触。当年，我们武汉局的同志对刘志丹的印象很好，觉得他是年轻有为之士，有胆略，有气魄，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刘志丹与我长谈了几次，围绕白色恐怖下如何开展党的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经历，介绍了他的老师李子洲在陕北的卓越功绩。每当提到李子洲时，他就喜形于色，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与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及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那时候，中共陕西省委（7月上旬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正在酝酿组织暴动，在白色恐怖下杀出一条血路，求得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急需要军事方面的人才。于是，我建议中央派遣刘志丹同志回陕西工作。

临别的时候，我托刘志丹同志代为转达我和武汉分局的同志对李子洲

等陕西省委领导同志的致意，并且写了一首诗赠他。题为《寄语李子洲并中共陕西省委诸贤——送刘志丹同志回关中》：

极目九边烽火惊，  
川原四塞渭河横。  
七盘乌道通天府，  
百一雄关壮帝京。  
紫气东临延策士，  
凿空西向启先行。  
而今四海纷争亟，  
可有男儿意未平？

诗中“九边”指长城线上张家口、古北口、居庸关、大同、雁门关、肤施等九个要塞。“七盘”指七盘石。“百二雄关”句，古代有个讲法，说关中有一百零二个关卡，极言这里地势之雄壮。“紫气东临”句，引老子出函谷关典故。“策士”本指关东说客苏秦、张仪等，这里指北方区委给陕西派了许多有胆有识之上。“凿空”句，用汉时张骞事，这里指陕西历史上有过许多豪侠勇士，希望刘志丹及在陕的李子洲等中共党的领导同志，学习古代这些大智大勇之士，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挺起腰杆，无所畏惧，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显然，这首诗对刘志丹同志及在陕的中共党的领导人李子洲等同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希望，也是中共武汉分局许多同志的希望，相信他们是会大有作为的。

事实证明，以李子洲为代表的中共陕西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李子洲同志在狱中的斗争更为生动感人，令人们传颂不已。面对敌人的屠

刀，他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而且利用一切机会，跟敌人斗智，宣传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宣传共产主义理想。最后，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党争了气节，为无产阶级争了光荣，舞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后来者。

逝者如斯夫！我与李子洲等共进社诸贤的交往，是在 20 年代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那时我才 20 多岁。而今，我已 86 岁高龄。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

人世间有许多事物，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退色、而消失了，唯有为人类工作的伟大的理想、英雄的业绩、不朽的事业，如江河日月，与天地共存。北大红楼的往事，吉安所左巷的回忆，虽岁月更新、荏苒多年，而至今记忆犹新、未能忘怀者，盖因李子洲等共进社诸贤之形象、事迹感人至深矣。李子洲等同志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子孙后代的记忆中！

（陈江鹏整理）

（转载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

---

①罗章龙我党早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 回忆李子洲同志

白超然

子洲和我是同乡，又有亲戚关系，自幼我们交谊甚笃。他上北大时，我在天津求学。后来，他受李大钊委托，回陕西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时期，他任中共陕甘区委组织部长，我和刘天章在西安国民日报社工作，往来也很多，受他的影响、教育也较大。

子洲幼时，正当清朝内政失修，帝国主义入侵的时候。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豪劣绅鱼肉乡里。子洲自幼目睹了这些事实，所以就深深地种下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之根苗，迨赴西安入三秦公学及到北京上北京大学时，再接受新思想的感染，因而就很快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在1919年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加入共进社。曾作文宣传“二七”大罢工及“五一”劳动节的重大意义。

他在北大上学时，就与陕西旅京学生刘天章、杨钟健、魏野畴、杨明轩等人组织共进社。出版《共进》半月刊，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共进社的宣传教育，给共产党弓1进了许多战士。当时的共进社，不唯对陕西的文化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起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作用，为党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干部。

子洲对于培养革命青年的工作，极为关怀。他对于新来京升学的陕西青年，在思想上给予指导，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并组织人给他们补习功课，介绍京津学校情况，帮助选择学校。一些学生在生活上有困难，还组织接

济互助。他看见陕北到北京求学的穷苦学生日渐增多，住宿很是困难。而北京四川营有延安会馆，系陕西延安、绥德等县的共同财产，乃为少数官僚、豪绅眷属所占据，穷苦学生竟不得入内居住而住公寓。子洲同志遂联络呼延震东、刘含初等同，动旅京的延安、绥德学生，召开同乡会，组织起延安会馆管委会，制订了会馆居住条例，使官僚、豪绅眷属搬出会馆，陕安、绥德等县的学生得以迁入会馆。由此解除了陕北穷苦学生到北京上学的住宿困难。

子洲同志对同志、对朋友极为热忱，而对于阶级敌人则是丝毫不留情的。当我们和劣绅斗争时，他时常叮哼大家说“对敌人要駘不把毒蛇弄死，回头来它会咬人的！”

1922年夏，子洲同志得悉陕西当局拟成立第四师范，但是办在关中还是陕南还未定下来。子洲同志看见陕北23个县，当时只有一所榆林中学，各县小学毕业学生远出升学极为困难，因而发动陕北旅京津学生，力争把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办在陕北绥德。陕北旅京学生推出李子洲、呼延震东为代表，陕北旅津学生便推出我为代表。我们三人乘暑假之便，回陕北榆林各地，向政教各界说明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开办在绥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当时陕北知名人士杜斌丞等许多人的支持。于是，共同向陕西省政教当局力争，终于把省立第四师范设立在绥德。

1924年夏季，李子洲同志到绥德就任第四师范校长。后来，他在绥师建立了党团组织。这是共产党和青年团在陕北活动的开始。他聘请了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英等人担任教员，又发展几位教员及青年学生入团入党，壮大了党团组织。同时，又派人到榆林中学、延安中学建立了党团的组织，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鼓动。刘志丹、王子宜、霍世杰、焦维炽等，都

是当时在榆林、延安分别加入党团组织的。这几个学校的学生，分别回到各县，发动工农群众组织，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陕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绥德成了陕北共产党活动的中心，成了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党内不少高级干部如马明方、贾拓夫、白如冰、贺晋年、张达志、常黎夫、李景林等，都是绥德四师培养出来的。

子洲同志不仅注意党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活动和工农中间的活动，而且也很注意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作为陕北红军根苗的李象九、谢子长，他们思想的进步，是与子洲的宣传感染分不开的。子洲不但和他们通信、面谈，而且还派了党团员李瑞阳、史唯然等帮助他们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所以，我们说陕北红军的创立，子洲亦有力也。

他还曾约国民党同盟会老党员惠又光秘密计议，共策陕西国共合作事业。惠在陕西军人中很有声望，与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等都有交情。所以，他们会谈，对于争取国民党进步分子起了直接的作用，也对1926年陕西国共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6年冬，反动军阀刘镇华退出陕西，国民联军进驻西安。子洲奉组织命令，前往西安。当时，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刚成立。社会人士拥戴他出任司法厅厅长，他均谢绝，而推荐别人。他集负责中共陕甘区委的组织工作。面对当时各派新旧军人杂处、久乱之后的陕西局面，要想把各方面的势力都能协调起来，发展革命力量，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任务。为了国共合作，为了适应各个军队，为了发展党的事业，子洲同志在谋划当时的对策上煞费了苦心。他带病日夜辛勤、艰苦地工作着。他处事沉着、持重，不管遇到多么危急的事情，他总是胸有成竹，从来不慌乱的。他常对朋友们说“拿稳些”，“不要慌”。

1927年，蒋介石、冯玉祥相继叛变革命，陕西革命形势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子洲同志在此极端困难之际，以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拖着患病的身体，迎着重重困难担负起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的职务。他日夜操劳，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同年10月，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第一次在陕西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使敌人闻之而丧胆。1928年春末夏初，又组织了渭华暴动，威震全陕及西北各省。这些革命的壮举，后来虽遇挫折，但革命的火种却撒遍了陕甘宁各地，为后来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29年年初，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获，子洲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仍镇静如常，针锋相对而又机智地与敌人坚持斗争，毫不示弱。终因敌人折磨，胃病加重，遂病故于狱中。

子洲同志一生为中国劳苦大众利益，为社会进步、民族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劳心劳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子洲同志为革命而牺牲了生命，但他一心为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宋新勇 整理）

（转载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

# 革命先驱李子洲

李明轩

李子洲，陕西省绥德人，原名登瀛，笔名逸民。其父李元贞，母白氏。弟兄三人，二弟李登云，号庆三，钻井技工；三弟李登霄，号腾九，共产党员，北大毕业，1947年牺牲于九里山；胞妹李登岳，号峙五，共产党员，一生以教书为掩护做妇运工作。其妻本城雷氏，家庭妇女，不识字，所生一女名李琴，16岁时病死。他们夫妻感情不洽，当时他年仅三十三四岁，知己友好几次劝他解决家庭问题，意为他另选佳偶，他总说目前应该好好办学校培养学生，个人的事算什么。

李子洲上高小时就刻苦攻读，抱负不凡，干练超众。1912年，他为了深造，徒步单装从绥德出发，日走七八十里，历时20多天，来到西安，考上三秦公学。1917年考上北大。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李子洲积极参加示威游行，被举为学生代表。他和学生们一起冲破军警的阻挠，包围了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1920年他与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等创办了《秦钟》及《共进》刊物，发表文章，唤醒民众积极奋起。他提出革新教育、改革政治、改造社会、打倒统治阶级、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1921年（应为1923年初。本书编者注），他在陈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李子洲北大毕业后，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及榆林中学教书。在榆林中学时期，对保安的刘志丹，绥德的贾春霖、霍世杰、张肇勤，清

涧的王怀德、白作宾，延川的曹必达，定边的蒙嘉福，子长的营尔斌、杨国栋，横山的高岗，米脂的乌济川，榆林的杨尔瑛等，积极教导培训，介绍他们加入“共社进”，组织起榆中学生会。这些人在李子洲的教导下，思想大大进步，要求参加校务会议，但被拒绝。时值学校放寒假，刘志丹、霍世杰、贾春霖等来绥德向李子洲请示办法。李子洲为了提高学生斗争情绪，指示实行罢课斗争，提出不达目的誓不复课，终于使校方允许学生会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从此，学生们从学校走向社会，斗争形势逐渐发展，榆林党团组织在此时期建立起来。

1924年5月间，李子洲接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聘请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先后聘请的教员有王懋廷、田伯英、韩叔勋、王复生、刘尚达、李致煦、蔡楠轩、关中哲、罗替先、何寓础、雷五斋、王汉屏、赵秉彝、赵少西等。他们有的是“共进”社员，有的是共产党员，思想很进步，工作又积极，全校教职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一心为革命办好学校贡献全力。教员中只有王汉屏一人，既非社员也非党员，学生一度提出驱走王汉屏。李子洲说：“王汉屏虽然未参加组织，但他从来不泄露我们的机密，对我们并没有不利之处。如果把他赶走，反动派借口说我们排除异己，对我们是不利的。”同学们对李子洲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

李子洲接任四师校长前，学校死气沉沉，学生除上课读书外，国家大事，人民疾苦，概不闻问。担任后，陕北23个县有志青年闻知十分仰慕，争先恐后前来投考。远自富县的学生李承文，洛川县的孟祖兴，中部县的李瑞才、刘榭基，白水县的石介等，他们不远数百里来投考，更有山西汾阳铭义中学的学生任国梁、赵缚、李麟铭等也转到四师上学。李子洲平易近人，善于处人，学校上下团结一致，革命形瓣勃发展，盛极一时。

四师原来图书、杂志一无所有，李子洲到任后，新购《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图书、杂志 2000 多本，供学生自由选读。王懋廷负责领导陕北青年社、四师青年社、工会、农民协会、脚户自保会、学生联合会等，进行各种活动。每月开游艺晚会，备有茶点水果，会上谈笑风生，畅所欲言。凡路过绥德的共产党员和知名人士，一定请他们讲话作报告，如刘味东、王子休、徐梦周、王陆一。杨虎城将军路过绥德南下时，也请他报告国内国际形势。教员田伯英、刘尚达、关中哲每周领导学生召开讲演竞赛会，自由选题，教员核定，公布于众，到时讲演，全校教职员会后评定优劣，练习宣传组织及鼓动工作的能力。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李致煦、王汉屏指导排演新剧，每月必演一次或两次，在学校大操场，欢迎各界人士参观。剧目有《复活的玫瑰》、《一只马蜂》、《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结婚前的一吻》、《大罢工》等。开幕前和演完后，青年社、学联会指定专人讲话，扩大宣传，唤醒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工农群众认为四师学校是他们的乐园，来去自由，毫无隔阂。

李子洲才能出众，见识高明。他除注重学校一切事务外，特别关心培养人才。他每月的薪资尽数接济同学，先后向黄埔军校输送贾春霖、刘志丹、杨国栋；向农民运动讲习所输送霍世杰、李波涛、乔国向上海大学输送张肇勤、李维勤、柳长青；向甘肃军校、耀县二民军官学校输送丁广智等学员。他积极热情，竭尽心血培养革命人才。而他本人则非常简朴，从来不浪费一文或储存一文，在学校的开支方面，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1924 年 7 月间，共进社四师分社组成。李子洲介绍白明善、李嘉谟、高光祖、赵通儒、李明轩、马瑞昌、罗伯福等人人社。在清涧、米脂、神木、府谷、定边、葭县、延安、延长、保安、横山、安定等县同时发展了

共进社，作为党团的外围组织。还成立了陕北青年社、四师青年社、学联合会等，党团活动逐渐展开。

1925年春，榆林党支部成立了，张肇勤任书记，刘志丹负责组织工作，曹必达负责宣传工作，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2月15日，在党组织领导下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成立了绥德县国民会议促进会，拥护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的军事善后会议。是日，在绥德教育局大厅开会。到会各机关各学校共2000多人，主席台悬挂孙中山先生像。李子洲在大会上发表了讲，内容包括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苛捐杂税；一致完成国民革命等。他的讲话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掌声。会上推选李子洲、杨明轩二同志为进京请愿代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绥德各界闻悉噩耗，异常悲哀。3月17日，党组织领导各机关、团体、学校，在四师大操场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到会5000多人，都佩戴纸花黑纱，主席台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在庄严肃穆气氛中李子洲、杨明轩、王德廷、白明善等发言，悲痛地悼念孙中山先生。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发生了。消息传到绥德，群情激愤。在党组织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李子洲发表了讲话，历数帝国主义的罪恶事实，并和与会者讨论了营救五卅惨案中被捕学生的办法，一致决议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收回租界，检查货物。并决定排演新剧，扩大宣传，演剧募捐的款项尽数捐助工人。此次反帝斗争运动，不但在绥德一县展开，陕北青年社派员到清涧、延川、米脂、葭县、吴堡各县去宣传，奠定了开展工作的基础。

吴新田在陕南任镇守使时横征暴敛，纵兵为匪，奸淫抢劫，无恶不作。1925年1月间，他以代理省长、督理两职进驻西安。5月间，西安一中学生将球踢出墙外被吴兵抢走，学生要球，吴兵不但不给，反而蛮不讲理，竟然吹军号集合匪兵，用砖头、铁锹对学生乱打，由操场冲进学校打到宿舍，手无寸铁的学生当场被打伤40多人，重伤者4人。惨案发生后，一中学生一致罢课，发表宣言，揭露吴匪军的罪恶行为。绥德学界异常愤慨，1925年6月24日，绥德教育界在党组织领导下召开驱吴大会。李子洲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博得了学生一次又一次的掌声。绥德各界掀起声势浩大的声援一中学生运动，经李子洲劝说，杨虎城将军由耀县飞驰南下，直捣西安，吴新田终于夹着尾巴逃回汉中，我党领导学生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1924年前，绥德基督教很猖獗，到处横行霸道。各镇都有教徒，各村随教者亦不少。他们在城里购置了大片土地，修盖楼房、餐厅、宿舍、花园、娱乐场所。思想落后的群众受其迷惑者不少，牧师披着伪善的外衣，打着救世的幌子，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麻痹的文化侵略。党组织发动驱逐牧师、赶走教会的运动。李子洲事先妥善布置，防止媚外成性的军警进行干扰，又组织大批宣传队到大街小巷进行讲演，一方面揭发教会的罪恶事实，一方面劝导教徒退出教会以表示热爱祖国。1914年2月25日圣诞节，各校学生及市民群众1600多人按照布置计划一齐出动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秩序井然地进入教会，通知牧师限期撤离绥德。牧师们夹着尾巴有的逃往延安甘谷驿，有的逃回定边小桥畔基督教老巢，非基运动工作胜利完成。

李子洲做事有计划有步骤，方法比较巧妙。他鉴于绥德文化落后教育腐

败，决心对此加以改革。但着手改革要同旧势力作斗争，因此，党组织指定四师才毕业的学生马瑞昌任教育局长。李子洲因马的资历尚浅，惟恐旧势力借口反对，于是与韩县长商妥，先委四师训育主任常汉三兼任教育局长，委马瑞昌为教育视学员。常汉三在任期间，大力整顿教育，撤换了腐朽的高小校长，兴办了简易师范学校、纺织业学校，增加了平民学校的经费，在平民学校开办了妇女班及成人班，在成人班培养出李邦俊、杨重远、丁锦业、雷忠秀、郝进德等工农出身的骨干，其后介绍他们加入共产党，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作出优异的成绩。二个月后，马昌接替吊汉一担任教育局局长，教育界秩序井然。

李子洲对井岳秀部多少人、多少支枪、各部队的思想动态如何了如指掌，他曾给北方局写过详细的报告。他说：“井岳秀全部不过有枪 2300 多支，其部下有的倾向革命，有的思想很反动。石谦旅有我们的同志李象九、谢子长、李瑞成、李有才、史唯然等数十人。我们计划还派李致煦、白明善、柳长青、冯景翼、马瑞生等人去宜川、清涧等地进入该部工作，石谦本人亦可以接受我们的指挥。高双成部贺尔介营经我们宣传，可以同情革命。高部参谋李仲仁同我们很接近，将来可以发展为共产党员。贺尔介本人住在李明轩家院内，我们已指示李同志多与贺联系，抓紧宣传工作。惟姜梅生团顽固不化，十分反动，我们必须随时提防。”每次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工作极其机密。

1926 年 10 月间，李子洲报请北方局批准成立共产党小组，常汉三任小组组长，（应为 1924 年冬，组长田伯英。本书编者注）除白明善、李明轩等共进社员外，还介绍冯景翼、杨玉峰、霍维德、乔国桢等人加入共产党。1926 年（应为 1925 年。本书编者注）2 月，扩大小组为支部，书记田伯英，

李致煦分管组织工作，王懋廷分管宣传工作，青年团书记赵通儒继续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党团组织，月余后支部又扩大为特别支部，人事未更动。

1926年12月间，冯玉祥、于右任五原誓师后，率部由宁夏、甘肃等地入陕，夹击刘镇华，从而使被围困八月之久的西安解围。因工作的需要，党组织调李子洲同志到西安，他路过延安时还曾叫呼延震东、刘尚达召集党团员开会。他在会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并布置工作。他说一、军事方面要善于运用统战方法取得联系，培养起来的刘仲仁要使他的队伍壮大起来，这对我们的军运工作十分重要。要加强宣传三大政策，扩大组织工作。二、学生方面要循循善诱，注重他们的学业成绩，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深入农村，积极进行农运工作。在工作中选拔优秀分子介绍入党。三、延安教会比其他各县更为猖獗，我们要扩大宣传，发动群众，驱逐牧师，捣毁教堂。四、延安文化落后，对妇女工作要积极开展，先从剪发、放足、读书、识字做起，组织妇女识字班，妇女学习会，首先从城市入手，然后再推广到农村。五、开辟农村工作十分重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是我们党的基本力量，我们的政策是农村包围城市。他指示了这五点工作以后，第二天凌晨就离开延安，南下西安。

李子洲同志于1926年2月间调至西安，任中山学院副院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组织部长等职。在党内历任中共陕甘区委组织部长、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指挥布置了清涧等地军事起义，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1929年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被严重破坏，李子洲遭到逮捕。他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毫不畏惧。敌人梦想从李子洲身上搞到重要的机密，迫不及待地进行审讯。李子洲横眉冷对，他痛斥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镇压革命，使敌人狼狈不堪。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同志病逝狱中，时年37岁。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卓越的领导干部。李子洲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史册。

（见《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永远的丰碑——李子洲》）

# 良师益友

李瑞阳

大约在 1919 年的秋季，我开始认识李子洲同志。当时他在北乐大学哲学系学习，我在北京第四中学上学。每当星期日，同学们都回家乡，我便要去高等师范或北京大学找同乡去。而大多数是去北大，原因是那里有一个同乡聚居的地方，这就是吉安所左巷 6 号。这里住的有杨晓初、杨钟健、李子洲、王君毅、刘天章等。这些人都是共进社成员，这里也可以说是共进社社址。本来这个社是在北京上学的同乡们组织的，所以不约而同地有机会都来这里见一见面。我也就在 1922 年在这里参加了这个组织。

在这里的几年中间，我对李子洲同志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待人诚恳热情，对事业忠心耿耿。在同乡里边，他算是最能为集体服务的一个。例如通过共进社的刊物《共进》半月刊，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思想，他特别出力。人们尊称他为“共进社的大脑”。

我于 1923 年中学毕业，因父亲病重便回了三原。这时子洲同志也由北大哲学系毕业，来到三原渭北中学任教。1924 年上半年他又去榆林中学任教，到下半年便调任绥德师范学校校长。当他在北大学习时，正是先烈李大钊在北京筹建党的时期。他就在这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他以后每到一处工作，就热烈宣传共产主义。

1925 年春，他和杨明轩同志知道我困住在家，便来信约我去绥德师范工作。当时明轩同志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大部分教师如王懋

廷、田伯英、呼延震东等同志，多是党团员。我一去他们就介绍我入了团。不久，又加入党组织。从学生中吸收大量的优秀学生为团员，这里是个特别支部。

人一有了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认识，自然也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品质。子洲同志一面宣传进步思想，一面教育青年，非常认真负责。青年们在这样一些亲如父兄的教师引导下，在一种融和的气氛中努力上进。所以这个学校在当时是一个极为人所称道的学校。

子洲同志对人宽厚温和。他除了关怀同学们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外，还处处注意老师们的生活，所以整个学校，真如一个融和的家庭一样。这种气息对人有极大的感染力。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从未见过学校领导人有过任何利用职权而假公济私的行为，也从未见过老师或学生相互之间闹过无原则的纠纷。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远大目标，都正在热烈紧张、顽强而忠诚地奔向光明前途。

当时的国家，是封建军阀各霸一方，人民正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利用人事关系，或从事逢迎奔走之途，希望能找一碗饭吃。当时参加真正的组织，不仅没有人权自由的保证，而且还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但是当时绥德师范的青年，并不是这样的心理，而是点燃了生命的烈火，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当时我感到，这才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有了正确的人生理想，因此干起事来觉得有理而有

这年冬天（1925年），李象九、谢子长经北方区委介绍，先后回到陕北，与李子洲取得联系。当时经过讨论，决定在寒假期间，派我随李象九同志去宜川军队做些工作。

本来我在绥师，一则因我的年龄和学生接近，再则我所喜爱的活动，

例如文艺活动、体育活动等，都正和同学们的爱好相投，因而离开这里，老师们都依依不舍。但子洲同志认为，在石谦部队开展工作，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在握别的时候，子洲同志还一再叮咛说“我们一定要把军队抓过来，使其成为党的武装。”他说“李大钊同志指示我们，军队中党的工作要从中下层做起。发展党、团组织，尤其要注意那些年轻的班长和士兵。咱们山区，不穷不会当兵，当了兵也只懂能混碗饭吃而已！这些青年人思想比较单纯，容易觉悟过来。此外，还要注意群众关系，把军队和群众的关系融洽起来。把以往军人欺侮群众，群众（特别是农民）痛恨军人这个风习从我们这来改一改。目前在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到革命！”这些话给我们很大启示。我以前既不在军队中待过，也从未接近军人，但是我按照子洲同志的指示，一去就干得较为顺利。

我到宜川不久，阎揆要同志也从黄埔军校回来了。名义上他任军事教练，我任文化教员，实际上我们经常通俗地给士兵们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和《共产主义ABC》等。从各方面，不断给士兵们灌输革命思想。

在李子洲和陕北党组织的领导下，石谦部队党的工作搞得很有成效，一年多时间内，五个连长、一百多名士兵加入了共产党。特别是李象九、谢子长等营、连，基本上成了由党指挥的革命武装。后来，这支部队成了清涧暴动的主力。

风云突变。这个部队的旅长石谦，是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下，延安的高双成对石谦深为嫉妒，把这里的情况密报给井岳秀。当石谦去榆林为井祝寿时，被井暗杀。井岳秀要调部队去换防，阎揆要同志和我遂即离开部队到了三原。省委派唐澍同志到三原来商量，决定举行清涧起义。这次起

义虽然失败了，但有一批受过党的培养的青壮年经受了武装斗争的锻炼，逐渐成长，对后来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1983年夏于西安

（转载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

# 常汉三先生墓志铭

(一九四四年)

杨明轩

先生讳士杰，字汉三，陕西绥德县常家沟人也。祖讳跃龙，邑庠生<sup>①</sup>，祖妣氏阎，举五子。先生之父善旭公其次子也，妣氏冯善治家，有男二女二。兄士俊早卒。先生七岁入乡塾，性钝凝重寡言，器宇渊穆，好学之笃远过成人，清末肄业三原宏道学堂，民国二年入三秦公学，体健好运动，每与赛辄冠军，八年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五四运动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号召，争得凡尔赛和约保留签字，先生曾积极参与。嗣由蔡子民<sup>②</sup>先生推荐执教于仰光华侨学校，我国朝野人士之重视侨胞教育自此始也。十年归国，历充陕西省立第一、第四两师范学校、私立咸林中学校教务、训育等职。十六年任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以中国积弱皆由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受封建制度之束缚，必须根本排除诲诸生，陕北文化于为大启。十九年任教育厅督学。二十一年任汉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十六年任三原县县长，吏畏民怀，强暴敛迹。抗战军兴，从陆军第三十八军赵军长寿山，担任组织民众协助抗敌之战地工作。转战晋豫之野，屡著功绩，积劳患咯血症，旋应整顿户县私立善慧小学之聘，稍资休养。三十一年任三十八军军部军法处处长，公正勤廉，守法不阿。操劳触宿疾，于三十二年国历八月九日午时<sup>③</sup>病逝于荥阳军次。呜呼！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五日丑时<sup>④</sup>享年五十有一。配马氏。子一，象聪。女四，一早亡，

二适人，一尚幼。先生临终语不及私，犹唱过黄河歌，勉同事努力杀敌。友人赵君寿山等议葬先生于华山之下。以余与先生同事同学久，知先生，属为文义曷可辞。铭曰：“谔谔一士，三秦之良。澄波万顷，器宇难量。惟炳惟纯，愈刚愈强。挹管幼清安<sup>⑤</sup>之清操，效贾长沙<sup>⑥</sup>之痛哭；挟渐离<sup>⑦</sup>之筑，率田横<sup>⑧</sup>之阁。借彭泽<sup>⑨</sup>樽酒，访漆园<sup>⑩</sup>傲吏，融合古今烈士之血，再拜东林<sup>⑪</sup>、复社<sup>⑫</sup>之鬼。榜礪凛冽，为河岳壮声色，为日月增光芒。呜呼！华山之阴，黄河之旁，松楸葱郁，永载永藏。”

孤子 象聪泣血纳石

民国三十三年□□日

（转载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杨明轩》）

---

①痒生，明、清时称府、州、县学堂的学生为痒生。

②蔡刁民，即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③午时，指十一时至十三时。

④丑时，指一时至三时。

⑤管幼安，即管宁，汉末避乱居辽东聚徒讲学，魏文帝、明帝授其高位坚辞不就。

⑥贾长沙，指贾谊，汉文帝时为太中大夫，遭忌贬为长沙王太傅。

⑦渐离，即高渐离，战国末年燕人，擅长击筑。秦朝建立后，变姓名，为人佣保。秦始皇闻其善击筑，命人熏瞎其目，使击筑。他在筑内暗藏铅块，扑击始皇，不中被杀。

⑧田横，汉韩信破齐后，横自立为齐王，率从属五百逃海岛，刘邦称帝羞为臣自杀，辱岛之徒众亦皆自杀。

⑨彭泽，县名，晋陶潜（渊明）曾为彭泽令。

⑩漆园，地名，今屈山东曹县，战国时庄周为吏处。

⑪东林，明万历、天启间以反对权奸宦官魏忠贤为旨的地主士大夫结为东林党。

⑫复社，明崇祯继东林党之后借讲学抨击时政的地主阶级士大夫结社组织。

## 回忆母校 缅怀师长（节选）

常黎夫

常汉三 1893 年出生于绥德县义合镇常家沟村。早年曾在三原宏道学堂、西安三秦公学读书，1919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经蔡元培推荐执教于仰光华侨学校，开我国朝野重视侨胞教育之先例。1921 年归国，先后任教于西安省立一中、一师等校，他协同杨明轩开展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开展共进社工作活动，对反对军阀刘镇华摧残教育罪行，作了坚决的斗争。1924 年秋任第四师范训育主任兼总务主任，1927 年春任校长。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求学和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宗旨，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让学生在大革命的风浪中去锻炼，另一方面坚持严以教学的方针，魏师生必须认真教育、刻苦读书。他的办公室就在大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上课期间学生一律不许外出，凡是进出校门的人，他都一清二楚。他常说“办好学校本身就是革命嘛 1927 年 8 月，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包围并查封学校时，常汉三校长为保护师生中的党、团员及进步分子，挺身而出，拍着腔子对敌人说一个共产党员，若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枪毙我。”结果学校师生安全离校，而他自己却受到敌人“软禁”一年多的无理处分。1930 年至 1932 年任省教育厅督学、汉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西安事变后，1937 年任三原县长，吏畏民怀，强暴敛迹。他同我党我军领导交往密切，积极配合推动抗日工作，政绩卓著。“七七事变”后，抗战军兴，常汉三即随赵寿山将军奔赴前线抗日，担任组织民众、协助抗敌之战

地工作，辗转晋豫之野，屡著功绩。1942年任三十八军军法处长，公正廉洁，守法不阿。但以辛劳过度，咯血宿疾发作，不幸于1943年8月4日病逝于荥阳军次，终年51岁。遗体葬埋于华山脚下。杨明轩特意撰写墓志铭，叙述了他的生命事迹，给予很高评价和赞赏。现在我把墓志铭结语一节摘录如下“谔谔一士，三秦之良。澄波万顷，器宇难量。惟讷惟钝，愈刚愈强。挹管幼安之清操，效贾长沙之痛哭；挟渐离之筑，率田横之阁。借彭泽樽酒，访漆园傲吏，融合古今烈士之血，再拜东林、复社之鬼。榜礪凛列，河岳壮声色，为日月增光芒。呜呼！华山之阴，黄河之旁，松楸忽郁，永载永藏。”当时杨明轩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只能含蓄地用古老文字去写。为读者方便，我请人译为白话文。译文是“这一位见识卓越的知识分子，是陕西杰出的优秀人才。他犹如清澈广表的湖海，胸襟和抱负无法估量；表面上寡言而质朴，思想深处却比任何人都要坚强。他取法管宁高洁的品德，又像贾谊那样忧国忧民，像高渐死相拼，又能像义士田横那样团结群众，生死同心。有时他像隐士陶渊明寄怀杯酒，寻觅志同道合的正直人士。在他身上融合着古今民族英雄的传统。一心崇拜明末东林清流和清初复社志士的英魂。正气纵横，震慑四方，使黄河华山增添声色，和日月并放光辉。啊，在华山北麓，黄河岸滨，在一片蔽日遮天的松柏丛中，请您永远安息吧。”

1929年李子洲牺牲后，常汉三同党组织失掉联系，但他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变。杨明轩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讲过李子洲临终前向他谈过有关第四师范的同仁情况，李子洲说“常汉三乃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义士，是朋友，也是同志；有的人是同路人，不是同志，也不够朋友。”杨老说赵寿山的思想转变，坚持抗日战争，以后成为共产主义者，

是同常汉三的帮助和影响分不开的。杨老还说常汉三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同志和党中央完全了解。常汉三的灵柩因家属多次要求，陕甘宁边区出资帮助，由华山麓下运回原籍。灵柩经过延安时，林伯渠主席曾亲赴大生客栈吊唁，我也随同前去。

（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杨明轩》之回忆母校  
缅怀师长 纪念杨明轩同志百年诞辰》）

# 高风亮节照千秋

——纪念革命英烈白明善同志诞辰 100 周年

马文瑞

今年是 1927 年 10 月 2 日清涧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白明善烈士诞辰 100 周年。白明善同志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于 1932 年 1 月 21 日在榆林敌人的绞刑架下英勇牺牲。他离开我们虽然 65 年了，但他那伟大业绩、高尚品德和英雄事迹却在陕北各地到处流传。他的音容笑貌、革命精神和高大形象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

## (一)

白明善，字乐亭。1897 年 1 月 27 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一个农民家庭。明善幼年，大哥被土匪杀害，父母先后去世，依靠族兄抚养。上小学时，家境十分贫寒，他常拿赚作笔，沙盘当纸，练习写字，使书法长进很快，逢年过节，常给乡亲们写对联。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本县折家坪、杨家园则等村当小学教员。

1923 年初，绥德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办，白明善闻讯后立即赴绥德报考，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入绥师时，他已是 27 岁的小伙子了。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学习刻苦，文思敏锐，写出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贴在墙上，让人传看。

当时的绥师校长高竹轩因循守旧，沿袭旧的教学方法，住在教师院养尊处优，把办学经费多用在个人生活上。白明善代表学生提意见，高竹轩无理训斥。白明善提出“绥师要办好，撤换高竹轩”，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拥护。1923年寒假前夕，绥师同学一致推举白明善、刘嘉善、杜嗣尧、高光祖、李明轩为学生代表，向上交涉。以白明善为首的学生自治会在平民学校召开会议，并由白明善起草了《撤换高竹轩，另派贤能任校长》的致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信。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的支持下，省教育厅于1924年5月撤销了高竹轩的校长职务，任命榆中教师李子洲接任了绥师校长，至此四师的驱高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李子洲接任校长后，白明善等四师师生感到如逢甘霖。从此，白明善就在良师校长李子洲的培养下逐渐成长。由于白明善学习成绩优异，办事干练，具有组织领导才能，学生拥护，也深得李校长赏识，了他重点培养的学生。1924年秋，省立四师青年社成立，白明善是其中的一员，并被李子洲推荐加入共进社。学生会成立时，白明善担任主席，他同时是共进社绥德分社和陕北青年社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者，并创办隔日油印刊物《陕北青年》和半月刊《塞声》。白明善不仅是主要撰稿人，而且参与编辑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冬，在李子洲、王懋廷的介绍下，白明善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他是李子洲在省立四师学生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1925年初，白明善和王懋廷介绍杜嗣尧等加入共产党，同时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成立。同年特支派遣白明善和王懋廷等到榆林中学发展党团组织，先后吸收王子宣、刘志丹、曹力如等人入党。3月，榆林中学建立了党支部。李

象九当井岳秀部连长后，绥德特支多次派白明善、李瑞阳等去宜川，在李象九连发展了王有才、瑞成、史唯然、阎红彦、呼振西等 30 多人为党员，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军队支部。1914 年 6 月，共青团绥德地委成立后，白明善、王懋廷、田伯英先后担任团地委书记。

白明善积极协助李子洲发展陕北的党团组织，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他和同学们深入工农群众之中，特别是深入脚户之中进行串联组织，终于在脱 5 年 3 月于平民学校召开“脚户自保会”成立大会，大会由白明善主持。大家一致推举白明善为会长，杜嗣尧和高光祖为副会长，王玉贵、石清泰、李明轩等 25 人为委员，并在绥德平民学校门口挂起了“绥德脚户自保会”的牌子。

1925 年 3 月初，绥德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后，选举出席北京会议的代表团，由白明善任代表团主任。当他率团至汾阳时得知北京的国民会议是安福系军阀段祺瑞召开后即率团返回。1925 年 3 月 25 日，绥德各界在四师礼堂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大会，白明善作为学生代表在大会上讲话，他热情赞扬了孙中山的伟大功绩，愤慨地谴责了北洋军阀政府，表达了拥护三大政策，继承孙总理遗愿，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925 年前后，白明善根据学校党组织到民间去的口号，和一些同学经常深入到绥德泥、石、瓦、铁、木等工人之中，讲解“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动员工人们团结起来，与反动派斗，并吸收王进平、雷忠秀、李邦俊、雷万春、王进禄等人加入共产党。经过艰苦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1925 年 8 月 12 日在绥德平民学校举行了绥德县工会成立大会，工会会员达到一千多人。

为了革命的需要，1925 年夏，党组织派白明善到上海大学深造，白明

善离开了培养他两年的母校。白明善在校期间，事事带头为大家服务，为革命事业奔波，被师生们誉为“学生领袖”。

## (二)

上海大学实际上是我党最早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校长是国民党元老和“左派”、陕西人于右任先生。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担任教员。白明善在校刻苦学习，理论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就到中共中央发行部工作，负责铅印和发行《马克思主义浅说》、《无产阶级政党之建设》等革命书籍。

1926年8月26日，经恽代英同志谈话后，白明善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负责笔记讲演录和编纂工作。他先后为吴玉章、罗绮园、黄平等人整理的讲演稿，都在《黄埔日刊》上发表。

1927年秋，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和苏共的帮助下，在绥远的五原誓师，进军西北，击溃刘镇华部，解除了西安八个月之围。为了力口强冯部政治工作，党组织先后派白明善、刘志丹、唐澍、王尚德等黄埔军校的党员干部从广州回到陕西，在冯部工作。白明善被分配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工作。他参加《新国民军报》的编辑工作，负责印刷出版，为北伐战争的宣传作出了贡献。其间，他还参加了陕西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和各地农民代表一起，商讨开展农民运动、促进革命发展的大计。

1927年7月，白色恐怖笼罩西安。白明善根据省委指示，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魏野畴、军委成员唐澍等同志去陕北巡视工作，布置军事斗争。他们到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找到了中共延安地委书记田伯英（公开职务是校长），团地委书记焦维炽，了解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状况，讲解全国

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通报了西安的情况，商量了应付突然事变的策略。指示党团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活动，保存革命力量，伺机开展新的革命斗争。然后，就急忙赶到清涧县城，开了石谦部队党团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军事工作。后来魏野畴东渡黄河到河南杨虎城部工作，并决定白明善、唐澍留在石谦部队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作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准备，白明善任石谦旅军支书记，负责该旅的组织发展和宣传教育工作。

1927年农历八月十五，陕北军阀井岳秀以祝寿为名，将同情革命的石谦诱骗到榆林派人刺杀在旅店。石谦旅广大进步官兵义愤填膺，白明善与唐澍会商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决定以“为石旅长报仇”名义，发动清涧起义，并向省委李子洲同志作了汇报。根据省委指示，他们在清涧旅部后楼秘密成立了起义指挥机关——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同志为委员。白明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部署，起草宣传材料，书写标语。在起义前夕，他还从绥德、清涧等地动员了一批学生参加部队，给起义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

1927年10月12日夜晚，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震惊西北的清涧起义爆发了，打响了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在邠县城贴标语，散传单，割电线，封闭五大商号，筹集经费。当时，起义官兵时人，士气高昂，精神抖擞，高唱白明秀，甘作军阔奴。纵杨衰，杀名流，罪属莫须有。先打高双成，活捉井岳秀。目的不至，志愿不遂，誓死不回头！”于13日凌晨按计划挥师南下，里应外合，先后攻占了延川、延长、宜川县城。

起义部队在宜川遭敌围攻，众寡悬殊，大部被敌打散，白明善与唐澍、

谢子长、阎揆要等到韩城，率另一部队再次举行起义，由唐澍、谢子长、白明善、阎揆要、白自强等同志重新成立军委，公开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红旗，准备到安塞、清涧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但是，攻打宜川失利，在交口镇又遭遇敌军，战斗激烈。白明善腿部中弹负伤，行走困难，组织安排他离开部队，在群众家中养伤。1928年春节，高杰村的白金章到延川高家圪台参加婚礼，意外地见到了手拄棍子的白明善，白明善托白金章到延川青平川给谢子长同志送了一封信。第三天，乡亲们以“坐回门轿”的名义，秘密将白明善抬回清涧高杰村。不久，敌人大搜捕，党组织将白明善转移到绥德义合霍维德同志家中，后又东渡黄河，在山西汾阳教会医院治疗腿伤。

### (三)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今属子洲县）南丰寨古庙里秘密召开。白明善因伤没有出席，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候补委员，后来兼任绥德县委书记。白明善的到来，使我很受鼓舞。我早就听说过明善同志丰富的革命经历，所以一见到他，就感到这位上级目光炯炯，仿佛可以洞察一切、穿透一切似的，是那樣的可亲可近又可信赖。白明善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出口成章，他常把革命的宣传内容编写成群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诗歌传播出去。他是一位很有才能和水平的领导。他虽然比我年长十多岁，相处时间不长，我们却成为忘年交。一次，白明善同志来绥德西川检查党团工作，在了解情况后，在我住的村子窑洞里，同我热情地拉话，他说“文瑞同志，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你能坚持独立工作，使西区团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艰难困苦之中，表现了勇敢坚

定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我有个想法，想让你把团县委书记这副担子挑起来。”不久，召开了共青团绥德县代表大会，把我选为团县委书记，同时由白明善、周发源介绍我由团转党，兼任县委常委。从此，我就在白明善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白明善同志以冬学教师的名义，住在周家硷附近李银家沟村的一孔土窑里，秘密进行党的工作。我和团县委委员周自歧及党员胡永华都以冬学学生的身份，在周围隐蔽活动，他所办的冬学实际上是党的县委指挥工作的中心。

后来，为了深入群众，明善同志和郭步岳等一起到三皇沛、姜家崖、马蹄沟一带的工棚中调查盐业工人现状，了解党的工作。他找工人谈心，帮助发展了十多位党团员，成立了党团组织，带领工人同盐厂主和反动警察斗争。明善与工人同甘苦，共患难，他身穿破旧学生服，脚蹬孝布鞋，饿了啃干窝头，累了躺在又脏又黑的熬盐棚里，不怕苦，不怕累，深受工人爱戴。不少人见他累瘦了，劝他歇一歇，他说“为了下一代不再受罪，咱们受死也心甘情愿。”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明善努力学习，坚持每天练字，一有空闲，他就研好墨，把袖子一挽，认真地练习书法。

1928年腊月，陕北特委从清涧县折家坪转移到老君殿，白明善参加特委工作，担任宣传委员，后来兼任米脂县委书记。根据特委寒假计划，他和李文芳一起住在米脂东关宋家硷小学，编写宣传材料。他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分析历史和现实，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写出许多宣传材料。他根据陕北人民春节爱闹秧歌的习惯，编写了八首革命秧歌词，其中一首写道：“太阳出来红满天，工人农民闹声喧。打倒地主和土豪，大家过好幸

福年。”这些宣传材料，受到社会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油印散发到各地，对宣传教育群众起了积极作用。

#### (四)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明善参加了会议，被选为特委执委和常委。明善的公开职务是米脂三民二中教员，兼任米脂县委书记和学校党支部书记。那年，陕北闹饥荒，他曾组织饥民进行反饥饿斗争，并组织三民二中的学生进行支援。陕北军阀井岳秀闻讯大怒，要派兵清剿三民二中。白明善立即动员全校党团员，清理党内文件，应付紧急情况。他商请进步校长杜立早出面，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合法斗争。在大会上，白明善作了形势报告，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特别是陕北人民残酷压榨，逼得到处死人的罪行。他说“反动政府不仅不救灾，反而镇压学生的救灾工作，残害灾民，又无故扣发三民二中的经费，迫害进步师生。”号召广大师生团结起来，同反动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

4月初的一天拂晓，军阀井岳秀派来一营官兵，将三民二中包围，米脂县委和白明善同志决定领导全校师生同敌人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将全校师生紧急集合，选派一部分学生去做士兵的工作。以班为单位将大部分学生组织起来，示威游行，到县政府找伪县长张仲瑜进行斗争。学生们冲进县政府，高呼口号“打倒张仲瑜！”“打倒井岳秀！”吼声如雷，此起彼伏，张仲瑜吓得魂飞魄散，向游行队伍行了礼，立即让军队撤离学校。游行队伍由校长领头，在县城各街游行了一大圈，凯旋返校。

这次斗争胜利了，但井岳秀却派兵封闭了米脂二中。当时的陕北特委

书记杨国栋思想右倾，作风恶劣，放弃对饥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导，不积极工作，老说泄气话。白明善和特委的同志对杨进行了多次规劝、批评。杨不但不听，反而大发脾气，踢翻桌子，甚至拿起火炉盖打同志。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批判杨国栋思想右倾作风恶劣等问题，并讨论了武装斗争和特委工作。参加会议的有杨国栋、刘澜涛、冯文江、霍世杰、白明善、刘志丹等十多人。为了便于纠正代理书记杨国栋的错误，与会同志一致推选白明善同志主持特委扩大会议。明善同志面对严峻的局势挺身而出，以坚定的立场，巧妙的斗争艺术，领导同志们对杨国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会议决定建议省委撤销杨国栋的代理书记职务，派杨去搞军运工作，选举刘志丹任军委书记。会议认为武装斗争要加强，形式可以有红色的、白色的、灰色的三种。“红色”指的是组织工农武装；“白色”指的是派人去做白军的工作；“灰色”指的是派人去做土匪的工作。红石峡会议，扭转了消极等待、右倾投降的错误，加强了党对武装斗争和灾民斗争的领导，是陕北党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白明善同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1930年春，明善身体有病，回到清涧故乡高杰村边养病边做党的秘密工作。他与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白振纪经常联系，研究开展工作，他还利用写字、谈话到本村的清涧二高学校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教育青年。谢子长、阎红彦、刘澜涛、白雪山等同志都先后来到高杰村，与白明善秘密接头，研究工作。

1930年秋，明善奉命赴天津、北平，在河北省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北平，他和北方局交通王怀德住在延安会馆，曾和谢子长、白坚等同志秘密接头。

## (五)

1931年元宵节后，白明善来到清涧县城亲戚家里。由于叛徒告密，伪县长派人跟踪盯梢，送上名片说“县长请白先生去县政府坐一坐。”明善预料凶多吉少，镇静地说“你先走，我马上就去。”他走进里屋，点火烧掉口袋里的纸片信件，对亲戚说“我出事了。”走出门去，随来人去衙门。伪县长先用教育局长的职位引诱白明善说出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厉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当堂毒打，妄图使他屈服。白明善嬉笑怒骂，奚落狗官，使他们无计可施，派一连士兵将他押解到榆林。

为了镇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国民党榆林县党部、敌八十六师军法处和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组成军法会审处，专门审讯、摧残政治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宋志先和榆林县党部书记长孙士英亲自审问。他们得意忘形，以为抓到共产党的“要犯”就能彻底破坏陕北特委和陕北党组织。

在敌人的法庭上，白明善正大光明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情况一概不说，敌人妄图用金钱、地位来拉拢，用中学校长的职位来引诱，都被白明善当场拒绝。敌人又派叛徒杨璞等人到狱中劝降，均遭到白明善的严厉痛骂，他怒斥叛徒“没有骨头，出卖同志，出卖灵魂，是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并嘲讽叛徒说“你们想在我身上发财，你们看错了人，我身上没有油水可捞！”他向敌人明确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不可丢！”

党组织通过关系派人到狱中看望白明善，明善坚定地向党组织表示“决不向敌人屈服，决不暴露一个同志，决不出卖党的机密，死活也要我一个人顶着。他这种坚强不屈，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的精神，让同志

们很受感动。

敌人的阴谋诡计破产后，立即动用酷刑逼供，他们先令打手板，白明善的双手被板子打得青肿剧痛，鲜血飞溅，但他守口如瓶，不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国民党特务头子宋志先气急败坏，令人从鼻孔里给他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用非人的酷刑往指甲缝里钉竹签子，白明善心痛如裂，满头大汗，一次次昏死过去，但仍然咬紧牙关，不肯屈服，鲜血溅到墙壁上，惨不忍睹。硬汉受酷刑，怕得狱卒都低下头、闭上了眼。连那军法处姓贺的军法官也看得心惊胆战，无法再审。他后来辞职不干，曾对人说：“我从没见过这么硬的硬汉子，共产党是好样的。”

诱骗、酷刑都无效，敌人无计可施，给白明善判了七年徒刑，把他投到陕西省第三监狱。

为了镇压陕北的革命武装斗争，扑灭星星之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杀害白明善。

1932年1月21日，在榆林第三监狱的后院，立着一台绞刑架，一大群端着刺刀的官兵，押解着遍体鳞伤的白明善，来到绞刑架前。国民党特派员、特务头子宋志先宣读了西安的密令，恶狠狠地对白明善说：“白先生，你看看！绞刑架就在你面前，你若能供出共产党的组织，马上升官发财，若不招供，马上就上绞刑！”

白明善昂然挺立，傲视苍穹，他看了看提刀端枪的国民党官兵，又看了看看在寒风中来回晃动、如同要张口吃人的毒蛇似的绞绳，哈哈一笑，说“宋先生，皮鞭、竹签、老虎凳，你们都用过了，不行；今天你们又要靠绞刑架屈服共产党人，同样的，不行！”

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宋志先不远千里来到榆林审讯白明善，想从这

个有名的“共产党要犯”身上打开缺口，把陕北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但是，白明善坚不吐实，无论用高官厚禄引诱，非人酷刑折磨，都无济于事，在这冰天雪地的榆林城里，搬来了这台从德国进口来闲置多年的绞刑架，妄图征服这位共产党人。谁料，白明善哈哈一笑，淡淡几句，使他当众出丑，于是他以怒遮羞，大声吼道“死在眼前，你还敢这么硬！”“吼什么！”白明善鄙夷地看了看国民党特派员一眼，淡淡地说“任你们上刑，我没有骨头就不干这事！”“杀我白明善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说完，他横眉冷对群魔，大义凛然走上绞架，从容就义。

绞索越拉越紧，白明善渐渐地窒息、昏迷，不省人事了。敌人不甘心失败，想在白明善昏迷中得到机密，又下令把他从绞架上放下来，泼了一桶冷水。白明善渐渐地苏醒了。他抬起头来看看杀气腾腾的刽子手，又看了看正在绞杀自己的绞刑架，意识到自己正在战斗，于是，他咬紧牙关，挣扎着站起来。宋志先又问“你快说，共产党……”白明善自豪地笑了。他平静地回答说“你们可以杀死我，绞死我，你们却无法得到我们党的机密。”不等白明善说完，敌人又把他拉上绞架，将他绞得昏死过去，但未断气又放下来。这一次，白明善同志的回答，只是一句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遂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追悼死难烈士时，白明善的英名刊印在《中国共产党死难烈士英名册》上。全国解放后，人民法院公审了出卖白明善的叛徒。白明善的英雄事迹一直在陕北人民中流传。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为了永久纪念英烈，启迪教育后代，1985年清涧县委、县政府在烈士的故乡高杰村兴建了白明善烈士陵园。

白明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陕北绥德师范的

学生领袖，是黄埔军校的政工干部，是西北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陕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名扬陕北的著名革命烈士。他赤胆忠心，艰苦奋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为宣传马列主义，为发展党团组织，为组织人民革命斗争，无私无畏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他的高风亮节足以为人师表，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将与历史共存，与河山同在！

今天，革命英烈的遗愿早已实现了。特别是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了百年耻辱。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中国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在纪念白明善烈士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为共产主义理想“誓死不回头”的革命精神。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一些原来革命的同志，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死不投降；有的则灰心丧气，消极不干；有的当了叛徒，叛变投敌。但白明善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却毫不动摇，坚定不移。他说：“陕北共产党，丢下我一个，我还是同样的干。革命是我今生唯一的职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死而后已。”“马克思主义是我灵魂的归宿，朋友，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我们要学习白明善同志忠于党热爱人民的高尚品德。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经常深入农村，与贫苦农民、熬盐工人、挖炭工人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和反动派，不辞千辛万苦“为受苦人谋福利”，自己“即使受死也心甘情愿”。这正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高贵品质的伟大体现。

我们还要学习白明善同志的治学精神。在地下斗争的艰舍岁月里，他挤时间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学习、写字、赋诗，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他编写了许多宣传材料，例如他为农村冬学编写的教材《革命三字经》有200多句，开头是“人之初，本自由，都平等，是一流；私有制，坏大同，从此后，阶级分；奴隶主，最残酷，对奴隶，如马牛。”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曾在陕北农村广泛流传。白明善同志的书法很好，就是在敌人的监狱里，也常提笔写字。敌人想利用他的书法，给自己涂脂抹粉，要他为第三监狱大殿上写一块牌匾。白明善同志巧妙地选择了一语双关、发人深省的四字：“拨云见日”。敌人见那四个行草大字，雄劲有力，挂上大殿。后来直到上司骂他们“混蛋”，才取下了那块牌匾。

白明善同志的骨头很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无论是在地下工作中，还是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白明善同志都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刚正不阿。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具有鲜明的党性。无论敌人用高官厚禄来引诱，还是用毒打酷刑来折磨，他都拒不暴露党的任何机密，敌人采用三次上绞刑架的最残酷的刑罚，妄图最后打开缺口，破坏陕北党组织，但是，白明善同志坚定地表示“你们可以杀死我，绞死我，你们却无法得到我们党的机密。”“任你们上刑，我没有骨头就不干这事！”“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不可丢！”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他这种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品德和情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为中国人民成就她的伟大事业的人是光荣的！

白明善同志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

（转载自《陕西日报》1997年10月23日第二版）

# 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忆白明善

白如冰

我党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陕北党组织领导人之一白明善同志，英勇就义已经五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白明善烈士的英雄形象、高尚品德和简朴作风，至今仍然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白明善同志字乐亭，1897年生于清涧县高杰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在家乡念私塾。由于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但书读得多，理解得深，而且练就了一手悬笔好字。五四运动后，因家贫不能升学，便先后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杨家园则和清涧县折家坪教书，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感人，学生很爱听。

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天灾人祸往往给人以很大影响。明善的堂弟白明理，五四运动后在榆林中学上学，接受新事物快，学习成绩优异，不幸毕业后患了肺病。那时陕北医疗条件很差，他因家境贫寒无钱到外地就医，以致悲惨地死去。这件事对明善同志刺激很大，他决心求学深造，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尽力。1923年，明善同志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著名共产党员李子洲、王懋廷等同志相继到该校任校长和教员。在这些同志的影响和指导下，明善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共进》等刊物。马列主义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白明善同志的眼睛，

使他提高了政治觉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4年，绥德党团组织建立后，明善同志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学生之一。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在城乡组织拉脚工人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进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当时他是革命热情很高、在斗争中最活跃分子之一。1925年，他多次和绥德党团组织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王复生同志去榆林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在绥师和榆林中学两处学校中开展工作。明善同志因能写文章，字又写得好，在创办《陕北青年》刊物中，他出力甚多，贡献突出。

1925年，明善同志考入上海大学。在那里他按照组织的决定，在党中央的发行部担负书刊的印刷和发行工作。次年夏末，他被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在政治部宣传科工作。著名的共产党人吴玉章、罗绮园到黄埔军校作报告时，明善同志负责记录，整理后在《黄埔日刊》校内刊物上发表。一个北方人初到南方，听四川、广东籍同志的讲话，本来就有不少困难，但明善同志不仅能听懂，而且能及时准确地整理发表，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

1926年秋，明善同志受党组织派遣回陕西工作。在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协助魏野畴同志（时任中共陕甘区委委员兼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编印《新国民军》报，不久又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这一段他工作得很出色。

我和明善同志按亲属关系论，他是我的六叔。他在上海、广州和西安工作期间，我正在他的村上（高杰村）读高小。当时我以好奇的心情给他写了几封信，他不但及时回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参加革命，还寄来《共产主义ABC》、《共产主义浅说》和《向导》、《中国青年》、《黄埔日刊》等革命书刊供我学习。我就是读了他寄来的这些书刊，受到了启发、教育和鼓励

而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把明善同志作为老师和革命的引路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革命斗争由高潮转入低潮，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这时白明善、魏野畴和唐澍等同志受陕西省的委托，到达陕北开展工作。不久魏叶畴同志东渡黄河去河南到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明善和唐澍同志留在陕北，在我党掌握的武装——石谦部李象九（中共党员）营里从事秘密的军事活动。是年10月，他和唐澍、李象九、谢子长诸同志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共同发动和组织了震动西北的清涧起义，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到近两千人，沉重地打击了陕北军阀井岳秀。但由于强敌围攻，加之领导缺乏经验，后来起义军被打散。明善同志在起义中热情向官兵宣传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对鼓舞士气，开展武装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在宜川作战中，他临危不惧，冲锋在前，不幸身负重伤，党组织送他回家养伤。由于当时环境恶化，在家中养伤目标太大，不得不转移到绥德义合镇雷家沟霍维德同志家中，后来又转到山西汾阳医院治疗。

明善同志伤稍愈后，即到陕北，先后去绥德、米脂等县任党的县委书记，不久又调到陕北特委，是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他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租、抗债、抗税、抗捐斗争奔波不息，废寝忘食。为了便于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春，明善同志以绥德县东门堖高小教员和县城平民学校（党活动基地）教员为掩护，领导党的工作。当时我在绥德四师一面工作（担任特支书记），一面读书，在明善同志调到特委工作的前夕，他让我代理他在平民学校教员的工作，指示我一定要把教学工作做好，取得学生和教职员的信任，才能站住脚，开展工作。他走后，我

在校代课两个月，按他的指示，发展党团组织，团结进步师生，积极开展工作。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锻炼。

1930年秋，明善同志去京津地区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春节前，他由京津调回陕北工作，路过我的家袁家沟，当时正是腊月二十九日下午，我父亲非常热情地一再挽留他在我家过春节，但他坚决要走，只在我家吃了一顿饭，便提着灯笼连夜赶回高杰村。他在家住了一天，农历正月初二就离家到了清涧县城。万万没有想到，还未来得及工作，就不幸被敌人逮捕。关押在清涧期间，他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我听到他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当即到绥德向特委负责人之一毕维周同志作了汇报，请求组织设法营救。但因没有找到得力关系，营救无效。

敌人捕到明善后，如获至宝，满以为从这个共产党“要人”口中可以得到重要情报，把陕北组织一网打尽。他们在清涧严刑审讯没有得到一点情报，便将明善同志押到榆林，交给了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特务头子宋志先。宋多次亲自参加审问，软硬兼施，什么老虎凳、压板子、用火烫、往鼻子里灌辣椒水、手指插竹签，直到上绞架等等酷刑都用尽了。白明善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死去活来，但他宁死不屈，一直严守党的机密，并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井岳秀。1932年1月，白明善同志惨遭敌人的绞刑，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白明善同志坚定的革命立场、崇高的政治信仰和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今天我们缅怀明善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一心一意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忘我的工作，把一切都贡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英勇奋斗！

（转载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革命英烈》1984年第  
5期）

# 怀念白明善，学习白明善

白寿康 白炳勋

白明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陕北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的优秀品质和思想作风，特别是他在敌人法庭上坚决斗争和三上绞刑架、壮烈牺牲的英雄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在我们脑海中盘旋荡漾。

明善是我们的严师，是寿康的族兄长，又是炳勋的堂叔父。我们从小就受他的亲切教诲，在学业上得益甚多。

明善知识渊博，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对中国的历史了解熟悉。在村中当教员时，常常手不释卷，有时就是一边走一边念。遇有好文章他在操场上便高声朗读，很有节奏，很有感情。过往行人听了也很受感动。他读了的书，有记号、有批语，还写摘要。他的写作能力也很强。

他练就一手很好的书法，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赞扬。他在练书法时，除用纸笔每日坚持书写外，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还用黄土拌成泥浆，用刷子在院内地上写，等晒干后扫了又写，写得满头流汗，腰疼手酸，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就又写。他对书法很有研究，总结过系统的经验。当时在社会上，人们公认白明善是陕北的一位大书法家。

他当教员的时候，对学生既有严格的要求，又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使学生高兴，家长放心。他对学生写的字，要一个一个地修改，还要给讲解，我们就是他手把手教的学生。对学生的作业，不是硬删硬改，而是启发诱导。他经常讲爱惜时间的两句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时乎时乎不再来”。品德教育方面讲的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受到学生们的热爱和尊敬。凡是知道他的人，都说明善教书教得好。

他有时从外地回家，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有一年冬天，他从外地回来。问他到什么地方，他说到绥远，顺口讲“进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元宝绊倒人，穷人没饭吃。”我问他元宝那么多，穷人怎么还没饭吃。他说那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元宝多，穷人比咱们这里还穷。

白明善被捕后，关押在榆林。适逢寿康在榆林，虽三次到监牢探望。在受竹签刑后的第三天，寿康看见他的脸色苍白，走路十分艰难，两手肿得像碗那么大，手腕上都成了黑红的，血还没有洗掉，但精神却很好，说话有力。最后一次是寿康要离开榆林，去和他告别。白明善鼓励寿康，要很好地学习，坚决地革命，不要怕。寿康将仅有的几块钱送他保养身体，挥泪而别。

白明善同志是无数革命先烈中的一位，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他的无产阶级党性坚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这些优良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是名垂千古、浩气长存的人民英雄。

(转载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革命英烈》1985年第5期)

# 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典范

——回忆白明善同志在狱中

李赤然

1933年夏，在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我被敌人拘捕。经过严刑拷打，敌人始终没有得到什么。同年秋，我被押送到井岳秀的军法会审处，后又被关进国民党第三监狱。

狱中党组织通过曹力如等同志了解我的情况。我一到第三监狱，党组织立即同我接上了组织关系。一在党的领导下，一场更加艰巨的特殊斗争开始了。

在第三监狱中堂悬挂着一块匾，上有大草书写的“拨云见日”四个大字。笔法苍劲，字迹很熟。在阴森森的监狱里，这块匾使每一个新到的人感到好奇。我记得在绥德四师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白明善同志擅长书法，练就米芾遗风，闻名于陕北。这四个字，和他的字体很像，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块匾确是白明善同志的遗墨。原来，白明善曾被关押在北面的一间牢房里，被敌人判了七年徒刑。

1931年夏，阴险的敌人以白明善写一手好字为借口，叫他为监狱中堂写一块匾，内容由白明善自己定。敌人想用这个办法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若写的内容不称他们的心，就可以作为迫害白明善同志的借口；若白明善同志不肯写，那他们就可以进行反动的宣传。“拨云见日”四个大字，使狡猾的敌人实在挑不出毛病，愚蠢的敌人还有些洋洋自得，认为这四个字对

关押在牢房中的共产党员还有点字，寄托了无产阶级战士前仆后继拨开旧社会的“阴云”，使劳动人民见到光明、自由的“天日”，建设一个薪新的中国的雄心壮志。正因为这样，我入狱时，这块匾依然悬挂在监狱中堂。这件事充分体现了白明善的智慧、胆略、信仰。1932年初，白明善同志终于被残暴的敌人处以绞刑，壮烈就义了。

在我坐牢的日子里，白明善同志所书写的这块匾的苍劲有力的笔迹、发人深省的含义和他机智巧妙的斗争艺术，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时时感到他就在我们身旁。

在敌人黑暗的牢房里，流传于同志们之间的白明善同志的英勇斗争事迹，像一束光芒，像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激荡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在狱中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

原来白明善同志被捕后，敌人虽得意一时，以为可以得到许多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但各种刑罚都用尽了，一无所获的敌人才觉得他们碰上了最难对付的人。白明善同志一身正气，震撼了这群鼠类。为了捞到口供，敌人用夹板夹住他的双手，往指头上钉竹签，十指连心，鲜血直流，但他宁死不屈。听同志们说，他几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守口如瓶。残暴的敌人不给他任何治疗。他两手溃烂化脓，惨不忍睹。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昂扬斗志，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

在狱中，白明善同志领导大家同敌人斗争。他担任教员，给同志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讲授共产主义学说的有关知识。他深入浅出的阐述，切中时弊的剖析，幽默风趣的语言，常使同志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坐牢时，他已经就义近两年，但同志们一说起白明善阐述过的理论，都是那样记忆犹新，印象极为深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同志们思想教育的效果。

监狱党组织的斗争使敌人十分恐慌，白明善同志更是敌人又恨又怕最难对付的人物。面对残暴的敌人，面对各种酷刑，他没有一丝毫动摇，而早已视死如归，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在这段时间他书写了“拨云见日”的横匾，寄托了他斗争到底的信念，显示了他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这是他留给同志们的遗物，激励着后人英勇战斗下去。

1932年元旦过后的一天，白明善曾风趣地告诉大家，他做了一个梦，回了一趟家。1月21日晚上，敌人突然加强戒备，给所有牢房都加了锁，“政治犯”都钉上脚镣。不一会儿，敌人把白明善押出牢房……

后来，监狱的看守曾说“咳！白明善虽说是念书人，但骨头硬得很！‘绞’他的时候上来下去三次，什么都问不出来！”

狱中同志们给我讲起白明善就义的经过，称他“三绞三放”，最有骨头。据同志们说，敌人把白明善带到绞刑架下，逼他说出我党地下组织的情况。白明善毫不理睬。敌人对他动用绞刑，绞昏过去，又放下来，再次逼问他，惨无人道地折磨他。明善坚贞不屈，依然毫不理会。恼羞成怒的敌人第二次对他用了绞刑，又放下来，敌人依然一无所获。最后，白明善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一士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同志们的极大愤怒，为纪念白明善同志，抗议敌人的暴行，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白明善的遗体必须送回他家乡高杰村安葬；二、政治犯要能看到报；三、增加放风时间，一天两次。若不接受全部条件体绝食。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绝食斗争，敌人被迫同意了这二个条件。

1933年我坐桃还可脏牢房里看到《中央日报》、《大众报》、《上郡日报》等报纸。每当有同志被送进牢白明善同志的斗争事迹，就义经过。白明善同志的革命精神，教育、激励了无数后来人。

五十多年过去了，白明善同志始终活在我们的心里。他的精神、品质，使人永远难以忘怀。几十年来，白明善同志的革命斗争事迹，始终是我们向部队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素材。他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共产党人当之无愧的楷模。

（转载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革命英烈》1984年第5期）

# 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

马文瑞

1933年8月3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在陕北米脂县南十里铺的无定河畔，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等六位共产党员，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人民为了纪念他们，称颂他们为“无定河畔六烈士”。今年是六烈士就义五十周年，作为六烈士生前的同志和战友，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到的史料，将他们的英雄事迹撰写出来，以慰藉先烈，启迪后人。

—

1933年，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正处在艰苦阶段。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陕甘革命武装，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清乡“剿共”，实行保甲政策，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当时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左倾”盲动，强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惨遭失败。不久，杜衡又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漫天，狼烟遍地，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

中共陕北特委为了部署陕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召开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为了保证安全，将会议地址选在葭县的偏僻山村——高起家抓高禄孝同志的家里。

高禄孝同志是中共党员，陕北特委交通员。他当时不到 20 岁，对党忠诚，机智勇敢。他的家是一个革命家庭。祖父高振烈是有名的老中医，热爱共产党，支持儿子和孙子闹革命。高禄孝的三叔高钧仰、堂兄高禄忠都是中共党员，堂弟高禄贤小小年纪就加入了共青团。会址选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加之村子的群众基础好，有党团员站岗放哨，开会是比较安全的。

高家有孔窑洞，里面有个套窑，套窑门用柜子、一木板挡着。20 多个同志白天隐蔽在套窑里开会，吃饭由高禄孝亲自往里送，直到夜幕降临，才悄悄出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特委会议从 7 月 22 日开始。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特委工作报告。

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崔逢运、鲁学曾和我出席了会议，与会的各地区党组织代表还有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朗亭、高长久、赵福祥、张岗、贾怀智等。

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北方代表的文件精神，总结了特委的工作，分析了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着重讨论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选举了新的特委委员。会议决定：迅速在神（木）、府（谷）、葭（县）、吴（堡）、绥（德）、清（涧）和延川、安定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分派特委各同志到以上地区开展工作。

在这次特委会上，王兆卿同志就如何武装群众，打击敌人，提出了许多好建议，被选为特委委员，分管军事工作。会后他被派往安定（今子长县）地区，协助毕维周同志整顿游击队第一支队，开展游击战争。王兆卿是陕西神木县王家抓村人，时年 25 岁。早在 1914 年，他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勤奋好学，善于做宣传鼓

动工作，大革命时曾任国民联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后在陕北、山西、甘肃等地搞兵运工作。红二十四军余部开到陕北神府一带失败后，他曾冒险营救战友，将梁子秀、老牛等同志掩护在自己家中。他参加过靖远兵变，曾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工作。记得1932年11月间，他由家乡前去陕甘游击队，路经瓦窑堡找我接头。当时我任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住在安定一带。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同志送给陕北特委一批经费，让杨庚武、雷云亭带到安定，要我转交特委。我一时找不到可靠的人，非常着急，便和王兆卿商量，让他先把经费送给特委，再去找游击队，他欣然接受。王兆卿带着经费，和一个老乡同路前往驻在米脂的特委机关，当走到无定河畔时，那老乡见财起意，用石头将兆卿同志打昏在地，将经费抢跑了。兆卿同志伤势很重，在米脂、葭县养了一段，回到了特委。特委负责人马明方同志把他留在特委，后曾到葭县、吴堡一带指导工作。

毕维周同志是米脂县城关镇华严寺湾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入团，后转为党员。历任共青团区委委员、中共县委委员和陕北特委委员。他出身贫苦，对敌斗争坚决。在担任中共陕北特委联络员赴北平等地联络时，曾不顾个人安危，探望身陷囹圄的刘澜涛等同志，给狱中同志以很大的鼓舞。1933年2月，特委派他到安定地区巡视工作时，他同张世清、郝醒民同志率领游击队员，机智勇敢地在蔡家坪桥头击毙伪安定县长刘述明，缴获步枪两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这次特委扩大会上，他又当选为特委委员，并由特委派任红军安定游击队政委。

特委扩大议胜利结束了，马明方和张达志同志代表特委，向支持和掩护革命的高振烈一家表示感谢。与会的同志们信心百倍地奔赴各地传达会

议精神，开展武装斗争，商定一个月后向特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但是，就在这时，由于叛徒告密，一场反革命的搜捕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 二

当时，米脂驻军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一个连队，连司务长名叫董培义，是渭南人。他伪装进步，诡称参加过渭华暴动，要求加入我地下党。米脂一些同志觉得在白军中有这样一个人也好，对开展兵运、搞兵变是个有利条件，于是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就把他接收入党。董培义参加过地下党的一些活动，逐步了解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和领导人的行踪。后来，他的老婆在和敌人一个排长鬼混时，告发了他的情况。敌连长李子宜把董培义提起来审问，他叛变了。敌团长姜梅生根据董培义提供的情报制定了搜捕的计划。那时米脂地下党区委（相当于县委）的宣传委员王守义工作人员局庆恩住在县城内，李子宜带领匪兵先把他们两人逮捕，然后窜到镇川堡，将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同志家团团包围。

崔明道是米脂县城北街人，后来移居镇川堡，1906年10月生，1927年参加革命。他以班家沟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王兆卿、毕维周和高禄孝同志一起，由葭县赴安定，途经镇川堡，住在崔明道家里。在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战友相见，分外高兴，大家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一直谈到深夜。黎明时分，凶残的敌人破门而入，王兆卿等同志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紧接着，李子宜又率匪兵到郝家坪抓常学恭（此人以后叛变）。扑空后，

又急忙开往姜家兴庄，企图逮捕住在姜好兴家的其他特委成员。姜家的住房坐落在沟底，有两三孔窑洞，院子很小，矮墙外面就是一条小河。当时，我和马明方同志以及常学恭在姜家的窑洞里整理特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姜好兴的母亲在门口放哨。她看见白匪军来了，赶忙拿起一把扫帚，跪到地上，边向前移动，边装着扫地，到窑门口低声说“白匪军来了！”我急忙收拾好文件，顺手塞到坑洞里。正在这时，敌人来到我们住房附近。他们以为我们在紧邻的石窑洞里开会，径直扑了进去。我们趁此机会，迅即走出窑洞跳过矮墙，顺河道向后沟方向跑去。敌人发觉了，一面追，一面放枪。我们路熟，跑到后沟顺一条拐渠上山岭躲开。敌人追问时，群众故意说我们进大沟了，把敌人引开。他们扑了空，恼羞成怒，把群众捆起来拷打，群众宁可挨打受苦，也要掩护党员，掩护干部。

我们从姜家兴庄跑出来后，向镇川堡方向进发。我一口气翻了几架山岭，天黑赶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了些南瓜。第二天，我到镇川堡去找崔明道，才知他们几人已经被捕，情况十分危急。我随即在附近找到比我先来的马明方同志，我们分析，敌人可能要发通缉令，扩大逮捕范围，必须做好隐蔽工作，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敌人没有抓到我们，就以十倍的疯狂，把罪恶的毒手伸向被捕的六位同志。

敌人把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六同志关押在伪连部所在地米脂县城财神庙里，拷打审讯无效又押送进伪县政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残酷折磨，烙铁烙压杠子，灌辣椒水，跪火铁绳，用尽了各种酷刑。但六位同志大义凛然，守口如瓶，坚贞不屈。面对吃人的豺狼，他们坚定地说“要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党，办不到！”

敌人从王兆卿等同志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又害怕我们的游击队劫狱救人，决定以押往绥德为名，阴谋在半路上进行枪杀。

1933年8月3日早晨，米脂城内，敌人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王兆卿等同志，个个被五花大绑，在敌人押解下，昂然离开县城，向绥德方向进发。

当来到米脂县南十里铺官家湾路口时，敌人强迫他们沿着田间小路走向无定河畔。王兆卿等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敌人慌忙开枪，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北人民的好儿子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六同志，倒在哺育他们成长的陕北大地上。

敌人的枪声唤来了革命者的亲属，召来了乡亲。他们不顾敌人刀枪的阻拦，抢回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三位烈士的遗体，装检安葬；王兆卿、王守义、高禄孝三烈士的遗体被敌人抛入无定河中。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烈士的精神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

六同志壮烈牺牲的噩耗传来，我们的心情十分难受。当时我住在绥德吉镇附近农村的杨树梁家，他的父亲很同情革命，支持我们的斗争，提出要外面给我打探消息，我劝阻了。不几天，我带着他给的三块白洋作盘费，向葭县走去。马明方、崔田夫同志也陆续到达那里。我们就在葭县寨子沟村召开特委会议，除我和马明方、崔田夫同志外，还有张达志、高长久等同志参加。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王兆卿等六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用宝贵的生命，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保障了陕北党团组织的安全，我们要以六烈士为榜样，鼓起勇气，开展游击战争，推翻反动统治。会议决定派常学恭到平津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马明方去安定整顿一支队；我

到神府地区巡视工作，并组织游击队活动；张达志、高长久同志留在葭县开展武装斗争。

1933年2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同志以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协助特委，开展武装斗争。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广大农村组成了革命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积极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战斗。1935年夏，在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一举解放六座县城，发展了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为了纪念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王兆卿等六烈士，1941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烈士纪念碑上铭刻了六烈士的英名，表彰他们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要学习王兆卿、毕维周等六烈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们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纲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转载自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 高光祖在四师

李明轩

1914年，高光祖同志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我成为同班同学。加之我们又住在一个宿舍，相处友善，结为盟兄弟。他在四师的革命活动我比较熟悉。

光祖刚入校时，校长是高竹轩。此人思想腐败，一年多没有向学生讲过一次话，学校死气沉沉。1914年冬，光祖和刘嘉善、白明善等人首先发起驱高运动，在平民学校开会，经全体学生一致同意，上书教育厅，要求撤换高竹轩校长职务，另委贤能接替，不达目的，就实行罢课。结果学生胜利了，教育厅另委李子洲任四师校长，从此高光祖在四师弓 1 起了同学们的注意和钦佩。

李子洲任四师校长后，聘请杨明轩、常汉三、王懋廷、田伯英、王复生任教员。这些人有的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有的思想很进步，他们同心协力，办好学校，培养革命人才。他们向学生介绍《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刊物，并成立了图书杂志辅导委员会，购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 ABC》等各种书籍宣传马列主义。光祖一下课就到图书馆阅读，还省吃俭用，订阅了许多刊物。在王懋廷等老师的影响教育下，19 以年 7 月（应为 10 月，本书编者注）间，他同我，还有白明善等一齐加入共进社，1925 年加入了共产党。

光祖自投身革命事业后，工作非常积极，党组织分配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推托缓慢。当时，党组织分配他到平民学校担任国语教师，同时还

在成人班、夜校任教。光祖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除课本外，还编印了许多课外读物，如“外洋鬼子真混蛋，无故登我中国岸，如果不再向后转，大炮打你王八蛋”。

他还提倡改革落后习俗“劝大娘听我的话，娃娃缠脚没人夸，走起路来拧几下，寻起婆家驳谈大，流脓溃水把针打，娃娃疼痛娘害怕，女婿嫌起没办法，你看缠脚怕不怕！”

他编的这些教材很受欢迎，学生们很爱读。他态度温和，善于接近群众，不分星期日、假日，经常挤时间和学生、农民、工人谈话，了解人民的生活，宣传劳动者求解放的道理，在他的宣传影响下，丁锦业、郝进德、李邦俊、杨重远等人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优秀党员。

光祖是陕北青年社的负责人之一。每次寒、暑假同学返里时，他都给他们布置任务，组织学生向农民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农协，成立“天足会”，并把返校同学的活动作出总结、汇报。

光祖对脚户自保会的工作也非常积极、认真。每当脚夫报告牲口被反动军队拉了差，他就集合学生三四十人向军队进行说理，迫使军队把牲口交还给脚夫。这种事在脚户中影响很大，大家交口称赞光祖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光祖口才伶俐，在讲演竞赛会上每每得到赞赏。在反军阀吴新田游行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大会和纪念五卅惨案等活动中，他走上街头讲演。讲者慷慨激昂，听者热血沸腾，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斗争劣绅大会上，他头戴草帽，腰系布带，手提烟袋，挤在群众中，经常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和很精到的议论。光祖还很爱参加演剧，每次都扮演老农，演得活灵活现，神气十足。

光祖积极从事各种革命工作和社会活动，但对各门功课也不放松。常常夜深人静，他还独自坐在油灯下苦读，同学们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笑。各门功课，他都考得很好。

1926年夏天，光祖从四师毕业了。1927年，他又到绥德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我们这一次相见竟成为永诀。

光祖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光祖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转载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革命英烈》1984年第5期）

# 回忆高光祖烈士

高长直 高长久

人老怀善。近几年越是卧床不起，越是在心头怀念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高光祖。

1904年农历十一月，光祖生于葭县神堂沟村。父亲一生务农，家境贫寒。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祖能读完四年私塾，三年高小，自然是非常不易的。父母节衣缩食，为的是能让家中出一个读书人。没想到，这样一来，高家却出了一位革命者。在店镇小学上高小期间，有件事影响了光祖的一生。1920年，在北京上学的杜宝衡、杜宝丰两位同学给母校寄回一些北京当时出版的进步报刊和一封信说：全国民众首先是教育界要团结起来救国，“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这封信向全校宣读后，群情振奋，16岁的光祖更是经受了“五四精神”的洗礼。后来，在考上绥德四师不久，他写下了这样两副对联“为于国民开知识，愿随时势造英雄。”“愿战后人道主义盛行全球，为我同胞团结奋斗争解放。”1924年，陕北最早的马列主义者，共产党员李子洲任绥德四师校长，四师成为中共陕甘地委领导陕北革命斗争的主要阵地。光祖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加入了共产党。

从1925年入党到1935年牺牲，短短10年，光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下半年，他联合绥德地区泥水匠、木匠、石匠等手工业工人，成立了工人联合会，使陕北工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1926年，他和葭县旅

外同学创办“振葭会”和《振葭》，宣传土地革命，反对土豪劣绅。“振葭会”后来成为葭县农民协会的前身。这年夏天，他在绥德创办“平民学校”。白天上课，晚上开设党团组织的训练班，为革命培训了大批骨干。1927年4月初，葭县县委成立，光祖回葭县参加农运的组织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葭县陷入白色恐怖，而光祖却勇敢地担起了临时县委书记的担子。从这时起到1935年，在这七年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一边教书，一边发展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和秘密工会、农会，并于1933年着手开展武装斗争，组织贫民会、赤卫队。他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使葭县的红六支队发展到七八十人，六十多条枪，苏区扩大到三百多村庄。1935年，正当他面对敌人新的反扑，秘密筹备建立新的革命武装的时候，不幸被叛徒出卖，于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被敌人杀害于葭县枣林沟，时年31岁。

光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记得在1934年底，葭县的红六支队已经南下，反革命武装趁机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的围剿，光祖的家被抄了，全家七口人流离失所，年老的父亲和一个孩子都病死他乡，但光祖顾不上这一切，仍然坚持工作。当时，县委从陕北特委要来一台油印机，决定出一期刊物，光祖就亲自承担了从写稿、编辑、刻蜡版到印刷、发行的全部工作。这台油印机没有胶辊，他就用棉花搓成球，油墨，一点一滴地推印。望着他那深陷的眼眶，同志们心疼地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还有一点是同志们深深难忘的。那个时候，党的活动经费很少，同志们缺吃、缺穿、缺路费，光祖就把自己当教员所得薪水的大部分，有时甚至全部，做了党的活动经费，或者资助了有困难的同志。

有一次，他从西川苗家坪放假回家，两手空空，请了一名脚户送行李。

到家后，他问父亲要钱付脚费。老父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出去把钱付了。晚上在灯下，父亲问光祖“这些日子赚了多少钱？”光祖说“我没有钱。”老父亲不相信。光祖对自己的钱是不吝惜地给党和同志，相反，对党和人民的钱却十分爱惜。当时由于形势紧要，党组织给每个同志身上带两三块白洋，以备急用。有的同志有钱就想花，而给光祖的钱，他总是带在身上，舍不得花分文。他常对同志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只要革命成功了，大家都能过好日子。有钱帮助党，帮助革命，比帮助家里重要得多。”

光祖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形象、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转载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革命英烈》1984年第5期）

# 怀念刘光显同志

张达志

刘光显同志是陕西省葭县店镇乡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以务农为生。他兄弟三人，大哥曾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土地革命时参加革命，已病故。他二哥在家务农，现在还健在。刘光显同志排行老三。我与刘光显同志是老乡，后又一起读高小，不仅感情甚好，而且都有反对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1914年秋，杨明轩同志由绥德四师来到葭县店镇乡，以店镇高小为中心，成立了国民党葭县县党部，杨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民众起来投身到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列强的斗争中去。我和刘光显同志听了很受鼓舞，便一同参加了国民党。杨明轩同志带领青年学生向群众做宣传，并组织反对军阀刘镇华的示威游行，我和刘光显一起参加了，是领头的积极分子。1927年2月，我俩又都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春又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算党龄）。他还参加了师范学校的反帝童子军。

1931年，刘光显同志担任陕西省葭县特区区委书记。当时，我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搞兵运工作和他单线联系。1931年冬，我做兵运工作回来后也是同他接的头，并参加了区委的工作。1933年春，他在葭县任县委书记，同年冬特委又派他到安定县（今子长县）任县委书记。1935年冬，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诬蔑他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撤销了他安定县委书记的职务，让他靠边站，不给分配工作。无奈刘光显同志只好随红军来到清涧县

的下五村一带。他见到了我，要求当红军。当时我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治委员，恰好八十四师二团缺少政委（原政委李赤然同志又名李宗贵在贺家湾战斗中负伤，离队养伤），我即向刘志丹同志推荐，志丹同志欣然同意，随即任命刘光显同志为红二团政委。他虽然没有军队工作经验，但到职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带领部队参加了攻打张家圪台的战斗，全歼敌人一个整连，接着又参加了打延长县城的战斗。志丹同志对他很信任，打下延长后让他负责审判地方豪绅的工作。刘光显同志接受任务后很认真，凡是该审的他都审得一清二楚，一一向刘志丹同志作了汇报，为正确处理那些土豪劣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后，在攻打安塞县城兴隆寨和李家塔寨子等一系列战斗中，刘光显同志表现得都很出色。1935年6月，陕北红军主力拟去攻打安边堡，忽然接到西北工委的来信，称敌井岳秀部有向我后方党政机关进攻的迹象。刘志丹同志随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决定改变原作战方案，派红二团开赴后方（我党政机关驻地），在安定县西北方向活动，伺机打击来犯之敌，红军主力去攻打靖边城。红二团团团长路文昌同志和政委刘光显同志带领全团指战员转移到安定县西北方向的青阳岔、石湾、三皇峁一带活动。1935年7月10日，在三皇峁反击敌人侵扰的一次战斗中，刘光显同志亲自向敌人喊话，争取瓦解敌人，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3岁。

刘光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1年了，但他的高贵品德和英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刘光显同志从少年起便投身于革命，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名红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指挥员。他在绥

德四师加入共青团后，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据我所知，他读过的书刊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浅说》、《共产主义 ABC》、《入团须知》、《中国青年报》、《向导》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他学习认真，善于钻研，写了大量心得笔记，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奠定了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思想基础。

刘光显同志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1933年夏，中共陕北特委转移到我家乡（葭县店镇乡南抓村）后，我家又成了特委机关的所在地。各地的同志来特委机关汇报工作，首先要和刘光显同志接头，然后由他介绍到我家，再由我安排与特委的领导同志见面。1933年7月，陕北特委在葭县高起家抓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后特委委员们分头去各地贯彻会议精神。由于叛徒出卖，特委委员毕维周、王兆卿，特委交通员高禄孝，米脂县党的领导人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等不幸被敌人逮捕，关押在米脂县国民党驻军内。事发之后，特委委员常学恭（后自首）来到我家，向我讲述了这一消息。这六位同志被捕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为了尽快查明情况，特委经过研究，决定派刘光显同志去米脂县探听消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星夜兼程90华里赶到米脂县城，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了解到这些同志被捕后的情况。这六位同志被捕后表现得很英勇，个个坚贞不屈，没有一人叛变自首，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第二天，他又连夜返回，向特委做了汇报。特委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在葭县寨子沟村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以后的工作。

刘光显同志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不畏艰险，总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积极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的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张和

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如每逢葭县白云山举办庙会时，他便主动写标语，印传单，分发给党团员，带到庙会散发、张贴。他还利用周围各村办庙会、唱大戏的机会，散发传单，召开党团员会议，部署工作。

刘光显同志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在葭县特区工作时，制定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工作计划，使工作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并严格要求党团员严守秘密。在他的领导下，葭县党组织一直未遭到敌人的破坏，为党保护了一大批骨干，为以后开展的武装斗争积蓄了力量。

刘光显同志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任团政委期间，教育党团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他团结同志，关心爱护战士，深得指战员的尊重和爱戴。这个团在原政委李赤然同志的领导下，已有好的基础，他在此基础上更加努力工作，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该部队能够英勇善战是与刘光显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刘光显同志为人正派，忠诚老实，生活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为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刘光显同志永垂不朽！

1987年11月

（转载自陕西人民录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张达志》）

# 悼高农斧同志

霍维德

高农斧同志患急性肺炎不治，于10月14日在中央医院逝世，噩耗传来，使我十分悲痛！农斧同志曾经参加过大革命末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战开始，他又转到敌后，抗击敌寇。十余年来，艰苦卓绝，始终如一。他对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是有伟大贡献的，他的病逝，实为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病榻沉思，追忆往昔，我觉得农斧同志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所以我愿意将我知道能记得起的几件事实写出，以供同志们研究学习，并作为他和我们永诀的纪念。

农斧同志原名承训，绥德义合深沟人，生于地主家庭，曾在绥德第四师范肄业。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夏转党。1928年至1929年间，陕北连遭荒旱，饥民成群。当时我党陕北特委为救济穷苦农民的生命，提出“欠租运动”号召，领导佃户欠租不交。农斧同志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以身作则，向家族进行说服斗争，终于获得了父亲高有业同意，首先宣布两年不收租子，对义合镇一带的欠租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时党在义合镇设立机关，参加工作的三四个人的粮食，全靠农斧同志供给。他还瞒着家里人把自家的粮食做成炒面，交给西川党的组织。这种忠实于革命忠实于劳苦大众，牺牲家庭与个人利益的崇高品质，永远是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的表率。

1934年绥德农民斗争激烈，农斧同志首先把自己所有的土地、粮食，

分给贫苦群众，然后参加领导农民斗争。1934年冬，农斧同志任绥德团县委领导工作，1935年参加红军工作。当时因领导方面某些同志的错误，轻视地主出身的同志，甚至加以歧视，农斧同志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但他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他能委曲求全，毫无怨恨之心，绝不消极动摇。因为他有坚定的信仰，这样高度的无产阶级意识，坚定的党的立场与牺牲和奋斗的精神，实在值得每个同志学习。

抗战以后，农斧同志被调至华中部队担任重要工作。这期间，我对他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但据崔田民同志讲，他艰苦奋斗，六年如一日。去年他因公来延安，家中因缺乏劳动力，老母幼子，生活十分困苦，而农斧同志毫无不满之词。回延安后，他没有褥子，直至死时，仅有旧毡一条。“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党内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与别人计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刘少奇同志说的这些话，农斧同志当之无愧。

现在农斧同志和我们永诀了，我们悼念他，他光荣的一生永远鼓舞着我努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的子女，我们建议党和政府应该很好地照顾培养，使其长大成人，继承遗志，为中国的革命胜利及解放与和平而战斗到底。

（原载1944年10月26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 我们向高农斧同志学习些什么？

张毅忱 尤奋涛

高农斧同志不幸病逝了，他虽只有 32 岁，但已是一个很老的革命战士。关于他的身世和在陕北进行革命工作的光荣经历，已由霍维德同志扼要介绍过了，但他还有很多优良品质和作风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他任新四军三师十旅政治部主任足有三年，在生活上向来没有高过一般的干部，大家吃杂粮，他也吃杂粮，大家吃不上菜时，他也跟着忍受。1941 年春天，部队处于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大家常吃不到饭，他的工作却夜以继日地繁忙，总务科有时单给他弄些茶饭，他总是婉言谢绝。他对人亲切和蔼，对工作却严肃认真，对问题毫不苟且，力求甚解。有一次要写给敌伪军的传单，他召集了五六个人一起研究如何写法。写后，又研究如何修改，平均一张传单修改四五遍。他临危不惧，具有布尔什维克的英雄气概。1941 年夏，部队由豫皖苏向淮北转移，道路艰险，农斧同志被分配先随一个团行动，夜间通过了津浦路，第二天进到了顽伪区（华中很多地方是顽伪合一），联庄会在顽县长的指使下，开枪阻住了去路。开始，一个干部前往交涉，未得结果。农斧同志便顶着危险前去交涉，团长要去，他不准。他当时想“部队处于危急情况下，如果团长遇危险，对部队的指挥有妨碍。”这充分显示了他舍己奉公的精神。由于十余年的繁忙工作，长期的艰苦生活，他最终患上了疾病。1942 年夏，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病，整夜失眠，经常头疼。在大家一致的意见下，他才开始注意改善自己的营养。

在休养中，他还是经常关心和处理工作。

农斧同志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很好的民主精神，很高的原则性，他尊重上级，团结同级，爱护下级。1941年秋，十旅与淮海军区合编，由区党委书记兼任部队政治委员，政委对部队工作经验较少，但他对政委很尊重、很虚心，凡有关干部调动、工作决定，他总是亲自跑去和政委商量。当上级调动干部时，他很少有本位主义。有时上级机关以商量的方式调干部，总是主张执行上级意见。有一次师政以商量的口气，要调旅政的青年干事到师去担任青年工作，组织科长的意见是不愿意，他不同意，说“还是调去好，师的工作重要，要是讲价钱，打折扣，会给上级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当他向下级组织调干部时，许多时候是采取商量的办法，对下级的工作指示，他常是以商量的口吻进行，绝不摆起上级的架子，个人意见第一，武断地对待下级。他以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团结同志，他经常反对某些人的拍拍吹吹、拉拉扯扯。

他既能听取下级的意见，又很尊重上级的批评。1942年夏，黄师长曾指出他的缺点，他那时正在休养中使用脑力很不方便然而仍是将黄师长的批评反复思考，并与其他同志交换意见。这次在党校总结学风、写反省笔记时，他还回忆着黄师长的批评。

在华中淮海区休养了六七个月，身体稍见恢复，敌人对该区“大扫荡”便开始了，他又重新担负起工作。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抱病工作的困难，以及希望他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于1943年春决定他来延安。路经山西省，他留下了他的牲口，过平汉路时他留下了警卫员，他不讲价钱，与某些同志一定要求带人带牲口的态度是两样的。他处理个人问题一贯如此。

他身材较小，体质较弱，背起包袱毯子一天走一百或八九十里路，却

不叫累，脚上打满了泡，还是勇敢地走，也不叫疼。行军时，他出洋相，开玩笑，休息时唱秦腔，使人笑个不停。

到党校后，他学习很积极，总结学风时，写反省笔记，花了40余天的时间，修改了七八稿。星期六到家里去（他老婆住在杨家湾招待所），一面喊着心跳，一面还开着夜车。他不但自己的学习好，还很热心地帮助别人，不但能帮助本组的同志，还注意与做到了帮助其他小组的同志。在生产上，他很积极，来校不几个月，学会了纺线。对同志的日常生活热情帮助，他们组有一位5的同志，每次到山下担水，他总来到山脚下接。他在支部中有很高的威信，这次改选支部时，他以最多的票数，当选为书记。同志们对过去的支干会有很多的意见都向他提，他耐心地倾听，常常与同志们谈话谈到深夜。本来他就神经衰弱，身体不好，加上操劳过度，面色日渐消瘦，饭量减少。有些同志劝他说“你食少事繁，不要骗了诸葛亮。”

劝他休息。他不听，学习、工作、劳动，依然不懈，最终爆发了严重的急性肺病与心脏病。进医院只有三天，就长眠了！

（原载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 悼崔曙光同志

崔田夫 郭洪涛

崔曙光同志牺牲了。他在去山东的路上，遭受敌人袭击，不幸牺牲了。中组部把这个噩耗告诉我们和曙光过去的诸同事，大家都非常悲痛。曙光同志的死，不仅使他自己未能达到坚持敌后抗战的志愿，而且是山东工作的一个损失，也是全党工作的一个损失。

崔曙光同志的真名叫崔世荣，绥德南区铁前坪村人，家景中农，绥德四师肄业，1927年春入党，曾任小学教员，以掩护党的工作。以后历任绥德县委秘书、组织部长，延安县委书记及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1940年春调中央党校学习，后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去年冬调赴山东工作，这就是他过去为党奋斗的简单历史。

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他初入党以后，就觉得农民运动是陕北革命运动的中心，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必须到农村中去，和农民结合起来，才能有所成就。因而他和崔田民同志（即崔逢吉同志，现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共同创造了铁茄坪村支部，这个支部是陕北最好的支部之一，是绥清暴动时的农村堡垒之一，是薛家峁区农民暴动的领导支部。这个支部培养了好些干部，支持了陕北游击战争。他对于绥清暴动是有过功绩的，他当时深入农村和农民结合的观点是正确的，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在绥德县委工作时，曾和王士英、崔文运诸同志坚持了绥德的游击

战争。他调到延安县以后，又和王丕年田丰年诸同志开创了延安县游击战争的局面，他对于绥德的游击战争，尤其对于延安县苏区的创建是有过功绩的。他积极负责，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为党工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此外，他为人忠厚，待人以诚，是一个老实出名的干部。他处事公正，毫不偏袒，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干部。他吃苦在先，享福在后，是一个绝不计较个人生活优劣的干部。他对上级服从领导，但不阿谀，对下级热忱亲近，但不轻视，是一个待人正派的干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死了，他死在敌寇手里。我们追悼他，我们用不着哭，用不着悲哀。我们只有向他学习，为党工作，完成革命事业，以安死者的心。这就是我们大家真正追悼他的意思。

1942年10月2日

## 延安各界举行李景波同志追悼大会

【本报讯】李景波同志追悼大会，于16日下午在边区参会大礼堂隆重举行。会场四壁满悬挽联挽词，台上台下围满花圈。台正中置李景波同志之遗像，衬以镰刀斧头之红旗，灵前供设酒馔，燃烛焚香。到会者有任弼时、李富春、徐特立、高岗等同志及西北局各部长，李副主席、安副议长及政府各厅长暨李景波同志之家属及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四时，曹力如同志宣布开会，会议程序在静穆之气氛中进行全体肃立奏哀乐，家祭和公祭。公祭毕，高岗同志以沉痛之语调开始讲话。在追述李景波同志生前事迹后（关于李景波同志之历史本报已有专文介绍，从略），高岗同志复列举了他的几个特点。第一，李景波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做过蒙回少数民族的工作、士兵工作、游击战争、政权工作、党务工作，样样都来。党分配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讲价钱，不作个人打算，工作认真，有气魄，埋头苦干。当他病重时，还屡次拒绝党要他休养的建议。第二，能掌握党的政策。第三，有群众观点，长期深入下层群众。做回民工作时，他一家一家地踏实去做，回民极爱戴他，曾要他入回教。绥德老百姓因他和蔼可亲，叫他“李老婆”。第四，谦虚朴实，不摆老资格，守纪律，任劳任怨。最后，高岗同志要大家学习李景波同志的优良品质来追悼他，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他死也会瞑目的。并号召以后每个干部都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卫生机关要负责检查一般干部有无疾病，注意卫生工作。

继由任弼时同志讲话，对李景波同志之死，表示深切的痛悼。他说李

景波同志是经过苏维埃阶段和抗战阶段，经过武装斗争和平时的多次考验的可贵的干部，在复杂的警备区做过长期工作，发动了警备区的广大人民，团结了广大的阶层，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不顾有病，总想把工作搞好。正当他在前进途中，将要为党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时，却去世了，这是党和边区的损失。我们在悲痛之余，应如高岗同志所说，学习他的工作精神和作风，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李副主席被请上台，开首便说，“李老婆”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不过当时我不了解他。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是个很诚实的受群众拥护的青年，每当群众发生纠纷时，他来讲几句，就解决了。他的方法就是说老实话，并且能在群众面前勇敢地自我批评，获得了群众的敬佩。至此，李副主席强调地说：有自我批评，就可以把事情做开，受群众拥护。李副主席又悲痛地说：我听到李景波死的消息，不禁流下泪来。我为绥德分区人民哭。不过李景波同志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要好好继续他未完的事业直至胜利。

继崔田夫同志讲话后，即由家属代表李鸣年（李之大哥）致谢词。散会时，人们伴着悲壮的哀乐声离开了会场。

（1944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 怀念强雄、康文林二同志

马树勋

强雄（原名强登弟）、康文林二同志和我都是绥德师范二学。他俩先后于1944年、1947年牺牲了，到现在已经四五十年了。想起他们的死，心里就产生无限的悲哀与怀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即爆发，抗战的呼声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陕北重镇绥德。强雄同志（陕西省米脂县龙崖沟人）就是在抗日的高潮中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1938年秋，我们去延安抗大时，他已从抗大毕业（他是抗大第四期学生），分配在抗大做招收新生的工作，他处处关照我们。

1940年秋，我们延安又见面了。当时他在警备五团政治处工作，我在边保独立九营工作。边区因为受国民党的封锁，正处于困难时期，部队边战斗边生产。警备五团因任务重，流动性大，生产自给搞得不如我们好，冬衣没法解决，穿的是头年穿过的破旧棉衣，棉花外露，冻得发抖，可我见到的强雄同志仍然是乐观积极，斗志昂扬，一片忠心地克服困难。

1994年靖边保二团，我俩又到一起了。他在团部任指导员，我在政治处任干事。1943年我们又同在警三旅旅部整风学习班。1944年反动地主武装在北部骚扰我们，破坏团结抗战，强雄被调任连队指导员。当时敌人占领伊盟大窟联，强雄同志奉命进攻该敌据点，顽敌在堡内凭工事据守，堡外是一片大草原开阔地。强雄同志身先士卒，奋勇前进，不幸英勇牺牲。

康文林同志，是陕西省吴堡县温家湾人。我俩是 1938 年一起去延安抗大第五期学习的，入校后编抗大第一大队。

记得绥德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警备区时，八路军进驻绥德，原来一潭死水的绥德师范学校活跃起来了。我们经常听警备司令部的领导同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新书新思想大量涌进学校，学生们的思想开阔了，由闭门读书不闻天下事，变为要进步要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口号、新议论、小字报在学校到处都是。当时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害怕了，说绥师要赤化了，他换来了一位新校长，结果被学生赶走，搞军训，想驯服学生也未达到目的，学生与何绍南之间的矛盾很尖锐。最后何绍南命令强行换了校长。听说将要来的校长是个反动分子，于是学生们“离开学校”、“到延安去”的呼声响彻整个学校，大家纷纷走向延安，走向光明。

文林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我一起去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文林同志分到定边警备二团。在抗大分别后，我们再未见面。1956 年我回家探亲时，问起文林的情况，才知道他在 1947 年解放战争初期，率领某部后勤人员东渡黄河时，遭敌机扫射中弹牺牲。

强雄与康文林二同志，牺牲已多年，但他们年轻、生气勃勃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里。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我们现在能过着和平的生活，是离不开他们的。我要永远地纪念他们。我们绥师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应引以为荣。强雄同志、康文林同志，安息吧！

# 忆革命烈士王立功同志

王佩仙

值此绥德师范建校 70 周年纪念之日，十分向往抗日战争期间那艰苦的岁月中，同学们严肃紧张、团结友爱、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更倍加怀念革命烈士——我的兄长王立功老师。他是绥师万余名师生中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的一名。

立功同志生于 1923 年，绥德师范三级学生。参加革命后，曾任绥德南校、附小校长，陕甘宁边区绥德干部子弟学校校长，米脂中学支部书记，陕西省绥德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绥德地委、行署秘书、支部书记，绥德县委副书记，榆林专署文教局长。1960 年 6 月地区领导通知他交接了局长工作，拟提拔另任，但兄长不幸在此期间病故。其间，1943 年至 1945 年任绥德四师教师，给二十六等班讲授史地课。

先父在兄长七八岁时牺牲，我们兄妹几人靠母亲的辛勤劳动和几垧山地的收获，过着清贫的生活。兄长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念过私塾小学、中学，学习成绩领先，特别对古典文学、历史情有独钟。善写文章，有很高的写作水平，也爱好体育、文艺。他对人热情直爽，襟怀坦荡，善于团结同志，所以每到一处，他的周围就团结了一批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我们家里经常客坐满窑。

**勤奋博学立志教育**

立功同志参加革命后，从事第一线教育工作时间较长，以后在党政部门工作也基本是教育管理工作。他很爱学，文史政治理论书籍看得最多，工作之余就是看书，似一书痴。对于中国近、古代史、地理情况非常熟悉。1942年整风运动后，调绥德师范任教，带几个班的史地课。他讲课认真，无论哪个朝代的特点，都很熟悉。还编写了不少近、古代史教材。他要求学生很严，同学们很尊敬他。曾在米中读过书、现为西安医科大学心血管专家的崔长宗教授去年提及兄长，感叹地说王立功是他最崇敬的一位老师。

全国解放后，为了提高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文化程度，省上在西安、绥德设立两所工农速成中学，并决定由立功兄任校长。他的治校方针明确，德、智、体全面发展，特别注意保证学生达到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此他首先抓师资质量。当时从全国各地到陕北来了一批知识分子，速成中学很快接收了一批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教师，同时又从绥德地区各中学选调了部分教师，既大胆重用，还注意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充分调动了教职员的积极性。速成中学办得生气勃勃，在短短的几年内，培养了一批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考上了大学，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或从事科学技术工作。20世纪50年代，有次他参加省教育工作会议，省上拟调他到教育厅任职。当省教育厅长赵亚农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还是立志在基层搞教育工作。他不图官，不谋利，默默无闻地在教育第一线辛勤耕耘。

## **赤胆忠心献身于党的事业**

兄长立功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党坚信至终。1939年他参加革命，18岁任南小校长，这副担子够重了。但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尊老爱幼，

团结了全校教职人员，齐心协力办好了学校。每调一处工作，他都是积极认真地完成工作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加强对在职干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绥德地委、专署组织干部上大课学习政治理论，聘请立功同志授课。为了上好大课，他自己下工夫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一讲几个小时非常累，但他总是不辞劳苦地为同志们义务讲课。担任地委、专署文字秘书期间，他写了不少文章。他的语文基础扎实，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所以他为领导起草的讲稿、总结报告等材料，很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赏识和肯定。他的休息时间经常被工作占去，由于过分劳累，身体1较弱。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边区，延安失守，绥德地区情况也很紧急，一切转入战争状态。兄长当时在专署工作，坚持在第一线与敌作战。有次正在宣传动员发动群众与敌斗争，突然被敌包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突围。当时正遇连绵雨水，他们在雨地里突围，终于和大部队取得联系。由于皮肤过分地受阴雨刺激，全身长了疖子，病很严重。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皮肤痒痛折磨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就这样他仍然坚持工作，还经常熬夜写材料。母亲心疼地催他休息，可他总是再痛苦，也要把材料写好。在绥德县委工作期间，为了改善绥德县人民的生活，他经常深入农村体察民情，为县委出谋划策，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县委一把手杨岐山同志每逢提及他便非常怀念地说立功是他共事中最好的一位得力助手。在榆林专署工作期间，他深入到各个学校考察，为发展全区教育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向省上和地区提出过不少建议和意见。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

## 战争困难中胜利信心百倍

无论在困难还是顺利的情况下，兄长对胜利总是充满信心。愈是在困难中，革命意志愈坚强。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向延安进犯，绥德专署紧急动员备战。大概是2月份，绥德专署在一天晚上召集了各单位负责人、党员骨干开会，动员布置全面转入战争状态和转移问题。我们绥德干部子弟学校，是培养我党政军领导同志子女兄妹就读的一所重要学校，是敌人重点追击的目标，专署决定立即全部转移到山西去。我们学校为防敌人飞机轰炸，住在离城20里地的白家碾村。当时人心惶惶，政治认识模糊和家里有困难的职工，产生动摇。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学校的转移任务很重。大会结束后，专署一科长郭文华和立功等同志又召集我们学校的几位同志，专门做了布置，兄长强调要保护好学生，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学校可带可不带的东西，一律坚壁清野，学生的转移是第一位的，孩子们的父兄都在战争前线，保护好孩子们是全体教职员的重要职责，并要我们马上赶回学校，进行转移动员工作。我们几个人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我还想回家辞别老母亲，兄长严肃地说“时间很紧迫，不要回去了。妈的工作由我做，在转移中一定要把孩子们照顾好，特别是低年级学生，行动自理有困难，千万不得有失误。”同时向我们几个人讲，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是暂时的，失去的地方，我们的队伍一定要打回来。毛主席、党中央亲自指挥，胜利终归是我们的。兄长的一席教导，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我就连夜返回学校，投入转移工作。不久，我们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转移到山西中阳县一个小山村，敌人这时也占领了绥德城。兄长一直在各地和敌人迂回战斗。同年秋，专署派他来学校看望全校师生，他讲了战争形势，胜利的消息，使全校沸腾起来。也就是这次，我学打了第一枪。兄长来学校时背着一支长枪，他鼓励我打枪，我在他的壮胆下，打出第一粒子弹。我当

时能坚定地在学校负起转移工作，  
与兄长的革命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

### **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儿童**

立功兄长爱好运动，他身材瘦高，弹跳灵活，是当时绥德有名的运动员。每逢有球赛，必有他上场。记得 1952 年二三月间，天气还凉，绥德地委举办篮球赛。比赛结束后，人流向城里涌去。当时未建大桥，从地委到城里要过小理河，只有一座独木桥。忽然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从他父亲身边掉下河里，桥上和两岸的人都在惊叫，小孩的父亲也惊呆了。这里每年都有淹死人的事件。眼看小孩子就要被卷到漩涡边了，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兄长就要跳入河心，从漩涡边抓住小孩，返回到岸上，将小孩交给其父亲。兄长由于打球出了大汗，被冰水一激，大病了一场。兄长那种舍己救人的事迹，真令人敬佩。

兄长在校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和领导干部。正当干一番事业的时候，38 岁的兄长由于积劳成疾，过早地与世长辞。他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怀念。